《死屋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曾宪溥、王健夫译

================================

目次

==================================

第一部

引言

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僻远地区，在草原、高山或无法通行的森林中间，偶尔会遇到一些有一、两千居民的小县城，这些小县城里的房屋都是木头的，并不美观，每个县城有两座教堂——一座在城里，另一座在墓地；这些小县城与其说象城市，还不如说象莫斯科郊外较大一点的村庄。这些小县城一般都派驻有相当多的县警察局长、陪审员和各种下级官员。一般说来，尽管西伯利亚气候寒冷，但在这儿当差奉职却是特别舒适的。居民朴实，缺乏自由主义思想，一切秩序都是旧式的、始终不变的、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尊崇的。那些实际上在西伯利亚充当着贵族角色的官吏们，或者是本地的土著即西伯利亚人，或者来自俄罗斯，大部分则来自京都，他们都是被那额外的薪俸、双倍的驿马费或令人向往的日后的美好前程吸引来的。其中善于解答人生之谜者，几乎总是留在西伯利亚，高高兴兴地在那儿扎下根来，尔后结出丰硕、香甜的果实。另外一些处事轻率、不善于解答人生之谜的人，则很快便对西伯利亚厌倦起来，他们满腹忧愁地暗自问道：为什么要到西伯利亚来呢？于是他们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法定的三年任期的终结，任期一满，便立即请求调离职守，返回故里，并对西伯利亚大加咒骂和嘲笑。其实，他们错了：别说从当差奉职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在西伯利亚也是有福可享的。这里气候良好；这里有很多家资巨富而又慷慨好客的商贾；这里有很多非常富有的非俄罗斯人。这里的小姐们更是象玫瑰花一样美丽，而且品德都极为高尚。这里的飞禽走兽在大街上乱飞乱跑，自投于猎人的罗网之中。香槟酒可以尽情地喝，至于鱼籽酱，则更是味美异常。说起农作物的收成，有些地方常常是春播一升谷，秋收万斗粮……总之，此处真乃福地也。只要会享受它就行。在西伯利亚，人们是会享受的。

在这些喜气洋洋而又自我满足的小县城当中，有一个小县城连同它那十分可爱的居民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个小县城里，我遇见过一位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的流放犯——他出生在俄国，从前是贵族兼地主，后来因为杀死妻子变成了第二类苦役流放犯。他服满法定的十年苦役后，作为一个移民在 K 城定居下来，恭顺地、无声无息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虽然被正式登记为该城的城关居民，但却住在城里，因而得以依靠给孩子们讲授功课为生。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县城中，常常有请流放犯当家庭教师的情况，人们并不歧视这些人。他们主要是教法语，这种语言在社交场所是十分需要的，如果没有他们当教师，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僻远地区，人们对法语就会一无所知了。我第一次遇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在一位功勋卓著而又慷慨好客的旧官吏伊万·伊万内奇·格沃兹季科夫的家里。这位官吏有五个年岁大小不等的女儿，她们都有各自的锦绣前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每周给她们上四次课，每次报酬为三十戈比。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外貌引起了我的兴趣。他面容十分憔悴，瘦瘦的个儿，年岁还不算老，只有三十五岁左右，身体矮小而孱弱。他总是穿西装，衣着整整齐齐。当你同他谈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盯着你，十分有礼貌地倾听着你的每一句话，仿佛对你的每一句话都在加以深思，又仿佛你是在用提问盘诘他，想要探听出他的什么秘密；对于你提出的问题他总是给予明确而简短的回答，但却认真掂估着每句话的份量，使得你不知为什么会突然感到不自在起来，到最后，连你自己也希望赶快结束这场谈话。我当时曾向伊万·伊万内奇打听过他的情况，他说戈梁奇科夫在为人方面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品行端正，否则伊万·伊万内奇就不会聘请他给自己的女儿们讲课了；但他性情十分孤僻，不同任何人来往；他知识渊博，读过很多书.，但却沉默寡言；一般说来，要想同他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是十分困难的。有人断言，他多半是个神经失常

的人，虽然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缺点，就连城里许多有名望的人，对他还另眼看待呢；人们都说他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因为他会写呈文等等。大家揣想，他在俄国内地大概有很多亲戚，而且可能还是一些很有地位的人，可是大家也知道，自从他被流放以来，他便毅然决然地同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总之，他在摧残自己。此外，我们全都了解他的一些往事：婚后不到一年，他出于嫉妒就把自己的妻子杀了，然后又去自首(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他的刑罚)。人们往往把这类罪行看做是一种不幸，并替犯这类罪行的人感到惋惜。尽管如此，这个怪人仍然执拗地回避着一切人，只是在教课时，他才抛头露面。

起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可是后来，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我竟渐渐开始对他发生了兴趣。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东西。要想同他进行交谈，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啦，对于我提的问题他总是给以回答，而且往往带着这样的神清，仿沸认为回答我的问题是他首要的责任似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等他回答完我的问题以后，我就不愿再多问他什么了；每次谈完话，他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痛苦和疲倦的表情。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在一个挺好的夏天的傍晚，我和他一起从伊万•伊万内奇家出来，我忽然想请他到我家去坐坐，抽支香烟。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他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惊骇万状的神色；他完全惊慌失措了，嘴里开始嘟哝出一些不相连贯的话来，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突然拔腿朝相反的方向跑去。我感到十分诧异，从那以后，每逢遇到我，他仿佛都带着一种惶惑不安的神情看着我。不过，我也并未就此罢休，我很想去看看他，一个月以后，我竟无缘无故地亲自去登门拜访戈梁奇科夫了。当然啦，我这样做也难免有些愚蠢和鲁莽。他寄居在城边上一位老太婆的家里，那位老太婆家里有个患肺病的女儿和一个小外孙女，小外孙女是个私生子，才十岁左右，长得十分漂亮，而且十分活泼可爱。我走进屋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正和小女孩坐在一起，教她念书。他看见我以后，显得十分困窘，仿佛他正在干一桩犯罪的事情被我当场抓住了一样。他惊恐万状，霍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瞪大眼睛瞧着我。我们好歹总算坐下来了；他留心观察着我的每一个眼神，仿佛疑心我的每一个眼神里都有特别神秘的涵义。我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已经多疑到了发狂的地步。他悻悻地望着我，几乎就要说出：“你怎么还不赶快从这里给我走开了？”我同他聊起天来，谈起我们的这个小县城和一些日常新闻；他却避而不答，只是恶狠狠地冷笑着；看来，他不但不了解那些最普通的、人所共知的城市新闻，而且对它们也不感兴趣。后来，我又谈起我们这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的需求，他仍一言不发地听我讲，而且十分奇怪地瞧着我的眼睛，弄得我最后竟为我们这次谈话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不仅如此，我手里拿着的一些新书和报刊也险些儿惹恼了他，这些书刊是我刚从邮局取来的，我表示愿意把这些尚未裁页的新书借给他看。他贪婪地朝书刊看了一眼，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推辞说没工夫阅读，拒绝了我的建议。最后，我向他告别，走出大门以后，我觉得仿佛有千钧重担从我心头掉落了下来。我感到十分羞愧，觉得死死纠缠着这样一个决心要永远与世隔绝的人不放，是极其愚蠢的。不过，事情毕竟已经这样做了。我记得，我在他屋里几乎连一本书也没有发现，可见，人们说他读过很多书，那是不确实的。不过后来，当我有两三次在深夜里从他窗前走过时，我发现屋里有灯光。他通宵达旦地坐在屋里干些什么呢？莫非是在写作吗？若是这样，他又在写些什么呢？

后来我因事离开我们的小县城约有三个来月。返回时已是严冬，我听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已于秋天亡故了，他是在孤独无依中死去的，甚至连一次医生也没有请过。县城里的人几乎已经把他给忘记了。他的住房空荡荡的。我立即把女房东请来，想从她那里打听一下：她的房客临死前都在干些什么？他写过什么没有？我给了她二十戈比，她把死者留下的一大筐碎纸抱到我面前。老太婆告诉我，有两个本子已被她撕毁了。她是一个悒郁不乐、寡言少语的老太婆，从她嘴里很难探听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关于自己的房客，她没有向我提供任何

特别新鲜的情况。据她说，他几乎从来都不做任何事情，一连几个月都不翻翻书本，也不提笔写字，但却整夜整夜地在屋里踱来踱去，老是在沉思默想，有时还喃喃自语；他非常喜欢并怜爱她的小外孙女卡佳，特别是当他知道小外孙女的名字叫卡佳以后，每逢圣卡捷琳娜节，他都要去祭祀某个人。他不喜欢接待客人，只是在教孩子们功课时，他才出门；甚至当这位老太婆每周一次照例给他整理房间的时候，他都拿白眼瞥着她。整整三年期间，他从未跟她说过一句话。我问卡佳：她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老师？她默默无语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身去，对着墙壁哭了起来。看来，这个人也会使人喜爱他的。

我把他的碎纸带回去，整理了整整一天。这些碎纸有四分之三都是一些没有写过任何字的空白纸，或者是一些带有书法示范字样的学生作业。不过我也从中发现了一个相当厚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但却没有写完，很可能是被作者本人遗忘在一旁了。这是一部手稿，是关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所度过的十年苦役生活的描述，虽然很不连贯。手稿中有些地方断断续续，中间穿插着一些荒诞离奇而又惊心动魄的回忆，那些回忆仿佛是为某种情势所迫而匆忙写成的，字体大大小小，极不均匀。我曾多次反复阅读过其中的一些片断，我几乎确信这些回忆都是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写成的。不过据我看来，这本苦役生活手记(或者叫做“死屋手记”——这是作者本人在自己的手稿中给它取的名字)，也并非索然无味。一个至今尚未为人所知的崭新的世界，一些离奇怪诞的事实，一些关于潦倒的人们的专门记载，把我给吸引住了，其中有些章节我还颇有兴味地诵读过。当然啦，也可能是我错了。现在不妨先选取其中两三章来试试，让公众去作评判吧……

第一章　死屋

我们监狱位于要塞的边缘上，紧靠着要塞围墙。有时，你透过木桩栅的缝隙向外窥视上帝的世界，看看能否瞧见点儿什么？——你看到的只是一小块天空，高高的、野草丛生的土围墙，日日夜夜在围墙上来回巡逻的卫兵；这时你会这样想：若干年后，倘若再来透过木桩栅的缝隙向外窥视，你看到的大概仍将是这堵围墙，同样的卫兵以及那块小小的天空，不过，那天空并不是监狱上面的天空，而是另外一个遥远的、自由的天空。监狱大院长二百步，宽一百五十步，呈不规则的六角形，四周被高高的木桩栅围起来，木桩栅是由一根紧挨着一根深埋在土里的、上端削尖、横钉着木板条的高大木桩构成的：这就是监狱最外面的一道院墙。院墙的一边开着一道坚固的大门，大门总是关闭着，日日夜夜由卫兵守卫着，只是在需要放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才打开。这座大门外面便是光明而自由的世界，那里的人们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生活在院墙里面的人，往往把外面的世界想象为某种无法达到的仙境。这里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它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里有它自己独特的法律，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俗习惯，这里是一座真正的死屋，这里的生活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不相同，人也是特殊的。我现在要叙述的就是这个特殊的角落。

你一走进这个大院，便会看见院子里有几排房屋、两排长长的木房沿着宽阔的内院两侧伸展开去，这就是狱室，囚犯们分类住在这里。接着，院子深处有一排同样的木房，这是伙房，它分为两部分；再往后，还有一排木房，它是一排被当作贮藏室和库房使用并堆放杂物的棚子。院子中间空荡荡的，是一块相当大的平地。犯人在这里集合排队，早上、中午、晚上在这里点名，有时一天要点好几次名——这要根据卫兵的多疑程度以及他们计算人数的能力而定。周围，木房和木桩栅之间，还有一大片空地。犯人中那些性格孤僻而又郁闷的人，都喜欢在工余时间到木房后面去散步，以避开众人的眼睛，想自己的心事。我常常在散步时

和他们相遇，我喜欢端详他们那抑郁不乐、打着烙印的面孔，揣测他们都在想些什么。有个流放犯喜欢在空闲时数木桩的数目。木桩共有一千五百根，他一根一根地数着，并在上面做记号。每根木桩代表一天，他每天记下一根，这样，根据尚未做记号的木桩的数目’，一眼便可以看出，到刑期结束时他还要在狱中待多少日子。当他记完这六角形的木桩栅的一边时，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还得在狱中度过很多年头；不过，在监狱里是有时间学会忍耐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在狱中被关押了二十年的犯人，在获释时如何向狱友们告别。有人记得他最初入狱时还很年轻，那时他无忧无虑，既不考虑自己的罪行，也不考虑对自己的惩罚，可是出狱时他已变成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面色忧郁而愁苦。他默默不语地走遍我们所有的六个狱室。他每走进一个狱室，便向圣像祈祷，然后向狱友们深深地鞠躬，请求他们原谅。我还记得，有个犯人入狱前原是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一天晚上被叫到传达室。半年前他曾得到通知说，他原来的妻子已经改嫁，因此他伤心得要命。可是现在她却亲自探监来了，并给他送来了东西。他们谈了大约两分钟，两个人恸哭了一场，便永别了。等他回到狱室时，我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是的，在这个地方，人是可以学会忍耐的。

天一黑，我们便被关进狱室，一夜不许出屋。每当我走进我们的狱室时，我心里总是感到十分沉痛。一排又长又矮又令人窒息的大房间，动物油蜡烛发出朦胧的光线，屋里充满着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气味。我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怎能在这儿度过了十年。我在通铺上占有三块木板：这就是我的全部位置。在我们这间狱室的通铺上，一共睡着三十个人。冬天，门很早就上了锁，可是要等大伙都躺下睡觉，还得等上四个小时；睡觉前是一片喧哗声，吵嚷声，笑声，咒骂声，镣铐的叮当声，油烟的气味，剃去半边的头，打着烙印的脸，破衣烂衫，全都是被责骂和被侮辱的……唉，人的生命力真强啊！人是一种能习惯于任何环境的动物，我以为给人下这样一个定义是最恰当不过的。

我们监狱里关押着二百五十个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固定的。一些人被送进来，另一些人期满后被放出去，还有的则死在狱中。唉，这里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想，俄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大概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被关在这里。这里也有非俄罗斯人，有几个流放犯甚至来自高加索山区。所有的犯人都是按照犯罪的程度来划分的，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刑期的长短来划分的。应当说，这儿各种各样的罪犯都有。民事苦役流放犯是全狱犯人的基础。这类犯人的一切权利均被剥夺，他们已与社会完全失掉了联系，他们脸上的烙印永远证明他们是被抛弃的人。他们被流放到这儿来服苦役，刑期一般是八至十二年，’刑满后作为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村。这里也有军事犯，他们的公民权未被剥夺，其处境类似俄国某些军犯连中的犯人。他们的刑期较短，刑满释放后往往被送回原地或西伯利亚的一些边防营去当兵。可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释放后，往往因再次犯下重大罪行而又立即被送回监狱里来，不过这次刑期就不是短期，而是二十年了。人们把这类罪犯叫做“终身犯”。尽管是“终身犯”，但他们的公民权并未完全被剥夺。最后，还有一类最可怕的犯人，他们人数颇多，主要是军人。这一类叫做“特别部”。犯人是从俄国各地发配到这儿来的。他们自认为是“终身犯”，也不知道自己的刑期。按照法律，他们应当从事两倍或三倍的苦役劳动。在西伯利亚开设最繁重的苦役营以前，他们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你们服苦役有期，而我们服苦役无限”——他们对其他犯人这样说。后来，我听说这一类苦役犯被废除了；此外，在我们要塞里，连民事犯部也被取消了，而只设单一的普通军犯连。当然，与此同时，狱方长官们也有所调换。所以，我所描述的是早已逝去的往事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些往事现在回忆起来，犹如一场噩梦。我还记得我入狱时的情景。那是在十二月里的一个傍晚。已是黄昏时分，犯人们收工回来，正准备点名。一个大胡

子士官终于把通向这座奇怪的牢狱的大门给我打开，让我走了进去。从这时起，我将要在这座牢狱里度过许多个年头，经受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过，我对于这种艰难困苦是不会有任何了解的。比方说吧，我无论如何也不敢设想：在整整十年服苦役期间，我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在一起过；一次也没有，就连一分钟也没有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令人痛苦的呢？干活时，有卫兵监视，回到监狱，有二百多个狱友和我在一起，我一次也没有单独一个人在一起过！不过，还有比这更使我不习惯的事情呢！

这儿有出于无意而误杀了人的杀人犯，也有杀人成性的凶手，有强盗，也有强盗首领。有骗子手，有掏腰包的扒手，有小偷和无业游民。还有一些人，很难断定他们是因为什么到这里来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就象昨天醉后的狂态那样含糊不清和令人感到痛心。一般说来，他们很少讲述自己的经历，显然他们都竭力不去回忆往事。我认识的人中，甚至有几个是杀人凶手.，然而他们总是那样愉快活泼，那样无忧无虑，我敢打赌说，他们的良心从来没有责备过他们自己。但是也有一些悒郁寡欢的人，他们几乎总是沉默不语。总之，很少有谁讲述自己的往事，问长问短的风气在这里并不盛行，不知为什么这里却没有这种习惯，都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宜的。有的人只是因为无事可做，才偶尔说起话来，.另一个人则冷淡而郁郁不乐地听着。在这里，谁也不会使人感到惊奇。“我们都是识字的人！”——他们常常用十分自负的口吻说。我记得，有个强盗有一天喝醉了酒(监狱里有时也可以弄到酒)，开始讲起他怎样杀害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起初用玩具把小男孩引诱到一个空棚子里，然后就在那里把小孩杀死了。当时正在听他讲笑话的全狱室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那个强盗这才不得不住了口；全狱室的人之所以喊叫，并不是由于气愤，而是因为不应该讲这种事，因为讲这种事是不适宜的。我要顺便指出，这些人确实都识字，这是从“识字”这个词的直接意义上讲的。他们当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会读会写。在俄国人集中的地方，你能在哪里从二百五十个人中间找出一半识字的呢？后来我听说，有人从这类统计数字中得出结论说：读书识字能摧残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有另外的原因；虽然不能不同意，读书识字能激发人的自信心。但这完全不是缺点。从服装上便可以区分出犯人的不同类别：有些人的短上衣一半是暗褐色，另一半是灰色，裤子也是一样——一条腿是灰色，另一条腿是暗褐色。有一次，我们正在干活，一个卖面包圈儿的小女孩走到犯人跟前，她把我端详了好一阵，然后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喊道：“唉呀呀，真难看！灰布不够用，黑布也短缺！”还有一些人，上身全是灰色，但袖子却是暗褐色的。我们的头也剃得互不一样：一些人竖剃半边头，另一些人则横剃半边头。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奇怪的大家庭中的人，有着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就连那些自以为比别人优越、个性最突出、脾气最古怪的人，也力求同整个监狱的共同点协调起来。一般说来，除了那些一味取笑逗乐而被大家看不起的少数人以外，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一些抑郁寡欢、喜欢嫉妒、虚荣心很重、自我吹嘘、器量狭小而又十分注重外表的人。谁若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到惊奇，便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他们都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爱面子都爱到了发狂的程度。然而最傲慢的表情，有时也会突然间闪电般地变为最怯懦的表情。有几个真正是膂力过人的人，他们纯朴憨厚，也不装腔作势。但说也奇怪，就是在这些膂力过人的囚犯当中，有些人也十分爱虚荣，几乎成了病态。总之，虚荣和外表是最重要的。其中大多数都腐化堕落到了可怕的程度。拨弄是非、造谣中伤的事情经常发生：这儿简直是地狱一般的环境，漆黑一团，令人无法忍受！但是对监狱内部的常规和惯例却无人敢去违抗。有些个性很强的人，起初觉得这种常规和惯例很难遵守，但毕竟还是遵守了。有些犯人，在自由时由于过于鲁莽和胆大妄为而终于犯罪，被捕入狱；他们所以犯罪，似乎并非出于本意，似乎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他们仿佛是在神志不清、迷离恍惚的状态下犯罪的，往往是由于虚荣心膨

胀到了最大限度而导致了犯罪。尽管有些人入狱前是全村或全城中最令人可怕的人物，但一进监狱，他们的威风立刻便被刹住了。新入狱的人向四周一瞧，很快就会发现他走错了地方，这里没有人会对他的到来感到惊奇，于是他不知不觉地也就变得俯首听命，屈服于一般的风气了。这种一般的风气表面上表现为某种特殊的自尊感，而这种自尊感几乎是狱中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苦役犯和被判刑者的称号仿佛真的是一种头衔，而且是一种荣誉头衔。连一点点羞愧和悔恨的迹象都没有！不过，他们都保持着一种表面上即形式上的俯首听命，以及某种悠闲自在的夸夸其谈习气："我们都是一些堕落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说，"既然自由时不会生活，那么现在只好穿绿街①，检阅队列了。"——"在家不听父母言，如今要听皮鼓声②。"——"既然不愿金线缝衣，现在只好鎯头砸石。"

****

①"穿绿街"是旧俄时代军队中惩罚士兵的一种残酷刑罚。手持树条的士兵站成两行，裸体受刑者从两行士兵中间穿过，每个士兵必须用树条抽打受刑者，否则自己就要受刑罚。
②在执行"穿绿街"这一刑罚时，有士兵在旁击鼓。

****

所有这些话，都是作为劝谕人的箴言或谚语而说出的，从来没有当真说过。这些话也只不过是顺口讲讲而已。他们中间未必有人从内心承认过自己的非法性。如果有人试图谴责一个犯人的罪过或把犯人痛骂一顿(虽然谴责犯人是与俄国人的精神不相符合的)，那他就会遭到无休止的辱骂。他们都是一些多么了不起的骂人专家啊！他们骂得既别致又艺术，已经把谩骂提高到一门科学的水平，他们所竭力选择的与其说是刺耳的字眼，倒不如说是带有侮辱性的、能损伤对方精神和思想的词句——这就显得更加别致和更加恶毒了。由于他们经常不断地争吵和谩骂，这门科学便在他们中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人全都是被迫参加劳动的，因而他们一个个都变得游手好闲，腐化堕落：如果说他们原先还没有腐化堕落，那么在监狱营里他们却都变坏了。他们这些人都不是自愿聚集到这里来的；他们彼此是陌生的。

"在把我们大家聚集到这儿来以前，魔鬼至少踏破了三双树皮鞋①！"—他们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

①过去，俄国农民大都穿树皮编的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从四乏八方聚集到监狱里来，是不容易的。

****

然而接踵而来的就是诋毁中伤、尔虞我诈、婆婆妈妈的拨弄是非、嫉妒、争吵、仇恨，这一切在这地狱般的生活中总是占着首要的地位。任何一个泼妇也不会象这些凶手中间某些人那样善于拨弄是非。我再重复一遍，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膂力过人的人，这些人一生习惯于出人头地和统治别人，他们老练沉着而又无所畏惧。这些人自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尽管他们也常常热衷于维护自己的威望，然而他们却不压制别人，也不参与无聊的谩骂，他们都有很强的自尊心，遇事审慎，而且几乎总是服从狱方，——但这种服从并不是出于顺从或自觉地遵守义务，他们仿佛同狱方有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默契。不过，大家同他们相处都很谨慎。我记得，这些犯人中间有一个遇事果断而又无所畏惧的人，他那残忍的癖性也为狱方所知，有一次不知因为犯了什么罪而被带出去受刑。当时正是夏天，大家都没有干活。那位直接管辖监狱的少校亲自来到大门旁边的卫兵室里监刑。对于犯人来说，这位少校真乃是他们注定要碰上的凶神恶煞，他残酷地折磨这些犯人，以致他们一看见他就浑身发抖、打颤。他严厉到了极点，正如苦役犯们所说的，他象一只饿虎一样，"见人就扑"。他们最害怕的是他那双锐利的大山猫眼睛，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他好象什么也不看，其实什么都看见了。从监狱这头一进来，他便知道那头在干什么。囚犯们都管他叫"八只眼"。他采用的管理方法是错误的。

他采用的那种疯狂而残忍的管理办法，只能使那些已经十分凶狠的犯人更加凶狠，如若不是他的顶头上司——气度豁达而又遇事审慎的要塞司令时常制止他的野蛮行动，他的那套管理方法恐怕早就闹出大乱子来了。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能得到善终！后来，他退休了，日子过得挺好，而且身体健康，虽然受到了审讯。

有个犯人，一听到喊他的名字就脸色发白。他受刑时，通常都是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上，任人鞭挞，受完刑罚后，霍地站起来，冷静而严肃地对待这次倒霉事件。尽管如此，狱方对待他仍然十分谨慎。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他却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脸色苍白，悄悄地背着卫兵把一把锋利的英国制鞋匠用刀藏在袖筒里。在狱中，刀或任何别的锋利器具是被严格禁止的。常常进行突然而严格的搜查，违法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过，一个小偷要想把什么东西藏起来，那是很难搜查出来的，而刀子或其他工具在监狱里又是时常需要的，因此，不管如何搜查，这些东西从未被搜净过。如被搜去，立刻又弄出新的来。这时，全狱的犯人都跑到木桩栅跟前，屏住气息透过缝隙向外观看。大家都知道，彼得罗夫这一次并不想乖乖地躺下挨打，看来，少校的末日来临了。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的少校却坐上轻便马车走了，把行刑的任务委托给了另外一个军官。“上帝亲自搭救了他！”——后来犯人们都这么说。至于彼得罗夫，他却满不在乎地忍受了这次刑罚。他的愤怒因少校离去而消失了。犯人可以顺从驯服到一定的程度，但却不能超越这个限度。顺便说一句，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急躁心理和执拗脾气的恶性发作更使人感到有趣的了。一个人往往能忍耐若干年，他俯首听命，忍受最残酷的刑罚，可是有时，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甚至什么都不为，却突然发作起来。从某种观点来看，甚至可以把他叫做疯子；可是人就是这样的。

我已经说过，数年中，我从未看到他们当中有谁曾有过一点点悔过的表示，他们在想到自己的罪行时，一点也不感到沉痛，相反，大多数人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无罪的。这是事实。当然，虚荣心、邪恶的榜样、胆大妄为、虚伪的羞愧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有谁能够说，他曾探究过这些受到创伤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了解过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奥秘呢？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本来是能够发现、捕捉、探听出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奥秘，以证实这些人内心中的烦恼和痛苦的。但却没有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这样过。是的，犯罪行为似乎是不能单从犯罪已构成事实这一现成的观点来理解的，犯罪的哲理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奥。不用说，监狱和强制性劳动制度是感化不了犯人的，这一切只能惩罚他，只能保障社会的安宁，使社会不再遭受这些凶犯的进一步破坏。监狱和最繁重的苦役只能在犯人心中助长仇恨，增强他们对被禁止的安逸享乐的渴求和令人可怕的轻率。我深信，这种受到过分赞扬的单独囚禁制度只能达到虚伪的、骗人的和表面的目的。它吮吸着人的生命之液，摧残、惊吓着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灵衰弱枯竭，然后把这个精神上已枯萎成木乃伊的半疯的人，捧出来当作感化和忏悔的典范。不消说，奋起反抗社会的罪犯是仇视社会的，他们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无罪，而有罪的是社会。他们既然受到了社会的惩罚，因而几乎就认为自己是已被肃清、被清算的人了。最后，根据这种观点可以断定，几乎无须再替罪犯本人进行辩护了。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但任何人都承认，有些罪行，无论何时何地或依照何种法律来判断，自从有人类以来就被认为是不容争辩的罪行，而且只要有人类存在，仍将被认为是这样的。我只是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一些最可怕、最不正常的罪行和最骇人听闻的凶杀事件，可是讲述者在讲述这些事件时却流露出一种十分天真的、抑制不住的嬉笑态度。有一位弑父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出身于贵族，家里有一个六十岁的父亲，在老人眼里他似乎是一个败家子。他行为十分放荡，到处欠债。父亲约束他，规劝他；父亲有一套房屋和一处田庄，估计还可能有一笔现款，儿子因急于得到遗产，

便把父亲杀了。这桩凶杀案一个月以后才被破获。凶手本人最初到警察所声称，他父亲失踪了。整整一个月期间他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警察终于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发现了尸体。他们院子里有一条很长的上面盖着木板的脏水沟。尸身就躺在这个阴沟里。死者穿得整整齐齐，.那鬓发斑白的头颅被割了下来，但还附在身上，凶手还在死者头下放了一个枕头。尽管他没有招认，法庭仍判决剥夺他的贵族资格，革职并发配服苦役二十年。在我和他相处期间，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逗笑取乐、喜气盈盈。他是一个性情乖张、轻率浮躁、遇事极不审慎的人，但他绝不愚蠢。在他身上我从未发现有什么特别残忍的东西。犯人们瞧不起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行(关于这一点人们从来不提)，而是因为他糊里糊涂，因为他的举止令人讨厌，他在谈话中有时也提到他父亲。有一次，当他和我谈到他们家族的遗传因子的时候，他说："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一直到死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有什么病。"这样的冷酷无情，自然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这是一种特殊现象：这不单纯是犯罪行为，而是一种尚未被科学发现的体质上的缺陷，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畸形发展。自然，我并不相信这种罪行。可是他那些对他的经历了解得十分详细的同乡，也都是这样对我说的。事实是如此明显，使人不能不相信。

犯人们有一次在夜间听见他在梦中大喊大叫："抓住他，抓住他！砍掉他的头，头，头！……"

几乎所有的犯人在夜间都说梦话。他们咒骂，说黑话，刀、斧子等等是他们发梦呓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字眼。"我们是被人揍得丧魂落魄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被人家掏去了，所以夜间才大叫大喊。"

官方规定的强制性奴役劳动并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义务，犯人们干完限定的活或消磨完法定的干活时间以后就回监狱。他们仇视劳动。一个人若是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一种能把自己的全部智力和精力都用上去的工作，他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囚犯都是一些发育成熟、过过痛痛快快的生活而又非常渴望生活的人，他们被迫聚集到这里，被迫脱离了社会和正常的生活，用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在这里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愿过一种有规律的、正常的生活呢？单是无所事事这一点，就能在他们身上产生出犯罪的特性，关于这种特性他们过去并不了解。一个人如若不劳动，如若没有合法的、正常的财产，他就不能够生存，他就要腐化堕落，变成兽类。因此，在监狱里，由于自然的需求和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技能和工作。在那漫长的夏日，几乎整个白天都得参加法定的强制性劳动，短短的夜晚只够勉强用于睡眠。然而到了冬天，天一黑犯人照例就被关进狱室。在漫长而寂寞的冬天晚上，他们总可以干点什么了吧？因此，不顾狱方的禁令，每个狱室几乎都变成了巨大的作坊。劳动和工作本身并不被禁止，但却严禁犯人持有工具；可是没有工具是不能工作的，于是他们便悄悄地工作起来，有时连狱方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佯装看不见罢了。犯人中间有许多人入狱时什么也不会干，但他们向别人学，结果，出狱时他们都成了很好的技术工人。这里有皮靴匠，鞋匠，裁缝，木匠，小炉匠，雕刻匠，镀金工匠。有个叫伊赛•布姆施坦的犹太人，他既是镀金工匠，又是放高利贷者。他们每个人都做点儿什么，都力图赚几个钱。他们常常接受城里的订货。金钱是模压出花纹的自由①，
****
①俄国的金卢布上模压着花纹，这里的意思是说钱能通神。
****
对于一个完全失去自由的人，金钱就更加十倍地贵重了。金钱在他的衣袋里叮当一响，他便得到了一半安慰，即使花不掉它们也是如此。不过，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花掉的，"禁果分

外甜”呀！就是酒，在狱中也能够弄到。烟袋是严禁之物，但人人都吸烟。金钱和烟草使得他们不患坏血症和其他疾病。工作使得他们不犯罪，如果不干活，犯人就会象玻璃瓶里的蜘蛛那样互相吞噬。尽管如此，工作和金钱仍是被禁止的。往往在夜间进行突然搜查，所有的禁品全部被搜去，至于钱，无论藏得如何严密，有时仍被暗探搜去。他们之所以都不贮存钱，而是很快地喝掉，其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因而酒也被弄进监狱里来了。每次搜查以后，那些犯了过错的人除失去其全部财产外，通常还要受刑罚。尽管如此，每次搜查以后，所损失的东西立刻又弥补上了，新的物品立刻又被弄进来，一切依然如故。狱方也了解这一点，犯人对于受刑罚也不抱怨，不过这种生活仍象是居住在维苏威火山②上一样，令人胆战心惊。
****
②在意大利南部，是世界上馨名的.火山区。
****

不会手艺的人则想别的办法搞钱。有些办法也真够独出心裁的了。比方说，有的人专门从事倒卖，有时他们倒卖的东西，就连监狱外面的人也难以想到，甚至算不上是什么东西。苦役犯们都很穷，但做生意的本领却很大。就连一块破布也值钱，也可以利用。由于贫穷，金钱在监狱里的价值和狱外相比也是大不相同的。一件十分复杂并付出了大量劳动的活计，只能赚几个铜板。有些人甚至放起高利贷来，而且很成功。有些陷入困境或被弄得贫困不堪的犯人，常常把自己最后一件东西送到高利贷者那里去典当，以换取几个铜板，而且利息往往高得惊人。那些抵押品若是到期不赎回，便会被人毫不犹豫和毫不怜惜地卖掉；放高利贷这一行业是如此兴隆，以至连公家发给的一些物品如衣服、靴鞋等等，也都成了抵押品，这些东西都是每个犯人随时随地所必需的。然而，在进行这种典当时，往往也发生这样一种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典当者得到钱以后，二话不说，径直跑到直接负责监狱事务的看守长那里去报告，说他把公家发给的东西典当出去了，于是看守长立刻下令把那些抵押物从高利贷者手里取回来，处理这种事情甚至无须向上级报告。更为有趣的是，在处理这种事情时连争吵都没有发生过：放高利贷者一声不响地哭丧着脸把东西退还给物主，好象他自己也已料到，结果必定会是这样的。也许他内心里不得不承认，如果他处于典当人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做的。所以，即使他事后骂上几句，那也并非出于恶意，只是为了不使自己感到懊悔而已。

一般说来，犯人中间互相偷窃之风是相当厉害的。每个犯人几乎都有一个上了锁的小箱子，收藏着狱方发给的东西。小箱子是准许有的，但小箱子也并不保险。我认为可以想象得到，犯人中间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小偷。我有一个狱友，对我忠心耿耿(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但却把我唯一的一本准许在狱中阅读的圣经给偷去了；可是他当天便亲自向我招认了这件事，他所以招认，并非出于悔过，而是由于他看我找了好久，替我感到难过。那些贩酒的人，很快都发了财。关于贩酒的事我以后还要专门讲到，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犯人当中有很多人是走私犯，因此尽管处在严格的监视和警卫之下，他们仍想方设法把酒弄进狱中来，这是不足为奇的。再说，走私，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比方说，你能够想象到，对于某些走私犯来说，金钱和营利并不是主要目的，而只在他们心目中占次要的地位吗？然而，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他们热衷于走私，把走私看作是自己的天职。走私犯多少有点象是诗人，有着很高的想象力。他常常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但他狡猾奸诈，善于施展诡计，能够顺利地躲过难关；有时他的行动简直是为某种灵感所驱使。走私的热情是如此强烈，犹如赌博一样。在监狱里，我认识一个犯人，他身体魁梧，但性情却十分娴静、温存、谦恭，很难想象他怎么会被关进了监狱。他性格十分善良，善于与人相处，他在蹲监狱期间从未和任何人争吵过。他是因为走私而被人在西部边界上捕获并关进监狱的，当然啦.，他

恶习未改，于是又私运起酒来了。他因为私运酒而被惩罚过多少次啊！而且他非常怕受鞭笞！其实，贩酒本身给他带来的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报酬。靠卖酒发财的只是那些生意人。这个怪人纯粹是为走私而走私。他总是象女人那样哭哭啼啼，受过刑罚以后，曾多次发誓洗手不干了。他有时也下过决心来约束自己，但是过不了一个月，最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由于这些人的走私，监狱里从来没有断过酒。

最后，犯人还有一项收入，尽管犯人靠它发不了财，但这项收入却是源源不断和大有好处的。这便是施舍品。我们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不大了解那些商人、小市民和全体老百姓是如何关怀我们这些"不幸的人"的。施舍品几乎总是经常不断，经常布施的是大大小小的面包和面包圈儿，偶尔也有现款。如果没有这些施舍品，许多地方的犯人，特别是那些受严格禁闭的待审犯人，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加艰苦。犯人们按照宗教仪式平均分享这些施舍品。整块的面包若是不够分，便切成小块平均分给大伙，有时甚至把面包切成六块，每个犯人都能分到一块。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接受现款施舍时的情景。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有一天我在卫兵的押送下干完早活回来。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才十岁左右，长得十分漂亮，象一位天使。在这以前我曾看见过她们一次。那女人是一个军人的遗婿。她丈夫是一个年轻的士兵，由于忍受不了刑罚而死在医院囚犯病房里了，当时我也正在住院。母女俩来医院向死者告别，哭得都很悲恸。小女孩一看见我，便涨红了脸，低声跟母亲说了句什么；母亲立刻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摸出一个铜板交给小女孩。小女孩跑过来追我……"给你，不幸的人，看上帝的面上，收下这个铜板吧，"——她一边喊，一边跑到我跟前，把铜板塞到我手里。我接过她的铜板，她这才高高兴兴地跑回母亲身边。这个铜板在我身边保存了很久。

第二章　最初的印象

最初的一个月以及我早期的监狱生活，至今记忆犹新。此后几年的监狱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却模糊得多了。有些事情仿佛已被忘却，彼此混在一起，只剩下一种笼统的印象：痛苦的、单调的、令人窒息的印象。

然而我在苦役犯生活的初期所经历的一切，至今回忆起来仍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清楚地记得，从我开始过上这种生活的最初几天起，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仿佛并未发现其中有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异乎寻常的、或者不如说是使人感到意外的东西。这里的一切，似乎早在我前来西伯利亚的途中，当我竭力猜测我未来的命运时，我就想象到了。可是过了不久，无数出乎意外的怪事和骇人听闻的事件，便接连不断地发生。只是到后来，当我在狱中度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我才充分了解到这种生活究竟有多么奇特，多么不可思议，因此我越发感到惊愕了。老实说，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中，这种惊愕心理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始终也未能适应这种生活。

入狱后，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无比厌恶；尽管如此(说也奇怪！)，监狱里的生活比起我在路途中所想象的却要轻松得多。囚犯们尽管戴着脚镣，但却可以在狱中各处自由行走，他们吵骂，唱歌，干私活，吸烟，甚至喝酒(虽说是少量的)，到了夜间，有的人还斗牌赌博。比如说，在我看来劳动本身并不那么繁重，并不象苦役，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以被称为繁重的苦役，与其说是在于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

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一个自由的农民所干的活可能要繁重得多，有时甚至还得通宵地干，特别是在夏天；然而他是为自己干活，而且有实际的目的，比起苦役犯被迫从事的这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劳动来就要轻松得多了。有一次我曾这样想：要想把一个人彻底毁掉，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能使最残忍的杀人凶手也胆战心惊，毛骨惊然)，只须让他干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劳动就行了。尽管现在的苦役劳动对于苦役犯说来是毫无兴趣和枯燥乏味的，然而就劳动本身来说，它还是有意义的：囚犯们烧砖，挖土，抹灰泥，盖房；这样的劳动还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的。苦役犯有时甚至醉心于这种劳动，希望把活干得更巧妙、更迅速、更出色。但是如果强迫他，譬如说，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或者让他把沙捣碎，或把一堆泥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搬回去，——我想，几天之后，这个囚犯就会上吊，或者宁肯犯一千次罪，宁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羞耻和痛苦。不用说，这样的惩罚也就变成了折磨和复仇，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达不到任何实际的目的。但是，由于一切强制性劳动都带有这种折磨人、无意义、使人感到羞辱的成份，因而苦役劳动也就远比任何一种自由劳动更加令人痛苦，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不过，我是在冬天入狱的，那是在十二月间，当时我还不知道夏季的劳动比这还要艰苦四倍。冬天，我们要塞监狱里的活计一般说来并不多。囚犯们常常到额尔齐斯河上去拆卸公家的旧驳船，在作坊里干活，打扫公房周围的积雪，烧制并捣碎建筑用石膏等等，等等。冬季天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大伙便早早地回到牢房来，如果不做点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干了。但是，干私活的也许只不过占囚犯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都吊儿郎当地在各个狱室里闲逛，互相咒骂，勾心斗角，惹事生非，如果能弄到几个钱，就去喝酒；夜里则把最后一件衬衫输在打牌上；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由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明白，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掉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要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当然，在别的地方人们也过集体生活，但监狱里往往有些人并不是谁都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而且我确信，任何一个囚犯都感受到了这种痛苦，只是大部分人当然是不自觉地感受到这一点罢了。

在我看来，食物也是相当充足的。囚犯们都要我相信，在俄国内地的一些军犯连里也没有这样好的伙食。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下断言，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此外，许多囚犯还能自己搞到吃的东西。我们这里的牛肉半戈比一磅，夏天也不过三戈比。但是，能够自己搞到食品的，也只是那些经常搞得到钱的囚犯；大多数囚犯则都是吃公家的伙食。不过囚犯们赞扬监狱伙食的时候，他们指的只是面包。他们感激的是我们这儿的面包是敞开供应的，而不是定量分配。他们最害怕定量分配，因为若是定量分配，三分之一的囚犯就会挨饿，而匀着吃则大家都能够吃饱。不知为什么，我们的面包特别香甜，在全城都有名。大家都说这是由于监狱的面包炉修造得好。菜汤可不怎么样。汤是用一口大锅熬的，里面只有几粒米，特别是平时，更是稀汤薄水的，连个油花也没有。最使我惊奇的是，汤里总是有很多蟑螂。可是囚犯们对此并不介意。

头三天我没有出工干活，每个初到的犯人都是这样：经过长途跋涉，需要休息一下。但是第二天我必须到狱外去换脚镣。我的脚镣不合乎标准，是用铁环做的，囚犯们管它叫做“小叮当”，通常戴在衣服外面。适合于干活时戴的狱中标准脚镣不是由铁环做成，而是由四根手指般粗细的铁棍做成的，用三个铁环连结在一起。这样的脚镣必须戴在裤腿里面。中间那个铁环系上一根皮带，皮带的另一头则拴在衬衫外面的腰带上。

我还记得我在狱室里所度过的第一个早晨。监狱大门口的看守室里敲起了晨鼓，十分钟后，值班看守长开始打开各狱室的门。大伙儿开始醒来。在六枝一磅重的油脂蜡烛的晦暗光线照耀下，囚犯们一个个从铺板上爬起来，冻得浑身发抖。大多数人都一声不吭，睡眼朦胧，愁眉不展。他们打呵欠，伸懒腰，紧蹙着他们那打着烙印的前额。有的在自己身上划十字，有的却开始吵架。室内空气闷得令人窒息。牢门一开，冬天的新鲜空气马上流进屋内，结成一团团蒸气在室内翻滚。囚犯们围在水桶旁边，轮流拿起杓子往嘴里灌水，然后把水吐在手心里洗手洗脸。水是由一个负责室内卫生的囚犯在头天晚上预备好的。每个狱室里照例有一个由大家推选出来专干杂活的囚犯，他可以不去干活。他的职务是保持室内清洁，擦洗床板和地板，倒马桶，打满两桶净水，以供早晨洗脸和白天饮用。杓子只有一把，于是大伙立刻为抢杓子而争吵起来。

“你这个该死的，往哪儿挤！”一个愁眉苦脸的大个子囚犯抱怨道。这个人又瘦又黑，剃光了的半边头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隆起的小包；他一面推搡着另一个愉快的、红光满面的矮胖子，一面喊道：“等一会儿！”

“你喊什么？我们这儿喊一声‘等一会儿’是要付钱的，你自己滚吧！他站在那儿简直象个纪念碑。弟兄们，他不过是猪鼻子插葱装大象罢了。”’

这句俏皮话确实产生了某种效果：许多人都笑了。这就是那个愉快的胖子所指望的，显然，他在狱室里自愿扮演着滑稽演员的角色。那个大个子囚犯极其藐视地看着他。

“一头比留列沃①的胖母牛！”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监狱里的纯面包②把他喂肥了！我很高兴，到开斋的时候管保他会生十二个小猪崽。”

****

①比留列沃是距莫斯科十八公里的一个小镇，以盛产黄牛著称。

②用不掺别的东西的纯面粉制成的面包叫纯面包。——作者注。

****

“你他妈的算什么鸟儿？”那个胖子忽然喊道，气得面红耳赤。

“一点不错，就是一只鸟儿！”

“什么鸟儿？”

“这种鸟儿。”

“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彼此怒目而视。胖子握紧拳头，等着回答，仿佛立刻就要冲上去打架似的。我真以为这一回可要大打出手了。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儿，我好奇地注视着。后来我才知道，这

种场面是完全无害的，他们是在表演滑稽剧供大家开心；他们几乎从未动手打过架。这一切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反映了狱中的风气。

大个子泰然而威严地站着。他感觉到人们都在盯着他，等着瞧他的回答是否会使自己丢脸；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名声，证明自己的确是一只鸟儿，而且说明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儿。他带着难以描述的轻蔑表情斜视着自己的对手，竭力使对手蒙受更大的耻辱，他不知为什么竟转过头来向下望着对方，仿佛是在看一个小甲虫，然后慢慢地、清晰地说道：

“笼中鸟！……”

这就是说，他是一只笼中鸟。一阵哄堂大笑祝贺这个囚犯随机应变的本领。

“你是个流氓，不是笼中鸟！”胖子吼叫道，他感到自己丢了脸，不禁勃然大怒。

但是，一到双方当真吵闹起来的时候，便立刻被制止住了。

“你们穷嚷什么！”狱室里的人全都冲着他们俩喊道。

“你们打上一场，也比扯着嗓子穷嚷要好！”屋角里有个人喊道。

“拉开，他们会打起来的！”有人应声喊道，“我们这儿的人又麻利，又好斗；七个对一个，我们也不怕……”

“好啦，两个都是好样的！一个是因为偷了一磅面包而进的监狱，另一个是舐牛奶瓶的浪子，吃了乡下女人的牛奶挨了鞭子。”

“喂-喂-喂！你们别闹啦，”一个残废老兵喊道，他住在这儿是为了维持狱室里的秩序，因此睡在屋角一张单人床上。

“弟兄们，打洗脸水来！涅瓦利德·彼特罗维奇醒来啦！涅瓦利德·彼特罗维奇，早安，亲爱的老兄！”

“老兄……我是你的哪号子老兄？我们连一个卢布的酒都没在一起喝过，算什么老兄！”残废老兵一边嘟哝着，一边伸胳膊去穿大衣……

准备点名了；天开始亮了；伙房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简直无法通行。囚犯们都穿着自己的短皮袄，戴着两色的皮帽子，围挤在一起等着炊事员给他们切面包。炊事员是由囚犯们公推出来的，每个伙房二人。伙房里只有一把菜刀，既切面包又切肉。

每个角落里，每张桌子旁都挤满了囚犯，他们都戴着皮帽子，穿着短皮袄，系着腰带，准备马上出工干活。有些人面前摆着盛满克瓦斯的木碗，他们把面包掰碎放进克瓦斯里吃。吵嚷和喧哗，令人难以忍受，也有人蹲在角落里斯斯文文地低声谈话。

“安东内奇老头，早安，祝您早餐胃口好！”一个青年囚犯说道，随即在一个眉头紧锁、

没有牙齿的囚犯身旁坐下。

“嗯，早安，你不是在取笑我吧，”老人道，他头也不抬，正用他那无牙的牙床使劲地嚼着面包。

“安东内奇，我真以为你死了呢，真的。”

“没有，你先死吧，我以后再死……”

我坐在他们旁边。两个中年囚犯在我右边谈话，他们两个人显然都竭力要在对方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

“他们大概不会偷我的，”其中一个说，“老兄，我倒担心，我可别偷了他们的什么。”

“嘿，他们休想赤手空拳来碰碰我：我会让他们倒霉的。”

“你能让谁倒霉！你不过是个逃亡犯罢了；此外咱们就没有什么别的称呼了……她能把你剥光，也不会向你点头称谢的。哼，老兄，我的钱花光了。前几天她亲自来啦。我能同她到哪儿去？我开始请求刽子手费季卡收留我们，这家伙在城郊有一座房子，是从一个卑鄙的犹太人索洛蒙卡那儿买来的，就是后来上吊的那个家伙。”

“我认识。三年前他在我们这里卖过酒，外号叫格里什卡，是个开黑酒店的。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黑酒店。”

“嘿，另外一个！你认识的人也太多啦！我可以给你找来许许多多的证人……”

“你找去！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嘿，你常挨我的揍，这可不是吹牛，哼，还说是谁！”

“我常挨你的揍？揍我的那个人还没有生下来呢；揍过我的那个人早已躺在地下了。”

“你要得宾杰尔①的鼠疫！”

****

①宾杰尔是比萨拉比亚一个城市，十九世纪初流行鼠疫。

****

“让你得西伯利亚的炭疽！”

“让土耳其的宝剑来对付你！……”

于是两个人对骂起来。

“唉呀呀！又吵起来啦！”周围的人喊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你们不会过，倒乐意到这儿来吃纯面包……”

两个人立刻安静下来。骂骂街，磨磨牙是允许的。这多少能给大家解解闷儿。但是，打架可不是任何时候都许可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两个对手才会真正厮打起来。打架是要报告少校的，一报告就开始进行搜查，少校还要亲自前来，——总而言之，这样对大家都不利，所以打架是不允许的。两个仇敌互相骂上几句，也多半是为了消遣，为了练练舌头。他们常常自己欺骗自己，开头的时候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你也许以为，他们真要打起来了；其实根本不会，闹到一定程度，他们就立刻各自走开了。起初，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惊奇。我在这儿故意引了一段苦役犯们最平常的谈话作为例子。起初，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能为了取乐而互相咒骂，并从中得到乐趣、惬意的练习和快感呢？而且也不该忘记他们的虚荣心。骂人专家颇受尊敬，他只是没有象演员那样受到鼓掌喝彩罢了。

我从昨天晚上就察觉到，他们在拿白眼瞟我。

我已看到了几道阴森森的目光。另一方面，有一些囚犯则在我身旁走来走去，猜想我身上一定有钱，于是立刻巴结起我来：教我怎样戴新脚镣，给我弄来一个带锁的小箱子(当然是要付钱的)，以便收藏公家发给我的东西以及我带进狱中的几件内衣。第二天，他们便把这些东西都给偷去换酒喝了。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了我最忠实最可靠的狱友，不过一有方便的机会他还是要偷我的东西。他这样做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几乎是不自觉地，好象这是他的职责，因而也就不能生他的气了。

而且他们还教我怎样自己动手煮茶，最好弄一把茶壶；于是他们替我租来一把，并给我介绍了一位炊事员，说只要我每月付给他三十个戈比，他就能单独给我做饭吃，我想吃什么，他就给我做什么，还能替我买食品……不消说，他们都向我借钱，仅头一天，他们每个人就都向我借过两三次钱。

一般说来，监狱里的人都阴沉而冷淡地瞧着贵族出身的囚犯。

尽管这些贵族已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而且已和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可是囚犯们从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难友。其所以会这样，甚至并非出于他们自觉的成见，而完全是出于本心，出于本能。他们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自己也喜欢拿我们的没落来奚落我们。

“唉，现在全完啦！全收场啦！彼得当初在莫斯科威风凛凛，如今彼得只好搓绳子了，”他们常说这一类的风凉话。

他们看着我们受苦而幸灾乐祸，尽管我们竭力不在他们面前把痛苦流露出来。我们在开始干活的时候特别受罪，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强的体力，而且根本帮不上他们的忙。再没有比接触人民(特别是接触他们这样的人)，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博得他们的爱戴更困难的了。

苦役犯中间有几个人是贵族出身。首先是五个波兰人。关于他们，我以后还要专门讲到。苦役犯最不喜欢波兰人，觉得他们比俄国贵族出身的流放犯更加可恶。波兰人(我说的只是政治犯)不知何故对待他们特别有礼貌，甚至可以说是低声下气。他们非常孤僻，而且在囚犯们面前怎么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厌恶，囚犯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于是他们也就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我在监狱里住了将近两年以后，才博得了某些囚犯的好感。到最后，大部分囚犯都喜欢上了我，并承认我是个“好”人。

除我以外，还有四个俄国贵族。其中一个是个卑鄙下流的家伙，他极端腐化，是个职业暗探和告密者。入狱前我就听人讲到过他，因此我一进来就不同他有任何来往。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上一章已经谈到过的那个弑父者。第三个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看见过象阿基姆·阿基梅奇这样的怪人。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又高又瘦，生性迟钝，一个大字不识，特别爱发长篇议论，象德国人那样认真。囚犯们常常嘲笑他；有些人甚至怕和他接触，因为他爱吹毛求疵，对别人特别苛求，而且爱和人争吵。他一开始就对囚犯们一点儿也不客气，和他们吵骂，甚至打架。他非常诚实。一看见不公平的事，就立刻出面干涉，尽管事情和他毫不相干。他极其天真，比方说，他和囚犯们斗嘴时，常常责备他们是贼，并一本正经地劝他们别再偷了。他在高加索当过准尉。从头一天起，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因而他立即就把自己的案情告诉了我。起初，他在高加索一个步兵团里当士官生，服了很长时间的兵役以后才被提升为军官，后来又被派到一个要塞去当指挥官。一个和俄国人和睦相处的地方酋长放火烧了他们的要塞，并对要塞进行夜袭，但未能成功。阿基姆·阿基梅奇耍了个滑头，甚至佯装不知道罪犯是谁。他把这件事推到一些不愿跟俄国人和睦相处的人们身上；一个月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友好地邀请那位酋长前来要塞作客。酋长毫不怀疑地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让自己的人列队站好，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并痛斥了那个酋长，向他指出，放火烧要塞是可耻的行为，并立刻向他宣读了一项训令，极为详尽地指出，作为一个跟俄国人和睦相处的酋长今后应当怎么办，最后他枪决了那个酋长，并立即将详情呈报了上级。为此他受到了审讯，并被判处死刑，后又改为发配西伯利亚，以二级苦役犯的身份在要塞服苦役十二年。他完全承认他做得不对。他告诉我，在枪决酋长之前他就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知道同俄国人和睦相处的人只能接受法律的审判；尽管他也知道这些，但他仿佛怎么也不能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过错：

“得了吧！难道他没有放火烧我的要塞吗？怎么，难道还要我向他鞠躬道谢不成！”当我向他提出异议时，他这样回答我。

尽管囚犯们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头傻脑，但由于他干活认真、手巧，他们还是尊敬他的。

没有一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会的。他是木匠，靴匠，修鞋匠，油漆匠，镀金匠，小铁匠，这种种手艺都是在狱中学会的。他不论干什么都能无师自通：不论什么活，他只要看一遍就会。他还会做各式各样的小匣子，小篮子，小灯笼，儿童玩具，拿到城里出卖。他就这样赚了一些钱，并立即购置了几件多余的内衣和一个较软的枕头，还弄来一个可以折叠的床垫。他和我住在一间狱室里，在我服役初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囚犯们外出干活时，都要在看守室前面排成两行；囚犯们前后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技术教官、技术员、一些低级技术员和监工都来了。技术员给囚犯们点过名，把他们一批批分派到各自干活的地方去。

我同另外几个人被派到技术作坊去干活。这是一座低矮的石头房子，座落在一个堆满各

种建筑材料的大院子里。这里有锻工作坊、钳工作坊、木工作坊、油漆作坊等等。阿基姆‘阿基梅奇也被派到这里。他在油漆作坊干活，熬油料，调色，油漆桃木桌子和桃木家具。

在我们等着钉脚镣时，我跟阿基姆·阿基梅奇谈起了我在监狱里得到的最初印象。

“是呀，他们是不喜欢贵族的，”他说，“尤其不喜欢政治犯，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吃掉；其实，这也不足为怪。第一，您是另一种人，跟他们不一样；第二，他们过去不是地主的农奴，就是当过兵的。您自己想想看，他们怎能喜欢您呢？我跟您照实说吧，在这里生活可不容易。可是，在俄国的军犯连里就更困难了。我们这儿有一些人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一个劲儿地称赞我们的监狱，简直就象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倒霉的还不是干活。他们说，那边监管第一类苦役犯的典狱长不完全象是军人，至少那里的管理办法和我们这里不同。他们说，那边的流放犯可以住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我没有到那边去过，我都是听他们这样说的。他们那边不剃头，也不穿囚服；不过话又说回来，剃头和穿囚服倒也不坏，这样总算整齐些，看着也顺眼些。只是他们都不喜欢这样做。唉，您瞧瞧，他们真是一群乌合之众啊！这个是世袭兵，那个是契尔克斯人，第三个是分裂派教徒，第四个是信奉东正教的庄稼汉，他把自己的家庭、可爱的儿女们都丢在老家了，第五个是犹太人，第六个是吉卜赛人，第七个不知道是什么人，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住在一起，彼此和睦相处，一口锅里吃饭，一个通铺上睡觉。再看看他们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吧；弄到一块额外的面包只能偷偷地吃，一文钱也得藏在靴筒里，这里的人能够拥有的一切，便是监狱加监狱……糊涂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就钻进脑袋里来了。”

不过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我特别想打听一下我们那位少校的情况。阿基姆·阿基梅奇并没有向我保密，我记得我当时得到的印象并不令人十分愉快。

可是我还得在他的管辖之下再熬上两年。阿基姆·阿基梅奇给我讲述的关于他的一切，后来证明都是完全真实的，所不同的只是从现实中得到的印象，总比从一般的叙述中得到的印象更为深刻。他这个人之所以令人感到可怕，其原因就在于：象他这样的人居然当上了对二百人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长官。就他本人来说，他最多不过是一个头脑混乱、心狠手毒的人罢了。他把囚犯一律看成是他的当然仇敌。这是他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错误。他确实有些本领，但是一切东西，甚至好的东西，在他身上都被搞得不成样子了。他任性放纵，凶狠毒辣，有时甚至夜里闯进狱室，倘若看见某个囚犯左侧着身子或仰面而卧，第二天早上就要惩罚他：“要按照我的吩咐，右侧着身子睡觉。”他在监狱里象瘟疫一样遭人恨，惹人怕。他脸色紫红，凶相毕露。大家都知道，他完全被自己的勤务兵费季卡控制在手心里了。他最疼爱的就是他那条被唤做特列佐卡的狮子狗。有一次特列佐卡生病了，他心疼得几乎发了疯。据说，他抱头大哭了一场，象哭亲儿子一样；他把一个兽医给轰走了，按照自己的习惯，几乎揍了他一顿；他听费季卡说，狱里有一个犯人是土兽医，医术非常高明，他立刻把那个犯人叫了去。

“帮帮忙吧！我叫你发一笔大财，只要你能把特列佐卡给我治好就行！”他对那个囚犯喊道。

这个囚犯是一个西伯利亚的庄稼汉，他狡猾，聪明，确实是一个很精明的兽医，但又是一个道地的乡下人。

“我看着特列佐卡，”在他见到少校之后过了很久，当这件事已被忘记了的时候，他对别的囚犯们讲述道，“我一看，嘿，狮子狗正在沙发的白垫子上躺着；我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条狗患的是炎症，放点血就会好的！可是，我心里想：要是治不好，要是狗死了呢？我便说：‘大人，不行啦，您给耽误啦，要是昨天或者前天把我叫来，我还可以把狗治好，可现在不行啦，我治不好它啦……’”

特列佐卡就这样死掉了。

人们详细地告诉我，有些囚犯真想把我们这位少校杀死。狱里有一个囚犯，被关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以举止文雅而著名。人们还说，他几乎从不和任何人说话。大家都认为他有点儿傻头傻脑。他认识字，最近一年来，他总是读圣经，白天黑夜地读。当大家都睡熟了的时候，他就在半夜里爬起来，点上一枝教堂里敬神用的蜡烛，爬上暖炉①，打开书，一直读到天亮。
****
①俄国农民一般都在火炉后面，用砖或土坯砌成类似我国北方乡村的火炕那样的暖炉，借以取暖。这种暖炉比我国的火坑略高一些，但面积较小。
****
有一天，他去找看守长，说他不想出去干活。看守长把这件事报告了少校，少校勃然大怒，立刻亲自闯进狱室来了。这个囚犯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砖猛砸少校的头，但没有命中。他被抓了起来，审讯后受了刑罚。这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三天后，他就死在医院里了。他临死时说，他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是他自己甘愿受苦的。不过，他并不属于任何宗教分裂派。监狱里的人都怀着尊敬的心情缅怀着他。

终于给我换了脚镣。这时已有好几个卖面包圈儿的女人陆续来到作坊。其中有几个是年岁很小的女孩子。在尚未成年以前，她们通常都是带着面包圈儿来，她们的母亲在家里烤，她们带来卖。成年以后，她们仍继续来，但已经不是带面包圈儿了；事情几乎总是这样的。有几个并不是女孩子。面包圈儿很便宜，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买得起。

我看到有个木匠囚犯，他头发已经花白，但却红光满面，正笑嘻嘻地和那些卖面包圈儿的女人调情。在她们进来以前，他刚把一条红手巾系在脖子上。一个满脸麻子的胖女人把托盘放在他的工作台上。他们谈起话来了。

“您昨天怎么没到这儿来呀？”那个囚犯洋洋得意地笑着说。

“哼，还说呢！我来啦，可你们都被米季卡叫走了，”口齿伶俐的女人答道。

“是的，把我们叫去有事，要不然，我们一定会在这儿等着的……前天你们那帮人都来过了。”

“谁，是谁？”

“玛丽亚什卡来过，哈芙罗什卡来过，切孔达来过，两吊钱也来过……”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是真的吗？……”

“这种事情是有过的，”他答道，然后谦恭地低下头，因为他是个非常纯洁的人。

这种事情当然有过，但却很少见，而且是很难办到的。一般说来，尽管过着这种极其艰苦的奴役生活，他们宁肯酗酒，而不愿搞这种事情。女人是很难搞到的。需要选择时间、地点，事先约好，特别难办的是寻找离群的机会，至于避开卫兵，那更是难上加难.，有时甚至还需要花上一大笔钱，当然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话虽这么说，可是后来我竟多次做了桃色事件的见证人。我记得那是在夏天，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岸上一个板棚里烧火炉；卫兵挺憨厚。最后，两个被囚犯叫做“提词员”的女人来了。

“喂，怎么呆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去兹维尔科夫家了吧？”她们要找的那个囚犯一见面就这样问，他已等她们好久了。

“我呆的时间长吗？刚才有一只喜鹊蹲在木橛子上，比我在他们那里呆的时间还长呢，”女郎愉快地回答。

这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一个少女。她就是切孔达。同她一块儿来的就是那位“两吊钱”，她丑得简直难以形容。

“好久没看见您了，”情郎转身对“两吊钱”说，“您好象瘦了点似的？”

“也许。过去我太胖啦，现在我就象吞下了一根针。”

“老是上大兵那儿去吗？”

“不，这都是那些坏人向您嚼舌头；不过，这又有什么？虽说我骨瘦如柴，我也丢不下那些大兵！”

“您抛掉他们，爱我们吧；我们有钱……”

除了这幅景象以外，不妨再想象一下那位情郎的尊容：他的头被剃去一半，戴着脚镣，穿着带条纹的囚服，还有一个卫兵在监视他。

当我听说我可以返回监狱去了的时候，我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由一个卫兵押送着回监狱去。囚犯们大都回来了。那些干包工活的囚犯回来得最早。唯一能使囚犯们卖力干活的办法，就是包工。有时，分配给他们的包工活是很繁重的，但他们还是能比强迫他们一直干到敲午饭鼓快两倍。囚犯们干完包工活以后，便可以通行无阻地回到狱中来，任何人都不阻拦他们。

他们午饭并不同时吃，而是谁先到谁就先吃；否则伙房一下子也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我尝了一口菜汤，由于不习惯，我喝不下去，于是便沏了一杯茶。我们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来。我的同伴，也象我一样是贵族出身。

囚犯们不断地出出进进。然而，座位还是有空着的，因为囚犯还没有全部回来。有五个

囚犯围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坐下。炊事员给他们盛上两碗菜汤，然后又把满满一碗煎鱼放在桌子上。他们在庆祝什么，食物是自己烧的。他们斜眼看看我们。一个波兰人走进来，坐在我们旁边。

“我虽不在家，可什么事全知道，”一个大个子囚犯走进伙房，一面打量着所有在坐的人，一面大声喊道。

这个汉子约有五十岁左右，肌肉发达，瘦瘦的身材。他脸上流露出一种狡黠而愉快的表情。他那厚厚的、下垂的下嘴唇特别引人注意，使他的脸显得特别滑稽可笑。

“喂，你们夜里都睡得好哇！怎么不互相问好呀？祝福祝福我们这些库尔斯克的朋友们吧！”他坐在那些正在吃自己饭菜的人们旁边，继续说，“祝你们胃口好！也该款待款待客人呀。”

“老兄，我们可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唐波夫人喽？”

“也不是唐波夫人。从我们身上，老兄，你什么油水也捞不到。你去找有钱的庄稼汉好啦，向他们伸伸手。”

“老兄，现在魏(胃)公子和常(肠)小姐在我肚子里闹腾起来啦；你说的那个有钱的庄稼汉，他住在哪儿呀？”

“嘿，卡津就是个有钱的庄稼汉；找他去吧。”

“老兄，今天卡津饮酒作乐，喝多啦，钱包准都喝空了。”

“十卢布二十卢布还是有的，”另一个接着说，“弟兄们，卖私酒可是赚钱的生意呀。”

“怎么，不招待客人吗？那我只好去吃公家的饭啦。”

“你去要杯茶喝多好。瞧，那两位老爷正在喝茶呢。”

“什么老爷，这里可不分什么老爷；现在他们和我们一样啦，”一个坐在墙角里的囚犯愁眉不展地低声说。他直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

“我倒喜欢喝茶，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我们也有自尊心呀，”那个厚嘴唇的囚犯一边说，一边很温和地望着我们。

“如果您喜欢喝，我给您，”我一边说，一边请他过来，“喜欢喝吗？”

“这好吗？我当然喜欢喽！”他走到桌前。

“哼，在家里拿他妈的树皮鞋煮汤喝，在这儿倒学会喝茶啦，而且还想喝老爷们的茶，”那个愁眉不展的囚犯说道。

“难道说，这里谁都不喝茶吗？”我问他，但他没有回答我。

“瞧，面包圈儿来啦。赏个面包圈儿吧!”

面包圈儿拿进来了。一个年轻囚犯提着一大串面包圈儿到监狱里来卖。面包圈儿的女主人答应把他卖完剩下的第十个面包圈儿赏给他吃；这就是他所期望得到的报酬。

“面包圈儿，面包圈儿!”他一面往伙房里走，一面喊，“莫斯科烤的，热的！本想留着自己吃，可是等钱用。喂，伙计们，就剩一个啦！谁有母亲？”

他招呼大家去孝敬母亲的作法，把人们都逗笑了，于是他的面包圈儿一下子就卖出去好几个。

“喂，弟兄们，”他说，“我看今天卡津喝酒非闹出乱子来不可！真的！居然在这个时候喝起酒来啦。说不定会把八只眼招惹来。”

“人们会替他瞒过去的。怎么，他醉得很厉害吗？”

“可厉害啦！凶得很，老是纠缠人。”

“嘿，这么说来，快动拳头啦……”

“他们说的是谁？”我问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波兰人。

“说的是卡津，一个囚犯。他在这里卖酒。赚上几个钱，就马上拿去喝酒。他为人残忍，凶狠；不过，他清醒的时候倒很安静；他一喝醉酒，就现原形；有时还要拿刀伤人。不过，马上就会有人制服他的。”

“怎样制服他？”

“十个八个囚犯一齐冲上去，狠狠地揍他一顿，直到他失去知觉为止，就是说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把他放在通铺上，给他盖上短皮袄。”’

“这样打，会把他打死的吧？”

“要是换上别人，真会被打死的，可是他却不会。他结实得要命，比狱中任何人都结实，他体质最棒。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就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请告诉我，”我继续问那个波兰人，“他们也是吃自己的饭菜，我只不过喝一点儿茶，他们就眼巴巴地看着我，好象是嫉妒我这杯茶似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答道，“他们之所以恨您，是因为您是贵族，您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想找您的碴。他们很想侮辱您，欺负您。您在这里还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在这里过日子可难得很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比他们困难得多。要有涵养，才能习惯这里的生活。为了这杯茶和单独起伙，您往后还会不止一次遇到麻烦并遭人咒骂呢，尽管这里有许多人也常常吃自备的饭菜，尽管有些人也常常喝茶。他们可以，您却不行。”

说完这几句话，他便起身离桌而去。几分钟以后，他的话果然应验了。

第三章最初的印象

米—茨基①(就是跟我说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酩酊大醉的卡津便摇摇晃晃地闯进伙房里来了。

****

①指波兰革命家亚历山大•米列茨基，他于一八四六年被判处十年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短篇小说《庄稼人马列伊》中曾提到过此人(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日记，)。

****

一个囚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囚犯们都必须出工干活的平常日子里，在随时都可能来监狱进行检查的典狱长的严格管辖之下，在专管囚犯事务、从不离开监狱一步的军士的监督之下，在看守和残废老兵的监视之下——总而言之，在这一切严格措施之下，竟然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把我头脑中刚刚形成的关于囚犯生活的种种看法全给弄乱了。看来我还得在狱中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我初进监狱时感到莫名其妙的那些事情全部搞清楚。

我已经说过，囚犯总是有自己的私活可干的，而这种私活乃是苦役生活的自然需求；除了这种需求之外，囚犯们都爱钱如命，并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几乎把金钱同自由等同起来，如果他们衣袋里有钱，他们便感到心安理得了。相反，若是没有钱，他们便灰心丧气，郁郁寡欢，心神不宁，无精打彩，这时他们便准备去偷，或者去干别的勾当，只要能弄到钱就行。尽管金钱在监狱里如此宝贵，但是那些有幸弄到钱的人并非总能把钱保存很久。第一，要想使钱不被别人偷走或被没收，那是非常困难的。倘若少校知道谁有钱，就会进行突然搜查，立刻把钱没收。也许，他会用这些钱去改善囚犯们的伙食；不管怎么说，钱反正是被他拿去了。然而最常见的还是被偷：狱中的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后来，我们这里有人发现了一个十分安全的保管方法：他们把钱托给一个年迈的旧教徒保管。那个旧教徒是从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①来的，祖先是维特柯人……关于这个老人，我不能不在这儿多说几句，尽管有点儿离题。

****

①指切尔尼戈夫省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十八世纪，一些旧教徒不堪忍受沙皇的迫害，纷纷从索日河上的维特柯岛迁往该地定居。

****

他是一个六十岁左右、头发斑白、身材矮小的老人。一见面，他就使我大为惊奇。他一点儿也不象其他囚犯：他的目光是多么安详平和啊！我记得，我当时怀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心情端详着他那双清彻而又明亮的眼睛，他眼睛周围布满了一道道清晰的鱼尾纹。我常常

跟他谈话，我一生中很少遇见过象他这样善良而又温和的人。他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件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中间有些人饭依了东正教，政府大力支持他们，并竭力进一步改变其他旧教徒的信仰。这位老人同其他一些热衷于旧教的人便决心象他所说的那样“维护信仰”。当时正在兴建一座皈一教②教堂，他们放火把它烧了。

****

②东正教中保存一切旧的教仪的教派。

****

老人作为主谋者之一被判处苦役。他本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小商人；家里还有妻子儿女；但他怀着一颗坚强不屈的心去接受流放，因为他盲目地认为这是“殉教”。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时期以后，你会情不自禁地反躬自问：象他这样一个安详温顺得象个娃娃的人，怎么会起来造反呢？我曾几次和他谈起过“信仰”。他在自己的信仰上毫不让步，但他在反驳时却从未流露过任何的怨恨和敌意。他破坏了教堂，而且并不否认。看来根据他的信仰，他想必还认为自己的行动和为此而遭受的“痛苦”，是一件光荣的事呢。但是，无论我怎样注视他和研究他，我在他身上从未发现一点点的虚荣或骄傲。我们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些别的旧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西伯利亚人。他们都是一些文化程度很高的人，狡猾的乡下佬，是一些死读圣经、咬文嚼字的人，同时又都是很有才能的诡辩家；这些人都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狡猾奸诈，而且十分固执己见。可是这位老人却完全是另一种人。他读圣经可能比他人读得都多，但他却避免争论。他十分喜欢与人促膝谈心。他性情愉快，常常发笑，但他的笑声却不象其他囚犯那样粗鄙下流，他的笑声明朗而文静，充满天真无邪的稚气，似乎与他那斑白的头发极为相称。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我总觉得可以从笑声中识别一个人。如果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初次相遇，他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悦耳，那您就可以大胆地说，他是一个好人。尽管这位老人博得了全监狱人的尊敬，但他却一点也不自负。囚犯们都叫他老爷爷，而且从不欺侮他。我也多多少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教友有这么大的影响。尽管他显然以坚定的意志忍受着苦役生活的痛苦，但他内心里却隐藏着一种深邃而又无法治愈的忧伤，他竭力把这种忧伤掩饰起来不让他人知道。我和他住在同一间狱室里。有一次，我在夜间两点多钟醒来，听见有人在低声哭泣。老人正坐在暖炉上(过去那个读圣经读得入了迷，而且想杀死少校的囚犯，夜间常常在这个暖炉上祈祷)对着手抄的圣经祈祷。他哭了，我听见他偶尔祷告说：“主啊，不要抛弃我呀！主啊，让我身强体壮吧！我的孩子们还小，我的孩子们都很可爱，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悲怆心情。就这样，几乎所有的囚犯都逐渐开始把自己的钱交给这位老人保管。监狱里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是小偷，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忽然都相信这个老人是决不会偷东西的。大家都知道他把别人交给他的钱藏在哪里，他藏在一个谁也找不着的秘密地方。后来，他对我和几个波兰人揭示了他的秘密：在栅栏的一根柱子上有一个树枝，从外表上看去好象牢牢地长在树干上，但若是把它拿下来，树干上便出现一个深洞。老爷爷就把钱藏在这儿，然后再把树枝插上，因此谁也永远无法找到任何东西。

不过我已经离题太远了。我前面谈到，为什么钱在囚犯的衣袋里待不长。除了难以保存这个原因以外，监狱里的生活又是那么令人苦闷。囚犯们生来都是一些十分渴望自由的人，然而就其社会地位来说，他们又是一些极其轻率、不顾死活的人，这自然会导致他们突然“恣意妄为”起来，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大吃大喝，在喧闹声和音乐声中忘却自己的苦闷，即使只忘却一分钟也好。看上去甚至有点奇怪，他们中间有些人头也不抬地干活，一连几个月不停地干，唯一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把挣来的钱拿去喝光，然后再为下一次痛饮苦干上几个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喜欢购置新衣服，而且一定是便服：黑色的便裤，衬衫，细腰短大衣。最时髦的装束是：印花布衬衫外面扎上一条嵌着金属圆片的皮带。他们在节日里穿戴起来，

然后到所有的狱室里去逛，向人们炫耀自己。有的人穿上新衣服后，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确实，在许多事情上囚犯们都完全象是一些小孩子。诚然，所有这些好东西有时忽然就不再为主人所有了，有时当天晚上便非常便宜地被典押掉或卖掉了。不过，狂饮是渐渐蔓延开来的。一般说来，狂饮都发生在节假日或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囚犯早晨一起床便在圣像前点上蜡烛祷告，然后穿戴好，为自己订下一份午餐。他订的是牛肉和鱼，还要包西伯利亚的饺子；他象一头公牛一样大吃大嚼，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享受，很少邀请难友们共进午餐。过一会儿，酒端上来了，寿星老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必定要摇摇摆摆、深一脚浅一脚地到各狱室里走一趟，竭力向人们显示他喝醉了，他是在“饮酒取乐”，借以博得大家的尊敬。不论在哪里，俄国人对喝醉酒的人多少都抱有好感，而在监狱里，饮酒作乐的人甚至会受到尊敬。监狱里的狂饮仿佛带有一种贵族派头。开怀畅饮的囚犯总要雇一个人为他奏乐。狱中有个身材矮小的波兰人，是个逃兵，十分令人讨厌，但他会拉小提琴，而且总是随身带着乐器——他的全部财产。他不会任何手艺，他唯一赚钱的办法就是替开怀痛饮的囚犯演奏快乐舞曲。他的职责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喝得醉醺醺的雇主走进各个狱室，不停地拼命拉小提琴。他脸上常常流露出无聊和悲伤的表情。但是那“拉呀，你收过钱啦！”的喊叫声逼着他又拼命地拉将起来。雇主从一开始狂饮就坚信，如果他喝醉了，一定会有人照顾他的，若是狱方出面干涉，也一定会有人及时把他隐藏起来，安置他躺下睡觉，而且这一切都丝毫不是为了私利。至于居住在狱中的值日官和残废老兵，虽然他们的责任是维持狱中秩序，但他们也尽可以放心，因为喝醉了的囚犯是不会闹出什么乱子的。全狱室的囚犯都注视着他，如果他发起酒疯来或动手打人——立刻就会有人把他制服，甚至会把他捆绑起来。因此监狱里的一般管理人员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倘若不许喝酒，那就会更糟。那么酒究竟是怎样弄进来的呢？

在监狱里，酒是从所谓“酒保”那里买来的。做“酒保”的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生意从不间歇，而且十分兴隆，尽管酗酒和“饮酒作乐”的人总的说来并不多，因为狂饮需要钱，而囚犯的钱是来之不易的。“酒保”的生意是用相当独特的方法经营的。比方说，往往有这样的囚犯：他既不会手艺，又不愿意干活(这样的人确实有)，但是他急不可耐地想弄到钱，而且想尽快发一笔财。他弄到了一点儿本钱，便决计做卖酒的生意。卖酒是一种大胆冒险的营业，要担很大风险。他可能会为此而被抽打脊背，而且货物和本钱也会被全部投收。但是，酒保却甘愿冒这样的风险。一开头，他的钱并不多，所以第一次他只好亲自把酒带进监狱里来，当然，酒一卖掉，就会赚许多钱。于是他便带第二次，第三次，若是不被狱方查获，他的生意便很快兴隆起来，直到他创建了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营业——他成了企业主，资本家，他雇佣代理人和助手，这时他冒的风险越来越少，而钱却赚得越来越多。他的助手们甘愿为他去冒风险。

监狱里总是有很多人把钱花在赌博和饮酒作乐上，最后被弄得囊空如洗。这些人都不会手艺，穿得破破烂烂，显得很可怜，但他们都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这些人所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们的脊背了；脊背对他们可能还有某种用处，于是那个把一切都挥霍殆尽的浪子便决定利用它。这时他便会被业主雇去往狱中运酒，一个富有的酒保往往要雇佣几名这样的雇工。监狱外面某处有这么一个人——也许是个士兵，也许是个小市民，有时甚至是个大姑娘，——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佣金，便用酒保的钱在酒馆里把酒买好，藏在囚犯们干活时路过的一个幽静的地方。经理人几乎总是先尝尝酒的质量，然后毫无人性地把水掺进喝剩的酒里；至于买主要不要，他就不管了，须知一个囚犯是不能过于挑剔的，因为钱总算没有白花，他总算买到了酒，不管酒味如何，但毕竟是酒啊。狱中酒保预先指定带酒人带着牛肠子去找经理人接头。这些牛肠子都预先洗涮过，然后灌满水，以便保持它原来的湿度和柔软

性，使其适于盛酒。牛肠子装满酒以后，囚犯便把它缠在身上，尽量藏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不消说，这需要走私人施展出浑身解数，把做贼的一切狡猾手腕都拿出来。这多多少少关系到他的名誉；他必须把卫兵和看守瞒哄过去。他欺骗他们：卫兵若是一个新兵，总会被一个机灵的贼蒙骗过去的。不用说，他要事先对卫兵进行一番研究，对干活的时间和地点也要考虑一番。比方说，这个囚犯是个瓦匠，他在砌砖炉子的时候爬进炉子里，那末又有谁能看得见他在那里干些什么呢？卫兵是不能跟着他爬进去的。进监狱大门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他们往往把钱——十五或二十个银戈比——攥在手里，在大门口等着班长。干活回来的每一个囚犯，一般都要由值日班长搜身以后，方才开门放他进去。带酒的人一般都指望看守不要过于仔细地摸他身上的某些部位。但诡计多端的班长有时却硬要摸那些部位，并且往往摸到了酒。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招了：走私人便一声不响地避开卫兵，悄悄地把手里攥着的钱塞到班长手里。由于使用这种办法，常常能把酒安然无恙地带进监狱里来。但这种办法有时也不能奏效，那时就只好付出自己最后的资本也就是脊背了。事情报告给了少校，脊背受鞭挞，而且鞭挞得很厉害，酒被充公，但走私人自己把一切承担下来，并不出卖雇主；他所以不出卖雇主，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不屑于告密，主要是因为告密对他不利：反正他已经受了鞭挞；若是他和雇主二人都受鞭挞，他自然会感到宽慰。但他还需要雇主，虽然按照惯例和事先的约定，走私人受鞭挞，雇主是不付一个戈比的。至于一般的告密，那是很普遍的事。在监狱里，告密者丝毫也不感到羞耻，人们是不会对告密者感到愤怒的。他不但不会被人疏远，人们反而乐于同他交朋友，如果您在监狱里想要证明告密是下贱可耻的事，那么人们就会完全不理解您了。那个卑鄙可耻的贵族，也就是我和他断绝了一切来往的那个囚犯，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交上了朋友，他给他当暗探，而费季卡又把自己听到的关于囚犯们的一切情况向少校报告。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惩罚过或者责备过这个坏蛋，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要这么办。

我又扯到一边去了。当然，酒往往能够顺利地带进来，这时，雇主付完钱，便将牛肠子收下进行盘点。他盘算的结果是：这批货的成本很高，为了增加利润，他必须再掺一次水，几乎掺进一半的水，这时才算准备就绪，只等主顾光临了。在第一个节日，有时就在干活的日子里，主顾光临了：这个囚犯辛辛苦苦地干了好几个月，攒了几个钱，以便在他预定的某一天把钱全部喝掉。还在这一天到来以前很久，这个可怜的受苦人不论是在梦中，还是在干活时的幸福幻想中，都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的魅力使他精神振奋地忍受着枯燥无味的监狱生活。这光明日子的曙光终于在东方出现了：他的钱积攒起来了，未被没收，又未被偷去，于是他拿着钱去找酒保。起初，酒保倒给他的是尽可能纯的酒，也就是只掺过两次水的酒，但当酒瓶快要倒空的时候，便立刻添水。在这里，一杯酒的价钱比狱外酒馆里要高出五、六倍。可以想象，要喝到酩酊大醉的程度，这种酒得喝多少杯，又需要花多少钱啊！由于已经失掉了喝酒的习惯，而且又戒了这么久，所以囚犯们很快就会喝醉的，但他照例要继续喝下去，直到把所有的钱都喝光为止。这时，他便把他所有的新衣服都拿出来：酒保同时又是高利贷者。送到酒保手中的，先是新购置的便服，然后是旧物，最后是公家的东西。当囚犯把一切东西，连最后的一块破布都喝光了的时候，便躺下睡觉，第二天醒来，脑袋难免隐隐作痛，于是他又徒劳地请求酒保给他喝一口，以便解解酒。他悲伤地忍受着醉后的痛苦，当天便又干起活来，他不停地再干上几个月，回味着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醉酒时的情景，然后又渐渐地振作起来，期望着另一个相同的日子到来，那一天虽说还很遥远，但终究会到来的。

至于酒保，他的生意很兴隆，赚了一大笔钱(几十个卢布)之后，他便备下最后一次酒，这次可不能掺水了，因为那是给自己喝的。他生意做够了，也该自己享受一番了！于是，一

场吃喝玩乐、狂欢痛饮的闹剧便开始了。他的钱很多，就连监狱里的低级狱吏们都向他献殷勤。这样的狂饮有时一连持续好几天。自然，他所备下的酒不久就被喝完了，这时这个酒徒便到别的酒保那儿去买，那些酒保正在等着他呢，于是他继续喝，直到把最后一个戈比喝掉为止。不管囚犯们怎样保护他，但他有时仍被上级长官(少校或看守长)发现。他被带到拘留室去，身上若是有钱，便会被没收，最后还得挨一顿鞭子。醒酒以后，回到监狱，几天以后又做起他的酒保生意。这些酒徒中间自然有一些有钱人，他们还梦想搞女人。有时他们花一大笔钱，便可在被收买的卫兵的监护下，以外出做工为名，从要塞里被秘密地带到城郊的一个什么地方。他们在县城边上某个幽静的小房子里举行一次十分盛大的宴会，在那里确实需要花掉很大一笔钱。只要有钱，就连囚犯也能不受人轻视；他们往往事先选定一个有经验的卫兵，这样的卫兵往往就是未来的囚犯。然而，有钱可以办到一切，象这样的外出游逛，几乎永远都是一个揭不开的秘密。这里需要补充一句，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罕见的，因为需要花很多钱，然而那些喜欢玩女人的人却能想出一些别的、十分安全的办法。

有个青年囚犯，长得很漂亮，早在我初进监狱时，他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叫西罗特金。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首先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漂亮的面孔，他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他住在特别部里，那是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囚室，因而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军犯之一。他性情温顺平和，很少说话，也不常笑。他长着一双蓝眼睛，容貌端庄，面孔白皙而细嫩，头发呈淡褐色。就连那剃去半边的头，也未能使他的容貌变丑：他就是这样一个美少年。他什么手艺都不会，手里的钱虽然不多，但也常常能弄到。看得出他既懒惰，又邋遢。不过偶尔也有人给他好衣服穿，有时甚至给他红衬衫穿，西罗特金显然是喜欢穿新衣服的：他常常穿上新衣服出入各狱室，炫耀自己。他既不喝酒，也不赌钱，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吵过嘴。他常在狱室后面散步，两只手插在裤袋里，显得安详而若有所思。他在思考什么呢？这是很难猜测的。你若有时出于好奇而叫他一声，问他点什么，他总是立刻回答你，甚至是恭恭敬敬地回答你，而不象别的囚犯那样粗野，他回答得总是很简单，不爱饶舌。他总是象个十来岁的娃娃似的瞧着你。他有钱时，并不给自己买点儿什么必需品，也不把上衣送去修补，也不订购新皮靴，他象个七、八岁的孩子那样只知道买面包圈儿和饼干吃。“唉呀，西罗特金！”囚犯们有时对他说，“你真是个喀山的孤儿呀①！”

****

①喀山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城市。俄语中的西罗特金这个姓氏是“孤儿”的派生词，发音极相似，故把西罗特金叫做“孤儿”。“喀山的孤儿”是对假装穷苦而又令人可怜的人的讽刺。

****

不上工时，他一般总是在别的狱室里到处闲逛，别人几乎都在忙自己的活儿，只有他无事可做。人们跟他说话时，几乎总是嘲笑他(囚犯们常常这样嘲笑他和他的同伴)——他一言不发，转身向别的狱室走去；有时若是被嘲笑得太厉害了，他也只是脸上发红而已。我常常想：这样一个性情温和、心地单纯的人，怎么会落到监狱里来了呢？有一次，我因病住在医院的囚犯病房里，西罗特金也病了，躺在我旁边。一天晚上，我们聊起天来，他突然兴奋起来，无意中告诉我他是怎样被送去当兵的，他母亲送他走时如何痛哭流涕，他当新兵时如何痛苦，等等。他还补充说，他无论如何也受不了新兵的生活，因为那里所有的人都十分凶暴残忍，长官几乎总是对他不满意……

“结果怎么样呢？”我问道，“为什么把你弄到这儿来啦？而且还关在特别部……唉，你呀，西罗特金，西罗特金！”

“是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营里只当了一年兵，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把我们的

连长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杀死了。”

“这我听说过，西罗特金，但是我不相信，象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杀人呢？”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哎，我当时痛苦极啦。”

“那么别的新兵怎样生活呢？当然，起初可能困难一些，但以后会习惯的，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兵的。一定是你母亲把你给宠坏了，她拿饼干和牛奶一直把你喂养到十八岁。”

“不错，我妈妈确实非常疼我，自从我被送去当兵以后，她就病倒了，听说再也没起过床……对我来说，新兵生活后来变得非常痛苦难熬。长官讨厌我，动不动就处罚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人人我都听从，我规规矩矩地生活，不喝酒，什么嗜好也没有；要知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人要是有嗜好，那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周围的人心肠都那样残忍，一一想痛哭一场都找不到地方。有时候，只好跑到一个角落里，在那儿痛哭一阵。嗯，有一次我出去站岗，那是在夜间，派我到大炮旁站岗。当时正刮大风，是秋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眼睛都睁不开。我觉得身上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我把枪立在脚旁，把刺刀解下来，放在一旁；我把右脚上的皮靴脱下来，把枪口对着胸口，用大脚指扳动枪机。一瞧——瞎火了！我查看了一下枪，把火门擦干净，倒进去新火药，打着火石，再把枪口对着胸口。怎么啦？只见火药一闪，结果又没打响！我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穿上皮靴，拿起枪，安上刺刀，一声不响地来回走着。这时我拿定主意干到底：不管到哪儿去都可以，只要不当兵就行！半个小时以后，指挥官骑马来查岗。他冲着我喊道：‘难道就这样站岗吗？’我把枪端在手里，用刺刀刺他，整个刺刀都扎进去了。唉，挨了四千棍，最后来到这里，进了特别部……”

他没有撒谎。是的，要是犯了别的什么罪，还能把他关进特别部吗？犯了普通罪行，惩罚要宽大得多。然而，在同一类罪犯中只有西罗特金是个美男子。象他这样的囚犯在我们这里约有十四、五个，那些人叫人看着都觉得奇怪；他们当中只有两三个人的面孔还能叫人勉强看得过去，其余的全都耷拉着耳朵，外貌丑陋，邋遢肮脏；有几个甚至连头发都白了。如果情况许可的话，我以后还要把这些人细加描述。西罗特金和卡津最要好，我在本章开头时就曾提及过，卡津如何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闯进伙房，他又如何搅乱了我对监狱生活的最初看法。

这个卡津是个可怕的人物。他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痛苦而可怕的。我总觉得，再没有比他更凶残、更可怕的人了。我在托波尔斯克曾看见过一个以残暴著称的强盗卡缅涅夫；后来我还看见过一个候审的逃犯、可怕的杀人凶手索科洛夫。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给我留下象卡津那样使人感到厌恶的印象。我有时仿佛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个象人一般大的蜘蛛。卡津是鞑靼人；他膂力过人，比狱中任何人都强壮，上中等身材，大力士的体格，他的头长得硕大而又难看，与全身极不相称；走起路来稍微有点驼背，皱着眉头看人。在监狱里，关于他有一些离奇的传闻：人们都知道他是军人出身，但囚犯们在背后都说他是从涅尔琴斯克跑出去的逃兵，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都说他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已经不止一次，逃跑也不止一次，更改过姓名，最后被关到我们监狱，进了特别部。据说，他过去喜欢宰杀小孩，只是为了一时的痛快：他把小孩哄到某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开头吓唬他，折磨他，当他尽情地欣赏了这幼小而可怜的牺牲品的恐怖和战栗之后，便怀着喜悦的心情悄悄地、慢慢地用刀把小孩杀死。这一切可能都是臆造出来的，因为卡津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是不愉快的，不过即使

是臆造出来的，这些故事似乎也与他相称，正好适合于他。然而平时，当他不喝酒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的行为还是很理智的。他总是安安静静，从不和任何人争吵，而且避免争吵，他好象看不起别人似的，又好象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说话很少，好象故意不同人们来往。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缓慢的，安详而自信的。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一点儿也不蠢，而且非常狡黠；他的面孔上和微笑里总是流露出一种傲慢和嘲笑人的残酷表情。他在狱中做烧酒生意，而且是所有酒保中最富有的一个。他一年里总要喝醉两三次，那时他就兽性大发。当他醉意渐浓的时候，他便开始对别人进行讽刺挖苦，他使用的词汇都是最恶毒的，经过认真推敲的，仿佛是好久以前就想好了似的；最后，当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他便狂怒起来，抓起刀子向人们扑去。囚犯们都知道他那惊人的力气，只得纷纷跑开，躲藏起来；他遇见谁就向谁扑去。但是人们很快就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同狱室的十几个囚犯一拥而上，向他扑去，开始揍他。再也想象不出有比揍他更狠毒的了：他们捶他的胸膛，捣他的心窝，踢他的肚子；他们狠狠地揍他，揍的时间很长，一直揍到他完全失去知觉、象死人一样躺在地上。若是换一个人，那可不能这样揍；这样揍法，就等于杀人，只有卡津例外，把他揍得不省人事以后，人们用短羊皮袄把他一裹，抬上床铺。“躺一躺就好啦！”的确，他第二天早晨爬起来，象健康人一样，一声不响、闷闷不乐地出去干活了。全狱的人都知道，每逢卡津喝醉了酒，这一天一定会以他被大揍一顿而结束。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知道，但他还是要喝醉。这样过了几年。最后大家看到，卡津开始认输了。他常说他有各种疾病，并且显得日益消瘦；常常去医院……“这回可该完蛋啦！”——囚犯们私下说道。

卡津走进伙房，那个随身携带着提琴的下流波兰人跟在他后面，他通常总是被那些饮酒作乐的囚犯雇去拉琴，让他们开心。卡津在伙房中间站着，一声不响，聚精会神地端详着在场的人。大家都不吭声。最后，他看见了我和我的朋友，便恶狠狠地拿嘲弄的眼光瞅着我们，放肆地微微一笑，好象想出了什么妙计似的，于是趔趔趄趄朝我们的饭桌走来。

“请问，”他开口道(他说俄语)，“你们有多少收入，竟在这儿喝茶？”

我一声不响地和我的朋友交换了一个眼色，我们明白，最好是沉默，不答理他。一反驳，他就会勃然大怒的。

“这么说来，你们是有钱喽？”他继续追问我们，“这么说来，你们的钱多得成堆喽？难道说，你们进监狱的目的就是为了喝茶？你们是为喝茶而来的吗？说呀，我把你们……”

可是，他看我们决心不作声，又不理他，便气得脸色发紫，浑身发抖。旁边墙角里放着一个盛面包的大木盘，这种面包是囚犯们拿来当午饭或晚饭吃的。这个大木盘很大，它盛的面包足够全狱半数囚犯吃一顿，而现在正好空着。他用双手把它举起来，在我们头上挥动着。他若再挥舞一会儿，就会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的。一般说来，凶杀案或凶杀的意图会给全狱的人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狱方会开始进行调查和搜查，并加强管理措施，因而囚犯们一般都尽力不让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尽管如此，可是这一次囚犯们都不吭一声，都等着看热闹。连一句替我们申辩的话都没有人说！也没有人向卡津喊一声！——他们对我们的仇恨是如此之深啊！显而易见，对我们的危险处境，他们都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事情竟顺利地结束了：就在他刚要把木盘向我们砸过来的时候，有人从穿堂里喊道：

“卡津，酒被偷走啦！……”

他砰地一声把木盘撂在地板上，象疯子似的冲出了伙房。

“嗯，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彼此说。后来他们还一再这样说。

后来，我始终不知道这偷酒的消息是确有其事呢，还是偶然想出来搭救我们的。

傍晚，天已黑了，在监房上锁以前，我绕着木桩栅散步，这时一阵沉重的悲痛涌上我的心头，此后，在我的全部监狱生活中，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悲痛。第一天的监狱生活是令人最难忍受的，无论在监狱里和囚室里，还是在苦役劳动中，都是如此……我记得，当时有个念头总是困扰着我，而且后来在我的全部监狱生活中，它总是令人厌恶地萦绕在我的心头，——这是一个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疑问，对我来说至今也没有解决：人们犯了同样的罪，为什么受到的惩罚却不同？不错，罪行是不能比较的，即使是大致的比较也不行。比方说，这个人和另一个人都杀了人，两个案件都经过了仔细的斟酌和权衡；对这个案件和另一个案件的惩罚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还得看看两起罪案有什么不同点。比方说，一个人可能是为了微不足道的一个葱头而杀了人：他在大路上杀了一个过路的庄稼人，而这个庄稼人总共只有一个葱头。“瞧，爸爸！你叫我出去弄点儿东西：瞧，我把这个庄稼人宰啦，只弄到这么一个葱头。”“傻瓜！一个葱头——还值一个戈比哩！杀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还能弄到一个卢布呢！”(监狱笑话)。另一个人为了保护未婚妻、妹妹或女儿的贞洁，而杀了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一个逃亡犯被整整一团的追捕者包围着，常常饿得要死，他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了人；可是另一个人虐杀孩子只是为了借此取乐，为了使自己的双手感觉到孩子们热乎乎的鲜血，为了欣赏孩子们的恐惧，欣赏他们在他的屠刀下如何象鸽子似的作最后挣扎。结果怎么样呢？这两种人却服同样的苦役。不错，刑期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并不很大；然而，同一类的罪行却是千差万别的。性质不同就是差异。我们姑且假定，这种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象无法把方的变成圆的一样，就算是这样吧！就算这些不平等并不存在，那末，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另一种不同，即惩罚的后果的不同……请看，一个人在狱中一天天憔悴，象蜡烛一样溶化着，而另一个人在服苦役之前，甚至都不晓得世界上竟有这样愉快的生活，竟有这样有趣的俱乐部，俱乐部中还有勇敢的伙伴。是的，监狱里确实有这样的人。再比方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心地善良，聪明多情，只要他心头一阵疼痛，还不等对他施加任何刑罚，他就在自身的痛楚中一命呜呼了。他本人对自己的罪行的宣判，要比最严酷的法律的宣判更为无情，更为残酷。然而就在他的旁边还有另一个人，那人在整个服苦役期间甚至一次都不曾想过他所犯的杀人罪。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对的。还有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为了来服苦役，以便逃避狱外艰苦得多的奴役生活。他在狱外过的是受尽屈辱的生活，他从未吃饱过，每天从早到晚替自己的雇主干活；可是苦役营中的劳动却比在家里还要轻松，又有足够的面包吃，而且还是他从未见过的那种面包；每逢过节还能吃到牛肉，领到施舍品，还有赚钱的机会。至于同伴们呢？他们都是一些机灵、能干的万事通；于是他怀着十分惊奇的心情瞧着自己的难友；他过去从未见过象他们这样的人；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一群人。难道刑罚会使这两种人都同样感到痛苦吗？不过，干吗要为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去伤脑筋呢！熄灯鼓敲了，该回狱室了。

第四章　最初的印象

最后一次点名开始了。点过这次名以后，狱室便上锁，每个狱室的锁都不一样，囚犯们被关在室内，直到天亮。

点名是由一位军士带着两名士兵进行的。为了点名，囚犯有时要在院子里排队，等候看守长到来。但这种点名仪式通常是用简便方法进行的：按狱室来点名。现在就是这样。点名者常常数错人数，他数完就走，然后再返回来重数。最后，这些可怜的看守人员总算把数目数对了，然后锁上狱室的门。一间狱室可容纳近三十名囚犯，他们拥挤地睡在通铺上。离睡觉时间还早。看来，每个人都需要做点儿什么。

监狱当局留在狱室里的唯一代表，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残废老兵。每个狱室还有一名囚犯当头目，这个头目自然是少校根据该人品德如何亲自指定的。这些囚犯头目也常常被卷进某些恶作剧中去，那时他们便会遭受鞭挞，立即被革职，由别人代替。我们狱室里的囚犯头目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使我惊奇的是，他常常呵斥囚犯，囚犯们通常都是用嘲笑回答他。那个残废老兵可比他聪明，他从不多管闲事，若是需要他开口，他也不过虚应故事，聊以塞责而已。他一声不响地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缝靴子。囚犯们几乎根本不理睬他。

在我入狱后的第一天，我就进行了一番观察，后来证明我的观察是对的，这项观察就是：除去囚犯之外的狱中人员，从直接和囚犯接触的卫兵和看守，一直到同监狱生活多少有点关联的人，不论是谁，似乎都用一种夸张的眼光来看待囚犯。好象他们时时刻刻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囚犯会猝然拿起刀子向他们扑去。最奇怪的是，囚犯们自己也意识到人们都怕他们，这显然使得他们颇有点自负起来。然而，对于囚犯来说，最好的长官还是那些不怕他们的人。一般说来，尽管囚犯们有些自负，但他们最喜欢的还是那些信任他们的人。你若是信任他们，你甚至会博得他们的喜爱。有一次(不过在我蹲监狱期间这种事是很少见的)，一位长官没带任何卫兵独自走进狱室里来。应当说，这使囚犯们十分惊讶，既惊讶又高兴。这样一位无畏的来访者往往会赢得囚犯们的尊敬，即使真的可能发生什么不幸，但在他面前也是不会发生的。凡有囚犯的地方，囚犯就会使人感到恐惧，我实在不能理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当然啦，人们产生这种恐惧也是不无理由的，首先，那些被公认为强盗的囚犯的外貌就会引起恐惧；此外，凡是到过监狱的人都感觉得到，这些人不是自愿聚拢到这儿来的，而且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不能使一个活人变成一具死尸：他还有感情，他渴望复仇，渴望生活，他怀有强烈的欲望，并需要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尽管如此，我依然深信，囚犯并没有什么可怕。一个人拿起刀来向另一个人扑去，并不那么容易，也不会那么迅速。总而言之，即使可能有危险，即使这种危险确实发生过，这类不幸事件毕竟是罕见的，因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说，这种危险性是很小的。自然，我现在所说的仅限于那些已被判了刑的犯人，这种犯人当中有许多人甚至乐意到监狱里来(新的生活有时是那么令人神往！)，因而他们打算安静、和平地生活下去；而且他们也不会让他们中间那些确实不守本分的人恣意妄为。每个苦役犯，不管他多么勇敢和大胆，他对监狱里的一切还是惧怕的。至于候审犯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候审犯人确实会无缘无故地持刀向一个不相干的人扑去，只是因为，比方说，他明天就要被拉去受刑；而现在若能制造一桩新的案件，他受刑的日子就会拖延下去。他持刀杀人的原因和目的就在于：无论如何也得尽快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知道一桩这种奇怪的心理学上的案例。

我们监狱里有这样一个军犯，他原来是个当兵的，被判处两年徒刑，未被剥夺公民权。他是一个吹牛大王，又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一般说来，吹牛皮和胆小怕死的人在我国军人当中是十分罕见的。我们的兵士总是忙得很，即使想吹牛，也没有时间吹。如果他是一个吹牛的家伙，那他几乎又总是一个懒汉和胆小鬼。这位军犯姓杜托夫，他服完短短的刑期，最后又回到边防营去。但是，所有象他这样被关在监狱里接受感化的人往往都彻底变坏了，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在外面待上两三个礼拜后，又重新受审，再回到监狱里来，只

不过这次刑期已不是两年或三年了，而是“终身”服役，要蹲十五年或二十年监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出狱后不到三个礼拜，杜托夫就撬锁偷东西；此外还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受到了审讯并被判处酷刑。他十分害怕即将受到的严酷刑罚，怕得要死，他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胆小鬼，于是在他将被赶着穿过队列接受鞭笞的前一天，他拿起刀子向走进监房的值日官扑过去。当然，他十分清楚，这种举动将大大加重对他的判决，延长他服苦役的期限。但他的想法是：即使把那可怕的受刑时刻，向后推迟几天或几小时也是好的！他十分胆小，虽然拿起刀子扑了过去，但却没有伤着值日官，他这样干只是为了做做样子而已，只是想要构成新的罪行，以便重新受审。

对于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来说，受刑前的时刻当然是可怕的。几年之中我看见过许多处在这个倒霉日子前夕的候刑犯人。我一般都是在医院的犯人病房里看见这些候刑犯人的，因为我常常因病住院。俄国所有的囚犯都晓得，最怜悯他们的就是医生。医生对囚犯一视同仁，而不象那些不相干的人那样，只有一般老百姓例外。一般老百姓从不因犯人犯了罪而责备他们，不管他们的罪行有多大，老百姓总是为他们所受的刑罚和遭到的一切不幸而原谅他们。无怪乎俄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把犯罪叫做不幸，并把罪犯叫做不幸的人。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意义的定义。这个定义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人们在无意中出于本能给下的。在许多情况下，医院的确是囚犯们的避难所，对于那些候刑的犯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监禁他们要比监禁一般的囚犯严厉得多……因此，当那些候刑犯人估计那可怕的日子快要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去住医院，希望把那可怕的时刻稍微推迟几天。当他出院回去，确切地知道第二天便是倒霉的日子时，他几乎总是焦急万分。有些自尊心很强的人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然而他们那种笨拙的、假装的镇静却瞒不住自己的难友。大家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出于仁爱谁都不作声罢了。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杀人犯，他从前当过兵，被处以棒刑，罚他的棒数最多。他怕得要命，在受刑前喝了一瓶酒，酒里还浸了鼻烟。顺便说一下，候刑犯人在受刑前总是要喝酒的。酒在受刑以前很久就被带进来了，并付了高价，候刑的囚犯宁愿半年之内不要任何必需品，但也要攒钱买四分之一俄升①的酒，以便在受刑前十五分钟内喝下去。
****
①一俄升等于 1.2299 升。
****
囚犯们一般都认为喝醉了酒的人在挨棍棒的时候不会感到太痛。不过，我又离题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喝了那瓶酒以后，果然立刻就病倒了；他开始吐血，把他送进医院时，几乎已不省人事。这次吐血使他的胸部受到严重损害，几天之后便发现他有了肺结核的症状，半年之后他便因此而死去。给他治病的医生始终不知道他发病的原因。

谈到囚犯在受刑之前常常表现出胆怯心理的时候，我应当补充几句：也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那种非凡的无畏精神往往使旁观者大为惊讶。我记得有几个人非常勇敢，这种勇敢简直达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这样勇敢的人是并不罕见的。我还特别记得，我同一个可怕的犯人相遇时的情景。那是在夏天，有一天犯人病房里传说晚上要给大名鼎鼎的强盗奥尔洛夫用刑，他是一个逃兵。用过刑以后要把他送进病房里来。患病的囚犯们一面等待着，一面断言，奥尔洛夫将受酷刑。大家都有点忐忑不安。老实说，我也极为好奇地等待着这个著名大盗的光临。好久以前我就听说过有关他的奇闻轶事。他是一个少见的杀人不眨眼的、残杀老人和孩子的凶手，同时又具有惊人的意志力，并对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他供认出了许多起凶杀案，因此被判处穿过队列受棒刑。把他送来的时候已是傍晚了。病房里已经昏暗，点上了蜡烛。奥尔洛夫几乎失去了知觉，脸色苍白得吓人，他那浓密而漆黑的头发披散着。他的脊背已经肿了，红一块青一块。囚犯们整夜地侍候他，不断拿水给他喝，帮他翻身，给他药吃，他们

象照顾亲兄弟或恩人一样照顾他。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了知觉，还在病房里来回走了两趟！这使我感到吃惊，因为他进院时是那么虚弱无力和精疲力竭！他一次就挨了判定的总棒数的一半。直到医生看出再打下去就会使他丧命的时候，才叫停止用刑。此外，奥尔洛夫身材短小，身体孱弱，况且长期的监禁已使他精疲力竭了。凡是遇见过候刑犯人的人，大概都会长久地铭记着他们那疲惫不堪、干瘦而苍白的面孔，以及他们那害寒热病似的神色。尽管如此，奥尔洛夫很快康复了。显然是他那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显得无比坚强。他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我为好奇心所驱使，结识了他并对他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观察和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一生中从未遇见过象他那样坚强有力、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在托波尔斯克，有一次我曾看见过一个这样的著名人物，一个原先的强盗首领。他完全是个野兽，如果您站在他身旁，即使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您也会本能地感觉到有个可怕的动物站在您身旁。但是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他那精神上的愚钝。在他身上，肉欲战胜了精神特征，以致您一眼便可从他的脸上看出，除了疯狂地渴望满足肉体上的享受——纵情酒色、淫荡作乐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我相信科连涅夫(这个强盗的名字)在受刑前也会垂头丧气、怕得浑身发抖的，尽管他有着杀人不眨眼的本领。奥尔洛夫则和他完全相反，显而易见，在奥尔洛夫身上，精神力量完全战胜了肉欲。看得出来，这个人的自制力是无限的，他蔑视一切痛苦和刑罚，世界上没有使他害怕的东西。您在他身上只会看到无穷的精力，渴望行动、渴望复仇、渴望达到预定目标的意志。然而他那种奇特的傲慢却使我感到诧异。他对一切仿佛都看不上眼，真是傲慢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但他完全不是装腔作势，而是自然的流露。我想，世界上没有人单凭权势就能使他屈服。他看待一切事物都出人意外地沉着，似乎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会使他感到惊奇。尽管他完全知道其他囚犯都怀着尊敬的心情看待他，但他在他们面前从不夸耀自己。徒骛虚名，骄傲自大，几乎毫无例外地是所有囚犯的特点。他非常聪明，坦率得有点奇怪，但却绝不信口开河。他坦率地回答我的问话，说他正等着恢复健康，以便尽快地受完剩下的棒刑，还说在受刑以前，他起初确实担心受不了。“可是现在，”他向我挤挤眉眼，补充说，“一切都过去了。把剩下的棒刑挨完以后，我立刻就随大伙到涅尔琴斯克去，在路上找机会逃跑！一定跑！但愿我的脊背能快快长好！”在这五天里，他总是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出院。在等待出院期间，他有时很爱开玩笑，而且显得很高兴。我曾试探着询问他的经历。他一听到这样的询问，总是微微皱起眉头，但还是坦率地回答我。当他察觉出我在探究他的内心并竭力想在他身上发现一点懊悔的情绪时，他便用十分蔑视和高傲的眼光瞧着我，仿佛我在他的心目中忽然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傻孩子，不能象跟成年人那样跟我谈论这种事情。他脸上甚至流露出一种仿佛象是怜悯我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冲着我大笑起来，这是最天真无邪的笑声，没有丝毫嘲笑之意，我相信，当他独自一人回想起我的问话时，他也许会哑然失笑的。后来，他的背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就办了出院手续；当时我也去办出院手续，恰好我们就一同出院了：我回监房，他回原先监禁他的那间靠近监狱的拘留室去。告别的时候，他跟我握了手，从他那方面说，这是极大信任的表示。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对此时此刻以及对自己都很满意。实际上他不能不蔑视我，他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驯服、软弱而可怜的人，认为我在各方面都不如他。第二天，他又被带去受棒刑……

我们的狱室上锁以后，立刻大为改观，……变得象一所真正的住宅，象个家庭一样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看出我的狱友们完全象在家里一样。白天，军士、看守长以及其他长官随时都可能到狱室来，因此全狱室的人都有点不大自在，他们仿佛都不大安心，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地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狱室的门刚一锁上，大家便立刻安静下来，各就各位，几乎每个人都干起自己的手艺来了。狱室内立刻明亮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蜡烛和烛台，大多是木制的。有的缝靴子，有的缝衣服。室内的恶浊空气越来越浓。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在墙角里铺上地毯，蹲下赌牌。几乎每个狱室都有这样一个囚犯，他保存着一块一俄尺①宽的

破地毯、一支蜡烛和一副脏得出奇的、满是油污的纸牌。
****
①一俄尺等于 0.71 米。
****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叫做赌场。物主每夜向赌徒们收十五戈比，他就以此为业。赌徒们通常都是玩“三叶”、“小丘”等等。所有的牌戏都是全凭运气不讲技术的硬赌。每个赌徒面前都摆着一堆铜钱——他衣袋里的全部财产，只有在他输个精光或者把伙伴的钱赢过来时，他才站起身来走开。一赌就赌到深夜，有时赌到天亮，直到早晨开门的时候。在我们狱室里，也象其他狱室一样，总是有一些贫穷的囚犯，有的是赌钱输穷的，有的是喝酒喝穷的，还有的天生就是乞丐。我说的是“天生”，而且我还要坚持用这个词儿。确实，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国人民中间总是有而且将来还会有这么一些奇怪的人，他们安守本分，而且往往一点儿也不懒惰，但他们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受穷。他们总是孑然一身，一贫如洗，邋遢不堪，看来他们好象总是受欺压而又不敢反抗，总是被折磨得抑郁不欢，而且总是依靠某一个人，受某个人的差遣，这个人通常就是那种游手好闲之辈或突然飞黄腾达的暴发户。任何一项创举，任何一种首创精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痛苦，都是负担。他们仿佛生下来就注定了不能自己开创任何事业，而只能侍奉别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而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天职就是听从别人吩咐。除此以外，任何环境，任何变革，都不能够使他们富裕起来。他们永远是乞丐。我发现，这样的人不只是普通老百姓中间有，就是各种社会团体、阶层、党派、报社、会馆里也有。每个狱室里，每座监狱里也是这样，只要赌场一开，准会有一个这样的人立刻出来侍候。而且也没有一个赌场离得了这种人。赌徒们通常花上五个银戈比雇用他们，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宵站岗报信。照例，他要在黑魅魅的穿堂里，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一连挨六、七个小时的冻，他要谛听每一下碰撞声、每一下叮当声、院子里的每一个脚步声。少校或值班长有时深夜里悄悄地走进监狱，当场擒获那些赌徒和干活儿的囚犯，没收尚未点完的蜡烛，燃着的蜡烛在院子里就可以看见。如果听到穿堂门上的锁忽然响动才躲藏起来，才熄掉蜡烛往床铺上躺，那就太晚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负责报信的仆人将要受到聚赌者的严厉处罚，因而这种疏失是很少发生的。五个戈比当然是少得可怜的报酬，即使是在监狱里也是一样；可是狱中的雇主们在这种场合或其他场合表现出来的那种严酷和残忍，却往往使我感到惊讶。“拿了钱，就得好好干！”这是一条不容反驳的理由。雇主付出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儿钱，便能取得他想要取得的一切，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取得额外的东西，可他却依然认为这是加惠于受雇者呢。那个喝得醉醺醺的放荡汉任意挥霍金钱，可是他却总想克扣仆人，这样的事情我不仅在监狱里，也不仅在赌场上屡次看见过。

我已经说过，狱室里的人几乎全都有点什么活儿干。除赌徒外，还有四、五个人完全无事可做，所以他们立刻就躺下睡觉了。我在通铺上的铺位紧靠着门。通铺的另一边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和我头对着头。他干活干到十点或十一点，他会糊五颜六色的中国式宫灯，那是城里人订做的，付给他的钱相当可观。他做灯笼做得很熟练，他不停地、有条不紊地裱糊着，糊完后，便整整齐齐地把活计放在一边，把褥垫打开，做完祈祷，然后心安理得地躺下睡觉。他显然过于注意品行端正和有条不紊，简直都有点迂腐了。他显然认为自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就象一切笨拙而又目光短浅的人一样。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他，那一天关于他我想了很多，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象他这样一个人竟然没有在外面飞黄腾达，反而进了监狱。以后，我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阿基姆•阿基梅奇。

我现在要把我们狱室里的所有成员简要地描述一下。在这个狱室里，我还要度过很多个

年头，因而这些人都是我将来的狱友和难友。不言而喻，我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他们的。我左边通铺上是一群来自高加索的山民，他们大部分都是因抢劫而被发配到这儿来的，刑期长短不等。他们是：两个列兹金人，一个切禅人，还有三个达格斯坦地区的鞑靼人。那个切禅人性格忧郁，愁眉苦脸，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他总是皱着眉头，怀着敌意，面带阴沉而恶毒的冷笑望着周围的人们。列兹金人中有一个已经是老头子了，他那个鹰钩鼻子又长又细，从面貌上看就是一个惯匪。然而另一个名叫努拉的列兹金人，从第一天起就给我留下了最愉快和最亲切的印象。这个人年纪还不大，他身材适中，大力士般的体格，头发淡黄，眼睛浅蓝，鼻子向上翘着，一副芬兰女人的面孔，两腿弯曲，那是因为过去经常骑马的缘故。他遍身都是刺刀和子弹留下的伤疤。他在高加索属于一个同俄国人保持睦邻关系的部族，但常常私自跑到敌对的山民那一边，并同他们一起从那里去袭击俄国人。监狱里的人都喜欢他。他总是那么愉快，对任何人都很和蔼，干活时毫无怨言，性格安静而开朗，尽管他常常以愤怒的眼光看着囚犯生活中的那些卑鄙龌龊的行为，并且对于一切偷盗、欺骗、酗酒以及一切不诚实的行为，他都深恶痛绝，但他并不挑起争端，遇见不顺眼的事他就拂袖而去。在服苦役期间，他从未偷过东西，从未干过坏事。他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作祈祷时特别庄重；到了伊斯兰教节日前的斋戒期，他象宗教狂那样斋戒素食，整夜整夜地祈祷。大家都喜欢他，相信他的诚实正直。“努拉是一头狮子，”——囚犯们说，于是“狮子”就成了他的外号。他完全相信，刑满后，一定会让他返回高加索老家去，这是他唯一的希望。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希望，他会死去的。入狱后的第一天，我就特别注意到了他。在其他苦役犯们那种凶狠、阴郁而又奸诈的面孔中，是不能不注意到他那善良而又和蔼可亲的面孔的。在我入狱后半个小时里，他就从我跟前走过，一面拍着我的肩膀，一面和善地望着我的眼睛微笑。起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俄语说得很不好。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到我跟前，又是一面微笑，一面友好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后来，又反反复复地这样做，一直持续了三天。据我猜测，他所以对我这样，是为了向我表示：他同情我，他认为我受不了监狱里的艰苦生活，他愿意对我表示友好，使我振作起来，并要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的。后来，我知道他的确是这么想的。善良而纯朴的努拉啊！

三个达格斯坦的鞑靼人，是亲兄弟。其中两个已上了年纪，老三叫阿列伊，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岁，看相貌还要年轻些。他的铺位紧靠着我。他那漂亮、开朗、聪明而又和善淳朴的面孔，一见面就把我的心给吸引住了，我十分高兴，命运让他而不是让别人做了我的邻人。他的整个灵魂都表现在他那漂亮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脸上。他的笑容是那么轻信，那么天真无邪；他的那双很大的黑眼睛是那么柔和而又温存，我瞧着他时，总感到格外快活，似乎我心头的痛苦和忧愁也减轻了几分。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在家乡时，有一次他哥哥(他一共有五个哥哥，另外两个哥哥进了驯马场)吩咐他骑马挎刀跟他们一起上路。在山民的家庭里，对长兄一般都是非常尊敬的，少年人不但不敢问，甚至也没有想到要问一声他们究竟到哪儿去？兄长们更是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他们是出去抢劫，埋伏在路旁窥视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商人，然后抢劫他。果然如此：他们杀死了护送人员，杀死了亚美尼亚商人并劫夺了他的货物。但是案子被破获了：他们六个人全部被逮捕，被审讯、揭发、定罪，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法庭对阿列伊开了点恩，判的刑期较短：四年苦役。他的兄长都很喜欢他，这与其说是手足之情，毋宁说是慈父之爱。在流放期间，他是他们的安慰，他们平时总是面色阴沉，双眉紧锁，但只要一看见他，便都笑逐颜开，当他们跟他说话(他们很少跟他说话，好象都认为他还是一个少年，跟他没有什么好谈的)时，他们那阴森的面孔便舒展开来，这时我猜想，他们准是在跟他谈什么有趣的事情，甚至是小孩的事情，当他们听到他的回答时，他们总是彼此交换着眼色，并向他露出和善的微笑。他自己却不敢先跟他们说话，因为他非常尊敬他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少年在整个服役期间，怎能保持着他那颗温柔的心，

怎能变得那样淳朴诚实，那样温情脉脉，那样讨人喜欢，而没有变得粗野和放荡不羁。然而，他的禀性却是坚强而毫不动摇的，尽管从外表上看他很温柔。后来，我对他有了深刻的了解。他象贞洁的少女一样纯洁，监狱里任何一桩丑恶、无耻、肮脏或不公道的暴行，都会在他那美丽的眼睛里点燃起愤怒的火焰，使得他的眼睛变得更加美丽。但是，他避免一切争吵和谩骂，虽然他并不是那种可以随便让人欺侮的人，他善于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因为大家都喜爱他。起先，他对我只不过是彬彬有礼。我渐渐开始跟他谈话，几个月之后他就学会了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可是他的两个哥哥在服役期间始终没有学会。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谦虚、对人非常客气而又明白许多道理的少年。总之，我要预先说明，我认为阿列伊远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常常回忆起和他会见时的情景，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会见之一。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那么美好，仿佛是上帝恩赐的一般，你甚至不敢设想他们有朝一日会变坏。你任何时候对他们都尽可放心。我现在对阿列伊也是放心的。可现在他在哪儿呢？……

有一次，那是在我入狱很久以后，我正躺在通铺上想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平时总是忙碌而勤勉的阿列伊这一次却什么也没干，尽管离睡觉的时间还早。当时他们正在过伊斯兰教的节日，因此他们都没有去干活。他躺着，把双手垫在头下，也在想着什么。他突然问我：

“你现在很痛苦吧？”

我好奇地回头瞧了瞧他，我觉得阿列伊提的这个直率而突然的问题颇有点奇怪，因为阿列伊对人一向很客气，思路一向很细腻，心里一向充满了智慧。但是当我更仔细地端详他时，我在他脸上看出，他正由于回首往事而显得十分沉痛，十分悒郁，我立刻领悟到，此时此刻他自己的心情很痛苦。我把我的猜测告诉了他。他叹了一口气，随即忧郁地微微一笑。我喜欢他的微笑，这微笑总是那么温柔亲切。此外，当他微笑的时候，他那两排珍珠般的牙齿便露了出来，世界上第一号美人也会羡慕他那口牙齿的。

“唉，阿列伊，你现在大概在想你们达格斯坦人是怎样度过这个节日的吧？是吗，那边好吗？”

“是的，”他非常高兴地回答说，眼睛熠熠发光，“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件事呢？”

“怎么会不知道呢！那边比这里好吧？”

“唉！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们那边现在想必正是鲜花盛开，跟天堂一样！……”

“噢，噢，你最好别提它了。”他十分激动。

“阿列伊，你听我说，你有妹妹吗？”

“有，你问这个干什么？”

“如果她长得也象你一样，她一定是个美人。”

“象我干什么！她的确是个美人，全达格斯坦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了。唉，我的妹妹长得多漂亮啊！你恐怕还没有看见过象她那样漂亮的美人！我母亲也是个美人。”

“母亲爱你吗？”

“唉！你说的哪儿话呀！她现在为了我大概都快伤心死了。我是她的爱子。她爱我胜过爱妹妹，胜过爱所有的人……我昨天夜里还梦见她哩，她为我哭啦。”

他不作声了，而且这天晚上他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但是，从这以后，他便寻找一切机会跟我谈话，尽管出于对我的尊敬(我不知道这种尊敬从何而来)，他从来都不首先跟我说话。但是当我跟他说话时，他总是十分高兴。我问他一些高加索的事情，问他过去的生活。他的兄长不阻止他跟我说话，他们甚至对此感到高兴。他们看出，我越来越喜欢起阿列伊来了，因而他们对我也就亲切得多了。

阿列伊在干活时帮助我，在狱室里尽量照料我，看得出来，只要他为我做点什么事能使我感到轻松，或使我感到满意，他就十分高兴，但是，在他的这番心意中却没有丝毫卑躬屈膝或贪图私利的成分，而完全是出于一种热烈的友情，他已经不再对我掩饰这种情谊了。我顺便说一下，他还掌握了许多技能：他学会了缝衬衣，而且缝得很好，他会做靴子，后来还学会了一点木匠活。他的两个哥哥都称赞他，为他感到自豪。

“你听我说，阿列伊，”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学用俄语读写？要知道，这对你以后在西伯利亚生活，可能会有用处的呀？”

“我很想学。可是跟谁学呢？”

“这儿会读会写的人还少吗？你愿意让我教你吗？”

“好，那就请你教我吧！”他甚至从通铺上欠身起来，一边望着我，一边合起手来恳求我。

第二天晚上，我们便开始学起来了。我有一本《新约》俄译本——这是监狱里不被禁止的书。没有字母表，就从这本书中学，几个星期之后阿列伊便读得很好了。大约三个月后，他便完全读懂了这本书。他热心地学，学得入了迷。

有一天，我们把登山训众那一段①全读完了。我发现，他在朗读其中某些地方的时候仿佛怀着特殊的感情。

****

①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

****

我问他是否喜欢读过的段落。

他迅速地瞧了我一眼，脸上泛起了红晕。

“哦，是的！”他答道，“是的，耶稣是一位神圣的先知，耶稣说的都是上帝的话。他说得多好啊！”

“你最喜欢他的哪一句话？”

“我喜欢他的这几句话：饶恕吧，爱吧，别欺侮人，敌人也要爱。哦，他说得多么好啊！”

他转身向着正在听我们谈话的他的两位兄长，热情地跟他们说起话来。他们一本正经地说了很久，并且频频点头。然后他们带着一种庄重而宽厚的笑容，即典型的伊斯兰教徒的笑容(我十分喜欢这种笑容，特别喜欢这种笑容的庄重)转身对我说：耶稣是上帝的先知，而且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他用泥做了一只鸟，吹口气，它就飞了……这也是他们的书上所写的。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完全相信，他们赞美了耶稣，也就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快乐；阿列伊感到特别幸福，因为他的两位哥哥居然开恩想使我高兴一番。

练习书写也进行得很顺利。阿列伊弄来了一些纸张(他不让我用自己的钱给他买)、笔墨，不到两个月，他就能写一笔好字了。这甚至使他的两位哥哥也惊叹不已。他们感到万分高兴和骄傲。他们不知怎样感谢我才好。我们在一起干活时，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帮助我，并认为这样做就是他们的幸福。至于阿列伊，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爱我，就象爱他的兄长们一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出狱时的情景。他把我拉到狱室后边，搂着我的脖子大哭起来。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吻过我，也没有掉过泪。“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太大了，”他说，“就连我父亲，我母亲，对待我也不象你这样周到：你让我懂得了该怎么做人，上帝会报答你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你……”

如今，我那善良、可爱而又可亲的阿列伊，你在哪儿呀，你在哪儿呀！……

在我们的狱室里，除了契尔克斯人以外，还有几个波兰人，他们组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小家庭，几乎不同其他囚犯来往。我已经说过，由于他们自己的排外情绪和对俄国苦役犯的仇视，所以他们自己也遭到大家的憎恨。这是一些被折磨得成了病态的人。他们共有六人。其中有几个受过教育，我以后还要专门详细地讲述他们。在我狱中生活的最后几年里，我曾向他们借过一些书。我看过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奇异的、特殊的印象。关于这些印象，我以后有机会还要专门讲。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我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对于某些事物如果不亲身体验，就不能下判断。我只说一点吧：精神上的贫乏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都更加使人难以忍受。一个普通老百姓入狱后，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同伴，甚至还可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同伴。当然，他失掉了很多东西——故乡、家庭等等，但是，他的生活环境仍是相同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普通老百姓依法接受同样的刑罚，但前者失去的东西往往要比后者多得无可比拟。他必须克制自己的一切需求，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进入一个不会使他感到满意的环境，学会呼吸另一种空气……这就等于把一条鱼从水里捞出来放在沙土上……所有的人都依法接受同样的刑罚，但对某些人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这是一条真理……即使我们所说的仅仅是一些不得不牺牲的物质方面的习惯。

但波兰人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整体。他们共有六个人，而且他们总是在一起。在我们狱室里所有的苦役犯中，他们只喜欢一个犹太人，唯一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能使他们开心。不过就连其他囚犯也都喜欢我们这个犹太人，尽管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嘲笑他。我们这里只有

他一个犹太人，就是现在我一回想起他来，也忍不住要笑。每当我看见他时，我就不禁想起果戈理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的那个犹太人杨凯尔来，当他脱下衣服和他的老婆走进一个大橱柜里过夜的时候，他立刻就变得象是一只小鸡雏。我们这位犹太人伊赛·福米奇也活象是一只拔掉了毛的小鸡雏。他已经不年轻了，约有五十岁左右，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但很狡猾，同时又是一个十足的蠢汉。他莽撞、傲慢，同时又胆小如鼠。他满脸皱纹，前额和两颊上全是受刑时打下的烙印。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他怎能忍受得住六十皮鞭。他是因为一起凶杀案而入狱的。他秘藏着一个药方，那是他的一位犹太朋友在他受刑后立即从一个医生那儿弄来的。按照这个药方可以配制一种药膏，一擦上它，两个星期内便可除掉烙印。在监狱里，他不敢用这种药膏，他打算等他服满十二年苦役出狱成为一个自由民时，再使用这个药方。“不然，我就不能结婚了，”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一定要结婚的。”我和他是好朋友。他总是兴高采烈、喜气盈盈的。他在监狱里过得挺轻松：他学的手艺是首饰匠，因为城里没有首饰匠，所以他的活计总是做不完，这就使他避免了做苦工。自然，他同时又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家伙，他向全狱放债、收存抵押品获取利息。他是在我以前入狱的，一个波兰人曾详细地向我讲述过他入狱时的情景。这是一个荒谬可笑的故事，我以后还要讲的，我以后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伊赛·福米奇。

除此以外，我们狱室里还有这么一些人：四个旧教徒，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饱读圣经的老年人，其中一个是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的老头子；还有两三个总是愁眉苦脸的小俄罗斯人①；

****

①这是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

一个瘦脸尖鼻子的年轻苦役犯，约有二十三岁，他已经杀过八个人了；一批伪造货币者，其中一个家伙十分滑稽可笑，全狱室的人都拿他开心。最后还有几个悲观失望、愁眉苦脸的人，他们的头被剃去了半边，面貌丑陋不堪，个个沉默寡言，贪婪嫉妒，总是怀着仇恨的心理皱着眉头看着周围的一切，他们打算还要长期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和仇恨别人，直到服满苦役。在我入狱后的第一个悒郁不乐的夜晚，这一切都只是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在烟雾和污秽中、在谩骂声和下流的猥亵话中，在污浊的空气中，在叮当响的脚镣声中，在诅咒和无耻的大笑声中一闪而过。我躺在光光的通铺上，把自己的衣服垫在头下(我还投有枕头)，把短皮袄盖在身上，久久不能入睡，尽管我已经被这第一天的许许多多骇人听闻而又出乎意外的印象折磨得精疲力尽了。但是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呀。前面还有许多我从未想到、也不曾预料到的事情等待着我呢……

第五章　第一个月

入狱后三天，我就被叫去干活了。干活的第一天是我永生难忘的，虽然这一天我并没有遇到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但总的看来，即使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处境本身就已经是不同寻常的了。这也算是我最初的一个印象吧，我还要热切地对一切继续进行观察。头三天我是在最沉痛的心情中度过的。“这是我漂泊的终点：我已陷身囹圄了！”我时时刻刻暗自重复道，“这就是我将要停泊许多个年头的码头，我的栖身之地，我是带着这么重的疑心、这么浓厚的病态心理走进这儿来的……可是有谁知道呢？也许，许多年以后，当我离开它的时候，我还会对它感到惋惜呢！……”我补充说，不免夹杂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这种心情有时竟发展到故意要去触痛自己的伤口，仿佛想要欣赏自己的痛苦，.仿佛真正的快乐就在于意

识到这种不幸的全部重大意义。一想到将来会对这个栖身之地感到惋惜——我自己便不禁大为震惊：我那时就已预感到，一个人适应生活的能力竟能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但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而现在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敌对的和可怕的……虽然也并非完全是这样，但我当时确有这样的感觉。我的新难友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瞅着我，他们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他们一伙当中的贵族出身的新难友的严厉态度，有时几乎达到了仇恨的程度，——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痛苦，我自己只盼望着赶快出去干活，以便尽快地一下子就了解和体会到我的全部灾难，开始象他们那样生活，尽快同大家走上一个轨道。诚然，那时对于我眼前的许多事物我还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意料到，我还没有想到在敌视之中也还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在这三天中，我所遇见的几张和蔼可亲的面孔，大大地鼓舞了我。对我最为和蔼可亲的就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其他苦役犯们那种阴沉而又充满敌意的面孔当中，我也看到几张善良而愉快的面孔。"到处都有坏人，而坏人中间也有好人，"我急于安慰自己，"谁知道呢？这些人也许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尚留在狱外的人更坏。我虽然这样想，但是连我自己也不禁对我的这种想法频频摇头，然而——我的天哪！——我若是那时就知道这个想法是多么正确就好了！

比方说，有一个人，多年以后我才对他有了充分的了解，然而在我蹲监狱期间，他始终都和我在一起，待在我身边。这个人就是苦役犯苏希洛夫。当我现在一讲起苦役犯并不比别人坏的时候，我就立刻不由得想起他来。他常常侍候我。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常常侍候我。从第一天起，阿基姆·阿基梅奇就把一个叫奥西普的囚犯荐举给了我，并告诉我说：我若是讨厌监狱的伙食，而且又有钱，只要我每月花上三十个戈比，他就可以每天给我单独做饭吃。奥西普是由囚犯们推选到两个伙房去的四个炊事员之一，然而，是否接受这样的推选，还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即使接受下来，第二天也还可以拒绝。炊事员不外出干活，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烤面包和熬菜汤。我们不叫他们炊事员，而是管他们叫做"厨娘"，这并不是对他们的藐视，而是亲切地开玩笑，因为被选进厨房的都是一些精明强干和极其诚实的人，所以我们的炊事员对此也就一点儿也不见怪了。几乎总是推选奥西普，而且往往一连几年都让他当"厨娘"，只是当他极感苦闷并总想往狱中贩卖私酒的时候，才让他停当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少见的诚实而又温和的人，尽管他是因走私而入狱的。他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身材魁梧的走私犯；他胆量很小，对什么都怕，尤其是怕受鞭笞，他性情温存和善，和任何人都友好相处，从不和人争吵，但是不让他贩私酒却不行，尽管他胆小如鼠，对走私却已上了瘾。他也伙同其他炊事员一起做酒生意，但规模却没有那么大，譬如说就比不上卡津，因为他们不敢冒太大的风险。我和这位奥西普总是相处得挺好。至于自己单独办伙食，用钱并不太多。如果说每月我花在伙食上总共也不过一个卢布，这话并没有说错，当然，不包括面包钱，因为我吃的是监狱里的面包，至于菜汤，若是我饿得太厉害了，我有时也喝公家的，也顾不得它会引起恶心，不过后来几乎一点儿也不觉得恶心了。一般说来，我每天买一磅牛肉。一到冬天，我们这儿的牛肉更不值钱。每个狱室里都有一个维持秩序的残废老兵，买牛肉也由他们负责，他们每天自愿到市场上去给囚犯们买东西，而且几乎不收一点小费，因为这不过是一件不值一谢的小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身的平静，否则他们在监狱里是待不下去的。这样他们就买回来烟草、茶砖、牛肉、面包圈儿以及其他种种食物，唯一不准带进来的就是酒。酒是不求他们给买的，虽说偶尔也请他们喝。奥西普一连几年给我煎的总是同样大小的一块牛肉。至于这块牛肉是怎么个煎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我和奥西普相处多年，几乎从没交谈过两句话。我有许多次开始和他谈话，可是他似乎不很健谈：往往只是微微一笑，或者只回答一个是或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了。看着这个七岁孩子似的赫拉克勒斯①，确实叫人觉得有点奇怪。

****

①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

除了奥西普，给我帮忙的还有一个苏希洛夫。我并没有叫过他，也没有找过他。不知为什么他却自己找上门来，听候我的差遣；我甚至记不得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样开始的。他开始替我洗衣服。狱室后面专门为此挖了一个大污水坑，污水坑旁边放着供囚犯们洗衣用的洗衣槽。此外，苏希洛夫自己还千方百计地讨好我：给我沏茶，办理杂务，帮我寻找东西，把我的上衣送去修补，每月给我擦四次皮鞋；这一切他都尽心竭力地、手忙脚乱地去做，似乎只有上帝才晓得他担负了哪些职责，——总之，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我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了，把我所有的事情都担负了起来。例如：他从不说："您的衬衫这么多，您的短上衣破啦"等等，而总是说："咱们现在有这么多衬衫，咱们的短上衣破啦。"他总是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把这一切当做他全部生活的目的。至于手艺，或象囚犯们所说的手工活儿，他统统不会，他似乎只能从我这儿弄到几个钱。我尽可能多付给他一些钱，也就是付给几个铜币，他总是唯唯诺诺地表示满意。他不能不侍候一个人，他之所以特别选上了我，似乎是因为我对他比对别人都和气，付的工钱也比别人公道。他也是那种永远不会发财致富、不会使家境转好的人，赌徒们往往雇佣这种人给赌场放哨，他们通宵站在冷冰冰的穿堂里，倾听着院子里的每一个声音，以防少校突然闯进来。一个通宵他们只能得到五个银戈比，稍一疏忽大意，不但会失去一切，而且还要挨上一顿揍。关于这种人，我已在前面提到过了。这种人的特性是：几乎总是在所有的人面前到处糟蹋自己的人格，而在共同事业中甚至不会扮演第二流角色，只能扮演第三流角色。他们的这些特性都是天生的。苏希洛夫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他对人总是唯命是从，忍辱负重，甚至受了欺压也不敢反抗。尽管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打过他，但他天生就是一个受人欺压而又不敢反抗的人。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很可怜他。我甚至不能不怀着这样的感情去看他；至于为什么可怜他——连我自己也不能回答。我甚至不能够同他谈话；他也不善于谈话，对他来说，谈话显然是一种很大的负担，有时只是为了结束谈话，我才给他点儿事情去做，求他到什么地方去干点儿什么，只有这时他才会活泼起来。我最后甚至相信，我只有这样才能使他高兴。他身材不高也不矮，相貌不俊也不丑，他既不愚蠢也不聪明，既不年轻也不衰老，脸上有几颗稀稀疏疏的麻瘢，头发呈淡黄色。关于他，你永远也不能说出任何确切的看法。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如我感觉到并揣测到的那样，他是西罗特金那一类型的人，他之所以属于那一类型，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唯命是从，受欺压而又不敢反抗。囚犯们有时也嘲笑他，主要是因为他在发配到西伯利亚来的路上曾冒名顶替过别人，他获得的代价只是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正因为他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把自己给出卖了，囚犯们才嘲笑他。所谓冒名顶替——也就是和某人调换姓名，因而双方的命运也就随名字而异了。这件事尽管有点古怪，但毕竟确有其事，就在我服苦役的那些年头，这种事在被押往西伯利亚的犯人们中间还很流行，当时还被人们奉为传统，而且还要履行正式手续。起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后来我也只好相信那些明显的事实了。

事情是这样进行的。比方说，有一批犯人被押解到西伯利亚去。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囚犯工厂，有的去流放地，他们都被一块儿押送着。途中走到某地，比方说，彼尔姆省吧，流放犯中间有一个人想让另一个人顶替自己。比方说，有这么一个姓米哈伊洛夫的犯人，是个杀人凶手或者犯了别的什么严重罪行，他发现去服很多年的苦役对于自己不利。再比方说吧，这个人诡谲狡诈，饱经世故，且又熟谙法律；于是他便想在这批犯人中间物色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这个人受了欺压却又不敢反抗，比较听话，判的刑也较轻：或是去囚犯工厂干不多几年活，或者去流放地，甚至也许是去服苦役，但刑期较短。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原先是地主的家仆，只被判处流放。他已走了一千五百俄里，不用说他是囊无分文的，因为苏希洛夫从来就不会有一个戈比，——他走路已走得精疲

力竭了，他只吃公家发的口粮，香甜的东西连一口也没有尝着，衣帽也是公家发的，他只能靠侍候别人赚几个可怜的铜板。米哈伊洛夫同苏希洛夫一谈，就谈得十分投机，甚至交了朋友，最后来到一个停宿站上请他喝酒。酒后问他是否愿意顶替？他说：我姓米哈伊洛夫，我被押解去服苦役，也不是服苦役，而是到“特别部”去。这虽然也是服苦役，但它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要好得多。关于特别部，当时就连长官们都不完全知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在彼得堡也是如此。这是西伯利亚一个偏僻角落中的一个特殊角落，这里的囚犯人数不多(在我蹲监狱时也不过七十来人)，很难搞清楚它在哪儿。后来，我遇到一些曾在西伯利亚供职而又了解内情的人，他们也是听我说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特别部”的。在法典里关于这个特别部的条文只有六行字：“应在某某监狱设一特别部，以便监押最重要之罪犯，直至在西伯利亚创办最艰苦之苦役营为止。”就连被关在特别部里的囚犯本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刑期是无期的，还是有期的？没有一定的限期，只说要等到创办最艰苦之苦役营为止；因此，也许就是“无期徒刑”。这批犯人中无论是苏希洛夫还是别人，当然都不知道这一点，其中也包括米哈伊洛夫本人，他只能根据自己所犯的十分严重的罪行和已挨过三、四千棍的刑罚来判断特别部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因此，他断定是不会把他发配到什么好地方去的，而苏希洛夫只是被押解到流放地去，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吗？“你愿不愿意顶替？”苏希洛夫是个心地纯朴的人，对米哈伊洛夫这样的亲热态度，他已经感恩不尽了，兼之他又有点醉意，因而便不好拒绝。况且，他在这批人中间也曾听说可以顶替，别人也有顶替的，因而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他们俩都同意了。这个无耻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十分天真的性格，只用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便将他的姓名买去了，并在证人面前当场把东西交给了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醉意已消，可是这时又有人用酒灌他，要想拒绝也不行了：他得到的一个卢布已经喝光，那件红衬衫过一会儿也喝光了。要是不愿顶替，就得退钱。可是苏希洛夫到哪儿去弄一个卢布的银币呢？要是不退钱，他们那一伙就会逼着他退：他们在这种事情上是十分严厉的。此外，既然答应了就得恪守诺言——那帮人也会坚持要他这样做的。否则，他们就会吞吃了他。他们会揍他，或者干脆把他打死，起码也要这样威吓他。

事实上也是这样，那帮人对于这种事情只要宽容一次，冒名顶替的习俗也就完蛋了。如果把钱拿到手，可以拒不履行诺言，可以破坏做成的交易，那以后谁还会去遵守呢？一言以蔽之，此事关系重大，关系到他们那个帮，因而那帮犯人对待此事也就非常严格。最后，苏希洛夫看出来央求也无济于事了，只好横下一条心表示完全同意。接着，这件事便向所有的犯人公开宣布；至于别的人，该请酒的请酒，该送礼的送礼。当然啦，对于他们来说，反正都是一样：米哈伊洛夫也好，苏希洛夫也好，不管谁下地狱都是一样，反正酒是喝进肚子里了，客也请了，所以他们也就不作声了。到了下一个停宿站，比方说要点名，当叫到米哈伊洛夫时，苏希洛夫便回答：“到！”当叫到苏希洛夫时，米哈伊洛夫便喊道：“到！”——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走。关于这件事，谁也不再提了。到了托波尔斯克，对流放犯进行分类：“米哈伊洛夫”被送往流放地，而“苏希洛夫”则由加强警卫队押送到特别部。以后就再也没有抗议的余地了；实际上又能用什么来证明呢？要是去调查这个案子，需要多少个年头啊？结果又会怎样呢？最后，证人在哪儿？即便有，他们也会否认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了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苏希洛夫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所以嘲笑苏希洛夫，并不是因为他和人家换了姓名(尽管他们十分藐视那些拿轻刑罚换取重刑罚的人，就象藐视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而是嘲笑他只得到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这个代价是太微不足道了。一般说来，冒名顶替是要得到一大笔款项的，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至少也要得到几十个卢布。但苏希洛夫是那样顺从，那样窝囊，而且在所有人的眼中又是那样无足轻重，似乎连被人嘲笑也不配了。

我和苏希洛夫在一起住了好久，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渐渐地对我特别忠诚，这一点我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对他也就习惯了。但是有一次——为此我永远也不能饶恕自己的——他不知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办事，而他又恰好刚刚从我手里拿了钱去，于是我冷冰冰地对他说，“喂，苏希洛夫，你就只知道拿钱，不知道办事。”苏希洛夫一句话没说，跑出去给我办事去了，但不知道怎的，他忽然忧郁起来。过了两天。我心里想：他不会是因为我说了那几句话而感到伤心吧。我知道，有一个叫安东·瓦西利耶夫的囚犯，逼他还一笔微不足道的债务。不用说，他是没有钱的，可是他又害怕向我要。到了第三天头上，我对他说：“苏希洛夫，您似乎想要向我借钱去还安东·瓦西利耶夫的债，是吧？拿去吧。”我当时正在通铺上坐着，苏希洛夫就站在我面前。他似乎很受感动，因为我竟主动提出给他钱，我竟主动想到了他的困难处境，更何况根据他的请求，最近他已从我这儿拿走了很多钱，因而他也就不敢期望再从我这里拿到钱了。他看看钱，又看看我，然后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跟着追出去，我在监狱后面找到了他。他正站在监狱的木桩围墙旁边，面向围墙，头紧贴在围墙上，用一只肘子撑在上面。“苏希洛夫，您怎么啦？”我问他。他没有看我，使我特别吃惊的是，我看出他几乎要放声痛哭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开始说道，竭力向旁边看着，“您以为我侍候您……是为了钱吗……可是我……我……唉！”他马上又转向围墙，甚至用脑袋向围墙上撞，接着便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囚犯在监狱里恸哭。我好不容易才止住了他的哭。从此以后他便更加热心地服侍我和“照料”我，然而根据一些几乎无法捉摸的迹象，我察觉到他内心里是永远也不会饶恕我责备他的那几句话的。其他囚犯都嘲弄他，一有机会就使他难堪，有时还狠狠地辱骂他，——可是他仍然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和他们友好，从不生气。是啊，要了解一个人是很困难的，即使结识了多年以后！

我起初没能象后来那样看到监狱生活的真正面貌，原因就在这里。我还说过，即使我热切地、专心致志地对一切进行认真观察，但我还是不能把眼皮底下的一切事物都看得很透彻，原因就在这里。当然，最初使我感到惊愕的是那些重大的、最突出的现象，但就是对这些现象我的看法也不见得正确，它们只是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沉痛的、绝望而悲惨的印象而已。我和囚犯 A 的相遇，对于我产生这种印象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他是在我以前不久入狱的，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我留下了特别令人痛苦的印象。还在我入狱以前，我就知道我将在狱中同 A 相见。他毒化了我初期的苦役生活，加深了我心灵中的痛苦。因此，我不能不谈到他。

他是一个最令人讨厌的典型，他已经堕落腐化到了极点，他可以毫不费力和毫不懊悔地毁灭掉自己的道德感。A 就是我前面已经略微提及过的那个贵族出身的青年囚犯，据说，他把狱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报告给我们的那位少校，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要好。下面就是他的简历：他在学校里还没有毕业，便在莫斯科和他的父母发生了口角(因为他们为他的腐化堕落行为感到震惊)，来到彼得堡后，为了弄到钱，他决定干一件卑鄙的告密勾当，也就是出卖十个人的鲜血，以便立刻满足自己对极其粗野的淫荡作乐的贪婪欲望；他被彼得堡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以及市民大街①上的烟花巷迷住了，他变得放荡不羁，尽管他并不蠢，但却冒险去干疯狂的、毫无意义的勾当。

****

①当时彼得堡的市民大街上设有许多妓院、赌场和酒吧间。

****

他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告密时牵连了一些无辜的人，又欺骗了另一些人，因此被发配到西伯

利亚我们这个监狱来服十年苦役。他还很年轻，生活也还刚刚开始。按说，他一生中的这次可怕的转折理应使他震惊，激起他的天性去抗拒诱惑，使他发生彻底转变，可是他却丝毫不知羞耻地接受了自己的新命运，甚至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堪。除了必须去服苦役并同酒吧间以及市民大街上那三条烟花巷诀别外，他在精神上对这种新命运既不感到悔恨，也不感到恐惧。他甚至觉得，苦役犯这一称号更能使他放手去干更下流、更无耻的勾当。“苦役犯就是苦役犯；既然成了苦役犯，就可以去干卑鄙下流的勾当，也无须感到羞耻了。”这就是他的真实看法。我现在回想起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觉得他真是一个怪物。我在一些杀人犯、淫荡好色之徒和最凶狠的歹徒们中间生活过若干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一生中从未看见过象 A 这样道德败坏、这样腐化透顶、这样卑鄙下流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个弑父者，他出身贵族，我已经提过他了，但是根据许多特征和事实来看，我确信，就连他也比 A 高尚得多，有人性得多。在我服苦役期间，据我看，A 过去和现在都不过是一具有牙齿、有胃脏的行尸走肉而已，他对于极其粗野的禽兽般的肉欲真是贪得无厌，他为了满足最微不足道的、异想天开的一点点快乐，可以用最冷酷无情的手段干出凶杀、暗害等一切罪恶勾当，只要能把罪行掩盖过去就行。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我十分了解 A。一个人若是在肉欲方面不受任何内在准则和任何法律的约束，竟会堕落到何种地步啊，他就是一个例子。看着他那总是带着嘲弄意味的笑容，我感到十分厌恶。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精神方面的卡西摩多①。

****

①卡西摩多是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他身体畸形，相貌丑陋，后来他的名字成了身体畸形者的代名词。

****

而且他狡猾伶俐，容貌漂亮，甚至还受过一些教育，也颇有能力。不，宁可要火灾、瘟疫、饥饿，也比让这样的人留在社会上好！我已经说过，监狱里的风气是那么堕落，以致暗探和告密者大行其道，而囚犯们对此却毫不气愤。恰恰相反，他们都和 A 十分要好，人们跟他的关系要比跟我们亲密得多。我们那位酗酒的少校对他的厚爱，在囚犯们的眼里大大抬高了他的身价。顺便说一下，他曾使少校相信他会画像(他曾使囚犯们相信，他当过近卫军中尉)，于是少校便要求把他派到自己家里去当杂役，其实当然是为了给少校画像。这时，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做了朋友，而费季卡又对自己的老爷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也就会对狱中的一切人和事发生影响。A 根据少校的要求在我们中间进行暗探活动，而当少校喝醉酒抽打他的嘴巴时，便骂他是暗探和告密者。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打完他以后，少校又立刻坐在椅子上，命令 A 继续画下去。我们的少校似乎真的相信 A 是一个几乎跟他听说过的布留洛夫②同样杰出的画家，

****

②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著名画家。

****

可是他依然认为自己有权打他的嘴巴，因为在他看来，就算你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但你终究是个苦役犯，就算你真的是布留洛夫，但我终究是你的上司，因而，我想怎样对待你就怎样对待你。尽管他让 A 给他脱皮靴、倒夜壶、搬花盆等等，但他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以为 A 是一位伟大的画家。那幅画像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几乎拖了一年。到头来，少校发现自己受了骗，他确信这幅画像永远也画不成了，而且一天比一天画得不象他了，于是他勃然大怒，把这位画家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把他送进监狱以示惩戒，并叫他去干粗活。A 对此显然十分惋惜，使他伤心的是，他不得不放弃那悠闲的时光，放弃少校桌上的残羹剩饭，离开朋友费季卡以及他们俩在少校厨房里为自己烹制的一切美味。自从少校把 A 撵走以后，起码他停止了对囚犯米—茨基的迫害，A 曾不断在少校面前说他的坏话，其原因是：在 A 入狱时，米—茨基是狱中唯一的政治犯。米—茨基十分苦闷，他和其他囚犯没有任何共同语

言，他怀着恐惧和极其厌恶的心情看着他们，他没有发现也没有看出他们身上有着能够使他们跟他和好的东西，他未能跟他们和好，而他们也报之以同样的仇视态度。一般说来，象米—茨基这样的人在监狱里的处境是可怕的。米—茨基不知道 A 入狱的原因。恰恰相反，A 却看出米—茨基是个什么人了，他使米—茨基相信，他被发配到这里完全是因为被人告密，几乎同米—茨基被发配到这里来出于同样的原因。于是米—茨基便非常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米—茨基相信了他，在服苦役的头几天里安慰他，猜想他一定很痛苦，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钱送给他，给他买东西吃，把自己的一些必需品分给他。可是 A 却立刻对他怀恨在心，只是因为米—茨基人品高尚，因为米—茨基看到一切卑鄙龌龊的事物是那么吃惊，还因为米—茨基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他的人，于是他一有机会便赶快把米—茨基过去对他讲过的有关监狱和少校的坏话都向少校报告了。少校最恨这样的话，于是便迫害米—茨基，倘若没有要塞司令的干预，少校定会使米—茨基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后来，当米—茨基知道了他所干的一切下流勾当的时候，A 不但不感到难堪，反而却喜欢和米—茨基相见，并拿嘲笑的眼光看待米—茨基。显然，这使他感到快乐。米—茨基曾数次把 A 的这种行为指给我看。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后来同一个囚犯和一名卫兵一同逃跑，不过，关于这次逃跑的事我要留待以后再说。起初，A 也极力巴结我，以为我不了解他的底细。我再重复一句：在我服苦役的头几天里，他把我弄得郁郁寡欢，增加了我的苦闷。对于周围那些卑鄙下流的行为，我感到非常害怕，而我却陷进去了。我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这样卑鄙龌龊。但是，我错了：我是拿对 A 的看法来判断一切了。

头三天，我闷闷不乐地在监狱里走来走去，或者躺在通铺上。我把狱方发给我的一些亚麻布交给一个由阿基姆·阿基梅奇推荐的可靠犯人，让他去给我缝几件衬衫，当然，这是要付钱的(一件衬衫只需几个铜币)，根据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一再建议，我弄到一个可以折叠的褥垫(用毡子做的，外面缝着亚麻布)，这个褥垫特别薄，象一块薄饼，还有一个枕头，里面塞的是羊毛，由于不习惯，我觉得它硬得要命。阿基姆·阿基梅奇匆匆忙忙为我置办这些东西，并亲手给我缝了一条被子，这条被子是用我从囚犯们那里买来的毛呢片缝成的，而这些毛呢片是从穿破了的公家发的衬衫和裤子上剪下来的。公家发的衣物，用到一定的期限，便留给犯人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这些衣物立刻便在狱中被卖掉，；而且不管穿得如何破烂不堪，总是可以卖几个钱的。起初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吃惊。总而言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普通老百姓。我本人也突然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变成了象他们那样的苦役犯。他们的习惯、观念、看法、风俗似乎都成为我的了，起码在形式上和法律上看来是如此，虽然实际上我并不赞同它们。我既惊奇，又感到难堪，仿佛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也没有听说过，尽管我不但知道，而且也听说过。但现实生活给人的印象却与道听途说的完全不同。比方说，难道我过去能够想象到这样破旧不堪的破衣烂衫也算得上是衣物吗？然而，我的那床被子就是用这些破旧衣物缝成的！很难想象发给囚犯们穿的那种毛呢是什么样的。。从表面上看，它的确象是毛呢，而且还是挺厚的军用呢。可是稍稍一穿就磨出窟窿来，变成了拉网，扯成了碎片。毛料衣服穿用期限为一年，但实际上是很难穿到一年的。囚犯们干活时，用肩抬沉重的东西，衣服很快就会磨损，磨破。羊皮袄穿用期限为三年，可是在这个限期里，犯人们白天穿着它，夜间还得拿它当铺盖。不过，羊皮袄还算比较结实，尽管不到三年就得用粗布去缝补，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尽管如此，到了规定的期限，哪怕是穿得破烂不堪的皮袄也还可以卖它四十戈比。那些保护得好一点的可以卖六十戈比，甚至七十戈比，这在监狱里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啊。

金钱，在监狱里具有惊人的意义和威力，关于它我已经说过了。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囚犯在监狱里，哪怕只有一点儿钱，也要比另一个身无分文的囚犯少受十倍的痛苦，尽管后者

也同样拥有公家发给的一切东西，因而似乎无须花钱了(我们的狱方当局就有这种看法)。我再重复一遍，囚犯们要是失去了拥有自己金钱的一切可能性，他们或者会发疯，或者会象苍蝇一样死去(尽管狱方供应他们一切东西)，或者最后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一些人出予苦闷，另一些人则为了及早被判处死刑以了此一生，或者想别的办法“改变命运”(行话))。一个囚犯要是用血汗弄到几个钱，或者采取异常狡猾的偷骗手段弄到了钱，同时又象小孩似的毫无意义地把钱挥霍掉，这并不能证明他们不重视钱，尽管乍看起来象是这样。囚犯对钱的贪婪几乎达到了发狂和丧失理智的程度，如果说，当他们纵酒作乐时，他们的确把钱象木屑一样挥霍掉，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是把钱花在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上面了。对于囚犯来说，什么东西比钱更为贵重呢？那就是自由，或者只是对自由的幻想。囚犯们都是一些大幻想家。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要讲，不过现在既然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不妨先说几句：不知读者是否相信，我曾见过一些刑期为二十年的流放犯，他们十分泰然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嗯，别着急，上帝要是能让我服满刑期，那时我就……”。“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涵义就是表示一个人没有自由，而花钱的时候他却能行使自己的自由。不管有什么烙印、脚镣以及可恶的监狱围墙，把他同上帝的世界隔开，把他象野兽似的关在笼子里，——他还是可以弄到酒，也就是被严禁的享乐品，他还可以享受艳福，甚至有时(虽然并不经常)还可以贿赂直接管辖自己的官长们、残废老兵以至军士们，这些人受贿以后，对于他破坏法律、违反纪律的行为，就会睁一眼闭一眼；除收买他们外，甚至还可以对他们傲慢无礼，囚犯们是极喜欢对人傲慢无礼的，也就是说喜欢在难友们面前装腔作势，甚至竭力使自己相信(哪怕只是一时)，他享有的自由和权力比看上去要大得多，总之，他可以纵酒作乐，为所欲为，他可以把一个人欺侮至死，并向他证明，这一切他都能够做到，这一切都“操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让自己相信他能做到一个可怜人连想都不能想到的事情。顺便谈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也许囚犯们就是在清醒的时候，也都有纵酒作乐、爱说大话、爱吹嘘自己的癖好，尽管这种吹嘘是滑稽可笑的，是极其天真的。最后，在这一切纵酒作乐里面还有一种豁出去的味道，——也就是说，所有这一切都酷似现实生活，酷似遥远的过去的自由时期。而为了自由，什么样的代价不可以付出呀？试问：有哪一位百万富翁在被绳索勒着喉咙的时候，会不愿交出他的百万家产去换取一口空气呢？

长官们有时感到诧异：某一个囚犯温顺驯良、堪称表率地生活了好多年，为了褒奖他的良好品行，甚至叫他当了工头，可是突然之间他却无缘无故地象鬼迷心窍似的大闹起来；他胡作非为，纵酒作乐，无理取闹，有时甚至甘冒触犯刑律的危险；或者公然冒犯上级长官，或者行凶杀人，或者强奸妇女，等等。他们看着这个囚犯，感到诧异不止。这个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的人之所以突然发作，也许是因为这是一种忧郁的、神经质的自我表现，一种下意识的自我烦恼，一种想表现自己，表现自己受压抑的个性的愿望而已，而这种愿望又是突然表现出来的，并且达到了仇恨、疯狂、违背理性、疯癫、痉挛的程度。也许，这就好象把一个睡着的人活活装进棺材里，当他在棺材里苏醒过来时，便拼命地敲棺材盖，竭力想敲开它，尽管理智肯定会使他相信，他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但是问题也就在于这并不是理智的问题，而是神经质的表现。我们还得考虑到，犯人的任何一种任性的自我表现，几乎都被认为是犯罪，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大闹还是小闹，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既然要喝酒，干脆就尽情大喝一顿，既然要冒险，干脆就大干它一场，甚至行凶杀人也未尝不可。一个人只要开始干起来，尔后就会忘乎所以，甚至抑制不住！因而，最好还是采取一切办法不让他滑到这种地步。这样，大家就会平安无事了。

是的；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第六章　第一个月

入狱时，我还有一些钱，由于怕被搜去，手头只留下很少一点，为了预防万一，我把几个卢布糊在一本新约全书的封皮里，这本书在当时是许可带进狱中来的。这本书和糊在里面的钱，是那些也尝尽了流放的艰辛的人们①在托波尔斯克送给我的，他们已经以十位数字来计算被流放的时间了，而且早已习惯于把每一个不幸的人都看做自己的兄弟。

****

①在被押往鄂木斯克的路上，在托波尔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遇见过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穆拉维约娃、安年科娃和冯维辛娜。

****

在西伯利亚，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似乎总是把向“不幸的人们”提供兄弟般的照料当作是自己生活的目的，十分怜悯和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就象关心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这完全是一种无私的、圣洁的感情。在这里我不能不对一次相会作一简单的回忆。我们监狱所在的那个县城里，有一位夫人叫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她是一位寡妇。当然，当我们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中间谁也不能够亲自同她结识。看来，她已把救助流放犯看作是自己生活的目的，但她最关心的还是我们这样一些人①。

****

①指因反对沙皇政府而受到迫害的政治犯。

****

她的亲属中是否有什么人也有类似的不幸，或者，她最亲近的人们当中是否也有人因这种罪行而受到牵连，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她却认为她若能尽心竭力为我们做点什么事，那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当然，她不能资助我们很多，因为她很穷。我们虽然被关在狱中，但我们却感觉到，我们在监狱外面有一位最忠诚的朋友。顺便说说，她时常把我们很需要知道的一些消息报告给我们。在我出狱后被送往另一个县城去的时候，我终于去看了她，亲自和她结识了。她住在县城郊区一个近亲的家里。她既不老，也不年轻；既不俊，也不丑；甚至看不出她是否聪明，是否受过教育？在她身上经常能够看到的只是无限的仁慈，只是那一定要为人们做些好事以使人们感到满意和轻松的不可遏止的愿望。这一切都可以在她那温柔而慈善的目光中看得出来。我同另外一个出狱的难友一起在她家里几乎度过了一个晚上。她专注地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她也笑，无论我们说什么，她都急忙表示同意。她忙忙碌碌地尽其所能款待我们。端上茶，摆上菜，还有糖果，仿佛她若是有几千卢布，她也乐意都拿出来款待我们，并帮助我们那些尚留在狱中的难友们。告别时，她赠给我们每人一个烟盒作为纪念。这些烟盒是她亲手用硬板纸为我们糊的(只有上帝晓得她糊得多么好啊)，外面贴了一层象是小学算术课本封面那样的彩色纸(也许真的是算术课本的封面)。为了美观，两个烟盒又都用金纸镶上了一道细细的边，这些纸可能是她特意从商店里买来的。“你们都抽烟，这东西你们也许用得着，”她这样说道，仿佛为自己的礼物而感到不好意思……有人说(我听到并读到过)，对亲近的人的最深的爱，同时也就是最大的利己主义。这里究竟有什么利己主义呢——我怎么也不能理解。

入狱时，尽管我带的钱不算太多，。但那时不知为什么我却不能认真地埋怨那些苦役犯，他们几乎在我入狱后几个小时之内就欺骗了我，他们极其天真地、三番五次地向我借钱。但是有一点我要坦白承认：使我深感苦恼的是，我觉得，这些人出于天真的狡猾，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笨蛋、傻瓜，而且一定会嘲笑我，就因为我一连五次借给他们钱。他们也一定会认为，我受了他们欺骗，上了他们的当，如果与此相反，我拒绝他们，把他们赶走，那末我相

信，他们对我就会尊敬得多。但是无论我怎样苦恼，我还是不能拒绝他们。我所以感到苦恼，是因为我在这头几天里一直认真而用心地在想：在监狱里我应当使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或者不如说，我应当怎样和他们相处。我感到并且明白，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因此我是处在一片黑暗之中，而在黑暗中是不能生活这么多年的。因此，我必须有所准备。自然，我下定了决心，首先，我要按照内心的感情和良心的吩咐坦率行事。但是我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句格言而已，实际上我面前将会出现最意料不到的情况。

要在牢房里安顿下来，还有许许多多我前面已经提及的琐碎事情要办，这些事情主要都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协助我操办的，它们多少使我忘掉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那可怕的、吞噬一切的烦恼却日甚一日地折磨着我。“一座死屋！”我自言自语道。有时，在暮色苍茫中，我站在牢房的台阶上看着收工回来的囚犯们，他们懒洋洋地在院子中间的场地上来回走着。我仔细端详着他们，想尽量从他们的脸上和行动上猜出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性格又是怎样的？他们或者皱着眉头，或者眉飞色舞(这两种表情最为常见，几乎是苦役犯的特征)，在我面前逛来逛去，他们互相谩骂着，或者简短地交谈着，有的则孤孤单单，若有所思地、静悄悄地、从容不迫地在散步，有的带着疲倦和漠不关心的表情，另一些人(甚至在这里也这样！)则带着傲慢自大的表情，他们歪戴着皮帽子，披着羊皮袄，神情粗野而又狡猾，厚颜无耻地讪笑着。“这就是我的天地，我现在的世界，”我寻思道，“不管我喜不喜欢，我也得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试图利用喝茶的机会向阿基姆·阿基梅奇打听并了解一下这些人，我很喜欢和他一起喝茶，以免一个人太孤单。我顺便说一句，最初，茶几乎是我唯一的食物。阿基姆·阿基梅奇不拒绝喝茶，他还亲自摆弄我们那个可笑的、用马口铁自制的小茶炊，这是米—茨基借给我的。阿基姆·阿基梅奇一般只喝一杯茶(他也有几个玻璃杯)，他一声不响地、彬彬有礼地喝完，把玻璃杯还给我，向我致谢后，立刻就忙着给我缝被子去了。但是我想要了解的情况，他却不能够告诉我，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我对我周围的和最接近的苦役犯们的性格这样特别感兴趣，他甚至带着一种诡谲的微笑倾听着我的询问，那种微笑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不，看来须要亲身体验，光问不行，”我想。

第四天，也象那次给我换脚镣一样，一大清早，囚犯们就都在监狱大门守卫室前的小广场上排成两行。他们前后各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卫兵，枪都上着刺刀。囚犯们如果试图逃跑，卫兵便有权向他们开枪；如果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开了枪，卫兵是要承担责任的；在苦役犯们公开反抗时，也是如此。可是又有谁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试图逃跑呢？技术教官，技术员，监视囚犯干活的士官和兵士，以及监工，都到场了。开始点名；到缝纫组干活的那一部分囚犯先走，技术教官跟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是给监狱干活，做全监狱的服装。接着，去作坊干活的那一部分囚犯也走了，最后走的是干粗活的囚犯，其中也有我，共二十来个。要塞后面，冰封的河面上冻结着两只公家的驳船，已不能使用，因此须要拆掉，起码不能让旧木材白白糟踏掉。其实，那些旧木材也值不了多少钱，几乎是分文不值。城里劈柴的售价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四面都是森林。派我们来干这种活，目的就是不让囚犯们闲着，这一点囚犯们心里是明白的。干这种活时，他们总是显得无精打采，懒懒散散，然而要是干有用和有价值的活儿，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在准许他们干包工活的时候。这时，他们都好象有了精神，尽管他们干那种活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我亲眼看见他们都尽心竭力地把活干得又快又好；甚至自尊心也驱使他们这样做。但是象今天干的这种活，与其说是出于需要，不如说是装潢门面，这种活是很难要求包工的，而是要一直干到中午十一点敲鼓收工为止。那天天气温暖多雾，积雪还未融化。我们这一群人出发到要塞后面的河岸上，脚镣轻轻地响着，尽管脚镣戴在裤腿里面，但每迈一步还是发出尖细的金属碰击声。派了两、三个囚犯去工具室取工具。我和其他人一起走着，并且仿佛有点兴奋起来：我很想赶快看到并了解到我们干的

究竟是什么活？服苦役究竟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干苦役活将是怎样？

那天干活时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在路上，我们遇见一个留着胡须的市民，他停下来，把手伸进衣袋里。一个囚犯立刻离开人群，脱下帽子，接过那人施舍的钱——五个戈比——然后急忙转身回来。市民划了个十字，便走开了。我们当天早晨就用这五个戈比买了一些面包圈儿，大家分着吃了。

在这一群囚犯中，通常总是有人愁眉不展，沉默寡言，有的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还有些人则懒洋洋地彼此聊闲天。有一个囚犯不知为什么显得特别高兴，他有说有笑，一路上唱个不停，几乎跳起舞来，每跳一下他的脚镣便叮当作响。这就是那个矮小敦实的囚犯，在我入狱的第一夫早晨，他曾在洗脸的时候同另一个人吵架，因为那个人竟胆敢贸然肯定自己是笼中鸟。这个欢蹦乱跳的小伙子叫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起一段很俏皮的歌曲，我还记得它的叠句是这样的：

趁我不在家，给我娶了个老婆——
当时我正在磨房里干活。

只缺一只三弦琴了。

他那异常高兴的情绪，不用说，立刻在一些囚犯当中引起了一片愤怒，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

“嗥叫什么！”一个囚犯以谴责的口吻说道，其实这跟他毫不相干。

“狼只会用一个调门儿嗥叫，这个调门叫你这个图拉人①给学来啦！”一个愁眉苦脸的囚犯用霍霍尔②口音接着说。

“好吧，就算我是图拉人，”斯库拉托夫立刻反驳道，“可你们呢，你们波尔塔瓦那边吃的加卢什卡面汤③真能把人噎死。”
****
①这是当时俄国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人的蔑称。
②这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③波尔塔瓦是乌克兰境内的一个城市。加卢什卡面汤是用鸡蛋、牛奶、盐等和面做成的一种硬条状物，然后切成块做汤，是乌克兰人喜欢吃的一种面汤，很象我国北方人吃的疙瘩汤。
****

“胡说八道！看看你自己吃的是什么吧！你拿树皮鞋熬汤喝。”

“如今，好象是鬼拿炮弹来喂你啦，”第三个人补充道。

“弟兄们，我确实是个娇生惯养的人，”斯库拉托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仿佛在惋惜自己的娇生惯养似的，好象他这话是朝着大伙，而不是朝着某一个人说的，“我是从小用果脯和饼干饲养(应该是喂养，斯库拉托夫故意念错了这个词)大的，我的兄弟们现在还在莫斯科开商店，在路边货摊上卖风④，生意兴隆。”

****
④意为出售无价值的东西。
****

“那你是卖什么的？”

“我们弟兄们一生下来就禀性各异。就是那个时候，哥儿们，我头一次做生意就赚到了二百……”

“是卢布吗？”一个富有好奇心的人赶紧追问道，他一听有这么多钱，甚至打了一个冷颤。

“不，亲爱的，不是卢布，而是棍子。卢卡呀，卢卡！”

“别人管我叫卢卡可以，你可得叫我卢卡·库兹米奇①，”一个鼻头很尖、又矮又瘦的囚犯不高兴地说道。
****
①卢卡是名字，库兹米奇是父称，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对人表示尊敬时，应把名字和父称一齐叫出来。下文中的“卢奇卡”是卢卡的爱称。
****

“好啦，就算你是卢卡·库兹米奇，见你的鬼去吧。”

“别人可以叫我卢卡·库兹米奇，你可得叫我伯伯。”

“好吧，就算你是伯伯，让你和伯伯一起见鬼去吧，不值得和你争论！喂，我想跟你们说句好听的。是这么回事，弟兄们，在莫斯科，我没有神气多久，末了抽了我十五鞭子，就把我撵走啦。我就……”

“为什么要把你撵走呢？”一个热心听他讲的人打断他的话，问道。

“俗话说得好，拘留所进不得，槽里的水喝不得，别人的琴弹不得，都怪我没听老人言，弟兄们，我还没来得及在莫斯科正正经经地发一笔大财呢。我是多么，多么想要发一笔财呀。我真想发财，想得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许多人都大笑起来。斯库拉托夫显然是一个只顾取笑逗乐的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小丑，这种小丑似乎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使那些愁眉苦脸的难友们开心，自然，他除了挨骂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属于那种特殊的、值得注意的人物，关于这种人物，我以后也许还要谈到。

“就是眼下也可以把你当作黑貂来打呀，”卢卡·库兹米奇说，“瞧，这身衣服就值一百卢布。”

斯库拉托夫穿的那件羊皮袄十分破旧，而且肮脏不堪，补满了补钉。他一点也不在乎，但却很仔细地从上到下把自己的衣服打量了一番。

“可是我的脑袋却是无价之宝呀，弟兄们，脑袋呀！"他答道，“在我向莫斯科告别的时候，最使我感到安慰的就是我把脑袋随身带来了。再见吧，莫斯科，谢谢你的痛骂和鞭打，谢谢你留给我的伤疤，你抽打得我好狠啊！我这羊皮袄，亲爱的，可没有什么好看的……”

“难道说要看你的脑袋吗？”

“连脑袋也不是他自己的，那是人们施舍给他的，”卢卡又加入了谈话，“是他跟大伙一起发配到秋明时，别人看在基督的面上施舍给他的。”

“这么说，斯库拉托夫，你会点什么手艺？”

“他的手艺可真了不起！当过狗教练，会牵狗，还会偷狗食，”一个愁眉苦脸的囚犯这样说道，“哼，这就是他的全部手艺。”

“我真的学过缝皮靴，”斯库拉托夫答道，尽管人家挖苦他，他却毫不在乎，“只缝过一双。”

“怎么，有人买吗？”

“是的，来了一个，我一看，是个不怕上帝、不敬父母的愣头青，那是上帝惩罚他，——他把皮靴买去了。”

斯库拉托夫周围的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后来，我还缝过一次，就是在这儿，”斯库拉托夫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那是给中尉斯捷潘·费多雷奇·波莫尔采夫包皮靴头。”

“怎样，他满意吗？”

“不，弟兄们，他不满意。他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还从背后踢了我一脚。气得他直翻白眼。唉，我的生活欺骗了我，我的情妇欺骗了我！

过了一会儿，
阿库林娜的丈夫进了院子……”

他出人意外地又唱起来了，两只腿也跟着蹦跳起来。

“这家伙，太不象话啦！”一个从我旁边走过的乌克兰人咕哝着说，拿鄙视的眼光恶狠狠地瞥了他一眼。

“这个废物！”另一个用肯定而严肃的口吻说。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生斯库拉托夫的气？为什么凡是快活的人，象我在这头几天里所观察到的那样，都受人歧视呢？我把乌克兰人和另一些人的愤怒归结为个性。但这并不是因为个性，他们之所以生斯库拉托夫的气，是因为他缺乏自制力，因为他不会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这一点却正是一切苦役犯们斤斤计较的，总而言之，他们所以气愤，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废物”。然而，他们也并非对所有活泼愉快的人都生气，也并非对所有的人都象对斯库拉托夫这样看不起。这要看此人的为人如何：倘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实人，他会立刻遭到侮辱。这种情况甚至使我吃惊。但在那些爱逗笑取乐的人们中间也有喜欢并善于反唇相讥的，他们对任何人都不示弱：这样的人反而受到尊敬。就在这群囚犯中间有一个口齿锋利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快活而又特别可爱的小伙子，然而我是后来才了解到他的这种品质的。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脸颊上有一个大瘊子，脸上的表情很滑稽，然而却挺漂亮、机灵。大家都管他叫做开路先锋，据说过去他在工兵部队里当过勘测兵；现在却被关在特别部里。关于这个人，我以后还要讲到。

不过，也并非所有“严肃的人”都象一遇到愉快的事就怒不可遏的乌克兰人那样沉不住气。监狱里有几个人总是想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无事不知，足智多谋，有个性，有头脑。这些人中间确实有许多是有个性的聪明人，他们也果真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即居于高人一等的地位，在精神上对自己的难友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卖弄聪明的人彼此常常作对——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对头。他们往往以高贵的、甚至恩赐的态度看待其他囚犯，不挑起无谓的争吵，能得到官方的赏识，在干活时俨然象是调度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对别人吹毛求疵，比方说，为了唱歌而指责别人，他们是不会为了这类小事情降低自己的身份的。在我服苦役期间，这种人对我总是客客气气，但是他们却很少说话；他们这样做似乎也是出于自尊心。关于他们，我以后也还要作更详细的介绍。

我们来到河岸上。我们要拆毁的那只旧驳船就冻结在下面的河面上。河对岸是一片蓝色的草原；那是一片凄凉荒芜的景象。我料想，大家都会立刻着手干活，可是对于干活大家连想也不去想。有些人坐在散放在岸边的圆木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从靴筒里掏出烟荷包和自制的短嘴柳木小烟斗，他们吸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三戈比一磅的土烟叶。小烟斗抽起来了；卫兵们在我们四周排成一条散兵线，他们都带着极其厌烦的表情监视着我们。

“拆毁驳船这个主意是谁想出来的？”一个囚犯谁也不看，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大概是想要碎木片吧？”

“这个主意准是那个不怕我们的人想出来的。”另一个接着说。

“瞧，那群庄稼佬儿往哪儿赶呀？”第一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他显然没有听到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指着远处一群庄稼人，那些庄稼人正在未曾踏过的雪地上鱼贯而行，前往什么地方。所有的人都懒洋洋地把脸转向那边，由于无事可做，便开始嘲笑起那群庄稼汉来。走在后面的一个庄稼汉显得特别可笑，他两只胳膊伸开，头垂向一边，戴着一顶庄稼人常戴的那种象荞麦面卷子似的高筒皮帽子。他的整个身影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完整而清晰地显现出来。

“瞧，彼得罗维奇老弟是怎样一副打扮！”一个囚犯故意学着庄稼人的腔调说。奇怪的是，一般说来，囚犯们都很看不起庄稼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一半是庄稼人出身。

“你们瞧，伙计们，后边那个人走起路来象是在栽萝卜。”

“他是个笨脑袋，他的钱很多，”第三个接着说。

大家都笑了，但笑起来也是有点懒洋洋的，好象不愿意笑似的。这时一个卖面包圈儿的女人走来，她是个活泼伶俐的婆娘。

我们拿别人施舍的那五个戈比买了她的面包圈儿，大家当场就分着吃了。

那个在监狱里贩卖面包圈儿的小伙子拿了她二十个面包圈儿，于是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按平时的规矩，应给他两个作为手续费，可是这次他坚持要三个。但是女卖主不同意。

“还少一个，你给不给？”

“还少哪一个？”

“就是老鼠不吃的那一个。”

“叫你不得好死！”那女人尖叫一声，然后笑了起来。

最后，负责监督干活的那个军士终于拄着一根棍子来了。

“唉，你们怎么都坐着不动呀！干吧！”

“喂，伊万·马特维伊奇，给个包工活干吧，”一个“头目”慢腾腾地站起身来说道。

“干吗在派工的时候不说话？把驳船拆开，这也是包工活呀。”

最后，人们懒懒散散地站起来，趔趔趄趄地走下河去。人群里立刻出现了几个“调度人”，起码是口头上的。看来驳船不能砍坏，要尽可能地使木料完整地保存下来，特别是整条整条用木钉钉在船底的那些横肘材更得保存下来，——工作是长期而枯燥的。

“先把这根木料拿开。快来干吧，伙计们！”一个囚犯说道，他既不是调度，又不是头目，而只是一个干粗活的人，他一向沉默寡言，安安静静，一直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他弯下腰去抱住一根粗圆木等着别人来支援，可是谁也不去帮助他。

“你一个人拿得起来，别怕！你要是拿不起来，就算把你爷爷那样一头大狗熊叫来，他也拿不起来呀！”不知是谁含糊不清地说。

“这么说来，弟兄们，到底该怎样开始呢？我真不明白……”那个爱出风头却受了窘的人放下木料，挺起身来。

“所有的活儿你一个人是干不完的……干吗要出那个风头？”

“喂三只母鸡他还有喂错的时候，可现在还要充好汉……没事找事！”

“可是，弟兄们，我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受窘的那个人辩解说，“我只不过是……”

“要我把你们都裹在套子里吗？还是要我把你们腌起来留着过冬？”监督干活的军士又喊起来，他困惑莫解地看着那些不知如何下手干活的二十个囚犯，“干吧！快点干吧！”

“欲速则不达呀，伊万·马特维伊奇。”

“你呀，就是什么也不干，唉！萨维利耶夫！应当叫你‘贫嘴彼得罗维奇’才对！我跟你说：你干吗老站着转眼珠子呀！……干呀！”

“我一个人能做什么？……”

“给我们包工活干吧，伊万·马特维伊奇。”

“我已经说过了——今夫没有包工活啦。把驳船拆完就回家。干吧！”

大家终于干起来了，但他们都显得无精打采，勉勉强强，笨手笨脚。这群身强力壮的干活能手好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干活似的，让人看着都觉得不好意思。刚一动手拆下第一根最大的肘材，它就断了，他们向军士报告，说它是“自己断的”，因而就不能再这样继续干下去了，须要另想办法。他们彼此争论了好久：究竟另想什么办法，应当怎样干？不用说，争论渐渐变成谩骂、威吓以及其他等等。监督干活的军士又喊了起来，挥着木棍，可是肘材又断了。后来，感到斧头不够用，还得去取别的工具。立刻派了两个小伙子，由一名卫兵监押着回要塞去取工具，这时其他的人便满不在乎地坐在驳船上，掏出烟袋又抽起烟来了。

监督干活的军士最后吐了一口唾沫。

“象你们这样干活，活儿是不会哭的！唉，你们这帮人呀，这帮人呀！”他气得直嘟囔，只得把手一摆，挥着棍子回要塞去了。

一小时以后，技术员来了。他心平气和地听完囚犯们的话，便宣布派包工活儿，即再拆下四根肘材，但不准拆断，而要保持完整，另外他又划出一部分船身让他们拆去，干完这些活就可以回去。这件包工活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可是天哪，再看看他们是怎样动手干活的吧！懒惰不知哪里去了，那种笨手笨脚的模样也不知哪里去了！斧头响了，开始起木钉。其他的人则把一根很粗的木棍插在下面，二十多只手压在棍杆上，迅速而巧妙地把肘材拆了下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肘材拆下来以后竟十分完整，毫无损伤。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突然变得非常聪明起来。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谩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当说什么和于什么，应当站在什么地方，出什么主意。离敲鼓收工还有半个小时，全部包工活就干完了。囚犯们回家时都已精疲力竭，但他们都很满意，尽管比规定的收工时间他们只提前了半个小时。至于我个人，我看出这样一个情况：在干活时，无论我跑到哪儿插手帮助他们，哪儿都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处处妨碍他们，无论到哪儿，我不是被咒骂，就是被撵走。

就是一个衣服穿得最破烂的窝囊废，，哪怕他自己干起活来也是其笨无比，在其他干活比他灵活麻利的囚犯面前连一个不字都不敢说，但也认为有权训斥我，如果我站在他身旁，他便借口说我妨碍他而把我撵开。最后，一个手脚麻利的家伙竟直截了当地粗暴地跟我说：“你往哪里钻，滚开！越是不要你的地方，你倒偏往那儿钻。”

“走投无路了吧！”另一个立刻接着说。

“你最好拿一只杯子，”第三个对我说，“去募捐几个臭钱，盖一幢石头房子，你在里边闻闻鼻烟就行了，这儿没有你干的活儿。”

有时我不得不站在一旁，可是大家都在于活，自己袖手旁观，又感到不好意思。但是，当我当真走开并站在船尾上的时候，他们又立刻喊道：

“瞧，拨来干活儿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对他们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

当然，他们是故意说这种话的，因为这样才能使他们开心。应当在落魄潦倒的贵族老爷们面前摆摆架子，现在机会到了，他们当然会感到高兴喽。

现在很清楚了，正如我早先已经说过的那样，为什么在我入狱时，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在这些人面前，我应当如何行事？对他们我应当抱怎样的态度？我预感到，我将要常常同他们发生类似现在干活时这样的冲突。但是不管发生什么冲突，我还是决心不改变我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我这时已部分考虑好了；我知道这样的行动计划是正确的。具体说来就是：我决心待人接物要尽可能地朴实一些，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过分地要求和他们亲近；但是，如果他们自己愿意和我友好，我也不拒绝。绝不要惧怕他们的威胁和仇视，尽可能地装出一副不加注意的模样。在某些场合绝不同他们接近，绝不迎合他们的某些风俗习惯，总之，就是绝不死气白赖地要求他们把我完全当作他们的同伙。一开始，我就料想到，我这样做，他们起初一定会鄙视我。然而，根据他们的看法(我后来才确切地了解到了这一点)，在他们面前我无论如何也应保持并尊重我的贵族出身，也就是说应当逍遥自在，装模作样，厌弃他们，藐视一切，游手好闲。他们认为贵族就应该是这样。当然，他们可能为此咒骂我，但他们心里还是会尊敬我的。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可不大擅长，在他们看来，我从来就没有当过贵族；因此，我暗自发誓，在他们面前，我绝不做任何让步，以免有损于我所受过的教育和我的思想方法。我若是投其所好，迁就他们，奉承他们，和他们过分亲昵，为了博得他们的好感而去迎合他们的各种“癖好”，——那他们立刻就会认为，我这样做是由于害怕和怯懦，于是他们就会以藐视的态度对待我。A 并不值得效仿：他巴结少校，因此他们都怕他。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象波兰人那样，以冷冰冰的、叫人无法接近的谦恭有礼的态度把自己同他们隔绝起来。现在我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所以看不起我，是因为我想要象他们那样去干活，而不愿逍遥自在，不愿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尽管我可以肯定，他们以后将不得不改变对我的看法，但是一想到他们现在好象还有权藐视我，以为我在干活时巴结他们，——我还是感到非常苦恼。’

傍晚，干完下午的活回到监狱时，我已精疲力尽，劳累不堪，那可怕的苦闷又向我袭来。“以后还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啊，”我暗自寻思道，“全是象今天这样的日子呀！”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默默无语地在狱室后面沿着栅栏散步，忽然看见我们的沙里克径直向我跑来。

沙里克是我们监狱里喂养的一条狗，就象步兵连、炮兵连和骑兵连都喂养着狗一样。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它就生活在监狱里，不属于任何人，它认为每个人都是它的主人。它靠厨房里倒出来的残羹剩饭活着。这条狗相当高大，黑色的皮毛里夹杂着白点，是一条看家狗，年岁还不老，两只眼睛很聪明，尾巴毛茸茸的。从来没有人抚摸过它，任何人都不注意它。从入狱第一天起，我就抚摸它，用手里的面包喂它。当我抚摸它的时候，它安安静静地站着，亲切地看着我，轻轻地摇摆着尾巴表示满意。现在，由于好长时间没看见我了，——我是多年来第一个想到抚慰它的人——它跑着在人堆里找我，当它发现我在狱室后面散步的时候，便吠叫着向我跑来。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感情，我竟突然上前搂住它的头吻起它来；而它却把两只前爪搭在我的肩上，开始舔我的脸。"这就是命运送给我的朋友呀！"我想。后来，在那沉痛而忧郁的苦役生活初期，我每次下工回来，哪里也不去，总是首先带着沙里克急忙到狱室后面去，它在我前面跑着跳着，高兴得尖声叫着，我抱着它的头吻呀，吻呀，这时一种甜蜜而又令人痛苦难熬的感情绞着我的心。我还记得，我当时曾十分愉快地想到，仿佛是为自己的痛苦感到自豪似的：现在世界上就只剩下一个爱我并忠实于我的生物了，这就是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的忠实的狗，沙里克。

第七章　新交。彼得罗夫

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渐渐开始习惯了。我的新生活中的日常现象使我感到的不安，也与日俱减。对于所发生的事件，对于周围的环境和人，我似乎都已司空见惯。安于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承认这是既成事实，却早就应该如此了。我把那些仍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深深地蕴藏在自己心中。我已不再象一个丧魂失魄的人那样在狱中东游西逛了，也不再使自己的烦恼流露于外。囚犯们那种好奇的目光已不再那么凶狠地经常盯着我，他们也不再故意蛮横无礼地注视我了。看来，他们对于我也已司空见惯，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已经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在狱中走来走去，我已认得自己在通铺上的位置，看来，我甚至已经习惯了那些我以为我一辈子也不可能习惯的事物。我们每个星期定期去剃光半边头，为此，每星期六工余时间，把我们轮流从狱中叫到卫兵室(不愿去者由自己找人剃)，狱方派来的理发匠用冷肥皂水给我们洗头，用很钝的剃刀残忍地刮我们的头皮，我至今一回想起我们所受的那种折磨来，仍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找到了补救的办法：阿基姆•阿基梅奇告诉我，有个军事犯用自己的剃刀给大伙剃头，谁去都行，每次收费一个戈比，他就以此给自己挣几个钱花。很多囚犯都去找他剃头，以躲避官方的理发匠，虽然他们并不是一些娇生惯养的人。大家都管这个囚犯剃头匠叫少校，至于为什么这样叫他，那我可不知道，他究竟哪一点象是一位少校，我也说不清。如今，当我写到这里，我脑海里又清晰地浮现出这个少校的形象来，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瘦骨嶙峋、沉默寡言的小伙子；他这个人相当愚蠢，每天都专心致志地琢磨自己的手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皮带，昼夜不停地打磨他那把已经十分锋利的剃头刀，看来，他已全神贯注在这项手艺上了，显然他已把这项手艺当成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当他把剃刀磨得十分锋利且又有人找他剃头的时候，他确实感到非常高兴。他的肥皂水总是热乎乎的，手的动作也十分轻巧，剃起头来叫人感到舒服。显然，他对自己的手艺十分欣赏，并引以自豪，因此他总是漫不经心地接受每一个戈比，仿佛重要的不在于钱，而在于手艺。为了这个剃头匠，A 曾受到过我们那位少校的一顿痛骂：有一次，A 向少校告密时，提到狱中有一个剃头匠，不慎把他叫做了少校。少校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你这个下流东西，你知道少校是什么意思！"他在训斥 A 的时候，大喊大叫，喊得满嘴喷唾沫星子，"你懂得少校是什么意思！你竟敢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下流囚犯叫做少校！……"只有 A 才能和这种人和睦相处。

从入狱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幻想自由。用千百种不同的方法计算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自己的监狱生活，已成了我的习惯。我甚至不能再想别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被剥夺了一定时期自由的人，都会这样做的。我不知道其他囚犯是否也象我一样，也是这样想和这样计算的，但他们那种耽于幻想的异常轻率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使我大为吃惊。一个失去了自由的囚犯的希望，跟一个过正常生活的人的希望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自由的人当然也会怀有某种希望(例如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完成某一事业)，然而他在生活着，行动着，正常的生活以其瞬息万变吸引着他。囚犯的情况就不同了。就假定说，囚犯生活，苦役生活，也是一种生活；然而一个囚犯，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的刑期有多长，他都本能地绝对不会满足于自己眼下的处境，绝不会认为自己的命运已被最后决定，已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感觉到，他不是生活在自己家里，而象是一个旅途中的过客。他把二十年看得象两年那么短暂，而且完全相信，等他五十岁出狱时，他仍将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就象现在三十五岁时这样。“还大有活头呢！”——他这样想着，并固执地驱散一切疑虑和其他种种令人烦恼的念头。就连特别部那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也都期待着有朝一日会从彼得堡下来一道命令：“转解到涅尔琴斯克矿井去，并定出刑期。”到那时就好了：第一，到涅尔琴斯克去，差不多得走半年的时间，一路上跟大伙在一起，总要比被关在监狱里好得多！然后，在涅尔琴斯克服完刑期，那时就……有些已经鬓发苍苍的人也是这样打算的。

在托波尔斯克，我看见过一些被用铁链钉在墙上的囚犯。有个囚犯拖带着一条足有一俄丈①长的铁链，他身边放着一块铺板。

****

①一俄丈等于 2.134 米。

****

他所以被用铁链拴着，乃是因为他曾在西伯利亚犯下一桩十分可怕的罪行。他们将要这样被捆绑上五年，十年，其中大部分都是强盗。在这些人中，我只看见过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囚犯，此人曾在某地供职。他说话时，口齿不清，声调却十分温和，面带甜蜜的微笑。他曾指着他身上戴的铁链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在铺板上如何才能躺得更舒服些。他过去大概也是一个凶恶的家伙！一般说来，这些人都表现得规规矩矩，似乎也感到满意，然而他们每个人仍十分渴望尽快服完自己带铁链的刑期。为什么呢？因为到那时他们就可以离开这座有着低矮的拱形屋顶的、潮湿而闷人的砖房，到院子里走走……仅此而已。永远也不会放他们出狱的。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些被摘掉了铁链的人，将永远被囚禁在狱中，一直到死都要戴着脚镣。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仍十分渴望尽快服完自己戴铁链的刑期。须知，如果不抱着这样的愿望，他们怎能被铁链捆绑上五年、六年，而不死亡或发疯呢？谁能忍受得了这样的痛苦呢？

我觉得劳动能够拯救我，能够增强我的体质。精神上经常不断的烦躁不安，神经质的激动，狱室里的窒闷空气，这一切都足以把我彻底毁掉。“得经常呼吸点新鲜空气，每天干点累活，养成搬运沉重物件的习惯——至少我也要拯救自己，”我常常这样想，“体质增强了，出狱时就会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强壮有力，永不衰老。”我没有想错：干活和运动对我大有裨益。当我看着我的一位贵族难友①象一枝蜡烛一样燃尽、熄灭在狱中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可怕。

****

①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服苦役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杜罗夫。

****

他和我一起入狱时还年轻漂亮，朝气蓬勃，可是出狱时却已孱弱不堪，满头白发，步履艰难，气喘吁吁了。“不，”我看着他，心里想道，“我想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可是开始时，由于喜欢干活，我却遭到了囚犯们的白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看不起我，对我冷嘲热讽。然而对于这一切我都一概不予理睬，我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比方说，烧石灰和捣石灰——这是我最早熟悉的一种活。这种活并不重。技术教官总想尽量减轻我们贵族囚犯的工作量，但这绝不是宽纵，只是想把活安排得更合理一些罢了。如果要求一个体力很弱而且从未干过活的人，去干那种分配给壮劳力的包工活，那才是怪事呢。但是这种“照顾”并非总能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也仿佛是悄悄进行的：对这种事往往会有人从旁严加监视。我们也常常干重活，同其他囚犯相比，贵族们自然会感到加倍的沉重。烧石灰的工作，通常都是派三、四位年老体弱的囚犯去干，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此外，还要派一位体力强壮、且又懂行的囚犯去。被派去干这种活的通常都是那个叫阿尔马佐夫的囚犯，他干这种活已经多年了。他是一个面孔黝黑、瘦骨嶙峋的老头儿，为人严厉，不爱交际，性情乖僻。他极端鄙视我们。不过，他不爱讲话，甚至就连抱怨我们的话都懒得讲。烧石灰的棚子，就设在那荒凉陡峭的河岸上。冬天，特别是在阴夫，望着那河面和遥远的彼岸，会使人产生一种沉闷的感觉。在那空旷荒漠的景色中，似乎有一种勾人烦恼并使人肝肠欲断的东西。当阳光照射在一望无际的白皑皑的雪地上时，往往会更加使人感到心情沉重，人们简直想要向那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地毯、由对岸一直向南延伸一千五百俄里的大草原飞去。阿尔马佐夫通常总是一声不响地板着面孔干活；由于不能很好地帮他的忙，连我们自己也似乎感到惭愧；他故意独自一个人干，故意不让我们帮他的忙，好象为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感到内疚，使我们对自己的窝囊无用感到羞愧似的。其实，这种活无非就是给砖窑生上火，烘烧堆放在窑里的雪花石，那些雪花石都是我们给他运来的。第二天，当雪花石被烧透以后，便开始出窑。我们每人手持一个粗重的木槌，将雪花石填在那个特制的木箱里，然后就用木槌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那酥脆的雪花石很快就变成闪闪发光的白粉；它很容易被捣碎，粉碎后显得十分好看。我们挥动着沉重的木槌，捣得雪花石噼噼啪啪直响，干这种活时连我们自己也为之陶醉。最后，我们干累了，但心里却感到十分轻松，面颊发红，血液循环也加快了。这时，就连阿尔马佐夫也开始用体谅的目光瞧着我们，就象瞧着年幼的孩子一样；他和善地掏出烟袋抽烟，但他开口说话时，仍憋不住要发几句牢骚。不过，他对别人也是这样，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好人。

有时也派我去干另一种活——到木工作坊去摇旋车轮子。那个旋车轮子又大又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摇转起来，特别是当工程处的旋工为给某位长官做家俱而旋楼梯栏杆或大桌腿的时候，往往需要旋整条的圆木。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摇转不动的，因而往往派两个人去摇——我和另一位叫鲍—斯基①的贵族。

****

①指波兰革命家约瑟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参看本书第二部第八章。

****

每当需要旋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派我们两个去，这种活我们一直干了好几年。鲍—斯基是一个身体孱弱、气力单薄的人，虽然还很年轻，但却患了肺病。他是在我入狱前一年和另外两个难友一起入狱的——其中一个是老头子，他在蹲监狱期间总是白天黑夜地祷告上帝(为此，他博得了囚犯们的尊敬)，后来在我还未出狱时就死去了；另一个还很年轻，朝气蓬勃，面色绯红，身强力壮，胆大果敢，在他们被解往我们要塞的途中，当鲍—斯基已精疲力尽时，他曾背着鲍—斯基走了七百俄里①，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

****

①一俄里等于 1.06 公里。

****

鲍—斯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品格高尚，气度豁达，但由于疾病缠身，极易发火动怒。我们俩一起摇旋车轮子，这项工作甚至使我们俩都发生了兴趣。它给了我极好的健身机会。

我还特别喜欢铲雪。冬天常常下暴风雪，暴风雪下过一昼夜之后，有的房屋的门窗被掩埋上一半，有的几乎完全被埋住了。暴风雪一停，太阳露出脸来，于是我们囚犯们便成批成批地被赶出去，有时甚至全体出动——去铲除掩埋着办公用房的积雪。给我们每人发一把木锨，给我们大伙规定出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工作量很大，有时简直使人怀疑能否完成任务，可是大伙仍齐心协力地去干。刚下过的雪是松软的，上面微微结了一层薄冰，木锨一插进去就是一大块，往旁边一甩，便在空中变成一片纷纷扬扬的白粉。那一堆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雪，用锨很容易插进去。囚犯们干这种活时，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快活。冬天的新鲜空气和运动使得我们浑身发热。大家越干越高兴，发出一片嘻笑声和叫喊声，有的人还逗笑取乐。大家开始互相抛雪球；当然，那些谨小慎微、一遇到有人嬉笑逗乐就生气的人，便立即咒骂起来，于是这一片欢腾热闹的场面便在咒骂声中结束了。

我渐渐开始扩大我的结交范围。其实，我本人并不想和人交往：因为我依然心神不宁，悒郁不乐，疑虑重重。我的交往是自然而然开始的。在最初拜访我的那些人中，有一个叫彼得罗夫的囚犯。我说的是拜访，而且我还要特别强调这个词。彼得罗夫被关在特别部里，住的地方离我们狱室最远。我们之间显然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我们连一点共同的地方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然而从一开始，彼得罗夫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狱室来看我，或者在休息时间，当我尽量远远地避开众人，独自跑到狱室后边散步时，他便把我叫住，仿佛认为这样做是他自己的责任似的。起初，我有点不大高兴。但他很快就使我对他的拜访感到愉快起来，尽管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善于交际和健谈的人。从外表看，他身材不高，体格强壮，敏捷好动，脸色苍白，颧骨很高，目光大胆，长着一张令人十分愉快的面孔和两排细密洁白的牙齿，下嘴唇和下齿之间总是衔着一小撮烟末。下唇衔烟末，是很多囚犯的一种习惯。他的相貌相当年轻：虽说已年近四十，但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他和我谈话时总是无拘无束，显得十分自然，他以一种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也就是说对我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例如，当他看出我想独自安静一会儿时，他就只和我说上两三分钟，便马上离开，而且每次都感谢我看得起他，当然，他对狱中任何人从未这样客气过。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最初几天是这样，就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间也一直是这样，几乎从未变得更加亲密过，虽然他对我的确忠心耿耿。就是现在我也琢磨不透：他究竟对我有何希求？他为什么每天都来看我？尽管后来他曾偷过我的东西，但那似乎是出于无意，至于钱，他几乎从未向我伸过手，可见，他来看我完全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别有所图。

不知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仿佛根本就不是和我同住在一个监狱里，而是住在城里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好象只是为了打听新闻才顺便到狱中来探望我，来看看我们大家生活得怎么样。他总是忙着到什么地方去，仿佛把谁留在了什么地方，那里有人正在等着他，好象有什么事尚未办完似的。然而，他似乎又并不过分着急。他的目光也有点古怪：聚精会神，微带几分大胆和嘲笑的神情；他仿佛是越过眼前的东西向远方瞭望，仿佛是在竭力透过眼前的物体看到远处另外一种东西。这就使得他显出一种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有时特意观察：彼得罗夫离开我以后究竟都到哪里去？有谁在那边等待着他？他离开我以后，总是匆匆忙忙到别的狱室或厨房里去，到那儿以后，便在一些正在谈话的人们旁边坐下，聚精会神地听着，有时甚至也十分热情地参加谈话，可是后来又突然把话收住，沉默起来。不管他说话也好，一声不吭地坐着也好，可以看出：他只是顺便这样做做而已，好象别的地方还有人在等待着他。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从来不做任何事情，他过的完全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当然，狱

方规定的劳动除外)。他什么手艺也不会，手头几乎从未积攒过钱。但是，他并不为钱而过分发愁。他究竟跟我都谈过些什么呢？他的谈话也象他本人一样古怪。比方说，他只要看见我独自在狱室后面散步，便突然转身向我这边走来。他走路总是很快，转身也总是很突然。他一步一步地走来，但我却觉得他好象是跑着来的。

“您好！”

“您好！”

“我不打搅您吗？”

“不。”

“我想问问您关于拿破仑①的事。他和一八一二年的那个拿破仑是本家吗？”(彼得罗夫是一个世袭兵②，认识字。)

****

①这里指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爆发后，他当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即所谓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他于一八五一年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称帝。

②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军人的儿子一生下来就登记为军人，以备接受训练和入伍服役。

****

“是本家。”

“人们都说他是什么总统，是吗？”

他总是迅速而突然地提问，仿佛他需要尽快了解什么事情，仿佛他在侦察一桩极其重要的、刻不容缓的案件似的。

我向他解释了这个拿破仑是怎样一个总统，并补充说，他不久就可能称帝。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尽量详细地向他作了解释。彼得罗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完全理解并迅速地思考着，甚至把耳朵也转向我这边来。

“唔。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听说，有的猴子前臂长得特别长，直至后跖，个子有高大的人那么高，这是真的吗？”

“是的，有这样的。”

“这是一种什么猴子呢？”

我也就我所知向他作了解释。

“它们居住在什么地方？”

“居住在热带。苏门答腊岛上就有。”

“这是在美洲吗？听说，那里的人都头朝下走路，是吗？”

“不是头朝下。您说的是对跖人①。”
****
①指居住在地球恰恰相对两面的人。
****

我给他解释了美洲在哪里，也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对跖人。他十分认真地听着，仿佛他就是专为对跖人的问题而来的。

“哦-哦！去年，我读过一本关于拉瓦里尔伯爵夫人的书，这本书是阿列菲耶夫从一个副官那儿拿来的。书里讲的是真有其事呢，还是编造出来的？这是仲马的作品。”

“当然是编造出来的。”

“那好，再见，谢谢您。”

于是彼得罗夫走了。其实，除了这类问题外，我们几乎从未谈过别的事情。

我开始对他作进一步的了解。当米—茨基知道我和彼得罗夫交往以后，他甚至向我提出了警告。他对我说，苦役犯中有很多人曾使他感到害怕，特别是在入狱初期，然而最使他感到可怕的就是这个彼得罗夫，连卡津也没有他可怕。

“他是所有苦役犯中最果敢、最无畏的一个，”米—茨基说，“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他若是想干什么事情，谁也阻拦不住的。他能够把您宰掉，如果他起了这个念头的话，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您宰掉，连眉头都不皱一皱，也不会感到懊悔。我甚至认为他头脑有点不大正常。”

这个看法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可是，米—茨基却不能够回答我，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说也奇怪，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我同彼得罗夫一直过从甚密，几乎每天都跟他谈话，他总是真诚地依恋于我(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在这几年中，尽管他一直谨慎地生活在狱中，也从未干出过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每当我瞧着他并跟他谈话时，我总是相信米—茨基的话是对的，彼得罗夫可能是一个最果敢、最无畏、最不愿受任何约束的人。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也不能够解释。

不过我要指出，这位彼得罗夫就是那个在受刑时想要杀死少校的人，事后，囚犯们都说少校象是出现了奇迹一般得救了，——在动刑前一分钟他坐上马车走了。还有一次，那是在他入狱以前，在操练场上，一位上校打了他一耳光。在这以前也许还打过他很多次；然而这一次他却不想忍耐了，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列队站好的全团人面前，他公然把那位上校

刺死了。不过，关于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我并不知道，他也从未向我讲过。当然，这只不过是他的天性突然充分流露时的猝然爆发，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毕竟并不常见。他的确深明事理，甚至谦恭温顺。他内心里蕴藏着一股热情，甚至是强大而炽烈的热情，就如同燃烧着的木炭上面总是覆盖着一层灰烬，里面却在闷烧。我在他身上从未看见过一丝一毫的自我吹嘘和虚荣心，这在别的囚犯身上却是屡见不鲜的。他很少和人争吵，但也不和任何人特别要好，只有西罗特金是个例外，而且也只有当他需要西罗特金的时候。不过，有一次我却看见他当真大发起脾气来，那是因为本应分给他的一件什么东西而没有分给他引起的。和他争吵的是一个叫瓦西里·安东诺夫的民事犯，这是一个身材高大、膂力过人的汉子，他很凶恶，爱寻衅闹事，也爱嘲笑人，而且胆大包天。他们已经吵嚷很长时间了，我以为大不了三拳两脚就会完事的，因为彼得罗夫虽说不是经常，但偶尔也象一个最下流的囚犯那样跟人家打架吵嘴。可是这一次却不然：彼得罗夫突然脸色发白，嘴唇发青，而且直打哆嗦，气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他站起身来，赤着脚(他夏天很喜欢赤脚)，一声不响地慢慢向安东诺夫走去。狱室里本来是一片喧哗和吵嚷声，这时却突然静得鸦雀无声，连苍蝇的嗡嗡声都能听得见。大家都期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安东诺夫霍地站起来迎上前去，当时他已面色如土……我不忍再看下去，便走出狱室。我以为不等我走下台阶，就会听到杀人的尖叫声。可是这一次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还没等彼得罗夫走到跟前，安东诺夫便一声不吭地急忙把引起争吵的那件东西扔给他。(其实，引起争吵的不过是一块毫不值钱的破包脚布。)当然，过了一会儿，安东诺夫为了保全面子和不受到良心的责备，也为了表示自己并不完全怕他，仍不免骂了几句。不过，彼得罗夫对于谩骂却毫不介意，甚至也没有回骂：问题并不在于谩骂，反正他胜利了；于是他高高兴兴地把包脚布拿走了。一刻钟以后，他又照常在监狱里闲逛起来，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在寻找哪儿是不是有人在讲有趣的故事，以便凑上去听听。他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其实，他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漠不关心，他只是无所事事地在狱中东游西逛罢了。也可以把他比做一个劳动者，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无论什么活儿在他手里都会噼啪作响，但却无人给他活儿干，他只好坐等着，有时跟小孩子玩玩。我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仍呆在狱中而不逃走？他只要决心这样做，他会毫不犹豫地逃走的。象彼得罗夫这样的人，只有当他们不想干某件事的时候，理智才能够控制住他们。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住他们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够机智地逃走，也能够把大伙蒙骗住，他能够不吃饭而在森林里或河边芦苇丛里蹲上一个星期。但他显然还没有拿定这个主意，而且，他也完全不想这样做。我在他身上从未发现他有巨大的思考力和特别合理的看法。这种人生下来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无意识地推动着他们到处漂泊流浪；他们一辈子就这样漂泊不定，直至他们找到完全合乎自己心愿的工作；到那时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也会在所不辞的。我有时感到诧异，一个仅仅因为挨了一耳光便杀死了自己长官的人，怎么竟会毫无反抗地躺下受鞭笞。他常常因私运酒而挨鞭子。象一切不会手艺的囚犯一样，他有时也往狱中带酒。但他躺下受鞭笞时好象是出于心甘情愿，也就是说，似乎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否则，即使把他打死，他也不会躺下的。尤其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尽管他明显地依恋于我，但仍偷了我的东西。他之所以偷我的东西，似乎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当我托他把一本圣经送到另一个狱室去时，他却把圣经偷偷卖掉了。离那个狱室其实只有几步远的路程，他在半路上遇到一个买主，把圣经卖掉后，立即把钱拿去买酒喝了。他当时大概很想喝酒；他只要想干什么事情，就非得去干不可。他这种人为了弄到二十五个戈比去买半瓶酒喝，甚至会把人杀掉，然而在别的时候他又会把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放走。当天晚上他就亲自向我承认了这一偷窃事件，说的时候一点儿都不感到害躁，也毫无悔恨之意，就象讲述一件最普通的事情一样，显得满不在乎。我试图狠狠地责备他一顿，因为我实在为我那部圣经感到惋惜。他心平气和地听着，甚至显得十分恭顺；他也承认圣经是一部很有用的书，并真诚地为我失去这部书而感到惋惜，但他丝毫也不为他偷卖了此书而感到懊悔；他瞧着我，似乎确信我立刻就会停止对他的责骂。他

之所以忍受了我的责骂，想必是认为干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不挨骂的，但心里大概在这样想：你就好好骂一顿吧，让你也出出气，宽宽心，其实这全是废话，象这样的废话，一个正经人是羞于说出口的。我似乎觉得，他把我完全当成了一个小孩子，当成了一个几乎连最普通的人情世故都不懂的娃娃。比方说，当我主动和他聊起书本以外的什么事情时，他的确也往往回答我几句，但似乎只是出于礼貌，而且回答得十分简短。我常常反躬自问：他平时干吗老向我请教那些书本知识呢？当我们谈论书本知识的时候，我有时偶尔瞥他一眼：看看他是否在暗中嘲笑我？然而并非如此；一般说来，他总是认真而细心地听我讲，虽然有时也并不那么十分认真，遇到这后一种情况时，我往往感到难过。他问题提得明确而肯定，但对于我的解答似乎并不感到十分惊奇，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而已……此外，我觉得，他似乎认为对我已无须多费脑筋，跟我谈话用不着象跟别人谈话那样，除了书本知识外我什么也不懂，甚至也不可能弄懂，因而也就无须打搅我了。

我相信，他甚至有点喜欢我，这也使我大为惊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人，他对我的怜悯是不是出于一个强者对于一个弱者通常有的那种本能的感情，他是不是也把我当成了一个这样的弱者……尽管如此，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偷我，而且我相信，他偷我东西的时候，也一定很可怜我。“哎，你这个人呀！”当他伸手摸我东西的时候，很可能在这样想，“瞧你这个人，连自己的东西都看管不住！”不过，他似乎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喜欢我。有一次，他无意中亲口对我说：“您这个人心眼儿太好了！您竟这么老实，老实得简直叫人可怜。不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请您不要见怪，”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这可是我的心里话啊！”

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人，在发生某种激烈的群众运动或急剧变革的时候，他们往往突然崭露头角，并跃居于显要地位，从而立即使自己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他们不是一些只说不干的空谈家，但他们也不能成为事业的倡导者和主要领袖；然而他们却是事业的主要完成者和开拓者。他们并不大肆喧嚷便立即开始行动，但他们却是第一批逾越主要障碍的人，他们毫不犹豫、无所畏惧地上刀山入火海，——大家都盲目地跟在他们后面往前冲，一直冲到最后一道壁垒，他们通常就在那儿抛头颅洒热血。我不相信彼得罗夫会有善终，他会在顷刻之间突然结束掉一切的；如果说他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毁灭掉，那只是因为时候未到。不过，谁晓得呢？也许他会毫无目的地漂泊终生，直至白发苍苍，最后寿终正寝。不过，我觉得还是米—茨基说得对：他是全狱囚犯中最果敢的一个。

第八章　果敢的人们。卢奇卡

谈论果敢的人们是不容易的，在监狱里，也象其他地方一样，这种人相当少。从外表上看，你也许会觉得他是一个可怕的人，要是再联想起别人对他的议论，你甚至还会躲避他呢。起初，一种出于本能的感情使我尽量躲着这些人。后来，我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甚至对最可怕的杀人凶手也是如此。有的人尽管没有杀过人，但却比另一个因六次杀人而被捕入狱的人更为可怕。有些罪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犯罪动机中有许多奇怪的因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老百姓中间有些凶杀案发生的原因是非常离奇的。比方说，常常有这样的杀人凶手：这个人安详而温顺地过着日子，忍受着痛苦的命运。譬如说，他是一个庄稼汉，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小市民或者兵士。突然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折断了，他不能忍受了，便捅了他的敌人和压迫者一刀。于是奇怪的事情开始了：这个人在一段时间里突然变得无法无天起来。他杀的第一个人是那个压迫他的人，他的敌人，这虽然也是犯罪，但还是可

以理解的，也是不无理由的；可是后来他杀的已经不是敌人，而是遇着谁就杀谁，以杀人来取乐，或者为了一句粗野的话，为了有谁看了他一眼，为了凑够整数，有时只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滚开，别挡我的路，让我过去！"他仿佛是喝醉了酒，仿佛是处于神志昏迷状态。仿佛一旦逾越了那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就开始沾沾自喜地认为，对于他再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了；他仿佛急于一下子摆脱一切法律和权力的约束，尽情享受不受任何束缚和限制的自由，充分欣赏连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觉到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情绪。他也知道，一种可怕的惩罚正在等待着他。这一切也许恰似这样一种感觉：一个人正从高塔上望着他脚下的深渊，以便最后一头栽下去：一切都赶快结束吧！甚至有一些极其温顺而且从不引人注意的人也这么干。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在这种昏迷状态中炫耀自己。这种人过去越是受压抑，现在就越是渴望耀武扬威，渴望使人感到恐怖。他以别人的恐怖为乐，他喜欢激起别人的反感。他摆出一种不顾死活的样子，而这种"不顾死活的人"有时竟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受惩罚，盼望着被干掉，因为到最后连他自己也难以忍受那种伪装的不顾死活的样子了。有趣的是，这种情绪，这种装腔作势的态度，往往一直持续到受刑的时候，然后就象被一刀切断了：仿佛这期限是规定好了的，仿佛是事先就规定出来的。于是这个人便突然屈服了，他惊恐不安，软得象一块破布。在刑场上他痛哭流涕，请求人们饶恕他。他被关进了监狱，人们一看，原来他是一个流着口涎和鼻涕的家伙，甚至受到压制也不敢反抗，因而令人不禁感到诧异："难道他就是那个杀过五、六个人的家伙吗？"

当然，有一些人就是在监狱里也不是很快就屈服的。他们还保持着一种傲气，保持着好吹牛的脾气，仿佛在说：我可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人，我是因"六条人命"而蹲监狱的。但是他最终还是屈服了。他有时回忆自己那大胆的一刀，回忆他还是"不顾死活的好汉"时的那次狂欢痛饮，也只是为了寻开心，他很想找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以便妄自尊大地在他面前装腔作势，吹嘘吹嘘自己，并向他叙述自己的丰功伟绩，同时还要装出一副他并不愿讲的样子。他似乎在说：你瞧，我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

这种极其微妙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以捉摸啊！这种故事有时讲得多么轻松愉快啊！讲故事人的语调和每一句话，都流露出十分考究的漠不关心的口吻。这些人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啊？

有一次，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的一个漫长的晚上，由于无事可做，我很烦恼地躺在通铺上，听着别人讲这一类的故事，由于缺乏经验，我错把讲故事者当成一个了不起的可怕凶手，一个具有惊人的钢铁般意志的人，当时我几乎觉得彼得罗夫也不足为奇了。故事的主题是说，他，卢卡·库兹米奇，怎样干掉了一名少校，这并不是为着别的什么，而只是为着使自己高兴。这个卢卡·库兹米奇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青年囚犯，他在我们狱室里个子最小，身体瘦弱，鼻子尖尖的，是个乌克兰人。其实，他是俄罗斯人，只不过出生在南方罢了，似乎当过奴仆。他确实有些嘴尖舌快，傲慢自大："鸟儿虽小，爪儿却尖。"不过，囚犯们最有识别人的本领。囚犯们并不很尊敬他，就象监狱里所说的，"对他并不恭敬"。他爱面子爱得要命。那天晚上，他坐在通铺上缝衬衫。缝内衣已成了他的职业。他旁边坐着一个笨拙迟钝但却善良可爱的囚犯，名叫科贝林，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睡在卢卡旁边。因为是近邻，卢卡就时常同他争吵，总是傲慢地讽刺他，有时还以专横的态度对待他，但科贝林由于忠厚纯朴，竟然不大觉察。他一面织羊毛袜子，一面漫不经心地听卢卡讲故事。后者大声而清楚地讲述着。他希望大家都能听到他讲的故事，但又竭力装出只讲给科贝林一个人听的样子。

"老兄，他们把我从老家押解到H城，"他一面挑针一面讲，"那次是因为流浪。"

“这是在什么时候，很久以前了吧？”科贝林问道。

“豌豆熟了的时候——一年以前了。嘿，我们刚到 K 城，就把我暂时关在监狱里。我一瞧，和我蹲在一起的大约有十二个人，都是乌克兰人，高大魁梧，身强力壮，简直就是一群大公牛。可是他们都是一些安分守己的人。伙食很坏，他们的那位少校对待他们简直可以说是为所欲为。蹲了一天，到了第二天，我一瞧——原来都是一些胆小鬼。我跟他们说：‘你们怎么竟能容忍这么一个笨蛋？’可是他们说：‘那你就自己去跟他说说吧！’他们甚至嘲笑我。我没作声。

“当时有个乌克兰人特别可笑，弟兄们，”他突然撇开科贝林，把脸转向大家补充说，“他讲了法庭是怎样判他的案子的，他跟法官怎样对话，可是这时他自己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哭起来。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可他本人身强力壮，又肥又胖，满头白发。他在法庭上说：‘我什么罪都没有！你这个鬼儿子，老是写呀写呀，没个完，你都写些什么呀。嘿，滚你的吧，该死的家伙，要是我就吊死！可是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写呀写，不知都写些什么东西！……这时我就完蛋了！’瓦夏，给我点线；监狱里发的烂线。”

“那是市场上买来的，”瓦夏一面递给他线，一面答道。

“我们缝纫车间的线要好一些。前几天叫残废老兵去买，不知他从哪个缺德娘们儿那儿弄来的！”卢卡一面冲着亮光纫针，一面继续说道。

“那还用说，一定是从他亲家母那儿弄来的。”

“对，从他亲家母那儿弄来的。”

“后来少校又怎么样了呢？”完全被忘在一边的科贝林问道。

这正是卢卡所需要的。然而，他却没有立刻讲自己的故事，好象科贝林不值得注意似的。他慢条斯理地把线弄直，又慢条斯理地把线压在腿底下，然后才开始讲下去。

“最后我总算把那些乌克兰人给鼓动起来了，他们要求见少校。我一大清早就从邻人那儿借了一把刀，我把它藏起来，以防万一。少校怒气冲冲地坐车来了。这时，我说：霍霍尔，你们别怕！可是，他们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哆嗦不停。少校醉醺醺地跑进来喊道：‘谁在这里捣乱？这里怎么搞的！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

“他刚一说完‘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这句话，我就走向前去，”卢卡继续讲道，“刀子就藏在我的袖筒里。”

“‘不对，阁下，’我一边说，一边一步一步往前挪，‘不对，阁下，怎么能说您就是我们的沙皇，就是我们的上帝呢？’

“‘噢，这么说，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少校喊叫起来，‘要造反呀！’

“‘不对，’我又往前挪动一步，说道，‘不对，阁下，您自己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万能的，是无处不在的，上帝只有一个。我们的沙皇也只有一个，是上帝使他凌驾在我们众人之上的。’我说：‘阁下，沙皇是君主。’我说：‘阁下，您只不过是个少校罢了——是沙皇开恩，看您立下了功劳，才让您当上了我们的典狱长。’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他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顾象母鸡下蛋那样咕咕地叫。他大吃一惊。

“‘那好吧，’我一面说，一面向他猛扑过去，我嗖的一声拔出刀子，直捅到他的肚子里。我干得可麻利啦。他倒了下去，两脚直蹬。我把刀子扔在一边。

“我说：‘霍霍尔，你们瞧，现在把他抬起来吧！’”

在这里我要说几句题外话。可惜，象“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这样的话，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话，过去在许多军官中间确实经常说的。然而，也应当承认，这样的军官现在已经不多了，也许完全绝迹了。我还要指出，特别喜欢用这一类词句来炫耀自己的大都是由低级军衔擢升上来的军官。军衔似乎把他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头脑，都给翻转了过来。他们长期呻吟于重压之下，隶属于各级长官，突然他们看到自己当上了军官，成了贵人，于是便很不习惯地首次陶醉起来，尽量夸大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当然，他们只是对待自己的下级是这样。他们对待自己的上级仍然奴颜脾膝，尽管这样做已完全没有必要，许多长官都是讨厌这一套的。有些奴颜脾膝的家伙甚至特别热衷于赶快向自己的上司声称：虽然他们已是军官，但终究是由下级一步一步擢升上来的，因此他们将“永远牢记自己的地位”。但是对待下级，他们几乎都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当然，现在未必能碰到这样的军官了，未必还有人这样喊“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任何东西都不会象这一类的官腔更能激起囚犯们以及所有下级军官们的愤怒。这种自吹自擂的厚颜无耻的行径，这种夸耀自己可以不受任何惩罚的做法，就是在最驯服的人们身上也能激起仇恨，最后使他们无法再忍耐下去。幸而，这一切几乎都已成为过去，就是在昔日也是要受到上级严格约束的。这方面的例子我也知道一些。

总之，在对待下级方面，任何傲慢自大、粗枝大叶的作风，任何的厌恶情绪，都能激起他们的愤怒。比方说，有的人认为只要把囚犯的伙食办好，对囚犯看管得严格一些，一切都按法律办事，就万事大吉了。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他是本能地抑或不自觉地忍受屈辱，但他还是希望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囚犯自己也知道，他是一个囚犯，他没有权力，也知道自己在长官面前的地位。但你用任何烙印任何脚镣都不能强迫他忘却他是一个人。既然他确实是一个人，所以就应该把他当作人看。我的天哪！人道的态度甚至能使那些连上帝的形象在他们心中都早已暗淡无光了的人们重新振作起来。应当用最人道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不幸的人”。这就是说要拯救他们并给他们以欢乐。我遇见过这种善良而豁达的军官。我看到过他们对这些被欺凌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几句亲切的话几乎就能使囚犯们在精神上复活。他们会象孩子似的高兴起来，开始象孩子似的爱戴起他们来。我还要指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囚犯们并不喜欢长官们对待他们过于亲昵，过于善良。有些囚犯本来想要尊敬长官，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后来却不再尊敬他了。囚犯们喜欢，比方说，他们的长官有勋章，有名望，受上司宠信，喜欢他严肃庄重，公正而又有尊严。囚犯们最喜欢的是这样的军官：他们既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又不侮辱囚犯，这样一来就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了……

“为了这件事，一定狠狠给你加了一番热吧？”科贝林心平气和地问道。

“嗯。加热，老弟，那还用说，自然要加热的。阿列伊，把剪刀递给我！弟兄们，赌场今天怎么不开张呀？”

“钱都喝光啦，”瓦夏说，“要是没喝光，早就开张了。”

“要是！你这个‘要是’就是在莫斯科也值一百卢布，”卢卡接着说。

“卢卡，他们总共抽了你多少鞭子？”科贝林又开口问。

“亲爱的朋友，总共抽了我一百零五下。唉，弟兄们，有啥可说的呀：好歹总算没把我打死，”卢卡接着说，他又不搭理科贝林了，“他们很隆重地押着我去挨这一百零五鞭，可热闹啦。在那以前我还没尝过鞭子的滋味呢。当时人山人海，全城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惩罚一个强盗哩，一定是个凶手。嘿，这些人真蠢，我简直说不出他们有多蠢。行刑人扒下我的衣服，把我按倒在地，喊道：‘挺直腰，我要开鞭啦！’一一我等着，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当他抽我第一鞭时，我想喊，嘴都张开了，可就是喊不出来。已经喊不出声音啦。抽第二鞭时，信不信由你，连他们数‘二’的声音我都听不见了。等我醒过来时，我听见他们已数到十七。老弟，他们后来把我从刑台上抬下来四次，每次半个小时，往我身上泼冷水。我一瞧，连他们都瞪眼了，这时我想：‘这回可完啦……’”

“可你并没有死呀？”科贝林天真地问。

卢奇卡用极端蔑视的眼光把他打量了一番，然后大笑起来。

“他结实得象个木墩子！”

“他脑袋有点不大好使，”卢奇卡说，似乎懊悔不该同这样的人谈话。

“他是个傻瓜，”瓦夏证实道。

虽然卢奇卡杀过六个人，但在监狱里谁也不怕他，尽管他心里也许希望被大家看作是一个可怕的人……

第九章　伊赛·福米奇。澡堂。巴克卢申的故事

圣诞节快到了。囚犯们怀着某种庄重的神情等待着它，我瞧着他们，也期待着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节前第四天，我们被带到澡堂去洗澡。在我蹲监狱期间，特别是头几年，囚犯们很少被带到澡堂去洗澡。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开始作准备。这次洗澡安排在下午，因而那天下午就不出工干活了。我们狱室里最高兴最忙碌的要算是伊赛·福米奇·布姆施坦了，关于这个犹太囚犯，我在这部小说的第四章里已经提到过。他洗澡时喜欢用蒸气喷，一直喷到昏迷过去，失去知觉；如今，每当我回首往事，回忆我们那次洗澡的情景(这件事我是永

远不会忘记的)时，这个怡然自得而又令人难忘的伊赛·福米奇的面孔便立即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他是我的狱友，和我住在同一间狱室里。天哪，他这个人多么滑稽可笑啊！关于他的外貌特征，我已简单说过几句：他年纪在五十岁左右，身体孱弱，满脸皱纹，面颊和前额上打着可怕的烙印，他那瘦弱而洁白的肉体活象一只拔掉了毛的小鸡。他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沾沾自喜、怡然自得的表情。看来，他对于服苦役一点儿也不感到惋惜。他是一个首饰匠，由于本城没有干这种手艺的人，所以给城里老爷们和官员们做首饰的活计便由他一个人包揽下来了。人们付给他一些工钱，因此他日子过得相当宽裕，甚至发了财，攒下钱，向全狱的人放高利贷。他有自己的茶炊、漂亮的被褥、茶杯以及全套餐具。城里的犹太人都乐于与他结识，并对他加以保护。每逢星期六①，他都要在卫兵的押送下，到城里犹太教堂去做祈祷(这是法律所允许的)；

****

①犹太教规定星期六为安息日。

****

他日子过得十分快活，而且急不可耐地期待着二十年刑期快快结束，以便“娶妻成家”。他是一个由幼稚、愚蠢、诡谲、粗鲁、朴实、怯懦、吹牛、无耻等成分混合构成的极其滑稽可笑的人物。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囚犯们从不欺侮他，只是有时和他开几句玩笑，逗逗乐而已。伊赛·福米奇显然永远是专供大家取乐和消遣的。“我们只有一个伊赛·福米奇，谁也不要动他！”囚犯们都这样说；伊赛·福米奇尽管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他显然也以能充当这种使囚犯们开心取乐的角色而感到自豪。他入狱时显得特别滑稽可笑(这件事发生在我入狱以前，我是后来听人们说的)。一天傍晚，下工以后，监狱里忽然传说，来了一个犹太人，正在卫兵室里剃头，过一会儿就进来。当时，监狱里还没有犹太人。因而囚犯们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他一进大门，立刻就被大伙围住了。一名军士带他走进民事犯狱室，指给他通铺上的位置。伊赛·福米奇手里提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公家发的物品和他个人的杂物。他把口袋撂下，爬上通铺，盘腿坐下，不敢抬眼看任何人。周围发出一片笑声，有人讲起监狱里流传的一些有关犹太人的笑话。忽然，一个青年囚犯从人群中挤过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旧单裤和一块破包脚布。他在伊赛·福米奇身旁坐下，拍着他的肩膀说：

“喂，亲爱的朋友，我在这儿等你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你瞧瞧这几样东西，能值几个钱？”

于是，他把拿来的破烂摊在他面前。

伊赛·福米奇刚进来时，吓得连一句话都不敢说，更不敢抬头看一眼密密麻麻围站在他周围的这群面带嘲笑神色、脸上打着烙印、样子显得十分可怕的囚犯们；可是等他一看见典当品，他全身突然抖动了一下，接着便敏捷地把那些破烂拿在手里，仔细翻瞧起来，甚至还冲着灯光照了照。大家都一声不吭地等着听他将会说些什么。

“怎么，连一个银卢布还不给吗？这是值得的！”典当者一边向伊赛·福米奇挤着眉眼，一边继续说。

“一个银卢布？不值，七个戈比还凑合。”

这就是伊赛·福米奇进狱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大伙都捧腹大笑起来。

“七个戈比！好吧，七个就七个，算你走运！你可要当心，好好把它们收藏起来；要是有个长短，小心你的脑袋。”

“利息三戈比，总共十个戈比，”犹太人一边用不连贯的、颤抖的声音继续说，一边伸手到衣袋里去摸钱，同时胆怯地打量着囚犯们。他非常胆小怕事，但又很想做生意。

“三个戈比是一年的利息吗？”

“不是一年，是一个月的。”

“你这个犹太人，真抠门。请问尊姓大名？”

“伊赛・福米奇。”

“那好吧，伊赛・福米奇，你在我们这儿会发大财的！再见!”

伊赛・福米奇又把典当品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叠起来，在囚犯们连续不断的笑声中，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在自己的口袋里。

大家仿佛真的都很喜欢他，而且谁也不欺负他，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欠他的账。他自己则象母鸡一样温和，看到大家都对他表示好感，他有时甚至狂妄自大起来，可是大伙一看见他那副天真无邪的滑稽样子，也就立刻饶恕了他。卢奇卡当年曾认识很多犹太人，因而常常逗他，但并非出于恶意，只是为了逗笑取乐而已，就象逗弄小狗、鹦鹉和其他家驯的小动物一样。伊赛・福米奇也很清楚这一点，因而一点儿也不生气，只是很机灵地说句笑话岔开。

“喂，犹太人，我要揍你一顿!”

“你揍我一下，我就揍你十下，”伊赛.福米奇勇敢地答道。

“该死的癞痢头!”

“癞痢头又怎么样？”

“长癞痢的犹太人!”

“那又怎么样？长癞痢也不要紧，反正我有钱；只要有钱就行。”

“你出卖过上帝。”

“出卖过上帝，又怎么样？”

“太棒啦，伊赛・福米奇，好样的！谁也不要动他，我们只有一个伊赛・福米奇!”囚犯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喊道。

“喂，犹太人，你要挨鞭子，会把你发配到西伯利亚去的。”

“我现在不是已经在西伯利亚了吗了”

“把你发配到更远的地方去。”

“那里有上帝老爷吗？”

“当然有啦。”

“那就行；只要那里有上帝老爷，有钱就行，有钱走遍天下嘛。”

“好样的，伊赛·福米奇，真是好样的！”周围发出一片叫喊声；伊赛·福米奇虽然也看出大伙都在取笑他，但他并不气馁；大伙的夸奖显然使他感到高兴，于是他用又尖又细的童音在狱室里哼唱起来：“利亚-利亚-利亚-利亚-利亚！”——这是一种怪诞而又可笑的曲调，是他蹲监狱期间所唱的唯一的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后来，当他和我混熟了以后，他曾发誓向我保证说：从前，当六十万犹太人横渡黑海的时候，从小孩到大人，唱的就是这首歌曲；每个犹太人遵奉圣训，在获得对敌胜利的时候，都要哼唱这个曲调。

星期六前夕，即星期五晚上，别的狱室的囚犯往往特意跑到我们狱室来看伊赛·福米奇如何做安息日祈祷。伊赛·福米奇是那么天真地喜爱虚荣和喜欢炫耀自己，就连大伙的这种好奇心也使他感到高兴。他带着一种好为人师和装腔作势的傲慢神气，把自己那张小桌子放在一个角落里，铺上台布，摊开书本，点上两枝蜡烛，嘴里嘟哝着一些神秘玄妙的话语，披上袈裟，其实也就是披上他那件收藏在小箱子里的五颜六色的毛料斗篷；然后在两只手腕上套上套袖，用绷带把一个小木匣子绑在头上，一直盖住前额，这样一来，伊赛·福米奇的头上就好象长出一个可笑的犄角。接着，祈祷开始了。他拖长声调诵读着，喊叫着，唾沫四溅，不停地转动着身子，同时打着各种奇怪而又可笑的手势。当然，这一切都是祈祷仪式所规定的，并没有什么可笑和奇特的地方；但使人感到可笑的是，伊赛·福米奇在我们面前竟故弄玄虚，竭力炫耀他的这种仪式。他突然双手抱头，开始大声嚎啕着诵读祈祷词。嚎啕的声音越来越大，于是他声嘶力竭地、几乎是哀嚎般地把自己那顶着圣经匣的头低垂在书本上；正当他用劲哀嚎的时候，突然又放声大笑起来，接着又用一种由于深受感动而显得庄重严肃、由于过度幸福而变得有气无力的声音，拖长声调诵读起来。“瞧，他多么虔诚啊！”囚犯们常常这样说。有一次，我问伊赛·福米奇：正当嚎啕痛哭的时候，突然又庄严地转向幸福和极乐，这是什么意思呢？伊赛·福米奇非常喜欢我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立即向我解释说，哭泣和哀嚎是表示失掉耶路撒冷的意思，教仪规定在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要尽量大声哀嚎，并用力捶胸。可是当嚎哭得最痛心的时候，他，伊赛·福米奇，应该突然(这个突然也是教仪中所规定的)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关于犹太人要返回耶路撒冷的预言来。这时他应立即流露出喜悦的情绪，唱歌，放声大笑；在诵读祈祷词时，声音里要尽量流露出幸福的感情，面孔上尽量显示出庄严而高贵的神情。伊赛·福米奇非常喜欢这一突然转变以及对这项教规所承担的义务：他认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奥妙的招数，于是他带着自夸的神气把这一神奇玄妙的教规解释给我听。有一次，当他祈祷得最带劲的时候，少校在看守长和几名卫兵的陪同下突然走进狱室。囚犯们都笔直地站立在通铺旁，只有伊赛·福米奇一个人却更加起劲地大喊大叫和装神弄鬼起来。他知道祈祷是允许的，不能中断，即使在少校面前喊叫几声也不会担什么风险。能有机会在少校面前装腔作势，并在囚犯们面前炫耀炫耀自己，使他感到特别高兴。

少校走到离他只有一步远的地方；这时伊赛·福米奇突然转过身来，脸冲着少校，一边挥动着胳膊，一边开始拖长声调诵读起他那庄严的预言来。由于教仪规定，在这一瞬间他脸上要显露出怡然自得和气度高贵的表情，因此他立即眯起眼睛，笑嘻嘻地向少校频频点头。少校感到惊奇，终子噗哧笑出声来，并当面骂了他一声糊涂蛋，然后就走开了；可是伊赛·福米奇却更加起劲地喊叫起来。一小时以后，等他吃过晚饭，我问他："要是少校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您发起脾气来，那您怎么办？"

"哪个少校？"

"哪个？难道您没看见吗？"

"没看见。"

"他就站在您面前，离您只有一俄尺远。"

可是伊赛·福米奇却一本正经地要我相信，他确实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少校，在做祈祷时，他已经神魂颠倒，他看不见也听不见周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记得，伊赛·福米奇每逢星期六总是无所事事地在狱中到处闲逛，尽量不做任何事情，这是他们的教规所规定的。他每次从犹太教堂做完祈祷回来，总要告诉我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闻轶事，或者给我带来一些从彼得堡传来的不伦不类的新闻和流言蜚语，而且总是要我相信，这些消息是他从他们那些犹太人那儿听来的，而后者得到的则是第一手材料。

不过，关于伊赛·福米奇我已经讲得太多了。

全城只有两个公共澡堂。其中一个是一位犹太人经营的，有单间，每个单间取费五十戈比，是专为高级人士开设的。另一个则是为一般老百姓开设的，这是一个破旧、肮脏、狭小的澡堂，_我们现在就是要到这个澡堂里来洗澡。那天天气寒冷，阳光普照；囚犯们都很高兴有机会走出要塞，到城里去看看。一路上说说笑笑，话声不停。派了整整一个排的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我们，使全城的人都感到惊奇。来到澡堂后，我们立刻被分为两批：第一批洗澡时，第二批必须在寒冷的脱衣间里等着，由于浴室很小，所以只好这样做。一个狭小的浴室居然能容纳下我们一半人，真是叫人难以想象。彼得罗夫一直没有离开我，还没等我求他，他就主动跑来帮我的忙，甚至还提出要给我搓背。和彼得罗夫一起主动提出给我效劳的还有巴克卢申，他是特别部的囚犯，人们都管他叫开路先锋，我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一个十分有趣、十分可爱的囚犯，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我和他很快就混熟了。彼得罗夫甚至帮我脱衣服，因为我脱得很慢，而脱衣间里又几乎象户外一样冷。顺便说一下，对于囚犯来说，脱衣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他尚未完全学会的话。首先，他必须学会迅速地解开脚镣带。这种脚镣带是皮的，有四俄寸长，系在箍着脚腕子的铁环下面的衬裤上。一副脚镣带的价钱不少于六十戈比，然而却得由每个囚犯自己花钱去买，不用说，没有这种带子就不能走路。由于镣环并不紧贴着脚腕子，脚腕子和镣环中间还有一指宽的空隙，因此，走起路来，镣环就会磨腿，如果囚犯一天不戴脚镣带，就会把腿磨破。不过，解脚镣带并不难学。最难学的是如何敏捷地从脚镣下面脱衬裤。这是一整套戏法。比方说，要想从左腿上往下脱衬裤，就必须先把裤腿从腿和镣环中间放下去，从脚上脱下来以后，再把裤腿通过镣环穿回来；然后把

从左腿上脱下来的裤腿，通过右脚上的镣环穿过去；然后再把从右脚镣环中脱下的两条裤腿穿回身上。换一套新内衣就必须经过这一整套的程序。对于一个新手来说，甚至很难想象这一切是怎样做的。最先教会我穿内衣的是托波尔斯克城一个叫科列涅夫的囚犯，他是一个强盗头目，已被铁链锁了五年。不过，囚犯们对此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能毫不费劲地应付这一切。我给了彼得罗夫几个戈比，让他给我弄一块肥皂和一把纤维团来；不错，每个囚犯也发了一块肥皂，但那块肥皂只有两戈比铜币那么大，只有“小康人家”晚餐桌上的一块干酪那么厚。肥皂就在脱衣间里出售，那里还出售热茶、面包圈儿和热水。根据狱方和澡堂老板达成的协议，每个囚犯只供给一盆热水；谁要是想洗得更干净一些，他可以花上一戈比再买一盆热水，这盆热水可以通过脱衣间特设的一个小窗口递到浴室里来。彼得罗夫帮我把衣服脱掉以后，看我戴着脚镣走路困难，便挎起我的胳膊，扶着我走。“您往上提提，提到小腿肚那儿，”他象一位老用人一样搀扶着我，同时不停地说道，“小心，这儿是门坎。”我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很想让彼得罗夫相信，我一个人也能走过去，可是他却不信。他简直把我看成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什么也不会干、处处都需要别人照料的孩子。彼得罗夫绝不是仆人，他完全不是仆人；倘若我冒犯了他，他是知道应该怎样对待我的。我并没有因他服侍我就答应给他报酬，他本人也没有向我要过报酬。是什么促使他这样热心照料我呢？

当我们推开通向浴室的门时，我以为我们走进了地狱。请设想一下吧，一个只有十二步见方的房间里一下子竟拥进来上百口人，即使不是一百，起码也有八十，因为只把我们分成了两批，而我们前来洗澡的几乎有二百人。浴室里热气腾腾，烟雾弥漫，到处都是秽物浊水，拥挤得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我一看这情景，吓得直想退回去，可是彼得罗夫立即又鼓励我。我们请求那些蹲在地板上洗澡的人弯下腰让我们走过去，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越过人们的头，挤到了长凳跟前。长凳上的位置已被占满。彼得罗夫这时对我说，应该用钱买个位置，于是他立即就去和一个坐在小窗口旁的囚犯商议。那个囚犯得到彼得罗夫给他的一个戈比以后，立刻就把位置让了出来，这钱是我们进浴室时为了预防万一而攥在手里的。那个囚犯得到钱以后，便立即钻到我的位置下面，即长凳底下洗起来，那儿又黑又脏，粘滞的污秽几乎有半指厚。然而就连长凳底下的位置也被占满了，人们在那儿蠕动着。浴室地板上连一块巴掌大的空地也没有了，到处都是歪歪扭扭坐着或蹲着的囚犯，木盆里的水向四外飞溅。另外一些人则直挺挺地站在人堆里，手托着木盆站着洗，脏水从他们身上一直流到蹲在下面的人们的头上。在木板架的最高处和下面各级阶梯上，人们蜷缩着身子，拥挤在一起擦洗。不过，他们洗得并不怎么认真。一般老百姓都很少用热水和肥皂擦洗，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往身上喷蒸气，然后用冷水冲，——他们都喜欢用这种方法洗澡。近五十把桦条帚在木板架上一起一落地、有节奏地往身上抽打，一直抽打到昏迷过去。蒸气不停地往外放。①这已经不是热蒸气，而是地狱之火了。

****

①从前，俄国中小城市的澡堂里往往设有一个带几级阶梯的木板架，浴者用木盆盛水在下边几级阶梯上洗擦，在上边阶梯上用蒸气喷。在和浴室相通的另一个小房间里，放着一堆烧得通红的石块，人们把水泼在石块上，使之发出蒸气、烟雾，直接冲入浴室。俄国人洗澡时都喜欢用蒸气喷，同时用桦条帚(将一把桦树枝捆在一起)蘸水往身上抽打，一直抽打到全身发红，大汗淋漓，有的人甚至把自己抽得失去知觉。

****

人们在近百副铁镣碰着地板发出的铛啷声的伴奏下，大喊大叫，纵情狂笑……有的人想走过去，但被别人的脚镣绊住，歪倒在蹲在下面的人们的头上，在一片谩骂声中，把别人也曳倒了。脏水从四面八方流过来。每个人都处在一种如痴如醉、十分兴奋的状态中；发出一片尖叫声和呼喊声。在脱衣间递水的那个小窗口旁，更是一片谩骂、拥挤和厮打。从窗口领出来

的热水，还没等端到目的地，就都洒在坐在地板上的人们的头上了。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士兵，手里端着枪，不时从窗口或半开着的门口探进头来，向里窥视，看看有没有越轨行动。囚犯们那被剃去半边的头和被蒸气喷得发紫的躯体，显得更加丑陋难看。在他们那被蒸气喷得发紫的脊背上，明显地露出过去因受鞭笞而留下的伤疤，此时看上去，他们的脊背仿佛又重新布满了伤痕。多么可怕的伤疤啊！看着他们，我真有点不寒而栗。人们不停地往烧得通红的石块上泼水——一团团浓密的热蒸气弥漫整个浴室；大家都格格地笑着，喊叫着。透过水蒸气的云雾，隐约看得见布满伤疤的脊背、被剃去半边的头、蜷缩着的胳膊和腿；而蹲在木板架最高处的伊赛·福米奇，更是放声哈哈大笑。他让蒸气喷得失去了知觉，看来，不论蒸气多热，也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花一个戈比雇的那个替他抽打全身的囚犯，终于热得支持不住了，丢下桦条帚，跑到一边用冷水冲澡去了。但伊赛·福米奇并不泄气，他又雇了第二个，第三个；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吝惜花钱的，一连换了五个人替他抽打身子。“喷得真带劲啊，伊赛·福米奇，真是好样的！”——囚犯们从下面向他喊道。伊赛·福米奇自己也感到这时他已凌驾在所有人之上，比所有的人都高出半截身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用尖锐而近乎发狂的声音唱起他那首抒情曲来：利亚-利亚-利亚-利亚-利亚，这歌声压倒了一切声音。这时我忽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进地狱的话，那地狱很可能就和这个地方完全一样。我实在憋不住，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彼得罗夫；他只是向四周瞧了瞧，一句话也没说。

我本想在我坐的长凳上也给他买一个位置，可是他却在我脚下坐下来，并声称他很舒适。巴克卢申帮我们买热水，我们用多少他就给我们端多少。彼得罗夫说，他要帮我从头到脚洗一遍，“这样，您就会彻底干净了”，而且极力劝我去喷蒸气。我没敢去喷。彼得罗夫给我全身擦上肥皂。“现在我要洗您的小脚了，”——他最后补充说。我本想对他说我自己会洗，但我没有拒绝他，只好听从他的摆布了。在他那种把我的脚称做“小脚”的语调里，并没有丝毫阿谀奉承的意味；彼得罗夫之所以把我的脚称做小脚，大概是因为只有别人的、真正男子汉的脚才配称得上脚，而我的脚只能称之为小脚而已。

他帮我洗完澡以后，又以同样彬彬有礼的态度扶着我回到脱衣间，并步步警告我要留心，仿佛我是一个瓷做的人似的。接着他帮我穿内衣，等把一切都料理完以后，他自己才跑回浴室喷蒸气去了。

回到狱中，我请他喝杯茶。他不拒绝喝茶，喝完后向我道了谢。我又破钞请他喝了半瓶白酒，这种白酒在我们狱室里可以买到。彼得罗夫显得十分高兴，喝完酒，格格地笑着说我已使他完全恢复了精神，说完便急忙跑到伙房去了，仿佛那儿有什么事没有他就不能解决似的。他走后，又来了一位和我聊闲天的人，他就是巴克卢申(开路先锋)，还在洗澡的时候，我就约他来喝茶了。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象巴克卢申这样可爱的人。不错，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从不示弱，甚至常常和别人争吵，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事情，——总之，他善于保护自己。但他从不和别人作长时间的争吵。看来，囚犯们都很喜欢他，他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很受欢迎。甚至就连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喜欢逗笑取乐的一个人。他身材魁梧，三十来岁，面孔英俊、朴实，虽然长着一个赘疣，但仍显得十分漂亮。他见谁都要模仿一番，脸上总是做出各种滑稽可笑的怪相，使得周围的人看着都不禁哈哈大笑。他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他从不宽容那些一看到别人开玩笑就流露出厌恶和敌视情绪的人，因此谁也不能骂他是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他热情洋溢，朝气蓬勃。我入狱后没过几天就和他认识了；他告诉我

他是一个世袭兵，后来在工兵部队服务，甚至还受到过某些高级长官的赏识和垂青；每当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来，总是感到十分自豪。我们初次见面时，他立刻便向我打听起彼得堡的情况来。他甚至还常常看书。他现在来我这儿喝茶，一进门就说，今天早晨 U 中尉把我们那位少校教训了一顿，说得全狱室的人都笑了；然后他在我旁边坐下，带着喜悦的神情告诉我，狱中快要演戏了，囚犯们正在筹备圣诞节演出。演员已经物色好了，舞台布景也正在一点一点地准备。城里有人答应把自己的衣服借给演员们，就是女角的服装也能借到，甚至通过一个勤务兵的帮助，还有希望搞到一套带肩章的军官服。但愿少校别象去年那样突然禁止演出就好。去年圣诞节时，正赶上少校心绪不佳：他不知在哪儿赌博赌输了，再加上狱中又出了点乱子，他在一怒之下便让戏停演了。这次演出他也许不会禁止的。总之，巴克卢申显得十分兴奋。显然，他是演戏的倡导者之一，于是我当即就答应他，到时候我一定去观看他们的演出。巴克卢申因想到演出一定成功而流露出来的那种天真无邪的欢快情绪，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畅谈起来。他还告诉我，其实他在彼得堡并没有待多久，后来因犯了过错，被调到 P 城，不过仍在警备营当士官。

“我就是从那个县城被发配到这儿来的，”巴克卢申说。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问他。

“因为什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以为还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爱情呗！”

“是吗？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因为爱情而被流放的，”我一边笑，一边反驳他。

“真的，”巴克卢申接着说，“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为了爱情我用手枪把那个县城的一个德国人打死了。不过，若是仅仅为了那个德国人，值得把我发配到这儿来吗？您自己想想看！”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讲讲，这倒很有趣。”

“这是一个十分可笑的故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那就更好。请讲吧。”

“要我讲吗？那好，您就听吧……”

于是我听到一桩虽不十分可笑、但却相当离奇的凶杀案……

“事情是这样的，”巴克卢申开始讲述道，“他们把我调到 P 城以后，我发现这个县城挺好，也很大，只是德国人很多。嘿，当然啦，当时我还年轻，又受到长官的赏识，因此我常常歪戴着帽子，到处闲逛，向德国姑娘挤眉弄眼。后来，我看上了一个名叫路易莎的德国姑娘。她和她的姑妈都是洗衣工，洗得一手洁净的衣服。她姑妈是一个爱挑剔的老太婆，不过她们日子过得倒挺宽裕。起初，我常常在她们窗口附近闲逛，后来就真的和她交上了朋友。路易莎俄语讲得也很好，只是发音有点不太清楚，——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儿，象她这样可爱的姑娘，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开始我对她有点不够稳重，她对我说：‘不行，萨沙，你不能这样，我要保持我的贞洁，以便将来做你的贤妻。’她只是偎依在我身上，格格地笑个不停，那笑声象银铃一般悦耳……我还从未看见过象她这样诚实、纯洁的姑娘。她主动提

出要嫁给我。我怎能不娶她呢，您想想看！我已准备好要向中校提出请求了……可是突然，有一次路易莎没有来赴约会，第二次没来，第三次又没来……我写了一封信给她，也杳无回音。我心里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她若是存心骗我，她会想出别的花招来应付我，也会回信或来赴约的。她不会撒谎，所以一直躲在家里不出来。我想，准是她姑妈出的鬼主意。可是我又不敢到她姑妈家去；尽管她也知道我们的事，但我们却是背着她悄悄地进行的。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于是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她，信中说：'你若是再不出来，我就要亲自找你姑妈去。'她害怕了，这次出来啦。她抽抽搭搭地对我说，有个名叫舒里茨的德国人，是她们的远亲，职业是钟表匠，很有钱，已经上了岁数，表示想要娶她，——'他说他能使我得到幸福，而且到了晚年他也不能没有妻室；他还说他爱我，早就有意要娶我，但一直没有开口，只是暗暗作准备。萨沙，你看，他有钱，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难道你真的想要剥夺我的幸福吗？'我一看，她又是哭，又是拥抱我……咳，我想她说的也有道理呀！嫁给一个当兵的有什么好处，更何况我只不过是一个士官！我便对她说：'那好吧，路易莎，再见啦，愿上帝保佑你；我干吗要剥夺你的幸福呢。请告诉我，他很漂亮吗？'——'不漂亮，已经上了岁数，鹰钩鼻子……'说到这里，连她自己也笑了。我于是离开了她，心想：都怪我自己命运不好！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他那个钟表店门前，地址是她告诉我的。我隔着玻璃往里一看：里面坐着一个德国人，正在修钟表，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鹰钩鼻子，眼睛向外鼓出，穿着燕尾服，领子又高又硬，样子显得十分傲慢。我不由地啐了一口唾沫，真想把他的玻璃砸碎……但转而又想，触犯他有什么用呢！反正一切全完啦，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啦！天黑时我回到营房，躺在床上，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信不信由你，我竟失声痛哭起来……

“咳，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我却见不着路易莎。这时我从一个老太婆(她也是一个洗衣工，路易莎常到她家去)口里听说，那个德国人是在获知我们恋爱的事以后才立即决定向她求婚的，不然的话，他说不定还要等上两、三年。他似乎曾逼路易莎发誓永远不再和我见面，否则他就要给她们俩(她和她姑妈)一点厉害看看。老太婆还说，他可能仍在犹豫，就是现在他也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她还告诉我，后天，星期日早上，他请她和她姑妈喝咖啡，还有一个年迈的亲戚作陪，那个亲戚过去也是商人，如今却一贫如洗，在一家酒馆里看门。我一听说星期天一切事情就要定下来了，我当时真是火冒三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天和第二天，我心里想的只有这件事。我真想把那个德国人一口吃掉。

“直到星期日早晨，我还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办；做完早弥撒以后，我霍地站起身来，披上外套，就去找那个德国人。我想见见他们。至于我为什么要去找那个德国人，见面后和他说些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预防万一，我把手枪装在衣袋里。说起我那支手枪来，那可真是一支老掉牙的手枪，连扳机也不灵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拿着它玩。其实，它已经打不准了。但我仍装上一粒子弹，心想：他们若是对我粗暴无礼，撵我走的话，我就掏出手枪，吓唬吓唬他们。我来到他们那个店里。店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在后面一间屋子里坐着。除了他们四个以外，没有别的人，连女仆也不在。他只雇了一个德国女人，既是女仆又是厨师。我穿过店铺一看：通向后屋的门关着，那是一扇很旧的门，挂着门钩。这时，我心里怦怦直跳；我站在那儿一听：他们正在里边用德语交谈。我用力踢了一脚，门砰的一声就开了。我进去一看：桌子已经摆好，上面放着一把咖啡壶，正在酒精灯上煮咖啡。桌上放着一盘饼干，另一个托盘上放着一瓶烧酒、熏鲜鱼、香肠，还有一瓶葡萄酒。路易莎和她姑妈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坐在沙发上。那个未婚夫德国人坐在她们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头发梳得光光的，身穿燕尾服，硬领向前翘着。旁边另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头发斑白的胖老头子，也是德国人，他一句话也不说。我一进屋，路易莎吓得脸色发白。她姑

妈慌忙站起身来，但马上又坐下了；那个德国人却把眉头一皱，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冲着我说：

“‘您有何贵干？’

“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这还用问！您先拿酒来款待款待客人吧。我到您这儿做客来了。’

“德国人沉思了片刻，说：

“‘请坐。’

“我坐下，说道：

“‘请把酒拿上来。’

“‘这儿有酒，请喝吧。，

“‘把你的好酒拿上来。’这时，我真有点火冒三丈了。

“‘这就是最好的酒。’

“我很生气，没想到他竟这样慢待我，特别是当着路易莎的面。我呷了一口酒，说道：

“‘你这个德国人，为什么对我这样粗暴无礼？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你应该把我当朋友看待才对。’

“‘我不能做您的朋友：您是一个大兵。’

“这句话把我惹恼了。

“‘哼，你这个丑八怪，卖香肠①的德国佬！你明白不明白，就在此时此刻，我可以想把你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让我用手枪把你打死吗？’

****

①当时，许多德国人都在俄国做生意，如开酒馆、卖香肠等等。这句话含有藐视德国人的意思。

****

“我掏出手枪，站在他面前，把枪口对准他的头。别的人都吓得半死不活地坐在那里，连喊一声都不敢喊；那个老头子更是吓得面色苍白，浑身直打哆嗦，一句话也不敢说。

“德国人大吃一惊，但随即又镇静下来。他说：

“‘我不怕您，我现在把您看作一个高贵的人，请您立即把您的玩笑收起来；我一点也不害怕。’

“‘哼，你撒谎，你害怕啦！要不然，为什么你的头在我枪口底下一动也不敢动？’

“‘不，您绝对不敢开枪。’

“为什么不敢开枪？’

“‘因为开枪是严格禁止的，为此您会受到惩罚。’

“鬼晓得这个德国人为什么这样糊涂！如果不是他自己给我往火上浇油，他本可以活到今天的，事情完全是由于发生争论而引起的。

“‘照你说，我真的不敢吗？’

“‘不敢!’

“‘我不敢？’

“‘您绝对不敢这样对待我……’

“‘那好吧，给你来个香肠吃!’我一扣枪机，他就瘫倒在椅子上了。别的人都吓得惊叫起来。

“我把手枪往衣袋里一装，就走开了。当我走到要塞的时候，我顺手把手枪扔在要塞大门口的荨麻丛里。

“我回到营房，躺在床上，心想：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抓我的。可是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却没有人来。当时天已经黑了，我感到十分烦恼；我走出要塞，我一定得去见见路易莎。我打钟表店门前走过。我往里一瞧：店里挤满了人，还有警察。我去找那位老太婆，求她把路易莎叫出来。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就看见路易莎向我跑来，一头扑在我身上，搂住我的脖子，抽泣着说：‘都怪我错听了我姑妈的话。’她还告诉我：自从出事以后，她姑妈立刻就回家了，吓得差一点没有病倒，什么话也不敢说；她姑妈没向任何人提起过那件事，也不让她往外讲；她姑妈十分害怕，并说这事随便由他们怎么处理吧，‘路易莎，今天早晨谁也没有看见我们在那儿。当时他把他的女用人也打发走了，因为他怕她。他的女用人若是知道他想结婚，准会把他的眼睛给抓破的。钟表店的伙计也都不在家，他把人都给打发走了。他亲自煮咖啡，亲自预备酒菜。他那个亲戚更是一辈子都不爱说话，什么话也没说，早晨那件事刚一发生，他就第一个抓起帽子走了。他大概也不会把这事宣扬出去的。’事情正象路易莎所说的那样，两个星期过去了，也不见有人来抓我，对我没有产生任何怀疑。那两个星期，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信不信由你，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天天和路易莎见面。她对我多么依恋啊！她呜咽着对我说：‘我要跟你走，不论把你发配到哪里，我也要跟着你；为了你，我愿意抛掉一切！’我当时是那么可怜她，为了她，我真想献出我的整个生命。可是，两个星期以后，我被抓去了。这是那个老头子和她姑妈商议好，把我给告发了……”

“请等一等，”我打断巴克卢申的话，“为了这件事，只能判您十年徒刑，最多也不过十二年，作为民事犯被流放；可现在您却被关在特别部里。这是因为什么呢？”

“嗯，这是因为又出了一件事，”巴克卢申继续讲道，“我被带到法庭受审，当时有个大尉骂了我几句极难听的话。我实在憋不住了，便冲他说：‘你为什么骂人？你这个下流东西，难道你没看见你是坐在守法镜①前面吗？’
****
①旧俄时代法庭上往往悬挂着三棱镜，顶端嵌有双头鹰像，上面刻着彼得大帝有关执法守法的手谕。
****
嘿，这样一来，就使案情发生了变化；开始重新对我进行审判，两件事加在一起判了我四千棍，然后就被发配到这里，进了特别部。把我带去受刑的时候，那个大尉也被带去了：我被罚穿绿街，他则丢了军衔，被充军到高加索去了。再会，亚历山大·彼得岁堆奇。请来看我们的演出吧。”

第十章　圣诞节

圣诞节终于来到了。还在圣诞节前一天，囚犯们差不多就不出工干活了。有的人到缝纫间或作坊去，其余的只是在派工时出去点点名而已，尽管也分派了活，但几乎所有的人不是单个儿就是成群结伙地立刻返回监狱；午饭后就再也没有人出去了。早晨，大部分人出去都是办私事，而不是干公家的活儿：有些人张罗着往狱中带酒或订购新货，另一些人则去探望亲友，或者去收别人欠他们的那点儿工钱，好用来过节；巴克卢申和其他参加演戏的人为了弄到必需的服装，就出去看望某些熟人，其中多半是军官们的勤务兵。有些人带着关切而忙碌的神情四处奔走，只是因为别人的神情都是关切而忙碌的。尽管有的人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生财之道，但他们也装出一副将从某人那儿弄到钱的模样；总而言之，人人都期待着明天将发生什么变化，将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傍晚，那些到商场去替囚犯们买东西的残废老兵们带回各种各样的食品：牛肉，奶猪，甚至还有鹅。囚犯当中很多人都认为，到了节日那天慷慨解囊，把开斋节过得隆重一些是理所应当的，就连那些平日里节衣缩食、十分俭朴、一年到头也舍不得花儿个大钱的人也都是如此。对于囚犯来说，明天是他们真正的、不可剥夺的、法律上明文规定的节日。这一天是不能派囚犯出工干活的，这样的日子全年只有三天。

谁晓得呢，在迎接这一天的时候，在这些被社会所摈弃的人们的心灵深处将会激起多少回忆啊！对于普通平民来说，从童年起，伟大的节日就在他们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他们在从事艰辛繁重的劳动之后获得休息并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可是在监狱里，他们只能怀着痛苦和悲伤的心情追忆着这一切。对于重大节日的尊重，已成了囚犯们严格遵守的风俗习惯；只有少数几个人游手好闲，大多数人都很严肃认真，似乎都在忙碌着什么，其实许多人几乎根本就无事可做。但不论是游手好闲的人，还是无事可做的人，都竭力保持着一种庄重骄傲的神气……嬉笑似乎是被禁止的。总之，人们的情绪已经达到一丝不苟和容易使人急躁、使人无法控制感情的程度，谁若是破坏了大家的情绪，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遭到大家的呵斥和詈骂，人们会对他怒目而视，仿佛他亵渎了节日本身似的。囚犯们的这种情绪是非同一般的，甚至是令人感动的。除了对伟大节日的虔敬之外，囚犯们还下意识地感觉到，

他们如此尊奉圣诞节，就仿佛和整个世界有了接触，因而，他们也就不是一些完全被摈弃的人，被毁灭的人，无人需要的人了，他们虽然身在监狱，但是也和外边的人们一样。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很认真地准备过节。他没有家庭的回忆，因为他是一个在别人家里长大的孤儿，几乎从十五岁起就开始服繁重的兵役；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回忆，因为他整个的一生都很平庸无奇，单调乏味，他总是丝毫不差地去执行给他规定的义务。他其实并不特别笃信宗教，只是礼仪仿佛已把他身上尚存的一切人的天性和特征、一切激情和愿望，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吞噬殆尽。正因为如此，他在迎接这一隆重节日的时候，既不东奔西跑，更不感到焦急不安，也不为那令人苦恼而又完全无益的回忆所困扰，而是安静地、有条不紊地按照礼仪行事，这种礼仪正是完成责任和那永恒的宗教仪式所需要的。而且一般说来，他也不喜欢多动脑筋思考问题。看来，他从来不去考虑事物的内在涵义，但如果把指示下达给他，他就一丝不苟地认真去执行。如果明天命令他去完成一项完全相反的任务，他也会俯首听命、一丝不苟地去完成，就象过去完成与此相反的任务一样。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曾试图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结果遭到缧绁之灾。这次教训使他终生难忘，虽然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弄明白他究竟错在哪里，但他却从自己的遭遇中得出一条明哲保身的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思考问题，因为正象囚犯们私下里所说的那样，思考“不是他能胜任的事情”。由于盲目地遵奉宗教仪式，他甚至事先就怀着某种虔敬的心情看着他那头节日奶猪，他亲自把米肉馅儿塞进去，并加以烘烤(他很善于烘烤)；好象那不是一只普通的、随时都可以买到并加以烘烤的奶猪，而是一只特殊的节日用的奶猪。也许，他从小就已习惯在圣诞节这天看见餐桌上摆着一只奶猪，因而得出结论：这只奶猪在这一天是必不可缺少的；而且我相信，如果他在圣诞节这一天哪怕有一次吃不到奶猪，他会终生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懊悔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的。圣诞节以前，他总是穿着他那件旧上衣和旧裤子，尽管补得很整齐，但已经完全破旧了。看来，他现在怀着喜悦的心情正打算在节日那天庄重地把三、四个月以前发给他的那套新衣服穿在身上，那套衣服他一直细心地收藏在自己的箱子里，还未曾穿过。的确是这样。还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那套新衣服取出来，摊开，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刷了又刷，吹了又吹，弄得平平整整，并预先试穿了一遍。衣服似乎很合适；一切都很好，一排扣子扣得紧紧的，领子象用硬板纸做的一般，又高又硬，一直顶到颌下，腰部稍瘦，颇象一套军官服，于是阿基姆·阿基梅奇高兴地咧开嘴笑了，然后英姿飒爽地转身对着自己那面小镜子照了照，这面小镜子的金纸边是他在工余之暇亲手粘上去的。只有一个领钩钉得似乎有点儿不合适。阿基姆·阿基梅奇稍微想了想，于是决定移移位置，重新钉好后，又试穿了一下，这才觉得正合身。然后，又重新叠好，放到箱子里预备明天穿，他这才感到心安理得了。他的头本来已经剃得齐齐整整，但对着那面小镜子仔细端详了一番，又发现头发好象不大平滑，隐隐约约露出几根刚长出来的头发丝，于是他便赶快去找“少校”，要求后者按照规定的发型给他理得光光溜溜、漂漂亮亮的。其实明天谁也不会仔细察看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他所以要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以便在这一天尽到自己的全部责任。对于制服上的钮扣、肩章、领章的重视，从童年起就作为不容争辩的责任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又作为只有正派人才能达到的美的最高典范而铭刻在他的心间。在把这一切都处理完毕以后，作为狱室的囚犯头目，他盼咐把干草抱进来，并认真监督把干草撒在地上。其他狱室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但圣诞节前夕总是把干草撒在我们狱室的地上。把这一切都做完以后，阿基姆·阿基梅奇便开始做祈祷，然后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为了明天早晨能尽早醒来，立刻便象小孩子似的安然进入了梦乡。其他囚犯也都是这样。各个狱室的囚犯都比平时睡得要早得多。他们把晚上的活计都搁在一边，至于赌博更是连想都没人去想。大家都等待着翌日早晨的来临。

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早晨，天还未亮，晨鼓刚刚敲过，狱室的门便打开了，查点囚犯人数的值日官走进来向全体囚犯祝贺节日。囚犯们也同样亲切友好地回答他。匆匆忙忙地做完祈祷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和其他许多有肥鹅或奶猪的人一样，赶快到伙房去看自己的奶猪或肥鹅烤得怎么样了，在何处放着，等等。透过昏暗的晨雾，从我们狱室挂着冰雪的小窗口可以看见两个伙房里的六个炉灶上熊熊燃烧着的火光，那炉火还在天亮以前就点上了。在晨雾中，囚犯们披着短皮袄在院子里串来串去，大家都奔向伙房。也有少数人已去过酒保那里了，这都是一些性情急躁的人。一般说来，大家都举止端正，态度温和，而且显得格外彬彬有礼。平时的谩骂和争吵声，这时都听不见了。人人都明白今天是一个重要日子，是伟大的节日。有些人到别的狱室去向自己的狱友祝贺节日。似乎表现出一种类似友谊的东西。顺便说一句：囚犯们之间几乎毫无友谊可谈，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的友谊——那是不待说的了——而是个人的，即一个囚犯与另一个囚犯之间的友情。我们中间几乎完全没有这种友情，这是一个绝妙的特点：是狱外所没有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严厉而冷酷的，几乎很少例外，而且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司空见惯的风气。我也走出了狱室；天刚刚开始放亮，晨星暗淡起来，一层薄薄的寒气徐徐上升。厨房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一些和我相遇的囚犯都主动地、亲切地向我祝贺节日。我也同样答谢他们并向他们祝贺。其中有些人一个月以来一直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在厨房门口，我被一个披着羊皮袄的军事犯追上。我走到院子中央的时候他就认出了我，并向我喊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急急忙忙往厨房里跑。我站下等他。他是一个青年人，圆圆的面孔，眼神温和，跟任何人都很少说话，跟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而且从我入狱以来也一直没有注意过我；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站住，面带一种茫然而又怡然自得的微笑瞧着我。

"您有什么事？"看见他站在我面前微笑着，睁大两只眼睛瞅着我而又不开口讲话，我便不无惊异地问道。

"这还用问，过节嘛……"他嘟囔了一句，这时他看到再也无话可说了，便离开了我，急忙向厨房跑去。

我顺便在这里说一下，从此以后我和他再也没有相遇过，一直到我出狱，我们几乎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厨房里，在熊熊燃烧着的火炉旁边，是一片忙碌、碰撞和拥挤的景象。每个人都照看着自己的食物，炊事员正着手为囚犯们准备午餐，因为这天的午餐要提前开。然而谁也不肯开口先吃，尽管有些人很想吃，但他们在别人面前还是要遵守礼节的。大家都等待着神甫，只有在神甫到来之后才能开斋。天未大亮之前，就从监狱大门口不断传来班长呼喊炊事员的声音。这喊声不停地传来，几乎已持续两个小时了。这是呼唤炊事员去接收从本城各处送到监狱来的施舍品。送来的施舍品很多，其中有面包圈儿、面包、奶渣饼、油煎饼、千层饼、小油煎饼以及其他各种甜食。我相信，全城所有的商人和小市民家庭中的主妇没有一个不送面食到监狱来的，她们都向这些"不幸的人"和囚犯们祝贺伟大的节日。有的施舍品十分丰盛——送来了大量奶油甜面包，都是用最白最细的面粉做的。也有些施舍品十分简陋——一个只值一个铜板的面包圈儿和两个稍微抹了点酸奶油的黑面饼：这是穷人把他最后的一点食物拿来送给了这些可怜的人。一切礼品，不论是什么礼物和什么人送的，都以同样的谢意接

受下来。囚犯们接受施舍品时要脱帽鞠躬，祝节日愉快，然后把施舍品抬到厨房里来。当施舍品多到堆积如山的时候，便把每个狱室的头目叫去，由他们在各狱室之间平均分配。没有争吵，也没有谩骂；分得诚实、公平。至于分给我们狱室的这一份，我们自己再分一次；由阿基姆·阿基梅奇和另外一个囚犯来分，他亲手把礼品分开，再亲手分配给每一个人。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人嫉妒，大家都很满意；没有人怀疑施舍品会被私藏起来或分配不均。等把厨房里的事安置好以后，阿基姆·阿基梅奇便开始文质彬彬地、郑重其事地穿戴起来，个个钮扣都扣得整整齐齐，连一个领钩都不马虎，穿好以后，立即开始做祈祷。他祈祷的时间很长。已有很多囚犯在做祈祷，大部分都是中年以上的人。年轻人做祈祷的时间很短：只是在早晨起床时划划十字，就是在节日里也是如此。阿基姆·阿基梅奇做完祈祷后，走到我跟前，带着某种庄严的表情向我祝贺节日。我立刻请他喝茶，而他则请我吃他的奶猪。过了一会儿，彼得罗夫也跑到我这儿来，向我祝贺节日。他好象已喝过酒了，而且跑得气喘吁吁，但并没有说很多话，只是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仿佛等待着什么似的，不久就离开我到厨房去了。这时，军犯狱室里正准备接待神甫。这间狱室内部的布置与别的狱室不同：床铺都靠墙放着，而不是象其他狱室那样放在中间，因此这是全狱中唯一一间没有安设通铺的狱室。这样布置也许是为了在必要时，可以使囚犯们在这里集合。狱室中央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桌上放着圣像，并点着长明灯。神甫捧着十字架和圣水终于来了。在圣像前做完祈祷并唱完赞美歌以后，神甫便面向囚犯们站着，这时人人都怀着真诚的虔敬心情前来吻十字架。然后，神甫绕狱室走了一圈，并分洒圣水。在厨房里，他称赞了我们囚犯自己制作的闻名全城的面包，于是囚犯们立刻表示愿意送他两个刚出炉的又香又甜的面包；立即派了一名残废老兵给他送去。囚犯们怀着象欢迎十字架时的那种虔诚心情欢送走了十字架，少校和要塞司令这时也几乎同时赶到。要塞司令深受我们的爱戴和尊敬。他由少校陪伴着巡视了每个狱室，他向大家祝贺节日，然后到厨房尝了尝犯人喝的菜汤。菜汤十分香甜：为了庆祝这个节日，给每个囚犯配给了一磅牛肉。此外，还有一盘浇了很多奶油的黍米饭。把要塞司令送走之后，少校立即下令开始午餐。囚犯们都竭力避开他的目光。我们不喜欢他那从眼镜下面射出来的凶恶目光，就是在此时此刻，他仍左右环视着，寻找不守秩序的人，他总是希望能抓到一个有过错的人。

午餐开始了。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奶猪烤得特别好吃。我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少校走后不到五、六分钟，就有很多人喝醉了，而在五、六分钟以前，这些人几乎都还完全是清醒的。很多人的脸上都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三弦琴也拿了出来。一个小个子波兰人带着小提琴紧跟在雇主后面(他被雇用一整天)拚命地拉着快的舞曲。谈话声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有醉意。不过，这顿午餐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越轨行动就结束了。大家都吃得很饱。许多老年人和举止庄重的人都立刻躺下睡觉，阿基姆·阿基梅奇也是这样，他们好象认为在伟大的节日午餐之后，一定得睡上一觉似的。那个来自斯塔罗杜布的年迈的旧教徒仅仅打了一小会盹儿，就爬上暖炉，打开书本，祷告起来，他几乎一直不停地祷告到深夜。他认为囚犯们普遍纵酒是“可耻”的，因而当他看见这种现象时便感到痛苦。所有的契尔克斯人都坐在台阶上，怀着好奇而又有些厌恶的心情看着这些醉汉们。我碰见了努拉。“不好，不好！”他带着敬神者特有的那种愤懑情绪摇着头对我说，“哎，这可不好！真主会生气的！”伊赛·福米奇固执而又傲慢地在自己的小角落里点上蜡烛，开始干活，显然他想以此证明，他完全不认为这是节日。有的角落上赌博也开始了。赌徒们并不害怕残废老兵，不过为了提防值日官(尽管他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还是派了人去望风。这一天值日官来狱中巡视了三次。他一来，醉汉们就躲藏起来，赌场也被撤去，其实值日官本人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过问这些琐碎的小事。在这一天，一个人耍酒疯也被认为是小事。囚犯们渐渐狂饮起来。吵骂声也开始了。但清醒的人终究还是占大多数，那些醉汉总是有人照看的。所以狂饮的人便毫无节制地大喝起

来。卡津更是得意洋洋。他在自己的铺位旁边怡然自得地卖酒，他大胆地把一直藏在狱室后面雪堆里的酒搬到床铺底下，望着那些来找他买酒的顾客，他狡猾地嬉笑着。他自己很清醒，今天滴酒不进。他打算等节日过后，把钱从囚犯衣袋里都弄干净，再痛饮一番。每个狱室里都唱起歌来。酩酊大醉已变成令人昏厥的感情冲动，因此唱歌也就离流泪不远了。许多人抱着三弦琴，披着羊皮袄东游西逛，洋洋得意地拨弄着琴弦。特别部甚至组织了一个八人歌咏队。他们在三弦琴和吉他的伴奏下演唱得很出色。真正的民歌并不多。我只记得其中有一首他们唱得很带劲：

我，一个年轻女人，
傍晚去赴宴。

我在这里听到的是新填的歌词，这是我过去未曾听到过的。民歌的末尾新添了几句诗：

我那年轻的妻子，
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
汤匙洗得干干净净，
菜汤在盘子里盛；
窗儿明来几又净，
炉内馅饼香喷喷。

他们唱的多半是一些囚徒之歌，而且都很著名。其中有一首叫做《过去的时光……》——是一首幽默歌曲，它描写一个人过去如何享乐，过着逍遥自在的老爷式生活，如今却身陷囹圄；他过去如何用“香槟酒给奶油冻调味儿”，可现在却是：

顿顿给我白菜加凉水，
我吃起来也是狼吞虎咽。

还有一首流行歌曲，也很著名：

昔日我是快乐一少年，
我有钱财上万贯；
可惜失去钱万贯，
只身入狱受熬煎……

唱得也很悲切动人。还有一首真正的囚徒之歌，似乎也很著名：

天上曙光闪烁，
晨鼓敲过数声——
狱吏把门开，
书记来点名。

我们被高高的狱墙隔开，
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悲惨境遇，
上帝、造物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监狱里也不会潦倒死去。

另一首唱得更加悲切，然而曲调却很优美，大概是一位流放犯所作，甜言蜜语的词句有点令人腻烦，而且有点文理不通。我现在回忆起其中的几句：

我再也看不到
我那可爱的故乡；
现在我无辜受苦
被判处徒刑终生。
猫头鹰在屋脊上悲声啼叫，
啼叫声在森林中回荡萦绕，
我痛心、我悲伤，
再也不能返故乡。

这首歌在我们囚犯当中经常唱，但不是合唱，而是独唱。有的人在闲暇时，走到狱室外面的台阶上坐下，一只手托着腮，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拖着假嗓子唱起来。听着真叫人心酸。有些囚犯的嗓子相当好。

这时，天也快黑了。酗酒狂饮之中出现了忧愁、痛苦和令人昏厥的气氛，叫人看着难受。有的人一个钟头以前还是笑嘻嘻的，现在却喝得酩酊大醉，在旁边痛哭起来。另外一些人已经打过两次架了。还有一些人，脸色苍白，东摇西摆地到各狱室游逛，寻衅吵架。那些喝醉酒但却不爱惹事生非的人则东奔西跑地寻找知己，以便向他们诉说自己的苦衷，并把醉后的悲哀倾吐出来。所有这些可怜的人都想尽情地欢乐一番，愉快地度过这伟大的节日——然而，天哪！这一天对于每个囚犯来说几乎都是痛苦和悲哀的。每个囚犯仿佛都是在一种自欺欺人的期待中度过了这一天。彼得罗夫到我这儿来过两次。他喝得不多，因而整天几乎都很清醒。直到最后一小时，他都期待着一定会发生某种非同寻常的、令人高兴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尽管他没有说出口，但从他的眼神里却可以看得出来。他不知疲倦地从这个狱室串到另一个狱室。但是任何特别的事情也未发生，除了酗酒、醉后的狂言和醉醺醺的头脑以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了。西罗特金也穿着一件簇新的红衬衫在各狱室里游逛，他打扮得漂漂亮亮，洗得干干净净，也在悄悄地、天真地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各个狱室里渐渐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和令人厌恶起来了。当然，也有一些使人开心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我竟替所有的人感到难过，并怜悯起他们来，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忧伤和苦闷。瞧，这里有两个囚犯正在争吵谁应该请谁的客。显然，他们已争吵好久了，而且过去也曾这样争吵过。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怀有宿怨。他虽然口齿不清，但却抱怨个不停，竭力证明对方对他不公道：他有一件羊皮袄被卖掉了，而钱则被对方藏了起来，这都是去年谢肉节那天发生的事。除了这些，还因为别的什么事……发怨言的囚犯是一个肌肉发达的高个子青年，他并不愚蠢，显得谦恭温顺，但是当他喝醉酒时，却死乞白赖地要和人家交朋友，向别人倾吐自己的苦衷。他一边谩骂，一边又表示愿意以后同对方更加友好。对方是一个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的小伙子，圆圆的脸膛，显得滑头滑脑而且诡计多端。他喝得可能比他的伙伴多一些，但却没有醉。他性格刚强，而且以有钱著称，但现在不知为什么却故意不去刺激他那位不沉着的朋友，而是把那位朋友领到酒保那里，从而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那位朋友一口咬定说，他应该而且一定得请他喝酒，"如果你是一个诚实人的话。"

酒保对矮个子略有尊敬之意，而对那位不沉着的朋友却有点藐视，因为他不是自己花钱

买酒，而是让人家请他，于是便取出酒来，倒了一杯。

“不，斯捷普卡，你该我的，”那位不沉着的朋友看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这样说道，“因为你欠我的债。”

“我不跟你白费唇舌！”斯捷普卡答道。

“不，斯捷普卡，你这是胡说，”前者一边从酒保手里接过酒杯，一边说，“因为你欠我的钱；你没有良心，就连你的眼睛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借来的！你是个卑鄙的家伙，斯捷普卡，你就是这号子人；一句话，你是个卑鄙的家伙！”

“你唠叨个什么呀，酒都洒出来啦！人家尊敬你，买酒给你喝，你就快喝吧！”酒保呵斥那个不沉着的朋友道，“你总不能让我们为你一直站到明天呀！”

“酒我是要喝的，你嚷什么！祝你节日快乐，斯捷普卡·多罗费伊奇！”他双手举杯，恭恭敬敬地转身，向半分钟以前被他骂做卑鄙家伙的那个斯捷普卡微微一鞠躬：“祝你长命百岁，已经度过的时光，就不算了！”他喝下去，把嘴咂得直响，然后擦擦嘴，说道：“弟兄们，当年我是海量，”他带着十分傲慢的神气说，好象不是朝着某一个人，而是朝着大家说的。“可现在，年纪大啦，嗨，好汉不提当年勇。谢谢你，斯捷普卡·多罗费伊奇。”

“不客气。”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斯捷普卡；不管怎么说，你在我面前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坏蛋，我实话对你说吧……”

“我把你这个喝醉了酒的丑八怪，告诉你说吧，”斯捷普卡实在忍耐不住了，便打断他的话说，“你听着，而且要记住我的话：把世界劈成两半；一半归你，一半归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再也别让我给遇上。真讨厌！”

“这么说，你不还我钱啦？”

“还你什么钱，你这个醉鬼！”

“哎，等到来世，你自己会送上门来的——现在我不要啦！我们的钱是辛辛苦苦用劳动挣来的，是头上流汗手上磨茧得来的。到来世，你会为我那五个戈比而受罪的。”

“呶，见你的鬼去吧！”

“你跟我呶什么，还没套好马呢。”

“滚！滚蛋！”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你这个下流胚！”

于是他们俩又谩骂起来，比请酒前骂得更凶。

瞧，这边通铺上也坐着两个朋友：其中一个高高的个儿，身体结实而肥胖，红红的脸庞，活象一个真正的屠户。他因为感情冲动而几乎在痛哭。另一个体质孱弱，身子又瘦又细，鼻子倒挺长，从鼻孔里好象往外流着什么，他那两只小小的猪眼睛总是盯着地面。这个人善于耍手腕而且有学问；他当过司书，因此对自己的朋友颇有些傲慢，从而使后者感到十分不快。他们一整天都在一起喝酒。

“他对我粗暴无礼！”胖朋友一边说，一边用左手拚命地摇司书的头。这里所谓“粗暴无礼”，意思就是说打过人。胖朋友当过士官，暗自嫉妒自己的瘦朋友，因此两个人都竭力用最文雅的语言向对方炫耀自己。

“我告诉你，你也不对……”司书用独断专行的口吻开始说，竭力不看对方，却带着傲慢的神气一个劲儿地盯着地面。

“他对我粗暴无礼，你听着！”胖朋友打断他的话，同时更用力地摇晃着自己的好友。“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好朋友，你听见了吗？因此我才对你一个人说：他对我粗暴无礼！……”

“可是我要再次告诉你：你这种令人不愉快的辩解，可爱的朋友，只能在你头脑里形成一种耻辱！”司书用细弱而又有礼貌的声音反驳道，“你最好还是同意，可爱的朋友，你这种酒后狂言都是因为你那反复无常的个性引起的……”

胖朋友摇摇晃晃地向后退了几步，他醉意惺松地瞧着自鸣得意的司书，然后突然出人意外地举起大拳头用力朝司书的瘦小的脸上打去。于是这一整天的友谊就在这一拳之下结束了。可爱的朋友失掉了知觉，一头栽下通铺……

这时，特别部的一个囚犯(他跟我认识)走到我们狱室里来，他是一个性情十分温厚而又快活的小伙子，他很聪明，爱说笑话，但并无恶意，虽然从外表上看有些憨头憨脑。他就是那个在我入狱第一天，在厨房吃饭时要去寻找有钱的庄稼人，声称他有“自尊心”并同我一起喝过茶的人。他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嘴唇特别厚，多肉的大鼻子满是粉刺。他手里抱着一只三弦琴，漫不经心地拨弄着。一个个子特别矮小而头却很大的囚犯，象仆人似的紧跟在他身后，在此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其实，他也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这个人很奇怪，他生性多疑，一向沉默寡言而又一本正经；他在缝纫车间干活，显然，他要竭力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和任何人来往。可现在他喝得醉醺醺的，象一个影子似的跟在瓦尔拉莫夫身后。他跟在后边，显得焦急不安，挥动着胳膊，用拳头往墙上和通铺上捶打，而且几乎哭出声来。可是瓦尔拉莫夫却根本不理他，仿佛他身边没有这个人似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先前几乎根本就没有交往过；无论就职业来讲，还是就性格来讲，他们俩都毫无共同之点。他们犯的罪不同，而且也不住在一个狱室里。这个矮小的囚犯名叫布尔金。

瓦尔拉莫夫一看见我就咧着嘴笑了。我坐在暖炉旁自己的铺位上。他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想了想，身体晃动了一下，然后迈着不稳的步伐走到我跟前，得意洋洋地歪着身子，

单手叉着腰，轻轻地拨动琴弦，皮靴尖儿稍微点着地打着拍子，用咏叹调唱道：

圆圆的脸儿白又嫩，
唱起歌来象山雀般动听；
啊，我可爱的人儿，
她身上穿着绫罗绸缎，
打扮得漂亮又干净，
她是多么可爱又可亲。

可是，这首歌儿却使布尔金大为气恼，他挥动着双手，向大伙喊道：

“弟兄们，他撒谎！连一句真话都没有，全都是撒谎！”

“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老人家致敬！”瓦尔拉莫夫一边说，一边滑头滑脑、笑嘻嘻地瞧着我的眼睛，差一点和我接起吻来。他有点喝醉了。“某某老人家”这个称呼在西伯利亚一般平民中间是对某人表示尊敬时才用的，即使对二十多岁的人也可以这样称呼。“老人家”这个词表示尊敬，爱戴，甚至有奉承的意思。

“怎么，瓦尔拉莫夫，您一向可好哇？”

“天天都很好。谁要是喜欢过节，他一清早就会喝醉的，请您原谅！”瓦尔拉莫夫拉着长声说道。

“完全是撒谎，他又在撒谎啦 1”布尔金一边喊，一边绝望地用拳头捶打通铺。但瓦尔拉莫夫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理睬他了，这就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因为布尔金无缘无故地从一大清早就纠缠着瓦尔拉莫夫不放，理由是他认为瓦尔拉莫夫“总是撒谎”。他象一个影子似的到处尾随着瓦尔拉莫夫，挑剔他的每一句话，握紧拳头拼命地向墙上、通铺上捶打，几乎捶出血来。显然他很痛苦，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确信瓦尔拉莫夫“总是撒谎”！如果他头上有头发，他一定会由于伤心而把头发拔掉的。他仿佛承担了一种义务，要对瓦尔拉莫夫的一切行为负完全责任。好象瓦尔拉莫夫的一切缺点都会使他问心有愧似的。然而，可笑的是，瓦尔拉莫夫甚至连理都不理睬他。

“全都是撒谎，全都是撒谎，全都是撒谎！他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布尔金喊道。

“这有你什么事？”囚犯们笑嘻嘻地问他。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向您报告，我从前可漂亮啦，大姑娘们都很爱我……”瓦尔拉莫夫突然没头没脑地开始说道。

“撒谎！又是撒谎！”布尔金尖声打断他的话。

囚犯们哄堂大笑。

“我在大姑娘们面前可以为所欲为：我身穿红衬衫，呢绒裤，我象布蒂尔金伯爵那样舒舒服服地躺着，也就是说醉得象个瑞典人，总而言之——我可以随心所欲！”

“撒谎！”布尔金断然反驳道。

“那时候，我有一幢两层石头楼，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嘿，不到两年的工夫，我就把两层楼花光了，我只剩下一座没有门柱子的大门。钱嘛——象天上飞的鸽子那样，飞来又飞走了！”

“撒谎！”布尔金更加坚决地加以证实。

“前些日子我从这儿给我父母写了一封请求信，我想他们也许会给我寄些钱来。因为，我承认了我曾违抗父命，并说我是个不孝之子！自从发出那封信，到现在已是第七个年头了。”

“没有回信吗？”我笑着问他。

“没有，”他答道，但突然又笑了起来，而且越发把鼻子凑近我的脸，“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这儿有一个情妇……”

“您有情妇？”

“奥努弗里耶夫前些日子说：‘我的情妇虽说满脸麻子，不漂亮，可是你瞧她有多少件衣服啊！你的情妇虽说漂亮，可她却是个叫化子，天天背着口袋讨饭。’”

“是真的吗？”

“她的确是个叫化子！”他回答道，突然又悄声笑起来，全狱室的人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的确，大家都知道，他同一个女乞丐发生了关系，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只给过她十个戈比。

“嗯，结果呢？”我问道，希望能赶快摆脱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谄媚地看了我一眼，又温柔地说：

“您能不能为此赏给我几个钱，好买半瓶白酒喝？我跟您说吧，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今天一天都光喝茶啦，”他一边接钱，一边感动地补充说，“我大口大口地喝茶，噎得我都喘不过气来啦，你听我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就象瓶子里的水一样……”

当他接钱的时候，布尔金似乎精神错乱到了极点。他象一个绝望的人一样打着手势，几乎要哭出来。

“善良的人们！”他发疯似地向全狱室的人喊道，“你们都来看看他！全是撒谎！不管他说什么，统统，统统是谎话！”

“这有你什么事？”囚犯们看到他那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都感到惊奇，于是朝他喊道，“你这个人真是岂有此理!”

“我不许他撒谎!”布尔金喊道，这时他两眼冒凶光，拼命地用拳头敲打通铺，“我不许他撒谎!”

一阵哄堂大笑。瓦尔拉莫夫接过钱，向我鞠了一躬，扮着鬼脸，急忙走出狱室，他自然是找酒保去了。他好象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布尔金。

“喂，走吧!”他站在门口对布尔金说，好象布尔金确实对他有什么用处似的，“真是我的一根拐棍!”他一边让闷闷不乐的布尔金走在自己前面，一边用藐视的口吻补充说，又重新开始拨弄起琴弦来。

我干吗要描写这种腐化堕落的环境呢！这令人感到窒息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囚犯们已经躺在通铺上睡着了。这天夜里，他们说的梦话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多。角落里还有人在赌博。盼望已久的节日过去了。明天又将是平常的日子，又得出工干活……

第十一章　演戏

圣诞节第三天晚上，我们剧团举行了第一次演出。毫无疑问，事先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但所有这些筹备工作都由演员们自己担负了起来，以至我们这些局外人都不了解筹备工作是怎样进行的，甚至连演什么节目都不知道。演员们在这三天里既要出工干活，又要想方设法弄到更多的服装。巴克卢申遇见我时，由于高兴，把指头弹得噼啪作响。看来，少校的心情也相当好。不过，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剧团的情况。如果他了解的话，是正式得到了他的许可呢，还是他决心保持沉默，对囚犯们的演出计划只是佯装不知，或者认为只要一切尽可能做到有秩序就行了呢？我想，他对剧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不可能不了解，但他不打算干涉，因为他明白，若是禁止演出，事情就会更糟，囚犯们就会酗酒闹事，因而让囚犯们有点什么事情忙着，就会好得多。我猜测，少校所以这样考虑，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最自然、最正确和最明智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节日里如果不让囚犯们去张罗演戏或组织其他类似的娱乐活动，那么狱方就得为他们筹划别的娱乐方式。由于我们少校的思想方法和别人的思想方法截然不同，不难想象，他是知道剧团的存在的，而且他也允许演出。我若是说错了，那就算我造了大孽。象少校这样的人，他需要到处压制人，没收别人的东西，剥夺别人的权利，一言以蔽之——他不论来到哪里，那里就应该服服帖帖，奉公守法。在这方面他是闻名全城的。至于这种限制会在监狱里引起什么样的乱子来，那与他又有什么相干呢？闹事是要受惩罚的(类似我们少校这样的人都这样认为)，对于那些干欺骗勾当的囚犯就得严厉，迫使他们经常不断地、一丝不苟地遵守法律——这就是对他们的全部要求！这些平庸无能、只知奉公守法的人根本就不理解，而且也不能理解，如果只是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而不善于加以灵活运用，不理解其精神实质，那就只会引起骚乱，永远也不会有另外一种结果。“法律上明文这样规定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这样说，如果要他们给法律增添一些合理的细则和清晰的阐述，他们就会感到十分惊奇。他们中间许多人都觉得这样做是完全多余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自找麻烦，因而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值班长并没有跟囚犯们作对，而这正好是囚犯所需要的。我可以肯定地说，节日期间监狱里之所以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越轨行动，没有发生一次粗暴的争吵，没有发生一次盗窃事件，其原因就是由于演戏以及对准许演戏的感激心理。我亲眼看见，囚犯们如何规劝和压服那些狂饮和争吵的人们，唯一的理由就是：如果这样胡闹，狱方就会禁止演戏。值班长要囚犯们保证：一切都要有条不紊，每个人都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规矩。囚犯们欣然同意了，而且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只要能相信他们，他们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应当说，允许演戏对于狱方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这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连场地都用不着事先整理：戏台在一刻钟之内便可搭起来或拆除掉。戏只演一个半小时，如果上面命令停止演出，—转眼工夫就可以收拾干净。戏服藏在囚犯们的箱子里。不过，在叙述如何搭戏台和穿什么样的戏服之前，我要说说海报，也就是准备上演的节目内容。

其实，真正写成文字的海报是没有的。不过却有一张关于第二和第三个节目的海报，这张海报出自巴克卢申的手笔，是专门为那些前来观看我们剧团演出的军官先生们以及其他高贵的观众们预备的，他们早在演第一个节目时就来观看了。这些观众先生们当中经常来的是看守长，值班长亲自来过一次，技术教官也来过一次，这张海报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可以设想，狱中剧团的名声已在要塞甚至县城中远远地传播开去了，特别是因为本城没有剧院。据说，这个剧团是由一些业余爱好者组成的，而且只演那么几天。演出的小小成功都会使囚犯们乐得象小孩子似的，他们甚至感到演出给他们增添了光彩。我们这些囚犯彼此之间是这样想并这样说的："谁知道呢，也许那些高级长官们听到后也会来观看的；那时他们就会看到囚犯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士兵剧团，尽表演一些什么漂荡着的小舟啦，什么狗熊和山羊跳舞啦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才是演员，真正的演员，他们会演高等喜剧，这样的剧团就是在全城也找不到第二个。据说，阿勃罗西莫夫将军府上曾请人演出过一次戏，说是还要再演；他们在服装方面也许能胜过我们，至于台词和我们的演员相比，还不知谁高谁低呢！再说，若是传到总督耳朵里，——什么巧事没有啊？——也许，他也会亲自来看一看呢。要知道，城里没有剧院啊……"一句话，囚犯们的幻想，特别是在第一次成功之后，在过节的那些日子里，已经飞驰到了九霄云外，他们甚至幻想得到奖赏或缩短他们的刑期了，不过过不了一会儿，他们又几乎立即憨厚地嘲笑起自己来。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一些孩子，完全是一些孩子，尽管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年过四十。尽管没有海报，但演出的主要节目内容我已经知道了。第一出戏是《两个情敌——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①。

****

①《两个情敌——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是格里戈里耶夫编写的通俗喜剧，一八三一年起在彼得堡上演。一八三三年以后该剧本曾多次再版。

****

巴克卢申还在演出前一个礼拜，就在我面前夸口说，他本人将扮演菲拉特卡这个角色，他将会表演得十分精彩，就是在圣彼得堡大剧院里也不会看到这样的表演。他跑到各个狱室，夸大其词而且毫不感到羞耻地吹牛，有时甚至突然按剧情表演一个动作，也就是表演他自己扮演的那个角色的一个动作，——这时不管他表演得是否真正可笑，也会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不过，应当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约束自己并保持自己的尊严的：狂热赞美巴克卢申的滑稽动作和他讲述的故事的，或者是那些最年轻、最幼稚而又缺乏自持力的人们，或者是在囚犯当中那些已经牢固地建立起自己的权威的最有势力的人物，因为对他们来说，坦率地谈出自己的感想是无所惧怕的，不管这种感想幼稚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按囚犯们的说法，达到了最猥亵不堪的程度)。其余的人只是一声不响地听着他们议论，既不妄加评论，也不加以反对，竭力对演出保持一种冷淡的态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只是到后来，几乎到了演出那一天，他们才开始到处打听：将演出什么？我们的人将怎样表

演？少校怎么样？这次演出也会象前年那样获得成功吗？等等，等等。巴克卢申要我相信，所有的演员都是经过悉心挑选的，每个角色都由最合适的人来扮演。甚至连幕幔都弄到了。菲拉特卡的未婚妻由西罗特金扮演，“您会亲眼看到他穿上女人衣服将有多么好看！”他一边对我说，一边挤眉弄眼，把舌头咂得直响。乐善好施的地主太太身穿带皱褶的连衣裙，披着披肩，手里打着阳伞；乐善好施的地主登场时则身穿带肩章的礼服，手里拄着手杖。第二出戏是剧情紧张的《馋嘴克德里尔》。这出戏的名称使我深感兴趣，但不管我如何打听，事先仍不能了解其内容。我只知道，这出戏不是根据刊印的剧本，而是根据“手抄本”演出的；这个手抄本是从一位住在本城郊区的退伍士官那儿弄来的，那位士官显然曾在某军人剧场亲自参加过该剧本的演出。在我们的一些边远城镇和省城里，确实有些剧本似乎不大为外人所知，也许从来也没有刊印过，但是这些剧本好象是自己从某处跑出来似的，而且成为俄国境内某些地区民间剧院所依据的脚本。我顺便说一下：我说的是“民间剧院”，如果我们的戏剧研究者能对现有的、也许并非毫无价值的民间戏剧进行一番新的、十分认真的研究，那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我不相信我后来在我们监狱舞台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囚犯们自己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们的演出必定是以古代传说为根据的，而古代传说一经形成固定的形式和剧情，便根据人们的记忆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了。应该到士兵中间，工人中间，工业城镇，甚至到某些不知名的贫穷小城镇的市民中间去发掘，去探索这些剧本。它们还保存在乡村和省城的大地主家的仆人们手里。我甚至这样认为，有许多古老的剧本正是由地主的奴仆们用手抄方法传播到俄国各地的。许多过去的旧式地主和莫斯科的贵族老爷们都有过由农奴演员组成的戏班子。我们的民间戏剧艺术正是在这些戏班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这一特点是不容怀疑的。至于《馋嘴克德里尔》，不管我多想了解它的剧情，除了听说戏台上将会有鬼上场把克德里尔带进地狱以外，事先什么也没有了解到。克德里尔是什么意思呢，这究竟是俄国人的名字，还是从外国传来的？——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压场的一出戏叫《音乐伴奏哑剧》。当然，每一个节目都十分有趣。演员共有十五个——全都是动作洒脱而又富有朝气的人。他们为了把戏演好而忙碌个不停，有时躲藏在狱室后面悄悄地进行排练。总而言之，他们想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完全出人意外的演技使我们大家感到吃惊。

平常，天一黑，狱门就早早地上锁了。圣诞节期间则例外：天很晚才上锁。这是对剧团的一种特殊优待。节日期间，每天天黑以前，都派一名囚犯去请求看守长：“请允许演戏，晚一点上锁，”而且还要补充说：昨天晚上也演戏啦，狱门也锁得很晚，但任何越轨行为都未发生。看守长是这样想的：“昨天晚上确实没有发生任何越轨行为，现在既然他们自己担保今天也同样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说他们一定会自己照管自己的，这样就最保险不过了。要是不允许他们演戏，说不定(谁晓得他们呢？他们都是一群苦役犯呀！)他们会在一怒之下故意搞出什么鬼名堂来的！连看守也得跟着他们倒霉。”况且，站岗又是一件苦差使，既然演戏，何必不去看看呢，况且又不是一般的军人剧团，而是囚犯剧团，要知道，囚犯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人：去看看他们的演出倒也挺美。看守长任何时候都是有权去看的。

若是值日官来问：“看守长在哪儿？”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替自己辩解说：“到狱室查点人数和锁门去啦。”因此，在圣诞节期间，看守长每天晚上都允许演戏，而且直到很晚很晚才锁狱室。既然囚犯们事先知道看守长那里不会有障碍，他们也就心里踏实了。

六点多钟的时候，彼得罗夫来找我，约我一同去看戏。我们狱室里，除了切尔尼戈夫省的旧教徒和波兰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去了。波兰人只是在一月四日那天去看过最后一次演出，而且还是在多次向他们介绍说演得很好，很有趣，又无危险以后，才决定去看的。波兰人吹毛求疵的习惯一点儿也没有激怒囚犯们，一月四日那天他们都受到了很有礼貌的欢

迎，甚至把好位置让给他们坐。至于契尔克斯人，特别是伊赛·福米奇，看我们演戏，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伊赛·福米奇每次都拿出三个戈比来，看最后一场时，甚至往盘子里放了十个戈比，他脸上流露出怡然自得的神情。为了剧团的开销和给自己打打气，演员们决定接受观众们自愿捐献的钱，不管捐献多少都行。彼得罗夫向我担保：无论剧场如何拥挤，也要给我找个好座位，他的根据是我比别人有钱，因此更会慷慨解囊的，还说我比别人更加了解他们的表演。事情正象他说的那样。但是在这里，我要先把剧场和戏台布置的情况描述一番。

权充剧场的这间军犯狱室有十五步长。从院子走上台阶，从台阶走进过道，再经过过道进入狱室。这间长长的狱室我已经说过，它的室内布置和别的狱室不同：通铺是沿四周的墙安置的，中间空着。进门靠近过道的那一半留给观众，而和别的狱室相通的那一半则划为戏台。最使我惊奇的是戏台上的布景，横贯全室足有十步长。这幅布景富丽堂皇得使人惊叹，此外，幕幔上还绘有树木、亭台、池塘和星斗的油彩图案。这是用大家你一块我一块捐献出来的新旧亚麻布片拼凑起来的，是用囚犯们的破包脚布和衬衫凑合着缝制起来的，亚麻布不够的地方，便用从各办公室零星要来的白纸补上，这些彩画和装饰都是由我们的油画家绘制的，那个自诩为“布留洛夫”的 A 就是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个。效果更是令人吃惊，这样富丽堂皇的布景，甚至使那些最郁郁寡欢、最老成持重的囚犯都感到高兴，他们在观看演出时，对于一切都毫无例外地表示赞赏，就象是一些最狂热、最缺乏耐性的孩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十分高兴，甚至高兴到了吹牛的程度。照明是把几枝动物油蜡烛切成几段点燃起来。幕前摆着两条从伙房搬来的长凳，长凳前面放着三、四把从士官室借来的椅子。椅子是给最高长官们预备的。长凳是为士官们和工程技术队文书、技术员以及其他人员预备的，尽管他们也是狱方人员，但终究没有军官官衔，这是预备他们万一到狱室来看戏时坐的。也的确是这样：整个节日期间，从狱外来看戏的观众络绎不绝，只是有时来得多一些，有时来得少一些罢了，而到最后一次演出时，长凳上几乎是座无虚席。长凳后面是站着看的囚犯，他们为了对来宾表示尊敬，都把帽子拿在手里，身上穿着短皮袄或棉袄，尽管室内的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当然，留给囚犯们的位置是很少的。不仅如此，他们简直是人压着人，尤其是最后几排更是如此，通铺上也坐满了人，布幔两侧也站满了人，有的戏迷甚至竟在舞台后面打转转，绕到通往另一个狱室的地方，从幕后看戏。狱室的前一半十分拥挤，也许只有我不久以前在澡堂里看到的那种拥挤情景才能与之相比。进过道的门敞开着，那儿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度，但也站满了人。人们立刻把我和彼得罗夫让到前面去坐，几乎紧挨着长凳，我们在那里要比从后面看清楚得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我看做一位鉴赏家、内行，虽然我并没有在这样的剧场看过戏。在排练过程中，他们看到巴克卢申经常向我请教，对我很尊重，因而我现在很荣幸地得到了这个座位。囚犯们无疑都是一些虚荣心很重而又极其轻浮的人，但这都是故意装出来的。他们可能嘲笑我，因为在干活时我是他们的一个不好的助手。阿尔马佐夫可能带着蔑视的神情看着我们这些贵族，他在我们面前可以夸耀他会烧石灰。但在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嘲笑中还混杂着另一种成份：我们曾经是贵族，我们所属的那个阶层和他们过去的主人所属的那个阶层是一样的，关于他们的主人他们不会有好的印象。可是现在，在看戏的时候，他们却在我面前退让。他们承认，在这方面我比他们有判断力，比他们有见识。就连他们中间那些最不喜欢我的人(这我是知道的)现在也希望我称赞他们的演出，而且毫无自卑心地把好位置让给我。我现在一边回忆我当时的印象，一边在思考。我那时仿佛觉得——我记得这一点，——在他们那公正的自我评价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奴颜脾膝，有的只是自尊心。我国人民最崇高和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正义感和对正义的热烈追求。那种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不论值不值得，都想出出风头的作风，是与我们人民的性格不相容的。只要把外面那层非本质的硬壳剥掉，.不带任何偏见地、更细心地从近处去观察内部的实质，——就会从人民身上

看到一些你过去料想不到的东西。我们的贤哲们并没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人民。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恰恰相反：贤哲们自己也应该向人民学习。

我们刚动身去看戏的时候，彼得罗夫就天真地对我说，人们所以让我到前排去，还因为我会捐献更多的钱。没有规定入场价目：每人量力而行，随意解囊。当他们捧着盘子四面收钱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要往上面放点儿钱，哪怕半戈比铜币也行。他们既然让我到前排去坐，其部分原因就是预料我给的钱会比别人多，在这件事情上又表现出他们的多少自尊心啊！"你比我们有钱，所以让你到前面去，虽说我们在这儿是平等的，但你捐献的钱多，象你这样的观众，演员们会更加喜欢的，——应该把头等座位让给你，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尊敬，所以对于我们自己也应加以区别对待。"这里有多少真正高尚的自豪感啊！这并不是尊重金钱，而是尊重自己！一般说来，囚犯们对于金钱和财物并不特别重视，如果把囚犯当作一个总体，而不是区别看待的话。即使单独地看待他们，我也不记得他们当中有谁为了金钱而卑躬屈膝过。不错，有人也曾伸手向我要过钱。但他们要钱时与其说是为了钱，倒不如说是出于恶作剧，出于诈骗，或者说是出于幽默和天真无邪。我不知道，我是否把意思表达清楚了……不过我竟把演戏忘在一边了。现在言归正传吧。

在帷幕快要拉开以前，整个房间里呈现出一种异常欢快活跃的景象。那些从四面挤压过来的观众们的脸上闪露出有耐性和幸福的表情，他们等待着开演。后面几排人你推我、我挤你地晃动着。不少人从伙房里搬来一些粗大的劈柴：他们好歹把劈柴一块一块地竖在墙根下，然后站上去，把双手搭在站在前面的人的肩上，就这样不变换姿势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自己的位置感到十分满意。另一些人则把脚踩在暖炉底下的踏磴上，倚扶着前面的人，始终这样支撑着。这是紧靠后墙站着的几排人。戏台两侧也挤满了人，他们爬上通铺，站得比乐师还高。还有更好的位置：有四、五个人竟爬上暖炉，趴在上面，从那儿往下看。真舒服呀！那些来迟了的或找不到好位置的人，便拥挤在对面墙的窗台上。每个人的动作都很轻，显得规规矩矩。每个人都想在先生老爷们和观众们面前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十分天真的期待神情。场内十分闷热，人人都满脸是汗，面色通红。在那布满皱纹、打着烙印的前额和双颊上，在那时而闪射出可怕的火焰的眼睛里，在那直到此时都一直郁郁不乐的人们的目光中，闪耀着一种孩童般的愉快、高兴、欣喜若狂的奇异光芒。大家都不戴帽子，因此我从右边看上去，那些头都好象是刚刚剃过似的。这时从台上传出一阵忙乱、嘈杂的声音。帷幕就要升起了。乐队也演奏起来……这个乐队可是值得一提的。侧面的通铺上坐着八名乐师：两把小提琴(一把是监狱的，另一把是从要塞某人那儿借来的，但演奏者却是囚犯)，三把三弦琴(都是自制的)，两只吉他，还有一面小手鼓代替大提琴。小提琴拉得吱吱呀呀，十分难听，吉他弹得更糟，但三弦琴却弹得非常好。他们用手指拨弄琴弦的敏捷程度，简直可以和最麻利的魔术师相比。演奏的都是舞曲。在弹到最轻快的旋律时，演奏者便用指骨敲打三弦琴的传响盘；声调、风格、手法、乐器的使用、曲调的转换等等——这一切都是囚犯们自己独创出来的，有其独到之处。吉他演奏者当中有一人十分精通自己的乐器，他就是那个杀死父亲的贵族。至于那面小手鼓，敲得简直使人感到惊奇：小手鼓一会儿在手指上旋转，一会儿又用大拇指敲打着鼓面，发出急促、响亮，均匀的敲击声，过了一会儿，这清脆响亮的声音突然又象往盘子里倒豌豆似的，变成无数细小而稠密的沙沙声。最后又出现了两只手风琴。说句老实话，在此以前，我还不晓得用普通民间乐器能演奏出这么好听的曲调；声音的和谐、协调，尤其是对乐曲本身的理解以及演奏的特点，都是十分惊人的。我这时才第一次完全了解到，在富有人生乐趣的欢快活泼的俄罗斯舞曲里竟蕴藏着这么多富有人生乐趣的欢快活泼的东西。帷幕终于升起来了。所有的人都微微动了一下身子，换了换脚，后面的人踮起脚尖站着看：有人从劈柴上摔了下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张着嘴，睁大眼睛，场内笼罩着一片寂静……演出开始了。

站在我旁边的是阿列伊、他的哥哥和一群契尔克斯人。他们都非常喜欢看戏，每天晚上都来。我不只一次地察觉到，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鞑靼人以及其他人都非常喜欢看热闹。挤在他们旁边的是伊赛·福米奇，帷幕刚一升起，他便全神贯注地看上了，十分天真和贪婪地期待着神奇和欢快场面的出现。如果他的期望得不到实现的话，他会感到非常悲伤的。阿列伊那可爱的脸庞上闪耀着孩子般的十分纯洁的喜悦，我承认，我一看见他就感到特别高兴；我还记得，每当演员们作出一个可笑而灵巧的动作时，每当大伙哄堂大笑时，我便立刻不由自主地转身去看阿列伊的脸。他没有看见我：他哪里还顾得上看我呢！我左边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囚犯，他已经上了岁数，平时总是愁眉不展，总是对什么都不满意，对什么都发牢骚。他也注意到了阿列伊的表情，我看见他曾几次面带微笑转过脸去看阿列伊：他多么可爱呀！他称呼他为“阿列伊·谢苗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称呼阿列伊。《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开始了。菲拉特卡(巴克卢申饰)演得确实好极了。他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十分逼真。显然，他对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进行过思考。他善于赋予每一句空洞的话、每一个姿势以意义，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完全谐调一致。除了刻苦努力、悉心钻研外，还得有一种十分真诚的天真活泼和质朴自然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看见过巴克卢申，那你就一定会同意，他是一位真正富有天赋和才华的演员。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一些大剧院里曾不只一次地观看过菲拉特卡这个角色，因此我敢断言——两个都市里扮演菲拉特卡这个角色的演员都比不上巴克卢申。和他比较起来，他们扮演的农民都不是真正的俄国庄稼汉，而是外国农民。他们都过分注意摹仿农民的外表。此外，巴克卢申还怀有一种强烈的好胜心：大家知道，第二出戏里的克德里尔这个角色将由囚犯波采伊金扮演，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个演员比巴克卢申更富有才华，于是巴克卢申便象一个小孩子似的为此感到难过。最近几天，他曾多次到我这儿来发牢骚。在开演前两小时，他兴奋得发狂。观众们被逗得哄堂大笑，并向他喊道：“真棒，巴克卢申！真是好样的！”这时，他脸上泛起了幸福之光，眼睛里闪烁着真正的灵感的光辉。在表演同米罗什卡接吻那一场，当他让米罗什卡先“擦干净鼻子！”的时候，他自己也擦了擦鼻头，——真是让人看着好笑。观众们一个个都捧腹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但是更使我感到有趣的却是观众；他们都敞开胸怀，忘我地沉湎于欢乐之中。叫好声越来越高。有个囚犯用肘子轻轻撞着旁边的伙伴，急忙把自己的感想告诉给对方，也不看站在他旁边的是谁；另一个囚犯在看到某一可笑的场面时，突然兴高采烈地把身子转向人群，迅速地环视着大伙，仿佛想让大伙都笑似的，然后挥挥手，立刻又贪婪地把脸转向舞台。也有的人把舌头咂得直响，弹着手指，怎么也站不稳，然而又不能走动，只得换换脚站好。戏快演完时，大家的欢快情绪达到了顶点。我这样叙述，一点儿都没有夸张。请想想看，平素是监狱、脚镣、囚禁、永无终期的悲惨岁月、象阴雨连绵的秋天一样单调而乏味的生活——突然间，这些受压抑、被监禁的囚徒可以松口气痛快一阵了，他们忘掉了沉痛的恶梦，组织起一个剧团，而且是一个怎样的剧团啊：一个使全城的人都引以自豪和感到惊愕的剧团，——好吧，让全城的人都来看看我们这些囚犯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吧！不用说，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有趣，就拿服装来说吧，他们看着就觉得新奇得要命，比方说，他们看到万卡·奥特佩托伊，或者涅茨维塔耶夫，或者巴克卢申，现在竟穿起了与他们多年来每天所穿的迥然不同的衣服。“他可是一个囚犯呀，就是那个每天戴着脚镣哗拉哗拉响个不停的囚犯呀，现在居然身穿燕尾服，头戴圆顶礼帽，披着斗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俨然是一个公职人员了！他还带着假胡须和假发。瞧，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条红手帕，还给自己扇风呢，他正在扮演一位老爷——活象是一位真正的老爷呀！”大家都非常兴奋。那位“乐善好施的地主”穿着一身军官制服出场了，不错，制服有些破旧，但却佩戴着肩章，头上戴着有帽徽的制帽，这样就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效果。这个角色有两个人想扮演——人们也许不相信吧？——两个人都象小孩子似的争着要演，他

们俩都想穿着带肩章的军官制服登台上场！其他演员把他们俩劝开，最后经多数表决确定由涅茨维塔耶夫扮演这个角色，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漂亮，更好看，更象一位老爷，而是因为涅茨维塔耶夫曾向大家保证说，他拿着手杖出场，这么一挥，在地上这么一划，准象一位真正的老爷和天字第一号的花花公子，而万卡·奥特佩托伊是演不象这个角色的，因为他从未见过真正的老爷。的确，当涅茨维塔耶夫挽着夫人的胳膊在观众面前出现时，他用那根不知从哪里拣来的芦苇杆做的手杖在地上迅速而敏捷地比划着，显然认为这是最高文明、豪华富贵和最时髦的象征。大概，他幼小时，当他还是一个赤脚家僮的时候，曾看见过一位身穿华贵服装的老爷，手里拿着手杖，使他入了迷，他也很想挥舞挥舞那根手杖，于是这个印象就永远不可磨灭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了；如今他已经三十岁了，又回忆起了那段往事，以便用它来迷惑和俘虏全体观众。涅茨维塔耶夫全神贯注在他所扮演的角色上，他目不斜视，说话时连头也不抬，使得观众们觉得他只是盯着自己手杖的尖儿。慈善的地主婆也演得异常出色：他出场时身穿一件很俗气的旧连衣裙，细看起来是一件破衣烂衫，颈项和胳膊都裸露在外，胭脂和口红擦得叫人看着害怕，头戴一顶细棉布睡帽，用绳子系在下颏下，一只手里拿着一把阳伞，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带画儿的纸扇，而且不停地扇着。观众用一阵哄堂大笑欢迎了这位地主婆的出场，地主婆自己也不禁笑了几次。地主婆是由囚犯伊万诺夫扮演的。西罗特金打扮成一位女郎，显得十分好看。主题歌唱得也很好。总之，这出戏演得使大家感到非常满意。没有人吹毛求疵，而且也不会有人吹毛求疵的。

乐队又奏起了前奏曲：《家啊，我的家》；帷幕重又徐徐升起。这一出是《克德里尔》。克德里尔颇有点类似拜伦笔下的唐·璜①；起码有一点是相似的：主仆二人最后都被魔鬼带进地狱去了。

****

①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人物。《唐·璜》是他的一部未完成的长诗，唐·璜是长诗中的主人公。

****

戏只演了一幕，显然这只是一个片断，因为头和尾都已失传。其实，剧情纯系无稽之谈，没有一点意思，事情发生在俄罗斯某地一家旅店里。店主人把一位身穿大衣、头戴破圆筒礼帽的老爷领进店里。他的仆人克德里尔一只手提着皮箱，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烧鸡，跟在他后面。克德里尔身穿羊皮袄，戴一顶仆人帽。他是一个贪吃的家伙。这个角色是由巴克卢申的竞争者波采伊金扮演的;老爷是由在第一出戏里饰慈善地主婆的那个伊万诺夫扮演的。店主人(由涅茨维塔耶夫扮演)事先警告说，屋内有鬼，然后就下场了。这位老爷愁眉不展，忧心忡忡，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说他早就知道有鬼，然后命令克德里尔打开行囊，预备晚餐。克德里尔是个胆小鬼，又是个贪吃的家伙，一听说有鬼，便吓得脸色苍白，筛糠似的打颤。他本打算逃跑，但又惧怕主人。他非常贪嘴。他贪淫好色，十分蠢笨，诡计多端却又胆小如鼠，他随时随地都准备欺骗他的主人，但又害怕他。他是一个绝妙的奴才的典型，在他身上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可以看出黎波列格①的性格。

****

①唐·璜的仆人。

****

演员演得的确好极了。波采伊金确实有才华，依我看，他是一位比巴克卢申更出色的演员。当然，第二天，在我遇到巴克卢申的时候，我并没有把我的看法全部告诉他：那样他会感到不快的。扮演主人的那个囚犯演得也不坏。他讲了一大堆十分吓人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废话，但他发音清晰，动作灵敏，手势也恰如其分。当克德里尔忙着收拾皮箱的时候，主人若有所思地在戏台上踱来踱去，然后大声宣称，今天晚上是他旅行的终点。克德里尔仔细听着，做

着鬼脸，面向一边说话，而且每句话都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他并不同情自己的主人，但却注意地听着，他很想弄清楚究竟有没有鬼，于是他也参与谈话并提问。最后，他的主人向他宣布说，过去有一次当他遇到灾难时，他曾祈求过地狱帮助，于是魔鬼便把他从苦难中搭救出来；今天劫数已到，根据契约，魔鬼可能会出来把他的灵魂带走。克德里尔一听此话，显得十分害怕，但主人却强打起精神，命令他去预备晚餐。一听见叫他预备晚餐，克德里尔便又活跃起来，又是拿鸡，又是拿酒，有时还撕一小块鸡肉塞进自己嘴里先尝尝。观众哄堂大笑。这时门吱纽响了一声，风把百叶窗吹得沙沙作响，克德里尔筛糠似的打起颤来，于是迅速地、几乎是下意识地把一大块鸡肉塞进嘴里，但又咽不下去。又是一阵哄堂大笑。“预备好了没有？”——老爷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喊。“这就，老爷……我这就给您预备好了，”克德里尔一边说，一边在桌旁坐下，镇静自若地开始往嘴里填食物，把腮帮子填得都鼓了起来。观众显然很欣赏这个仆人的狡诈、伶俐，他把主人当作傻瓜蒙在鼓里。应当承认，波采伊金确实是值得喝彩的。那句“这就，老爷……我这就给您预备好了”，他一字一板说得好极了。他坐在桌旁，开始贪婪地吃着，主人每挪动一步，他都吓得浑身发抖，担心主人发现他在捣鬼，主人稍一转身，他便拿着烧鸡往桌子底下躲藏。最后，他终于初步满足了自己的胃口，这时才想起自己的主人。“克德里尔，你预备好了没有？”——主人喊道。“预备好啦！”——克德里尔很敏捷地答道，这时才想起几乎没给主人剩下什么。盘里只剩下一只鸡腿了。主人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什么都没有觉察到，呆呆地坐在桌旁，而克德里尔则手拿餐巾站在他背后。当克德里尔回转身来面向观众，朝主人挤眉弄眼时，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个鬼脸，都逗引得观众忍不住哈哈大笑。主人刚开始用餐，魔鬼就出现了。戏再往下演就叫人有些莫名其妙了，鬼的出现未免太不合乎人之常情了：戏台侧面的一道门被打开，于是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怪物，它没有面孔，头上顶着一个燃着蜡烛的灯笼，另一个怪物也是头上顶着燃着蜡烛的灯笼，手里还拿着一把镰刀。为什么顶着灯笼，为什么拿着镰刀，鬼为什么穿白衣服？这一切谁也不能够解释。不过，谁也不去想这些事。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位老爷十分勇敢地把身体转向魔鬼，并朝它们喊道：他已经作好准备让它们把他带走。克德里尔象个兔子似的吓得直往桌子底下钻，尽管他十分害怕，但他却没有忘记从桌上抓起酒瓶。魔鬼暂时消失了，克德里尔从桌底下爬出来；但当主人刚又开始吃烧鸡时，三个魔鬼又出现在室内，从身后抓住老爷，把他带往地狱里去了。“克德里尔！救救我呀！”——主人喊道。但克德里尔哪里还顾得上他呢，他这次把酒瓶、盘子甚至面包都藏到桌子底下。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啦，魔鬼和主人都不见了。克德里尔从桌下爬出来，四下张望着，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狡猾地眯缝起眼睛，坐在主人的位置上，一边向观众点头，一边低声说道：

“好啦，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啦……老爷没有了！……”

大家都为他失掉了主人而哈哈大笑；这时他鬼鬼祟祟地转向观众，愈加洋洋得意地做着眉眼，同时压低声音补充道：

“魔鬼把主人抓走了！……”

观众欢喜若狂！除了主人被魔鬼抓走不提，台词说得那么好，动作显得那么狡黠奸诈，鬼脸扮得那么滑稽可笑，这一切确实让人不能不为之鼓掌、喝彩。但克德里尔好景不长。他刚刚把酒瓶摆上，斟满酒杯，正要举到唇边去时，魔鬼突然又回来了，踮着脚尖悄悄地从他身后走了出来，从侧面一把将他抓住。克德里尔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但由于胆怯，他不敢回头看。他也不能自卫：手里拿着酒瓶、酒杯，他不忍丢下这两样东西。他惊吓得张着嘴静坐了片刻，瞪大眼睛看着观众，脸上那种惊恐万状的表情显得十分滑稽可笑，这时完全可以

给他画一幅像。最后，魔鬼把他提起来，拖走了；他手里抓着酒瓶，两脚乱踢，嘴里不停地喊叫着。从后台继续传来他的喊叫声。幕落，大家哄然大笑，人人欣喜若狂……乐队开始演奏卡马林舞曲。

人们开始安静下来，隐隐约约听得见演奏声，但转瞬间曲调越来越高，节奏越来越快，三弦琴的响板弹得当当直响……这是卡马林舞曲到了最高潮，如果格林卡能到我们监狱来听听这次演奏，那该有多好啊！一幕音乐伴奏哑剧开始了。在哑剧表演过程中，卡马林舞曲一直响个不停。舞台上的布景是一间农舍的内室。室内坐着磨坊主人和他的妻子。磨坊主人在一个角落里修理马具，他的妻子则在另一个角落里纺线。妻子由西罗特金扮演，磨坊主人由涅茨维塔耶夫扮演。

应当指出，我们的道具是相当简陋的。无论在这出戏里，还是在前一出戏里，甚或在其他几出戏里，您看到的与其说是真正的布景，毋宁说是您以自己的想象加以补充的布景。随便将一块破地毯或马披子拿来当作后墙，侧面是用几块破布权充屏风。左边什么也没有，所以连通铺都能看得见。但是观众并不苛求，宁愿用自己的想象去加以补充。囚犯们是很善于这样做的："既然说这是花园，那你就把它看做花园好了，说是房间，就是房间，说是村舍，就是村舍——是什么都可以，用不着吹毛求疵。"西罗特金穿上少女的服装，真是妩媚动人。观众们已经在低声啧啧称羡了。磨坊主人修理好马具，抓起皮帽子，拿起皮鞭，走到妻子跟前用手势告诉她，他要出去，当他不在家时，她要是让谁进来，他就……他指指皮鞭。妻子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根皮鞭，她似乎很熟悉：这位少妇大概常常背着丈夫别有所爱。丈夫下场。丈夫刚走出门，妻子便在他身后挥起拳头骂他。这时有人敲门；门开了，一位邻居，也是开磨坊的，走了进来，他是一个留着胡须、穿着短袄的庄稼汉。双手捧着一条红手帕作为礼物送给她。少妇笑了笑，邻人刚要拥抱她，又传来一阵敲门声。往哪儿躲藏呢？她匆匆忙忙把他藏在桌子底下，自己则坐下来纺线。又来了一个崇拜者：这是一个穿军服的司书。一直到这时候这幕哑剧演得是完美无疵的；手势动作都准确无误。当您观看这些业余演员表演的时候，您甚至会感到诧异，会不由自主地想道：在我们俄国，有多少多才多艺的人都被白白地毁灭在牢房和令人痛苦的厄运之中了啊！扮演司书的这个囚犯，大概曾在外省剧院或家庭戏班子里登台演出过，因此他觉得我们所有的演员，没有一个懂行，没有一个会按舞台上的步伐走台步。因此，据说他是按照古典戏剧中的步法走台步的。在向前跨出一大步，另一条腿尚未挪动之前，突然停下来，把头和全身向后一仰，傲慢地向四周一看——然后再跨出第二步。如果说这种走台步的方法在古典戏剧中就是可笑的，那么在这出滑稽剧里，这位身着军服的司书这样一走，就显得更加滑稽可笑了。但我们的观众似乎认为这样走台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这位身材瘦长的司书这样迈大步在台上走动，也就无可非议了。司书刚刚走到台中央，便传出一阵敲门声：女主人又慌乱起来。把司书藏到哪里呢？让他钻进那个尚未加锁的大箱子里吧。于是司书钻进大箱子里，女主人便把箱盖盖上。这时又来了一位稀客，也是情人，不过他是一位特殊人物。这是一个婆罗门教的祭司，还穿着袈裟。这时，观众发出一阵不可抑制的哄笑声。扮演婆罗门教祭司的是一个叫科什金的囚犯，他演得好极了。他生就一副婆罗门教徒的相貌。他以手势表达自己陷入情网的程度。他双手向上举起，然后放在胸前，搁在心窝上，但当他刚要表示自己的痴情时，——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从门声敲得很响这一点可以听出是主人回来了。受惊的女主人手忙脚乱，而婆罗门教祭司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跑来跑去，请求把他藏起来。她于是赶忙让他站在衣柜后面，而自己却忘了去开门，又跑回去纺线；她只顾纺线，也未听见自己丈夫的敲门声；由于惊吓，她用手指拈着其实并不在她手中的线，转动着手中并没有的纺锤，真的纺锤却掉在地板上了，她并没有拾起来。西罗特金把受惊吓的动作也表演得很逼真、很成功。这时主人一脚把门踢开，

手里拿着皮鞭奔向自己的妻子。他一切都看见了，他曾在暗中窥探她，于是做了个手势表示她把三个人都藏了起来，接着便开始寻找被藏起来的人。第一个找到的是邻人，一顿拳打脚踢把他赶了出去。吓得胆战心惊的司书想要逃跑，便用头顶开箱盖，却恰巧暴露了自己。主人用鞭子抽他，这时这位钟情的司书也顾不得迈古典剧中的台步了，而是四处乱跑。只剩下婆罗门教祭司了，主人寻找了好久，最后在墙角衣柜后面把他找了出来，这时他很有礼貌地向主人鞠躬，主人扯着他的胡须，把他拉到舞台中央。婆罗门教祭司试图自卫，便喊道："天诛地灭的东西，天诛地灭的东西！"(这是哑剧中仅有的两句话)，但主人并不理会他，仍随心所欲地对付他。他的妻子意识到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挨鞭子了，便丢开正纺着的线和纺锤，向门外跑去：一跤跌了个嘴啃泥，囚犯们于是哄堂大笑起来。阿列伊眼睛也不看我，只顾拽着我的胳膊对我喊道："瞧！好一个婆罗门教徒，婆罗门教徒！"——他自己已笑得前仰后合，站都站不稳了。幕落。开始演下一个节目……

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剧目都一一加以描述了。下面还有两三出戏，全都很有趣，而且滑稽可笑。虽说这些戏不是囚犯们自己编出来的，但其中每一出他们都花费了一定的心血。几乎每个演员都临时增加了自己的动作，第二天晚上演出时尽管同一角色还是由同一位演员来扮演，但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改动。最后那幕哑剧是带有幻想性的，因此以舞蹈收场。这是埋葬一个死者。尽管婆罗门教祭司率领众弟子在灵柩前诵读了各种咒语，但也无济于事。最后传出"落日"的经曲，死者复活了，大家便兴高采烈地开始跳起舞来。婆罗门教祭司也同死者一起跳舞，但他跳的是婆罗门舞。全部节目到此结束，次日晚上再演。散场时囚犯们一个个都喜笑颜开，高高兴兴，称赞演员，感谢值日官。听不到争吵声。大家似乎都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感到很幸福，晚上睡得也特别香甜，大家几乎都是怀着平静的心情入睡的，一一这都是因为什么呢？况且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幻觉，而完全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这些可怜的人仅仅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意志过一小会儿人类的快乐生活；哪怕只让他们过一小时非监狱的生活，哪怕只有几分钟，人在精神上也会有所变化的……现在已是深夜了。我打了一个冷颤，突然醒来，看见那个老头仍在暖炉上祷告，而且还要一直祷告到天亮；阿列伊安安静静地睡在我身旁。我回想起他入睡时还一直在笑，并和他的哥哥谈论着戏中的情节，于是我不由自主地端详着他那安详的孩子般的面孔。我渐渐回想起所发生的一切：最后一天，过节，这一个月的生活……我在惊悸中微微抬起头来，借着狱室里动物油蜡烛所发出的暗淡而摇曳不定的光亮，望着我那些正在熟睡的难友们。我望着他们那苍白的面孔，望着他们那破破烂烂的铺盖，望着这群无依无靠、衣着褴褛、象乞丐一样贫穷的难友们(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们)，我似乎想要使自己相信，这一切并不是一场噩梦的继续，而是真正的现实。这的确是真正的现实：我听见有人在呻吟，有人在用力抡胳膊，传出一阵脚镣的当啷声。另一个人在睡梦中突然惊醒，开始说梦话，老爷子正在暖炉上为所有的"正教徒"祷告，于是我又听见他那平静而均匀的、拖得很长的祷告声："主啊，基督主啊，保佑我们吧！"……

"我毕竟不会永远呆在这里，我只能呆上几年。"我这样想着，又把头倚在枕头上。

第二部

第一章　医院

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因病住进了我们的军医院。这所军医院孤零零地座落在离要塞半俄里远的地方，这是一排很长的被粉刷成黄色的建筑物。夏天，粉刷这座建筑物时，需要使用

大量的赭石粉。医院大院里有很多办公用房、医务人员住房以及其他用房。正面一排房屋全是病房。病房很多，但供囚犯住的只有两间，而且总是挤得满满的，特别是一到夏天，常常需要让病床紧挨在一起。我们这两间病房里住满了各种“不幸的人”。常来这儿住院的有我们监狱里的囚犯，有被关押在各禁闭室里的各种待审军事犯，已判刑的、尚未判刑的以及解往外地而路经这里的犯人，还有来自感化连的士兵。说起感化连来，那可真是一个奇妙的所在，到那里去接受感化的都是一些在各营队犯了过错或被认为不大可靠的士兵，经过两、三年的感化后，离开感化连时，他们往往都变成了天下少见的坏蛋。患病的囚犯一般都是在早晨向军士陈述自己的病情。患者的名字立即被登记在一个簿子上，然后带着这个簿子，由卫兵押送着去营队卫生所就诊。在卫生所里，医生对来自要塞各分队的患者进行初步诊断，然后把确实患病的囚犯送进医院。我在簿子上登了记，到了下午一点多钟，等所有的囚犯都外出干活时，我便被送进医院。患病的囚犯一般都要尽量多带些钱和面包，因为医院当天不供应饭菜，此外还要带上自己的小烟袋、烟荷包、火石和火镰。后面说的这几样东西都仔细藏在皮靴筒里。我一走进医院大院，便不禁对我们囚犯生活中这种新的、我还不大熟悉的变化产生了某种好奇心。

那天天气温暖、阴沉而郁闷——在这样的日子里，象医院这样的地方，就显得格外冷漠无情，令人感到烦恼和不快。我由卫兵押送着走进候诊室，候诊室里放着两个可供进行浴疗的铜盆，已经有两个患病的待审犯人在候诊了，他们也是由卫兵押送来的。一位医师走进来，带着权威的神气懒洋洋地把我们打量了一番，然后更加懒洋洋地去向值班医生报告。医生很快就来了，给我们做了体检；他态度十分和蔼，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病历”，上面填写着我们的名字。至于下一步登记病情、开药方、规定饮食等事宜，则由专门负责囚犯病房的主治医师去办理。我以前就听人说过，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是赞不绝口的。住院前，当我问及医院里的情况时，他们都回答说：“有医生照料，就用不着父母操心了！”这时我们都换了衣服。我们来时穿的衣服和内衣都被脱下拿走了，给我们换上了住院服，此外还给我们每人发了长统袜子、拖鞋、睡帽和很厚实的棕色呢绒睡衣，睡衣的里子似乎是粗麻布做的，又象是涂着一层油污。总之，睡衣脏极了，不过，只有等我穿上它以后，才能对它作出充分的估价。然后带我们去囚犯病房，囚犯病房在那条很长的轩敞豁亮的走廊的一头。从表面上看，到处都干干净净，使人感到很满意；头一眼所看到的一切都很亮堂。不过，这也许只是我离开监狱后的最初感觉罢了。那两位待审犯人向左边的病房走去，我走进右边的一间。房门上挂着铁栓，门口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旁边还有一个副哨。二级军士(医院守卫队的)下令让我进去，于是我来到一间又长又窄的房间里，两边靠墙放着病床，约有二十二、三张，其中有三、四张是空着的。病床是木制的，被涂成了绿色，我们每个生长在俄国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床，——它注定是不可能没有臭虫的。我的床位在犄角上，紧靠着窗户。

我已经说过，在这儿住院的也有从我们监狱来的囚犯。其中有几个已认识我，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以前曾经看见过我。但大多数都是待审犯人和来自感化连的士兵。重病号即真正起不了床的，并不很多。其他的都是一些轻病号或已经痊愈的病人，他们有的坐在病床上，有的在两排病床中间的空地上来回踱步。病房里有一种特别窒息人的气味。室内的空气被各种恶臭味和药味所污染；屋角上生着火炉，几乎整天不灭。我的病床上蒙着一个条纹布布套。我把它揭下来。布套下面有一条亚麻布里子的呢绒被和一条很厚实的床单，这条床单的清洁程度是很值得怀疑的。床头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只水杯和一个锡碗，为了外观好看，这些东西都用一条毛巾蒙着。小桌下面还有一层隔架：那里放着一只专为喝茶病人预备的茶壶，一个盛克瓦斯饮料的木罐子以及其他用品；然而喝茶的病人并不多。烟袋和烟荷包几乎每个病人都有，甚至连结核病患者也不例外，都藏在床底下。大夫和其他医务人员几乎从未

检查过这些烟具，即使碰见有人抽烟，也装出没有看见的样子。不过，病人几乎总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抽烟时都到火炉旁去抽。只有夜间才躺在床上抽；到了夜间，除了医院守卫队的队长或其他军官偶尔进来看看以外，没有任何人来查巡病房。

在这以前，我从未住过院；因此，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格外新奇。我发现，我的到来引起了某些人的好奇。他们已经听人谈论过我了，因而都十分放肆地、甚至带着某种优越感打量着我，就如同学校里打量一位刚入学的新生，或办事机关里打量一位前来请求办事的来访者一样。我右边病床上躺着一位候刑犯人，他当过司书，是一个退职大尉的私生子。他是因伪造货币而被判刑的，住院已近一年，看样子他什么病也没有，但却竭力要大夫相信他患有动脉瘤。他达到了目的：逃脱了苦役和体刑，一年后又被解送到T城，住在某个医院里。他是一个身材矮小但很结实的小伙子，年纪在二十八岁左右，是个大骗子手和通晓法律的家伙；他很聪明，但却十分放荡，而且过于自信，他的自尊心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竟一本正经地要人们相信他是世界上最诚实最正直的人，他甚至认为他完全无罪，而且还要永远坚持这种信念。他首先开口跟我说话，好奇地向我问长问短，十分详细地给我介绍医院里的规章制度。不用说，他首先向我声明他是大尉的儿子。他极力装得象是一位贵族，或者至少也是“贵族出身”。接着，前来看我的是一个来自感化连的士兵，他开始要我相信他认识很多从前被流放的贵族，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和父名。他是一个头发已经斑白的大兵，从他的面部表情就能看出，他说的这一切全是谎话。他叫切库诺夫。他所以巴结我，显然可能是由于他料想我有钱。他一看见我有一包茶叶和糖，便立即主动为我效劳：取出茶壶，帮我沏茶。我的狱友米—茨基曾答应明天托前来医院干活的囚犯给我捎一把开水壶来。可是还没等捎来，切库诺夫就把一切都给办妥了。他弄到一个小铁锅和一个茶碗，把水烧开，泡上茶，总之，他待我十分热心，这立刻引起了另外一个病人对他的恶毒嘲笑。那个病人患的是肺病，躺在我对面，姓乌斯季扬采夫，他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由于惧怕体刑而喝了半瓶泡着烟末的烈酒，因而得了肺痨病的待审犯人。在此以前，他一直一声不吭地躺着，困难地呼吸着，聚精会神而又严肃地盯着我，同时悻悻地注视着切库诺夫。他那股非同一般的、怒气冲冲的严肃劲儿，给他的愤怒增添了一种特别滑稽可笑的色彩。到最后，他实在憋不住了：

“好一副奴才相！这一回可找到主子了！”他气喘吁吁地用虚弱无力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看来，他已经活不了几天了。

切库诺夫气忿地向他转过身去。

“谁是奴才？”他一边说，一边轻蔑地瞧着乌斯季扬采夫。

“你就是奴才！”乌斯季扬采夫用十分自信的口吻答道，好象他完全有权斥责切库诺夫似的，好象他是专门被派来监督切库诺夫的。

“我是奴才？”

“对啦，你就是奴才！好心的人们，你们听听，他还不承认呢！他还感到惊奇哩！”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没看见，他老人家孤单单一个人，无人服侍，他不习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不能服侍他？你这个毛脸小丑！”

“谁是毛脸小丑？”

“你就是毛脸小丑。”

“我是毛脸小丑？”

“对，你就是！”

“我要是毛脸小丑，那么你是美男子啦？看你那副脸相，活象一个乌鸦蛋儿……”

“你纯粹是一个毛脸小丑！既然上帝要你死，你就老老实实躺着等死好啦。可你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干吗要干涉别人？”

“干吗！哼，我宁肯向皮鞋叩头，也不愿向树皮鞋鞠躬①。我父亲就没弯过腰，他也不让我屈膝弯腰。我……我……”

****

①从前，俄国有钱有势的人多穿皮鞋，穷人多穿树皮鞋。这里的意思是：服侍人应该服侍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不应服侍穷鬼。

****

他本想继续讲下去，但一阵剧烈的咳嗽一连持续了好几分钟，连血都咯出来了。他那狭窄的脑门上渗出一层冷冰冰的虚汗。咳嗽妨碍了他，要不然，他会继续讲下去的；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还想再骂上一阵，但无奈只好有气无力地挥挥手作罢……到最后，切库诺夫也就把他忘掉了。

我觉得，这位肺痨病患者的怒气与其说是冲着切库诺夫，不如说是冲着我发的。切库诺夫想博得我的欢心，借以弄几个钱花，为此谁也不会生他的气或者特别瞧不起他。任何人都明白，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钱。普通老百姓对这种事是绝不会过分苛求的，他们能够谅解他。乌斯季扬采夫实际上是不喜欢我，他不喜欢我的茶叶，不喜欢我脚上带着镣铐仍摆出老爷的派头，好象我没有仆人侍候就不行似的，尽管我从未雇过任何人，也不想让任何人来侍候我。的确，无论什么事我总是想尽量由自己来做，特别不愿让人看出我是一个娇生惯养的阔少爷，处处摆出一副老爷的派头。既然谈到了这一点，不妨说这多多少少也与我的自尊心有关。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搞的——我总是摆脱不掉那些自愿前来效劳的各种仆人的纠缠，到头来，他们把我给完全控制住了，他们实际上成了我的主人，我则变成了他们的奴仆；当然从表面上看，我似乎仍然是真正的主人，好象没有仆人侍候就不行似的，而且过着老爷式的生活。这种情况当然使我感到十分苦恼。不过，乌斯季扬采夫是个容易动怒的肺痨病患者。其他病人都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甚至带着几分高傲的神情看着我。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全神贯注在一件特别的事情上：我听囚犯们说，那天晚上将把一个受审犯人送到我们病房里来，他现在正在受棒刑。囚犯们都怀着某种好奇的心理等待着那个犯人的到来，不过，据说他受的刑罚并不重一一只有五百棍。

我稍微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病人。据我观察，这里真正有病的人患的多半是坏血病和眼病——这两种疾病都是当地的常发病。病房里住着几个这样的病人。其他真正有病的人患的是寒热病、各种皮肤病和肺病。囚犯病房和别的病房不同，在这里，各种病人包括花柳病患者，

都住在一起。我所以说真正有病的人，乃是因为这里还有一些这样的住院者：他们其实什么病也没有，是来“休养”的。医生们出于怜悯心，都很乐意让这些人住进来，特别是当床位空余的时候。住院要比关在禁闭室或监狱里好得多，因此很多囚犯都乐意住院，尽管这里的空气十分窒闷，门也经常上着锁。有些人甚至特别喜欢住院，特别喜欢医院里的生活条件；不过，这多半是那些感化连的士兵。我好奇地打量着我的这些新难友。我记得，当时有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这个病人是从我们监狱来的，患的也是肺病，他大概也活不了几天了，躺在和乌斯季扬采夫只隔一张床的位置上，因而差不多也是在我对面。他叫米哈伊洛夫；两个星期前我还在监狱里看见过他。他患病已经很久，早就该住院治疗；但他却以一种十分倔强和完全没有必要的忍耐态度克制着自己，怎么也不肯住院，只是在节日期间才住了院，结果住院后不到三个星期就死于那可怕的肺痨；他象一支燃尽的蜡烛一样熄灭了。我至今回想起他那张已变得十分可怕的面孔时，还不禁感到吃惊；那是我入狱后最早看到的几张面孔之一；当时不知为什么它首先映入了我的眼帘。他旁边躺着一个感化连的士兵，已经上了年纪，是个可怕的、令人讨厌的邋遢鬼……不过，我不能对所有的病人一一加以描述了……我现在所以回想起了这个老头子，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也曾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并立即使我对囚犯病房的某些特点有了相当充分的认识。我记得这个老头子当时正患重感冒。他总是打喷嚏，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甚至在梦中也打喷嚏，他能连珠炮式地一连打上五、六个喷嚏，每打一次都要说一句：“主啊，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呀！”他当时正坐在病床上，一个劲儿地用小纸筒往鼻子里送烟末，以便使喷嚏打得更响、更准时些。他打喷嚏时总是用他那块已洗过一百次并已完全褪了色的方格子手帕接着，而且还特别皱起他那个小鼻头，挤出无数的细皱纹来，同时露出他那残缺不全的、已经变黑了的老牙和沾满唾沫的红牙床。打完喷嚏以后，他马上将手帕打开，仔细瞧着沾在上面的稀鼻涕，并立即将鼻涕抹在那件公家发的棕色睡衣上，这样鼻涕就完全沾到睡衣上，他的手帕只是有些潮湿罢了。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是这样。这种对自己的手帕爱惜如命，对公家的睡衣却不管不顾的行为，竟未引起病人们的任何抗议，虽然他们当中以后还会有人要穿这件睡衣的。然而，我们一般老百姓都非常粗心大意，一点也不注意这些事情。我当时十分反感，不由得立刻怀着极端厌恶和好奇的心情开始打量起我刚刚穿在身上的睡衣来。这时我才发觉，睡衣上的强烈气味早已引起我的注意；睡衣在我身上已经发暖，越来越强烈地散发着药味、药膏味以及我觉得似乎是脓液的腥臭味；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它已经多年没有离开过病人的肩膀了。它那粗麻布的里子也许被人洗过，但我不能肯定。不过，现在里子上却浸透着各种难闻的液体、洗剂和从伤口流出的脓液。另外，一些刚刚受过棒刑、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犯人常常被送进病房来；人们用药水给他们洗擦伤口，因而，直接披在湿漉漉的衬衣外面的睡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不被弄脏的，一切脏东西都沾在上面了。在我蹲监狱的那几年里，只要我一住院(我常常住院)，每次都怀着恐惧的疑惑心理把睡衣穿在身上。特别使我讨厌的是，这些睡衣上常常发现又肥又大的虱子。囚犯们往往怀着喜悦的心情把它们处死；当他们用厚厚的指甲将虱子挤得噼啪作响时，从面部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地高兴！我们也很讨厌臭虫，在漫长而寂寞的冬夜，全病房的人常常一起动手消灭它们。从表面上看，除了强烈的药味，病房里的一切都很整洁，但里面，譬如说衬料里，却是极不卫生的。病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就应该如此，医院里并没有严格的卫生制度。关于规章制度，我以后还要讲到……

切库诺夫刚刚把茶给我端上(顺便说一下，病房里的开水每昼夜只送一次，而且很快就被我们病房里的混浊空气污染了)，病房的门哗啦一声打开了，一个刚刚受过棒刑的士兵在加强警卫押送下被带了进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受过刑的犯人。后来，这样的犯人经常被送进来，受刑特别严重者甚至是被抬进来的，每一次都使病人产生极大的兴趣。迎接他们时，大家的面部表情都特别严肃，甚至严肃得有点不大自然。不过，迎接的方式或多或少也取决

于罪行的严重程度和受棒刑次数的多寡。一个被打得十分厉害、而且颇有点名气的大罪犯，比起一个逃兵来，例如象现在被带进来的这一位，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尊敬和关注。然而，不论对哪一种犯人，都不表示过多的同情，也不作特别有刺激性的评论。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帮助照料这个不幸的人，特别是当他需要有人照料的时候。医师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把受伤者交到一些经验丰富而又技术熟练的人的手里了。所谓帮忙，一般说来就是必须经常不断地把床单或衬衣用冷水浸过，披在那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脊背上，特别是当受刑者本人不能自理的时候，此外，还得敏捷地帮助他从伤口里往外拔碎木片，这些碎木片通常是在受刑时由于棍棒被打断而残留在脊背上的。这后一种手术常常使大家感到特别伤脑筋。然而受刑者那种忍受疼痛的迥非寻常的坚毅精神，往往使我惊愕不已。我看见过很多这样的受刑者，有时他们的伤势特别严重，但几乎谁也没有呻吟过一声！只是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两眼发红，目光显得呆滞而不安，嘴唇颤抖着，于是那可怜的人用力咬住嘴唇，有时几乎咬出血来。被带进来的这个士兵是一个二十三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体格结实，肌肉发达，面孔很漂亮，身材魁伟而匀称，皮肤显得黝黑。不过，他的脊背已被打得皮开肉绽，从肩膀到腰部都袒露在外，肩头上披着一件湿漉漉的床单，浑身象发疟子似地打着冷颤，他已在病房里来回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我端详着他的脸：看来此时此刻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用异样的目光迅速而粗野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显然是在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点上。我仿佛觉得，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我的茶。茶是热的，正从碗里冒着热气，而这个可怜的人却冻得上牙不接下牙地直打哆嗦。我请他喝茶。他一声不响地猛然向我转过身来，端起茶碗，还没等放糖，就站着喝下去了；他喝得非常匆忙，不知为什么竭力不看着我。喝完以后，默默地放下茶碗，甚至连头也没有向我点一下，就又在病房里来回踱起步来。他哪里还顾得上说话和点头呢！至于别的囚犯们，不知为什么这时都避免跟这位受过刑的逃兵说任何话；虽然起初他们都尽力帮忙照料他，可是后来他们就尽量不再去注意他了，也许是为了让他尽可能多安静一会儿，而不拿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同情”去打扰他吧。看来他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满意。

这时天已黑了，大家都点上蜡烛。有的囚犯甚至自己备有烛台，不过这样的人并不多。晚上医生查巡过病房以后，一位值班的军士最后走进来，给全体病人点了一次名，随后把一个夜间用的马桶提进来，便给病房上了锁……当我听说这个马桶要在室内放一整夜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厕所就在走廊上，离病房门口只有两步远。然而这是医院的制度。白天还可以放囚犯们走出病房，虽然不能超过一分钟，夜间则一概不准出去。囚犯病房不同于一般的病房，患病的囚犯即使在病中也得忍受对自己的惩罚。这种制度最初是谁规定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种制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形式主义的。各种弊病和危害从来没有象这种时候表现得如此突出。这种制度当然不是医生订出来的。我再重复一遍：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总是赞不绝口，他们往往把医生看作是自己的父辈，对医生十分尊敬。每个病人都感受过医生的亲切抚慰并聆听过他们那友好的话语；一个被众人所摈弃的囚犯对这一点是很珍视的，因为他从医生那友好的话语和亲切抚慰中看到了一片真心诚意。医生们也可以不这样做，即使医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即更粗暴更残忍地对待囚犯，也不会有人责怪他们的：所以，医生的善心是出于真正的仁爱。医生当然懂得，一个病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不是囚犯，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就如同任何一个病人，甚至职位很高的病人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一样。其他病房里的病人康复后，譬如说，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走廊上散步，尽情地舒展舒展肢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走廊上不象病房里那样窒闷，不象病房里总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味。如今，每当我回忆起我们病房里那种混浊的空气时，我就感到可怕和恶心：病房里的空气本来就已污染得相当厉害了，更何况夜间又提进一个马桶来，而且温度又那么高，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有的病人是需要经常起来大小便的。如果我说囚犯们即使在患病中也得忍受对自己的惩罚，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规定这种制度仅仅是为了

进行惩罚。如果我这样认为，那当然就是出自我这方面的毫无意义的诽谤。对病人无需再进行什么惩罚了。既然如此，想必是有一种十分必要的理由迫使当局采取这种后果十分有害的措施吧。究竟是什么理由呢？遗憾的是，无论用什么理由也无法解释采取这种措施以及其他许多令人莫名其妙的措施的必要性，非但不能解释，甚至无法猜想如何去解释它。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残忍的态度呢？也许有人会想，囚犯都是故意装病，欺骗医生住了院，说不定他会利用夜间上厕所的机会趁黑逃跑？其实，这种毫无道理的推测是不值得一驳的。往哪里逃跑？如何逃跑？穿什么衣服逃跑？白天是单个儿放他们出去，夜间病房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厕所就在离哨兵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尽管如此，病人上厕所时还由副哨跟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厕所里只有一个窗口，冬天也是双层窗框，外面还有铁栏杆。窗外院子里，囚犯病房窗口下面，还有一个哨兵在整夜地进行巡逻。要想从窗口逃走，就必须砸碎窗框和铁栏杆。可是谁会允许他这样干呢？就假定他事先能把副哨杀死，副哨连喊都来不及喊一声，谁也听不见。就假定这种荒唐的事情可能发生，但仍需打破窗框和铁栏杆。且莫忘记：哨兵旁边还躺着几个看守，十步以外，另一间囚犯病房的门口也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哨兵旁边还有副哨和几个看守。大冬天，穿着长筒袜子、拖鞋、医院发的睡衣和睡帽，能往哪儿逃跑呢？既然如此，既然危险性如此之小(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性)，为什么还要使病人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呢？莫非就因为病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比健康的人更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吗？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对此百思莫解……

既然提出了“为什么？”既然谈到了这一点，我现在不能不回想起另一件使我感到困惑莫解的事情来，这件最使人莫名其妙的事实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继续往下叙述以前，我不能不就这件事讲几句话。我说的是脚镣。无论患何种疾病的苦役犯都无一幸免地要戴脚镣。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些患结核病的犯人就是戴着脚镣死去的。然而大家对此都已司空见惯，认为这已是既成事实，是无法避免的。恐怕未必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就连那些医生们，多年来也未必有谁想到过要去请求医务部门给患重病的囚犯，特别是给肺病患者卸下脚镣。就算铁镣本身并不很重，总共只有八至十二磅。一个健康的人带上十磅重的东西，也许不会感到太沉重。不过我听人说，脚镣戴上几年以后，人的腿就会开始萎缩。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会这样，不过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一副脚镣虽然不重，只有十磅，但若是长期戴在腿上，就会使身体的重量增加，使腿变形，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某种有害的影响……就算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那么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呢？就算对于一般的病人来说也没有什么，那么对于一个重病号呢？我还要再重复一遍，那么对于一个肺痨病患者会怎样呢？肺痨病患者的手脚本来就已经在萎缩，让他从地上拣起一根稻草都会感到非常吃力，更何况戴上脚镣呢！的确，如果医务部门能够为此事奔走呼吁，哪怕减轻一下肺痨病患者的痛苦，那也将是一件真正伟大的善行。也许有人会说，囚犯都是一些歹徒，是不值得对他们行善的；但是，难道还应加重对一个已被上帝判处死刑的人的惩罚吗？很难相信，这些做法仅仅是为了惩罚。即使根据法律，一个患结核病的人也是应免除体刑的。因而，我们应把戴铁镣看成是一种神秘的重要的预防性措施。然而究竟有何必要采取这种措施呢？——我不能理解。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担心患结核病的人会越狱潜逃。怎能设想一个患结核病的囚犯会越狱潜逃呢，特别是当他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冒充患结核病，欺骗医生，以便逃跑——这是不可能的事。结核病是不能装的，这种病一眼就看得出来。顺便说一句：难道给一个人戴上脚镣，仅仅是为了不让他逃跑或妨碍他逃跑吗？绝对不是，脚镣——这是一种侮辱，羞耻，是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重累。至少是可以这样认为的。脚镣任何时候也不会妨碍一个人逃跑。就连最无能、最笨拙的囚犯也会轻而易举地迅速将铁镣锉断，或者用石头将铁镣砸开。脚镣是什么也预防不了的；既然如此，既然给一个已被判刑的苦役犯戴上脚镣仅仅是为了惩罚，我不禁又要问：难道还应惩罚一个行将死亡的人吗？

写到这里，我现在又清晰地回想起一个正在断气的肺痨病患者，也就是那个几乎躺在我对面、离乌斯季扬采夫不远的米哈伊洛夫，我记得他是在我住院后第四天死去的。现在既然谈起了肺痨病患者，我也许不由得又要回忆一下我看到这些人死亡时所产生的一些印象和想法。不过，我对米哈伊洛夫本人了解得并不多。他还十分年轻，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岁，身材魁梧，面目清秀，一副堂堂的外表，令人肃然起敬。他是特别部的犯人，平时很少说话，性情温和而文静，总是显得郁郁不乐。正如囚犯们后来所说的，他仿佛是“干枯”在监狱里了，他曾给囚犯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只记得他长着一双十分好看的眼睛；说实在的，我也不知为什么会对他记得这么清楚。他是在下午三点来钟死去的，那天天气寒冷而晴朗。我记得，一道道强烈的阳光透过我们病房结着一层薄冰的绿色玻璃窗照射进来，倾洒在这位不幸人的身上。他死时已经神志不清，显得十分痛苦，弥留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好几个小时。他从早晨起就认不出走近他的人了。人们看到他十分痛苦，都想使他轻松一下；他呼吸困难，喘着粗气，发出嘶嘶的声音；胸脯鼓得很高，仿佛空气不够用似的。他把被子撩开，把身上的衣服全都扯下来，最后开始从身上往下扯衬衣，但是他连扯衬衣的力气也没有了。人们帮他把衬衣脱下来。瞧着他那颀长的身躯、骨瘦如柴的胳膊和大腿、凹陷的肚皮、隆起的胸部、一根根外露着的青筋、满身的骨头架子，确实叫人感到可怕。他身上就剩下一个巴掌大的木十字架和一副脚镣了，看来那副脚镣很轻易地就能从他那瘦骨棱棱的脚上脱下来。他死前半个小时，病房里的人都安静下来，连说话都开始用小声说，走动时也尽量把脚步放轻。大家彼此都很少说话，即使说也只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大家都不时地打量着那个正在断气的病人。他喘气的声音越来越嘶哑，最后，他用一只颤颤巍巍的、软弱无力的手去摸胸前的十字架，并想把它扯下来，仿佛那小小的十字架也使他感到沉重，感到不安和有压力似的。人们帮他把十字架解下来。十分钟以后，他就死了。有人去敲门叫看守，报告有人死了。看守走进来，面无表情地看了死者一眼，然后去报告医师。医师很快就来了：这是一个年轻而又善良的小伙子，他有点过分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表，不过，他的外表也确实令人喜欢；寂静的病房里响起他的脚步声，他快步走到死者跟前，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抓起死者的手腕，摸了摸脉，然后一挥手就走了。立即又派人去报告看守长：因为死者是特别部的要犯，必须通过特别的仪式方能确认他是死了。在等待看守长的时候，有个囚犯悄声提议说，最好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另一个囚犯认真听完他的建议后，一声不响地走到死者跟前，给他合上双眼。这时他看见枕头上放着一个十字架，于是把它拿起来端详了一番，然后又一声不响地把它重新戴在米哈伊洛夫的脖子上；戴好以后，划了个十字。这时，死人的脸已经发僵；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半张着，从紧贴在牙床上的薄嘴片中间闪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看守长终于来了，他身佩长剑，戴着头盔，身后跟着两个看守。他往前走着，越走脚步越慢，困惑莫解地瞧瞧那些一声不吭地站在周围、正严肃地盯着他的囚犯们。当走到离死者只有一步远的时候，他停下脚步不动了，象是有些害怕。那具赤身露体、骨瘦如柴、只戴着一副脚镣的尸体，使他大吃一惊，他突然解开剑带，摘下头盔(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戴)，划了个十字。他是个面孔严肃、头发斑白的军人。我记得，当时切库诺夫也正好站在那里，他也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一直默默不语地、目不转睛地紧盯着看守长的面孔，特别留心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了，切库诺夫的下嘴唇不知怎的突然颤动了一下，他歪撇着嘴唇，呲着牙，迅速地、仿佛是无意识地用头点着死人对看守长说：

“他也有亲娘呀！”说完就走开了。

我记得这句话象刀割似的刺痛了我的心……他为什么要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呢？他怎么想出来这样一句话呢？人们开始抬尸体，连铺板一块儿抬；在一片静寂中，铺板上的稻草发

出沙沙声，脚镣碰在地板上，哗啦哗啦直响……人们把它拣起来。尸体抬走了。大家突然又大声说起话来。听得见看守长在走廊上派人去找铁匠。应该给死者摘下脚镣……

不过，我又离开本题了……

第二章　续

医生们一大清早就查巡过病房了；十点多钟，他们又陪同医务主任一块儿出现在我们的病房里，在他们来前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的主治医师也来过了。我们的主治医师当时还很年轻，他精通业务，待人和蔼可亲，因而囚犯们都很喜欢他，认为他只有一个缺点：过于温和。的确，他有点不爱讲话，在我们面前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动不动就脸红，只要病号一请求，他就给换伙食，看来，他甚至准备根据病号的请求而给他们开药。不过，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应当承认，俄国有很多医生是颇受普通老百姓的爱戴和尊敬的，而且据我观察，这完全是真实情况。我知道，我的这番话可能被认为是奇谈怪论，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俄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普遍不相信医学和外国药物的话。的确，普通老百姓宁肯一连几年忍受重病的折磨，宁肯请女巫或服用土方(这种土方是绝不应忽视的)，也不愿延请医师或住院治疗。此外，这里还有一个与医学完全无关的特别重要的原因，即：普通老百姓对于一切盖有官方图章的文书都是极不相信的；再有，各种各样的恐怖事件和流言蜚语也使得他们对医院产生恐惧心理和抱有成见，尽管这些流言往往是荒谬的，但有时也是有根据的。不过，他们最害怕的还是医院里的德国式的规章制度，住院治疗期间周围都是陌生的人，对饮食的严格限制，关于医师和医生们的冷酷态度以及关于动手术、解剖尸体等方面的谣传。此外，老百姓还私下议论说，医院里给人看病的都是一些老爷们，因为医生毕竟都是一些老爷。不过，当他们跟医生混熟了以后(虽然也有例外，但大多数都是如此)，他们的种种恐怖心理也就随之消失了；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我们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们的光荣。大部分医生都善于博得普通老百姓的尊敬，乃至爱戴。至少我这里所写的都是我在很多地方耳闻目睹并不止一次亲身体验过的情况，因此我没有理由设想其他地方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当然，在某些地方，有的医生往往接受贿赂，靠医院发大财，看不起病人，甚至把医学完全置诸脑后，这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不过我说的是大多数，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说的是目前存在于我们医务界的那种精神，那种思潮。至于那些背弃自己事业的人，那些混在羊群中的狼，不管他们如何替自己辩解，不管他们如何把一切都推诿于环境，说什么是环境把他们毁掉了，那都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当他们把仁爱也丢掉了的时候。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仁爱、温和、兄弟般的同情，有时甚至比药物更为重要。现在是停止一味抱怨环境的时候了。不错，环境能毁掉我们身上的许多东西，但并不是全部；有些狡猾而又饱经世故的骗子手，往往巧妙地把一切都推诿于环境的影响，他们不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弱点，而且常常以此掩盖自己的卑鄙行为，特别当他们是一些能说会道和善于舞文弄墨的家伙的时候。不过，我又离开本题了，我只是想说，普通老百姓所不信任和仇视的只是医务界当局，而不是医生。当他们了解到医生实际上是一些什么人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消除自己的偏见的。我们医院里的其他一些条件，直到目前在许多方面还不符合人民精神，医院里的规章制度直到现在还是同普通老百姓的习惯相敌对的，因而也就不能赢得老百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根据我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我认为至少是这样的。

我们的主治医师一般都要在每个病人面前停下来，严肃而又特别认真地检查每一个病人，询问病情，开药方，指定饮食。有时医师本人也看得出来，有些病人其实并没有什么病，他们只是为了逃避干活才住院的，因为在这里，可以睡在铺有褥垫的病床上，而不是睡在光

秃秃的铺板上，再说，病房里也比较暖和，不象拘留所那样潮湿和拥挤，拘留所里总是关满着许许多多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待审犯人(在俄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待审犯人都是形容憔悴而又骨瘦如柴一一这就说明，待审犯人的精神状态几乎总是比已判过刑的犯人更为沉重)；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主治医师便心平气和地将这些病人的病情登记为 febris catarhalis①，留他们住院，有时甚至让他们住一个星期。

****

①拉丁文，意为“卡他性冷热病”。

****

我们大家都常常取笑这种所谓的 febris catarhalis。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达成的一项谅解，是装病的代用语。囚犯们自己则把 febris catarhalis 翻译成“预备性刺痛症”。病人有时滥用医生的慈善心肠，一直住到他们被强行赶出医院为止。再看看我们的主治医师是怎样赶他们出院的吧：他仿佛有点胆怯，仿佛不好意思直接告诉病人，他已经痊愈，应该出院了；虽然他完全有权直接了当地、无须多费口舌地在病历上写上 sanat est①，让病人出院。

****

①拉丁文：痊愈。

****

他先是向病人作一些暗示，然后用肯求的口吻说：“是不是该出院了？你差不多已经痊愈，病房里又这么挤，”等等，直到病人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最后由病人自己请求出院为止。医务主任虽说也是一个慈善而又正直的人(病人也很喜爱他)，但比主治医师却要严厉果断得多，有时他甚至会说出一些冷酷无情的话来，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我们特别的尊敬。主治医师走后，医务主任在全体医生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病房，他也对每个病人进行单个检查，特别要在那些重病号面前停下来，总是善于对他们讲几句善意的、使人感到鼓舞的话，甚至还常常说几句知心的话儿，总之，他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于那些因患“预备性刺痛症”而住院的人，他也从未拒绝过，也不打发他们回去；不过，如果病人固执己见，不肯出院的话，他就直接了当地请他出院：“喂，老兄，你也躺够了，休息过了，该回去啦。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坚持不肯出院的往往是那些逃避干活的懒汉，特别是夏天活忙季节，或者是那些候刑犯人。我记得，为了迫使一个这样的病人出院，曾对他采取了特别严厉甚至有点残酷的措施。这个病人是因患眼疾而住院的；他两眼发红，抱怨说他的眼象针扎一般疼痛。医生们采用发疱药膏、水蛭吸血、往眼睛里滴腐蚀性眼药水等方法给他治疗，可是疼痛并不见减轻，眼睛也不见有好转。医生们渐渐开始怀疑他的病是假装的：炎症并不重，既不恶化，也不痊愈，总是处于一种不好不坏的状态，这种情况是很值得怀疑的。其实，囚犯们早就知道他是在装病骗人，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长得也挺漂亮，但却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从不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心声，总是疑心重重，愁眉不展，不跟任何人说话，皱着眉头看人，见谁都躲避，仿佛对谁都有戒心似的。我记得，有人甚至怀疑他干过什么坏事。他当过兵，有过严重的盗窃行为，被查获后，挨了一千棍，然后被送进军犯连。我前面已经说过，为了推迟受刑的时刻，待审犯人有时甚至铤而走险：受刑前用刀子把某个长官或自己的狱友捅一刀，这样就会对他进行重新审讯，把受刑的日期再往后推迟两、三个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两个月以后他将会受到两倍、三倍的刑罚，他对此是不加考虑的；反正只要眼下能把那可怕的时刻往后推迟哪怕几天也行，至于后果如何，他就不管了——这些不幸的人的精神有时竟颓丧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在悄悄议论，应该对他加以提防：说不定他夜间会宰人的。不过，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并未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就连那些睡在他旁边的人也是如此。不过，人们却发现他夜间用从墙壁上剥下的石灰或别的什么东西揉搓眼睛，以使眼睛第二天早晨又红肿起来。最后，

医务主任声言要对他实行穿线放脓疗法。对于那种经过长期治疗而又不见效果的顽固眼疾，当一切医疗手段都试过以后，为了保护视力，医生们往往决定采用一种令人极感痛苦的治疗方法：就象医治一匹马一样，给患者使用穿线放脓疗法。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可怜的人仍不承认他已经痊愈。这是一个多么固执而又过于懦怯的家伙啊！要知道，穿线放脓疗法虽不象受棒刑那样可怕，但也是相当痛苦的。医生猛力将患者颈后的皮肉抓在手里，用刀将其刺破，于是颈后便出现一道又宽又长的伤口，再把一条足足有一指宽的亚麻布条穿进伤口里；然后每天按时将伤口里的布条来回拉，伤口便象被重新刺破一样，往外流脓，永不愈合。这个可怜的人竟一连几天倔强地忍受了这种可怕的痛苦，到最后他才同意出院了。他的眼病一天之内也就完全好了。等颈后的伤口刚刚愈合，他便被送到拘留室，第二天重新去接受那一千棒的刑罚。

当然，受刑前的时刻是痛苦的，痛苦到我真后悔不该把这种恐怖心理称做颓丧和懦怯。当一个人遭受两倍、三倍的刑罚时，想必是非常痛苦的，但愿别马上受刑才好。不过，我已经说过，有的犯人在受过第一次刑罚后，不等背上的伤口愈合，便请求出院，以便受完上次留下来的棒刑，从而最后解脱审讯；对于任何一个犯人来说，关在禁闭室里候审要比服苦役更加苦不堪言。除了气质的不同，有些囚犯由于受惯了鞭笞和体刑，这对他们的果敢和无畏也起很大作用。有些人由于多次受到严刑拷打，他们的精神和脊背仿佛变得坚强了，到后来他们便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刑罚，几乎就象看待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一样，对它也就不再惧怕了。一般说来，这是确实的。我们病房里有个来自特别部的囚犯，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卡尔梅克人，囚犯们都管他叫亚历山大或亚历山大拉①。
****
①亚历山大是俄国男人的名字，亚历山大拉是女人的名字。这里囚犯们管他叫亚历山大拉，含有奚落他的意思。
****
他是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他滑头滑脑，无所畏惧，同时又非常善良，他曾给我讲过他如何受完了四千棍。他一边讲，一边笑嘻嘻地开玩笑，不过他又一本正经地发誓说；要不是他从娇生惯养的幼年起就挨惯了鞭笞，要不是在他们那游牧部落里他脊背上几乎从未断过伤疤，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四千棍的。他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是在感谢他在皮鞭下所受的教育似的。“我经常挨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我的床铺上，围着灯，对我讲道，“为了一点点小事我都挨打，一直打了我十五年。我记得，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我每天都要挨几次打；只有不肯动手打人的人，才不打我；所以，后来我也就完全习惯了。”至于他后来是如何当兵的，这我可不知道；我记不得了；虽然他可能告诉过我；他总是逃跑，到处流浪。我只记得他曾给我讲过，当他因杀害一位长官而被判处四千棍的时候，他曾害怕得要死。“我知道，他们会严厉惩罚我的，这顿棍子可能会结束我的生命，虽然我挨惯了皮鞭，可这是四千棍呀——这可不是开玩笑！况且，所有的长官都恨透了我！我知道，他们不会轻饶我，我可能受不住这四千棍，他们会把我打死的。起初，我试图做祈祷，心想他们也许会饶恕我的，虽然当时我的狱友们曾告诉过我，做祈祷也没有用，他们不会饶恕的；不过，我心里仍这样想：不管怎么说，还是试试看吧，对于一个受过洗礼的人，他们也许会另眼看待的。他们也的确为我举行了祈祷仪式，在做祈祷时甚至称呼我为亚历山大；可是棍子还是照样挨；一棍子也没少打；我感到难过极了。我心里暗想：咱们等着瞧吧，我给你们耍个花招，也让你们这群家伙瞧瞧，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以为怎么样，我真的给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我很会装死，装得不仅完全象死人一样，而且顿时灵魂出壳，两腿一伸就断气。我被带去受一千棍的毒打，他们打得我浑身象火烧火燎一样疼痛，连声叫喊；又带我去挨第二个一千棍，咳，这时我想，这回我可要完蛋了，他们打得我完全失去了知觉，

腿也打断了；我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两眼发直，象死人一般，脸色发青，气也不喘了，口吐白沫。医生走过来说我马上就要死去。我被抬进医院，一到医院我立刻就苏醒过来了。后来他们又两次带我去受刑，他们恨我，简直把我恨透了，可是我又哄骗了他们两次；在打第三个一千棍的时候，刚打完，我就死过去了；在打第四个一千棍的时候，每打一棍，我的心就象刀割一样疼痛，真是一棍比三棍还疼，他们打得我好重啊！他们一个个暴跳如雷。只剩下这致命的最后一千棍了(见它的鬼去吧！……)，这一千棍比头三千棍更加难以忍受，我可别在这最后关头死去啊(只剩下二百棍了)，我若不进行自卫，他们准会把我打死的；于是我又哄骗了他们，我假装死去，他们又信以为真了；他们怎能不相信呢，因为医生是相信我会死去的；于是他们更加怒气冲冲地打完最后二百棍，这二百棍打得比平时两千棍都重。尽管如此，他们仍没能把我打死。为什么没能把我打死呢？因为我从小就是在皮鞭抽打下长大的。正因为如此，我才活到了今天。唉，我总是挨打，我挨了一辈子打啊！"——当故事快结束的时候，他补充道。他仿佛陷入悲伤的沉思之中，仿佛在努力回忆和计算他总共挨过多少次打。"记不清了，"后来他又打破片刻的沉默，补充道，"至于我总共挨过多少次打？算不过来啦，算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挨打的次数是无法计算的。"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起来，他笑得那么温和、自然，以致我只好对他报之以微笑。"您知道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直到现在，我夜里只要一做梦，总是梦见人家打我；我没有做过别的梦。"的确，他夜里常常喊叫，扯着嗓门喊，别的囚犯赶快把他推醒："喂，你这个鬼东西，喊什么！"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小伙子，个头不高，活泼好动，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他和大伙都很合得来，尽管他喜欢偷东西，并常常因偷东西而挨揍；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囚犯当中又有谁没有偷过东西，又有谁不曾因偷东西而挨过揍呢？

我还要补充一点：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当这些受尽屈辱的人们讲起他们怎样挨打或讲起那些毒打他们的人时，他们总是显得特别宽宏大量，毫无怨恨之意。从他们的话音里，常常连一点点的气愤和仇恨也听不到，然而他们的故事往往立刻就扣住了我的心弦，使得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比方说吧，米—茨基也曾向我讲述过他受体刑的事；他不是贵族，而且只挨了五百棍。我是从别人口里了解到这件事的，并亲自问过他，是否确有其事？他回答得很简短，仿佛内心里感到痛苦似的，竭力不看着我，面孔涨得通红；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焰，气得嘴唇直打哆嗦。我感觉得到，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历史上的这一页的。然而我们的囚犯，几乎是所有的囚犯(我不敢担保没有例外)，对这类事情却完全有另外一种看法。我有时曾这样想，他们是不会认为自己有罪的，更不会认为自己应该受惩罚，特别是当他们并非因反对自己阶层的人，而是因反对官场人物而犯罪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完全无罪。我已经说过，我从未看见他们受到过良心上的谴责，即使当他们因反对自己阶层的人而犯罪的时候也是如此。至于因反对官场人物而犯罪，那就更不必说了。我有时觉得，对于后一种罪行，他们似乎有一种独特的、实际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天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事实，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出于一种信念，不自觉地干出来的。比方说，尽管囚犯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因反对官场人物而犯罪是合法的，因而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承认，官方对他们的罪行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而他们应当受惩罚，这样就谁也不欠谁的账了。这是双方在斗争。罪犯们晓得，而且毫不怀疑，他们自己阶层的人，普通老百姓，是会宣告他们无罪的；他们也同样晓得，普通老百姓是永远不会谴责他们的，而且绝大多数的人还会认为他们完全无罪，只要他们的罪行不侵害自己弟兄们的利益，不侵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就行。他们的良心是平静的，而良心又使他们增添了力量，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不受到烦扰，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仿佛觉得他们有一种依托，因而他们不怨天尤人，反而认为他们遭遇到的事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事实既非由他而

开始，也不会由他而结束，它还要在那已经开始了的、虽说是消极的、然而却是顽强的斗争中长期地继续下去。当士兵们同土耳其人打仗时，哪一位士兵会对土耳其人怀有个人的仇恨呢；可是，土耳其人仍然砍他，刺他，向他开枪。然而，也并非所有的人在讲述这类事情时，都是十分冷静和无动于衷的。比方说，人们在讲到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时就难免有几分气愤，虽然并不十分强烈。我闻知这位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的大名还是在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当然是从别的囚犯口里听到的。后来，他在我们这儿值班站岗，我才见到了他本人。此人年近三十，身体魁梧，长得又肥又胖，面颊上鼓出两块红通通的肥肉，牙齿雪白，笑起来声音洪亮，很象诺士特莱夫①。
****

①诺士特莱夫是俄国作家果戈理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
****
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是世界上最不肯动脑子的一个人。当他被委任为刑吏的时候，他喜欢用棍棒拷打和刑罚犯人。我得赶快补充一句，我当时就曾把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看成是他们那些人中的一个怪物了，其他囚犯也是这样看的。不久以前，当然是在“时隔不久，但却难以置信”的不久以前，也曾有过尽心竭力执行这一职务的刑吏。但大多数刑吏干这一行都是出于无知，其实并无特别的热情。然而这位中尉却不然，他酷爱这一职业，就如同十分讲究的美食家喜爱美食一样。他喜爱行刑的各种技艺，甚至把它当作一种艺术而喜爱。就象罗马帝国时代那些贪图享受、腐化堕落的贵族一样，他把用刑当作一种享乐，发明创造出了各种惨无人道的用刑方法，以使他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那极度空虚的灵魂得到满足。瞧，一个囚犯被带来受刑，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是监刑官；他一看见那些手持粗大木棍、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长列的士兵，便不由得精神抖擞起来。他洋洋得意地绕着队列走了一遭，严厉警告每一个士兵要尽心竭力、问心无愧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士兵们都明白这个否则是什么意思。受刑的罪犯被带出来了，倘若他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本人，倘若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听人讲述过这位中尉用刑的种种本领，那就看看中尉会玩出一些什么样的鬼花招来吧。(当然，这只不过是他那千百种鬼花招中的一种；这位中尉的鬼花招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任何一个囚犯，当他被扒光了衣服，两只胳膊被绑在枪托上，然后由两个军士拖拉着穿绿街的时候，——他往往都要痛哭流涕，苦苦哀求监刑官对他放宽刑罚，不要过重地惩罚他。这个不幸的人哀求道：“大人呀，您就发发慈悲吧，您是我的再生父亲，我要永生为您祷告，千万别把我毁掉，您就开开恩吧！”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正等着囚犯讲这些话呢；于是他停下来，显出深受感动的样子，开始跟囚犯谈话：

“我的朋友，”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并不是我要刑罚你，这是法律呀！”

“大人，一切全掌握在您手心里，您就开开恩吧！”

“你以为我不可怜你吗？你以为我乐意看着你挨打吗？要知道，我也是一个人呀！依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人？”

“那当然啦，大人，事情很明显；您是父亲，我们是孩儿。您是我们的再生父亲呀！”囚犯喊道，开始感到有几分希望了。

“哎，我的朋友，你自己想想吧；你也有头脑，你想想看：我本人也知道，即使你是一个罪人，我也应该把你当做人看，对你宽大为怀……”

“大人，您说的是真理呀!”

“是呀，不管你罪孽多么深重，也应该对你发慈悲。可是，事情并不在于我，这是法律呀！你想想看！要知道我是在为上帝和祖国服务呀；我要是违背了法律，我就会犯下滔天大罪，你好好想想这一点吧!”

“大人!”

“嗯，这样吧！为了你，这样办好啦！我知道，这样做是有罪的，但也只好这样了……我宽恕你这一次，给你把刑罚减轻一些。不过，我这样做，要是给你带来危害呢？我这次宽恕了你，给你施的刑罚轻一些，你就会希望下一次也会这样，你就会再去犯罪，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我心里也……”

“大人！我发誓！我在上帝的宝座前面发誓……”

“好，那好吧！你能向我发誓以后不再干坏事吗？”

“我若是再干坏事，天打五雷轰！让我来世……”

“别发誓了，这样做有罪。我相信你的话，你能给我立保证吗？''

“大人!!!”

“好啦，你听着，只是为了你这孤儿的眼泪，我才饶恕你这一次；你是孤儿吗？”

“是孤儿呀，大人，孤苦伶仃一个人，父母双亡……”

“好啦，就为了你这孤儿的眼泪我饶恕你这一次；不过，你要记着，这可是最后一次……把他带下去，”中尉用十分柔和的声调补充说，这时，囚犯真不知该如何虔诚地为这位大恩人祷告才好。于是，可怕的刑罚开始了，囚犯被带下去；鼓敲得震天响，棍棒在头上飞舞……“使劲打!”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扯着嗓门大声喊道，“给他加热！揍，揍！给他加热！给他再加点热，加热！狠狠地揍这个孤儿，狠狠地揍这个骗子！用劲给我打，用劲揍他!”士兵们抡起大棒狠狠地打，打得这可怜的人两眼直冒金花，他开始喊叫；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哈哈大笑，笑得他用手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来。他高兴，他开心，他那洪亮的笑声刚一中断，又传来他的叫喊声：“揍他，揍！给这个骗子加热，给这个孤儿加热！……”

此外，他还会玩出这样的鬼花招来：一个囚犯被带来受刑；这个囚犯又开始苦苦哀求他。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这一次不再装腔作势了，也不再扮鬼脸了，他单刀直入地说：

“你看，亲爱的，”他说，“我得狠狠地惩罚你一顿，因为这是你罪有应得呀。不过，因为是你，我想这么办：我不把你绑在枪托上。你一个人走过去，不过得按新办法：你要使出全身力气跑过整个队列，这样，每一棍虽然也会落在身上，但可能会轻些，你看怎么样？你想试试吗？”

囚犯一听，半信半疑，困惑莫解地沉思起来。“谁知道呢，”他暗自寻思道，“也许这种办法对我有利；我要是用劲一口气跑过去，痛苦的时间就可能缩短五倍，也许每一棍不一定都能打中。”

“好吧，大人，我同意。”

“那好，我也同意，开始吧！你们要注意，不许打空棍！”他冲着士兵喊道，尽管他事先就知道，哪一棍也不会落不到受刑者脊背上的；士兵也很清楚，若是打不中，他本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于是那个囚犯使足全身力气开始穿“绿街”，当然他连十五步也跑不过去；刹那间，棍棒象擂鼓，象闪电一般落在他的脊背上，那可怜的人惨叫一声，扑通跌倒在地上，就象中弹倒在地上一样。“不行呀，大人，还是按老办法吧！”——他一边说，一边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吓得脸色苍白，惊恐万状；而事先就晓得这场鬼把戏会有什么结果的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这时则哈哈大笑不止。关于他的种种鬼把戏，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是写不完的。

囚犯们谈起另外一位名叫斯麦卡洛夫的中尉时，口吻和心情就有点不同了，在我们那位少校被任命为典狱长以前，斯麦卡洛夫中尉曾暂时代理过典狱长的职务。当人们谈起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时，尽管口气十分冷淡，也未曾流露出对他的特别憎恨，但人们对他的丰功伟绩并不怎么欣赏，谁也没有夸奖过他，大家显然都很讨厌他，甚至有点儿鄙视他。然而一谈起斯麦卡洛夫来，大家便显得又高兴又愉快。问题就在于他并不特别喜欢施用刑罚，他身上一点儿也没有热列比亚特尼科夫的那种气质，但他也绝不反对用刑；说也奇怪，就连他的鞭笞也给囚犯们留下了甜蜜而愉快的回忆，——他多么善于迎合囚犯的心理啊！这是因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欢迎呢？的确，我们囚犯们也象全体俄国人民一样，为了一句悦耳的话，往往会把所有的痛苦都抛诸脑后，我是把这当做一种事实来讲的，并不是要从各个方面对他们加以评论。其实要想取悦于这样的入民并受到他们的欢迎，也并不难。所以，斯麦卡洛夫受到了特别的欢迎，以致人们一想起他使用过的刑罚来，就大为感动。当囚犯们拿他们过去的代理典狱长同现在的少校相比时，他们都感慨地说：“真是比亲爹还亲啊！”“他这个人太好啦！”他是一个朴实的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还是一个善良的人。长官们当中往往不仅有善良的人，甚至还有宽宏大量的人；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人们并不喜欢他们，有时甚至还对某些人大加嘲笑。问题就在于斯麦卡洛夫处事圆滑，以至我们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自己人。这是一种巨大的本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天生的本领，就连那些具有这种本领的人，也往往没有细想过这一点。说也奇怪，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其实根本就不善良，但他们有时却能博得很大的声誉。他们不嫌弃，不厌恶下属人员，——我认为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没有花花公子的习气，也没有官老爷的派头，他们身上有一种普通老百姓所独有的特殊气味，我的天哪，老百姓对这种气味是多么敏感啊！为了这种气味，他们什么牺牲不肯做出啊！他们宁肯要最严厉的人，也不愿意要心地慈善的人，只要前者身上具有他们那种自制的粗麻布的气味就行。如果这个人再有一副真正的好心肠，那就更好了！我已经说过，斯麦卡洛夫有时刑罚人也相当厉害，但他很善于处理事情，结果人们不但不憎恨他，反而对他感恩不尽；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然而人们至今仍笑嘻嘻地、愉快地回味着他体罚人时的那种鬼把戏。不过他的鬼把戏并不多，因为他缺乏艺术家的想象力。其实，他只有一套鬼把戏，就是他成年累月对我们使用过的那唯一的一套鬼把戏；这套鬼把戏之所以令人感到亲切，也许就因为它是唯一的。不过，这其中也有很多奥妙。比方说，一个罪犯被带来受刑。斯麦卡洛夫亲自走到囚犯跟前，有说有笑地向他问长问短，问他个人的生活，家庭情况，犯罪的原因以及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询问这一切并无任何目的，也毫无奚落嘲弄之意，只是因为他的确很想了解这些情况。有人抱来一捆树条，又给斯麦卡洛夫搬来一

把椅子；他坐在椅子上，掏出烟袋抽烟。他的烟袋杆很长。囚犯开始哀求他。“不行，老弟，躺下吧，哀求也没有用……”斯麦卡洛夫说；囚犯哀叹一声，爬在地上。“喂，亲爱的，你会背诵祈祷诗吗？”——“怎么不会呢，大人，我们是基督教徒，从小就会背诵。”——“那好，你就背吧。”囚犯知道应该背诵哪一首，而且事先就知道让他背诵这首祈祷诗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套鬼把戏已经对其他囚犯耍过三十次了。斯麦卡洛夫本人也知道囚犯已经明白他的意图，而且他也知道，就连那些手持树条站在受刑者旁边的士兵们也早已看惯他的这套鬼把戏了，但他还是要再耍弄一遍——他一向就很喜欢这首祈祷诗，也许就因为这首祈祷诗是他出于对文学的爱好而亲自编出来的吧。囚犯开始背诵起来，士兵们手持树条等待着，斯麦卡洛夫躬身向前，抬起一只手，熄灭了烟，等着背诵到那著名的一句。囚犯背完头几句以后，终于背到了“上有苍天”这一句。他等待的正是这一句。“停住！”欣喜若狂的中尉喊道，随即又兴高采烈地打着手势，向一个举着树条的士兵喊道：“敬他一顿美餐！”

他哈哈大笑起来。站在一旁的士兵也嘿嘿笑了起来，——打人的咧着嘴笑，挨打的也几乎撇着嘴笑了，尽管这时随着“敬他一顿美餐”的口令声，树条已在空中呼啸，顿时间就象刀割似的抽打在受刑者的肉体上。斯麦卡洛夫非常高兴。他高兴的是，他竟想得如此之妙——祈祷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上有苍天”和“敬他一顿美餐”正好押韵。斯麦卡洛夫于是心满意足地离开刑场，受刑者离开刑场时也似乎对自己、对斯麦卡洛夫都感到满意；半小时以后，他回到监狱，立即开始第三十一次地讲起那已重复过三十次的故事来。“照直说吧，他真是一个好人！这个人真有意思！”

在人们关于这位十分善良的中尉的回忆中，有时甚至有一种玛尼罗夫①的气息。
****
①玛尼罗夫是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人物，他以多情善感、想入非非、无所事事而著称。
****

“老兄，有时你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囚犯一边讲，一边笑容满面地回忆着，“抬头一看，他身穿睡衣，正坐在窗口喝茶，端着烟袋吸烟。你脱帽向他鞠躬，他说：‘到哪去呀，阿克谢诺夫？’”

“‘干活去呀，米哈伊尔·瓦西里伊奇，我得赶快到作坊去，’——他笑了起来……真是一个好人呀！这个人太好啦！”

“这样的人真是少有！”一个听故事的人补充道。

第三章　续②
****
②我这里所描述的有关刑罚的种种情况，都发生在我蹲监狱那个时期。我听说现在一切都变了，并正在改变着。——作者注。
****

我现在所以谈起刑罚以及执行这项有趣职务的各种刑吏来，主要是因为只是在住院以后，我才对这些事情有了一个初步明确的了解。在此以前，我对这一切只是有所耳闻而已。

驻扎在我们县城及其附近的各个囚犯营、囚犯看管所和其他军事连队，往往把受过刑罚的囚犯送到我们这个病房里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当我还十分贪婪地细心观察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所有这些使我感到新奇的规章制度，所有这些已受过刑罚和准备去接受刑罚的囚犯，自然也就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我激动不安，我感到困惑，感到惊慌。我记得，我当时突然急不可耐地开始深入探究这些新现象的详细情况，倾听囚犯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并亲自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力求得到解答。而且，我很想搞清楚判刑和用刑的各种等级，各种刑罚的细微差别以及囚犯本人对这一切的看法；我竭力想象那些去接受刑罚的囚犯的心理状态。我已经说过，受刑前很少有人能保持平静，就连那些过去曾多次受过酷刑的人也不例外。一般说来，被判处刑罚的人这时完全被一种强烈的、纯粹是肉体上的恐怖感所征服，这种恐怖感是不由自主的，无法抗拒的，它压倒了这个人的全部精神实质。就是后来，在我蹲监狱的数年期间，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细心观察着那些受刑的犯人，他们受完前一半刑罚后入院治疗，医好背上的创伤，又被迫出院，以便第二天去接受那剩下来的后一半刑罚。把刑罚分为两次接受，一般是根据行刑时在场的医生的意见决定的。如果根据罪行判定的棒刑数目过大，犯人又一次忍受不了，就分为两次或者三次接受，这要根据在场的医生的意见而定，也就是要看受刑者能否继续穿过队列，是否会危及他的生命。一般说来，五百棍，一千棍，甚至一千五百棍，是要一次接受的；如果判的是两千棍或三千棍，就要分为两次或者三次执行。那些已医治好背上创伤并准备出院接受后一半刑罚的囚犯，在出院那一天和前一天往往显得愁眉苦脸，郁郁不乐，沉默寡言。看得出来，他们都有点神志不清，精神上显得十分空虚。这样的人都不大乐意和别人说话，他们总是沉默不语；更为有趣的是，别的囚犯也从不多和他们说话，尽量不谈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表示安慰，甚至竭力不去注意他们。对于候刑的犯人来说，这样当然会更好一些。然而也有例外，例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奥尔洛夫就和别人不同。在受完前一半刑罚后，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背上的创伤竟久久不能痊愈，以至他不能很快出院去接受上次留下来的后一半刑罚，不能随同其同伙在解往其他流放地的路途中逃跑。他这个人不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天晓得他头脑里都想些什么啊！他是一个热情奔放、生命力旺盛的人。他感到非常高兴，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尽管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这是因为还在接受前一半刑罚以前他就想过，他可能忍受不住棍棒的拷打，可能会被打死。他在受审期间就听人讲过长官们用刑的手段，他那时就做好死的准备了。可是受完前一半刑罚以后，他又振作起来。他被送进医院时，已被打成半死；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重的伤势；他进来时显得很高兴，心里充满了希望：他会活下去的，一切传闻都是假的，他马上就要从刑罚下解脱出来，经过长期的监禁受审以后，他将重新开始去幻想征途、潜逃、自由、田野和森林……可是出院后两天，由于未能经受得住后一半刑罚，他死在医院里了，他是在那张他曾经躺过的病床上死去的。关于此事我前面已经谈过了。

然而，那些在受刑前曾日日夜夜感到焦虑不安的囚犯们，大多数都很勇敢地经受住了刑罚，即使最胆怯的人也不例外。甚至在他们入院后的第一天夜里，我也很少听见他们有谁呻吟过一声，就连那些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也是如此；一般说来，这种人是善于忍受疼痛的。我曾向很多人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我有时很想弄清楚这种疼痛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可以与什么相比？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记得一点，我所以要了解这些情况绝非由于无事可干，或者出于好奇。我再重复一遍，我感到焦虑不安，感到震惊。然而，不论问谁，我都不能得到一个使我感到满意的答复。灼痛，象火烧一样灼痛，——这就是我能了解到的一切，这就是人们给予我的唯一回答。灼痛，仅此而已。最初，我和米—茨基比较接近，我也曾问过他。“疼极啦，”他回答说，“象火烧一样灼痛，觉得脊背就象被烈火烘烤着一样。”总之，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记得当时我曾有过这样一个奇特的看法，我

不知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不过，囚犯们的普遍意见都有力地支持这种看法，即：用树条抽打，如果抽的次数很多，那就将是我国采用过的刑罚中最严酷的一种。乍听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十分荒诞和不可能。然而，用树条抽打五百下，甚至四百下，就可以把一个人抽成半死，超过五百下，几乎肯定就会把人抽死。就连体格最强壮的人一次也忍受不了一千下。可是，一个人却能忍受得住五百棍，而且丝毫也不会危及生命。就连体格不很强壮的人，也能忍受得住一千棍，且无生命危险。即使两千棍，也不能把一个中等体力或体格强壮的人打死。囚犯们都说，树条比棍棒更厉害。他们说："用树条抽更能伤人，更会使人感到疼痛。"再没有比树条抽打更使人痛苦难熬的了。树条更能刺激人的神经，使神经过度紧张，使人难以忍受。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反正不久以前曾有过一些绅士老爷们，只要一有机会打人，他们就感到快活，使人不由得回想起德·萨特侯爵①和勃琳维莉侯爵小姐②来。
****
①德·萨特(1740-1814)，法国色情小说作家。
②指法国侯爵小姐玛丽娅·马德琳娜·勃琳维莉，她是一个著名的女犯人，为了得到其父亲、两位哥哥和其他亲属的遗产，她毒死了他们。一六七六年被判处死刑。
****
我想，在他们的快感里，一定会有一种使这些绅士老爷们销魂蚀骨的东西，一种又甜又苦的东西。有些人象饿虎一样舔人的鲜血。谁若是拥有这样的权力，谁若是能够无限度地主宰另一个人(这个人也和他一样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也和他一样在上帝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的肉体、鲜血和灵魂，谁若是拥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地凌辱另外一个胸前佩戴着圣像的人，这个人就必然会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为所欲为起来。残暴是一种习惯，它不断地发展，最后发展成一种病态。我认为，一个最高尚的人也可以因习惯而变得愚昧无知和粗野无礼，甚至粗野到惨无人道的程度。血与权令人陶醉，使人变得冷酷无情，腐化堕落；到最后，就连最反常的现象也会为头脑和感情所接受，甚至感到十分惬意。人和公民被毁灭于暴君之手，到那时要想恢复人的尊严，要想忏悔，要想得到复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恣意妄为，甚至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感染力的影响，因为这种权势是有诱惑力的。如果社会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那么，社会本身的基础也就会受到传染。总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实施肉刑的权力，乃是社会的弊病之一，是毁灭社会上任何一种萌芽、任何一种文明变革意图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是使社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解体的根本原因。

剑子手在社会上是受人唾弃的，然而贵族阶级的刽子手却远非如此。不久前有人发表了反对的意见，但也只限于在书本上谈谈而已。甚至就连那些发表这种意见的人，也还未能抑制住对这种专横暴戾的渴望。任何一个工厂主，任何一个企业家，当他想到他的工人及其家属往往要完全依附于他时，想必一定会感受到一种有刺激性的快乐。这是肯定无疑的；一代人不会很快就摆脱掉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东西；一个人也不会很快就抛弃那种已经注入到他的血液之中，也可以说是从母亲乳汁里吮吸过来的东西。不可能发生这种急遽的转变。人们还很少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祖传的罪孽。应该彻底抛弃它；但这并不是很快就能办得到的。

我又谈起刽子手来了。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刽子手有两种：一种是自愿的，另一种是不自愿的，职业的。自愿的刽子手在一切方面当然要比职业刽子手低劣，然而人们对职业刽子手往往十分厌恶，他们常常使人感到可怕、憎恶、不可理解，甚至使人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怖感。为什么对一种刽子手的恐怖感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而对另一种刽子手竟漠然视之，甚至加以赞扬呢？往往有

这样的怪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甚至是一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在社会上也很受人尊敬，然而，比方说，如果受刑者在他们的严刑拷打下不喊叫，不肯求他们的宽恕，他们就觉得忍受不了。受刑者一定要喊叫，一定要哀求宽恕，这已成了惯例，只有这样才算合乎礼节；受刑者倘若偶尔有那么一次不想喊叫，掌刑者(我认识这个人，他在其他方面也许是个善良的人)就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起初，他本想轻轻地杖责几下，但由于听不到通常应有的那种“大人呀，我的生身父亲呀，开开恩吧，我将终生为您祷告”等等的喊叫，他便狂怒起来，又多打了五十大棍，直到受刑者呼救求饶为止。“没有办法呀，这家伙太不懂礼貌了！”——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至于谈到这个被迫的职业刽子手，众所周知，他不过是一个被判了刑的流放犯而已，后来被留用充当刽子手；他起初向别的刽子手学习用刑的本领，学好以后，便终身留在监狱里充当刽子手；他在监狱里受到特殊的待遇，住在单独的房间里，甚至可以治理个人的财产，但他几乎总是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当然，活人不是机器，刽子手打人虽说是迫于职守，但有时他也感到不安，尽管打人使他感到快乐，但他和受刑者本人并无宿怨。打人的技巧和学问，渴望在自己的伙伴和公众面前大显身手，这一切都刺激着他的虚荣心。他千方百计地磨炼自己的打人技巧。此外，他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为众人所唾弃的人，他到处都感觉到人们对他有一种几乎达到神秘程度的恐怖感，很难担保这一切对他不产生影响，不增加他的狂怒和他的兽欲。就连小孩子也知道，他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说也奇怪，我所见到的刽子手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聪明，通晓事理，然而自尊心都特别强，而且高傲自大。他们的自豪感是不是因众人对他们的鄙视而得到了发展，这种自豪感是不是由于他们意识到自己给受刑者带来了恐怖并感到自己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而得到了增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也可能是他们出现在刑场时的那种隆重仪式和戏剧性场面，促使他们产生了某种骄傲情绪吧。我记得有一个时期，我经常遇到一个刽子手，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此人中等身材，肌肉发达，四十岁左右，长着一张愉快而聪明的面孔和一头卷发。他总是显得特别高傲，悠闲，外表保持着一种绅士风度，他回答别人的问话时总是很简短，态度审慎而温和，不过，他那温和的态度中却带有几分傲慢，仿佛他在我面前有什么值得骄傲似的。值勤的军官常常当着我的面跟他谈话，似乎对他也很尊重。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故意在长官面前加倍地显示自己的谦恭、严酷无情和自尊感。长官跟他谈话时的态度越是友好，他就越发显得不肯让步，尽管竭力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我相信，他这时一定会觉得自己无比优越于跟他谈话的那位长官。这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在炎热的夏天，他手持一根细长的木棍，由卫兵监押着，奉命去打县城里的野狗。这个县城里无主的野狗特别多，而且繁殖得也特别快。节假日里，这些野狗常常伤害人，因此，当局下令派刽子手去消灭它们。然而就连这种卑贱的职务，显然也丝毫没有损伤他的自尊心。他由一个疲惫不堪的卫兵监押着，神气十足地在城里街道上走来走去，妇女和小孩一看见他那副神态，便吓得惊恐万状，可是他却怡然自得地、高傲地瞧着迎面走来的人。不过，刽子手们的日子却过得相当舒适。他们有钱，吃得很好，常常有酒喝。他们的钱是受贿得来的。一个被判处刑罚的民事犯，在受刑前总是要送些礼物给他们，即使花去最后一文钱也是要送的。对于那些有钱的犯人他们就进行敲诈，敲诈的数目则根据犯人的钱财状况而定，有时向他们要三十卢布，有时甚至更多。遇到特别有钱的犯人，他们更是拼命地讨价还价。当然，刽子手在用刑时不能打得太轻，如若这样，他就得拿自己的脊背负责。既然已经受了贿，他可以答应受刑者将不狠狠地打他。他的建议几乎总是被犯人欣然接受，否则，他就将残酷无情地刑罚他，他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有时，他甚至向很穷的犯人敲诈一笔巨款；犯人的家属常常跑来和他讨价还价，苦苦哀求他，如若不满足他的要求，就将有一场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激起的那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恐怖感，便发生了作用。关于刽子手，什么稀奇古怪的故事没有讲过啊！囚犯们曾亲自告诉我，刽子手一棍子下去就能把人打死。然而，有谁作过这样的试验呢？不过，这是可能的。人们说到这一点时都说得十分肯定。刽子手也亲自对我说过，他能够做

到这一点。人们还告诉我，他可以高高地举起棍子往犯人的脊背上抽打，但打过以后连一点微小的伤痕也看不出来，犯人也感觉不到一点疼痛。不过，关于刽子手的种种鬼把戏和毒辣手段我已讲得太多了。刽子手即使接受了贿赂并答应要轻打，但第一棍还是要使出全身力气来打的。这甚至已成了他们的惯例。打过第一棍以后，他可以把棍子放轻，特别是在他事先接受了钱的情况下。但是第一棍，不管是不是接受了钱，他是要使劲打的。说实在的，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受刑者立即习惯于刑罚，在挨过头一重棍以后，再挨轻棍就不那么痛苦了，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在受刑者面前显显威风，让他尝到点儿厉害，头一棍就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也知道他是同谁打交道；总之，就是为了炫耀自己。不管怎么说，在用刑前，刽子手往往十分兴奋，感到自己强大无比，可以主宰一切；在这种时刻，他是一个演员，观众们都怀着惊奇和恐惧的心情看着他；在打第一棍以前，他总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受刑者喊一声：“支撑着点，我要加热啦！”——这是在这种场合通常要说的两句不吉祥的话。很难想象，人的天性竟被歪曲到了这种地步。

住院初期，我听囚犯们讲这一类故事听得入了迷。躺在床上，我们都觉得无聊极了。天天都是如此！早晨医生们来查巡病房，还能使我们快活一阵，医生们走后就开午饭。在我们如此单调的生活中，吃饭当然是一件极大的乐事。每个人的饭菜是根据病情规定的。有的人只准吃带点米粒的稀汤，有的只准吃稀粥，还有的只准吃麦仁粥；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麦仁粥。囚犯们躺得时间久了，自然变得有点娇弱，因此都喜欢吃点好吃的东西。那些已经恢复健康或接近康复的病号，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炖牛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条公牛”。患坏血病的病人的伙食最好，——他们有洋葱拌牛肉、生姜拌牛肉等菜，有时还能分到一杯酒。面包也是根据病情规定的，有黑面包，半白面包，不过烤得都很好。院方给病人的饭菜规定得如此细致，只能使病人感到可笑。当然，有的病人任何食物都不能进口，可是有的病人胃口却好得什么都想吃。有些病人常常交换饭菜，于是给一个病号订的饭菜就转到另一个病人手里了。还有一些病人，他们嫌给自己规定的饭菜太少，便向别人买熟牛肉吃，或者把患坏血病病人的那份饭菜买过来，这样就能喝到克瓦斯，喝到医院自制的啤酒。有的人甚至吃双份饭菜。规定的份饭可以转卖。一份牛肉的价钱相当高，可卖到五个戈比。如果在我们病房里买不到，就打发人到另一间囚犯病房去买，那里买不到，就到那个所谓“自由的”军人病房里去买。反正总是能找到卖主的。有些人宁肯啃面包，也乐意攒几个钱。当然，大家都很穷，不过，那些有钱的病人还是常常打发人到市场上去买面包圈儿，甚至买其他香甜可口的食品。我们的看守在完成这些委托时，是完全无私的。午饭后是最苦闷的时刻；有的人因无事可做，便躺下睡觉，有的聊天，有的拌嘴吵架，有的则大声讲故事。若是没有新患者进来，那就更加寂寞无聊。新患者的到来，几乎总是对大家产生某种影响，如果他是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人，就更加如此。大家都打量着他，竭力想搞清楚他是什么人，从何地而来，他的案情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那些被解往别处而路过这里的犯人特别感兴趣；他们总是能讲述一些外地的情况，不过却很少提他们自己的事；关于他们自己的事，如果本人不讲，大家也从不打听，只问他从哪儿来？和谁同来？路途上如何？到哪儿去？等等。有的人一边听他讲述，一边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的往事：过去被押解时的情景，路途上的伙伴，刑吏，押解犯人的军官。受过棒刑的犯人一般是在傍晚时分被送进来。他们的到来，总是给大家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不过，关于这些我前面已经讲过了。然而，并非每天都有这样的犯人被送进来，无人送来时，我们就显得有点儿萎靡不振，所有的病人似乎都彼此讨厌起来，有的甚至开始争吵。就连那些被送来进行甄别的疯子，也使我们感到高兴。装疯卖傻的鬼把戏有时也被那些候刑犯人所采用，以便逃脱刑罚。有些人很快就被揭穿了，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行动策略，于是一个犯人装了两三天疯以后，突然又无缘无故地变得头脑清醒了，他们安静下来，快快不乐地开始要求出院。无论是犯人，还是医生，都不责备这个装疯卖傻

的人，就是提到他不久以前所要弄的那些鬼把戏时，大家也不觉得难堪；大家一声不吭地帮他办理出院手续，一声不吭地送他出院，两、三天以后，受完刑罚，他又被送到我们病房里来。这种事情曾经有过，但并不多见。但那些被送进来进行鉴别的真正的疯子，却往往给整个病房带来极大的灾难。有些疯子笑笑嘻嘻，疯疯癫癫，又是喊，又是跳，又是唱；囚犯们起初几乎总是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瞧，真有趣！”——他们看着一个刚刚被送进来的疯疯癫癫的囚犯说。然而，我一看见这种不幸的人，就感到十分难过和沉痛。我任何时候都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疯子。

疯子最初进来时往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然而他们那永无休止的疯癫行为和没完没了的乖张行径，很快就使我们大家讨厌透了，一两天之后就使得大家完全不能忍受了。其中有一个疯子在我们这里住了大约三个星期，最后把我们闹得简直都想跑出病房去了。真是无独有偶，这时又给我们送来一个疯子。这个疯子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件事发生在我服苦役的第三个年头。在我入狱后的第一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入狱后的头几个月里，那是在春天，有一次我和一批囚犯到两俄里以外的砖厂去帮助烧砖工人干活。为了到夏天能够烧砖，需要对砖窑进行维修。一天早晨，米—茨基和 B 领我去见当时在砖厂当监工的奥斯特罗日斯基军士。他是一个波兰人，已经六十多岁了，身材高大，瘦骨嶙峋，一副堂堂的仪表，令人肃然起敬。他很早以来就在西伯利亚服兵役，虽然出身平民，而且是在一八三 O 年波兰起义后作为一个普通士兵来这里的，但却颇受米—茨基和 B 的喜爱和尊敬。他总是读天主教的圣经。我曾同他谈过话，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和蔼可亲，头头是道，讲起故事来是那么引人入胜，他瞧着人时又是那么温和与真诚。从那以后，我有两年没有看见过他，我只是听说，他因某一案件受到了侦讯，现在却突然作为一个疯子被送到我们病房里来了。他尖叫着、哈哈大笑着走了进来，接着就以最不雅观的姿势在病房里跳起卡马林民间舞蹈来。囚犯们都非常高兴，我却感到十分悲伤……三天之后，我们大家简直不知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了。他跟人争吵，打架，尖叫，唱歌，甚至夜间也时常做出一些令人十分讨厌的乖张事情来，把大家厌烦得简直想要呕吐。他谁也不怕。人们给他穿上疯人紧身衫，然而这样一来我们更倒霉了，虽然不穿紧身衫时，他也是寻衅闹事，和人打架。在这三个星期里，全病房的人往往都异口同声地请求医务主任把这位宝贝调到另一间囚犯病房去。两三天以后，那边又请求把他调到我们这儿来。由于一次进来了两个不守本分、好打闹的疯子，我们这两个病房便轮流看管他们。可是，两个疯子在一起则更糟。后来把这两个疯子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这时我们才感到轻松了一些……

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奇怪的疯子。有一年夏天送来一个身体强壮、外表显得十分笨拙的候刑犯人，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长着满脸难看的麻瘢，两只小眼睛总是红肿着，面孔显得特别阴沉和郁闷。人们把他安置在我旁边。原来他性情十分安静，跟谁也不说话，总是呆呆地坐在那儿，象是在想心事似的。天一黑，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看样子象是想告诉我一件特别重要的秘密；他没有一句客套话，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一两天之内他将受两千棍的刑罚，现在又不对他用刑了，因为上校的女儿正在替他斡旋。我困惑不解地瞧了他一眼，对他说，据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上校的女儿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我还没有猜透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并不是作为一个疯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病人被送进来的。我问他患了什么病？他说他不知道，也不知为什么把他送到这里来了，还说他身体十分健康，上校的女儿爱上了他；那是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前，有一天她坐车从拘留所门前经过，当时他正巧扒着铁窗往外看。她一眼看见他，立刻就爱上了他。从那以后，她曾借机到拘留所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和父亲一块去的，说是找她哥哥，她哥哥是一位军官，当时正在那儿值勤；第二次是和她母亲一块去给囚犯分发施舍品，当她从他身边经过时，她低声告诉他，她爱他，并将设法搭救他。奇

怪的是，他竟如此不厌其详地向我讲述这件荒诞不经的故事，这一切当然完全是出自他那病态的、可怜的头脑中的幻想。他真诚地相信他能够逃脱这次刑罚。他用平静而坚定的口吻讲述那位小姐如何狂热地爱他；尽管这个故事十分荒诞可笑，然而从一个年近半百、精神如此颓丧、外貌又如此丑陋的人的口中，竟能听到一位钟情的小姐的桃色事件，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异。说也奇怪，对刑罚的恐惧竟把一个懦弱的灵魂捉弄到这样可悲的地步。他也许真的从铁窗里看见过什么人，结果，他那因恐惧而产生的、时时刻刻都在增长着的精神失常状态，便以这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个不幸的大兵一生中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什么姑娘，忽然间却幻想出这样一个完整的恋爱故事来，于是便本能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不放。我默默地听完他的故事，然后告诉了其他囚犯。当大家都对此表示好奇的时候，他却象是害羞似的一声不吭。第二天，医生长时间地询问他的病情，他说他什么病也没有，经过检查证明他也确实无病，于是医生便让他出院。医生走出病房后，我们才发现他的病历上写着 sanat(痊愈)，这时要想把他的情况告诉医生也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就连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过，这件事完全是那位送他进医院的军官的过错，那位军官并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这儿来。这是一次疏忽大意。——也许，那些送他进医院的人也只是猜测，其实并不完全相信他已经神经失常，他们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就把他送来进行鉴别。不管怎么说，两天以后，这个不幸的人被带去受刑。结果，出乎意外的体刑使他大为震惊；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相信他会受刑。当把他带到士兵行列中间时，他开始喊叫：“救命！”受完刑罚后，他又被送进医院，由于我们病房里没有床位，他被送进另外一间。我曾打听过他的情况，听说他在八天之中没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他感到困惑，感到特别伤心……后来，等背上的伤治愈后，便把他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至于说到治疗和服药，据我观察，那些轻病号几乎从不遵照医嘱去服药，重病号和真正有病的人却很喜欢治疗，并按时吃药；不过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外科治疗手段，什么拔罐子呀，用水蛙吸血呀，热罨剂呀，放血呀，一般平民都非常喜欢并相信这些治疗方法，我们这些病号也很乐意，甚至非常喜欢采用这些方法。有一个奇怪的情况使我很感兴趣。有些人虽然能够经受住棍棒和树条的抽打，但拔罐子却往往使他们疼得哼哼呀呀，叫苦不迭。是他们变得娇气了呢，还是故意装腔作势，——那我就不知该作如何解释了。的确，我们的医用吸血罐有点特殊。那种能够立即刺进皮肤的小型吸血罐早已被我们的医师丢失或弄坏了，也许是破旧得不能再用了，因此不得不用手术刀在皮肤上切许多小口。每拔一次罐子需要切十二个小口。用原来的那种小型吸血罐吸血并不疼，吸血罐上的十二个针头猛然刺进皮肤，几乎感觉不到疼痛。然而用手术刀切就不同了。手术刀切得很慢，能够感觉到疼痛；比方说，拔十个罐子，就得切一百二十个小口，同时切这么多伤口，当然会感到疼痛的。我拔过这种罐子，尽管有些疼，使人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致于疼痛到忍受不住而呻吟起来。有时，看着一个身材高大而又强壮的小伙子疼得又是哭又是喊，确实叫人感到可笑。总之，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有的人在处理重大事件时既果敢又沉着，可是当他待在家里无事可做时，却无病呻吟起来，大要小孩子脾气，把饭端到他面前他也不吃，还动不动就骂人；什么也不合他的心意，什么都使他感到不快，认为人人都对他粗暴无礼，人人都折磨他，——总之，正象俗话所说的，这些老爷们纯粹是温饱生是非；这种人在普通老百姓中间也能遇到，在我们监狱里，由于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就更加屡见不鲜了。在病房里，这种娇生惯养的人往往受到大家的嘲笑，有些人甚至嘲骂他；于是他沉默起来，仿佛正等着人家骂他，让他安静下来似的。乌斯季扬采夫特别不喜欢这种人，他从不放过机会辱骂这种娇生惯养的人。其实，他也从不放过机会和任何人吵骂。吵骂已成了他的乐趣和需要，这当然是因为他有病，或多或少也是出于愚蠢。瞧吧，一开始他聚精会神地认真倾听别人的谈话，然后就开始用平静而又充满自信的声调教训起别人来。他什么事都爱管；好象他是专门被派到我们这儿维持秩序或监督别人的

行动似的。

“他什么事都管，”囚犯们往往笑着说。不过大家都不和他一般见识，尽量避免跟他吵骂，有时只是付之一笑。

“看他那一大套训人的话！拉三车也拉不完。”

“我说什么啦？不能在混蛋面前脱帽行礼，这是一定的。只不过用手术刀划破了一点儿皮，他喊什么？爱吃鱼就别嫌腥，应该忍着点儿。”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不，弟兄们，”一个囚犯插嘴道，“手术刀倒没什么，我试过了；要是被人揪着耳朵不放，那才疼呢。”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怎么，你的耳朵被人家揪过吗？”

“你以为没有吗？当然被人揪过啦。”

“怪不得你的耳朵向外伸得那么长。”

这个小个子囚犯叫沙普金，他的两只耳朵确实很长，向两边伸着。他是个流浪汉，年纪还很轻，但办起事来却很老练稳重，他话里总是蕴藏着一种严肃的幽默感，这就使得他讲出来的故事具有很多滑稽可笑的成份。

“我干吗要想你的耳朵被人揪过没有呢？你这个笨蛋，我干吗要想这个？”乌斯季扬采夫又插嘴了，他悻悻地望着沙普金，尽管沙普金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话，而是向大家讲的，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是谁揪过你的耳朵？”有人问道。

“谁？’当然是警察局长啦。弟兄们，这是我流浪时发生的事。我们走到 K 城，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一个叫叶菲姆，他没有绰号，也是一个流浪汉。我们路过托尔明的时候，在一个农民家里发了一点儿财。托尔明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我们一进村，就四下张望，看能不能在这儿捞到点什么，然后就溜之大吉。我们在乡下自由得很，愿意到哪儿去就到那儿去，不象城市里这样提心吊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嘿，不管怎么说，先进酒馆再说。我们回头一看，有个乞丐模样的人走到我们跟前，他穿得破破烂烂，胳膊肘子露在外面。我们就东拉西扯起来。

“他说：‘请问，你们有没有公文①？’

****
①身份证。———作者注。

****

“我们说：‘没有，没有公文。’

“他说：‘原来是这样。我们也没有。我这里还有两个好朋友，他们也在库库什金将军麾下当差②。我斗胆建议，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吧，不过我暂时身无分文，先请你们破费一瓶。’

****

②即住在布谷鸟歌唱的森林里。他是想说，他们也是流浪汉。———作者注。库库什金是俄国人的姓。在俄语里，此字与布谷鸟是同根词。这是一句双关语，暗指他们也是流浪汉。

****

“我们说；‘欢迎，我们太高兴啦。’于是我们就喝起酒来了。这时他们告诉我们，可以留在这儿做木匠活儿，这是我们的本行。城边上有一座房子需要翻修，那里住着一个有钱的小市民，真是家财万贯。我们当天就去拜访了他。我们五个人刚来到这个富户人家，当夜就被人逮住了。我们被送进派出所，后来又带我们去见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说，他要亲自审问我们。他叼着烟袋走出来，后边有人给他端着茶，这个家伙很壮实，留着连鬓胡子。他坐下来。这时，除了我们几个人以外，又送来三个，也是流浪汉。弟兄们，其中有一个流浪汉特别有意思，他说他什么都记不得了，任凭你用木棍敲他的脑袋，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什么都忘了。警察局长转过身来问我：‘你是什么人？’他大声咆哮着，象打鼓似的。嘿，当然罗，我也这样说：‘大人，我什么都记不得啦，一切都忘啦。’

“他说：‘你等一等，我还有话跟你说，我认得你这副嘴脸，’他一边说，一边瞪着眼珠子瞧我。可是在这以前我根本就没见过他。接着，他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拔腿就跑，大人。’

“‘你的名字就叫拔腿就跑吗？’

“‘是的，大人。’

“‘那好吧，就算你是拔腿就跑，你呢？’他转身问第三个。

“‘我后边跟，大人。’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就叫我后边跟，大人。’

“‘是谁给你这个下流痞起的这个名字？’

“‘是好人给我起的，大人。世界上有的是好人，大人，这您是知道的。’

“‘那些好人是谁？’

“‘这我可忘记啦，大人，请您开开恩饶恕我吧。’

“‘全忘了吗？’，

“‘全忘啦，大人。’

“‘你大概也有过父母吧？……你总该记得他们？’

“‘应该说是有过，大人，不过，我也忘得差不多了；也许有过，大人。’

“‘在这以前，你住在哪里？’

“‘住在森林里，大人。’

“‘总住在森林里吗？’

“‘总住在森林里。’

“‘冬天呢？’

“‘我没有见过冬天，大人。’

“‘好吧；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斧头，大人。’

“‘你？’

“‘快点磨，大人。’

“‘你？’

“‘不慌不忙地磨，大人。’

“‘你们什么都记不得了吗？’

“‘我们什么都记不得啦，大人。’

“他站着，笑着，我们瞧着他，也嘿嘿地笑。可是有时候他会冷不防给你来一拳，把你的门牙打掉。象他这样的人，往往都长得又肥又壮。

“他说：‘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以后还要审问他们；喂，你留下别走，’这是对我说的。‘到这边来，坐下！’我走过去一瞧：桌子上又是纸，又是笔。我心里想：他要拿我干什么

呀？这时他对我说：‘坐在椅子上，拿笔写！’他一边说，一边揪着我的耳朵，一个劲儿地揪。我看着他，就象魔鬼看着神甫一样。我说：‘我不会写呀，大人。’他又说：‘写！’

“我说：‘您就发发慈悲吧，大人。’——‘写，你会写什么就写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继续揪着我的耳朵不放，一个劲儿地拼命拧！唉，弟兄们，我宁肯让他抽打我三百树条，哪怕抽得我两眼冒金花，也比揪耳朵好受。可他仍一个劲儿地催我写！”

“怎么，他发疯了吗？”

“不，他没有发疯。原来是这么回事——T 城有一位书记官，不久前耍了个鬼把戏：偷了一笔公款，带着逃跑了，他的耳朵也是向外伸着。当时，已往各地下了通缉令。他根据耳朵的特征，以为我就是那位书记官，所以就来试探我，看我会不会写字，写得怎么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小伙子，揪得痛吗？”

“是的，痛极啦。”

发出一阵哄笑。

“喂，你写了吗？”

“写什么呀？我拿起笔来在纸上乱划，他一把抢过去，扔掉了。嘿，他打了我十几个耳光，就因为这件事把我关进了监狱。”

“你真的会写字吗？”

“从前会写来着，可是现在一拿起笔来，就什么都不会写了……”

我们那寂寞的时光，往往就消磨在这种故事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消磨在这种废话里了。天哪，多么无聊啊！天又长又闷，每天都是如此。要是有一本书看看也好啊！入狱初期，我常常住院，有时是因病，有时只是想离开监狱，到这儿来躺一躺。我在监狱里感到很难受，比这里更难受，特别是精神上。怨恨，敌视，争吵，嫉妒，经常不断地对我们贵族寻衅找碴，阴险恶毒的面孔！在医院里，大家都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相处得也比较友好。一天中最烦闷的时刻是在天黑掌灯以后。大家都早早地躺下睡觉。昏暗的夜灯照射在门口附近，闪着一些光点，我们这一头却显得很黑。室内的空气变得又腥又臭又闷热。有的人睡不着觉，便戴上睡帽，低着头在床上静坐一两个小时，仿佛在想什么心事似的。这时，你一小时一小时地瞧着他，竭力猜测他都在想些什么，借以消磨时光。有时你开始幻想，回忆往事，在想象中勾画出一幅幅广阔而又鲜明的图画；这时你会回忆起一些在别的时候回忆不起来、也不会象现在感受得如此强烈的琐碎事情来。有时你对未来进行猜测：将来如何出狱？出狱后到何处去？何时才能实现？将来能否返回故乡？想着，想着，你心中便产生出了希望……有时你干脆数起数来：一，二，三，四……以便在数数中入睡。我有时甚至数到三千，仍不能入睡。有人在翻身。乌斯季扬采夫又咳嗽起来，这是一个肺痨病患者的干咳，接着他又有气无力地呻吟起来，每呻吟一声都要说一句：“主啊，我有罪呀！”在万籁俱寂中，听着这病人的衰弱无力的呻吟，会使你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角落上有两个人还没睡觉，他们正坐在床上说话。

其中一个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讲述那遥远的一去不复返的往事，讲述自己的流浪生活，孩子，老婆，过去的秩序。单从他那低沉的话音中，你就会感觉到他所讲述的一切已经永远不会再回到他身边来了，他，讲故事者本人，已经同一切失掉了联系；另一个人在听他讲。这时，能够听得见的只有那静悄悄的、有节奏的低语，犹如远处的潺潺流水声……我记得，在一个漫长的冬夜里，有一次我听到了一个故事。起初，我仿佛觉得它是一场噩梦，我仿佛正在患热病，这一切都是我在昏迷不醒中梦见的……

第四章　阿库莉卡的丈夫
(故事)

夜已深了，约摸有十一点多钟。我本来已经入睡，但突然又醒了。远处夜灯的昏暗而微弱的光线勉强地照射到病房里来……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已入睡。乌斯季扬采夫也睡着了，在一片寂静中，听得出他那沉重的呼吸声以及痰在喉咙里呼噜呼噜作响的声音。忽然，从远处穿堂里传来前来换岗的哨兵沉重的脚步声，枪托碰在地板上，发出当的一声响。病房的门打开了，班长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查点病人。一分钟以后，门又关上了，换上了新岗哨，班长走远了，四周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这时我才发现，在我左边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人还没有睡觉，他们仿佛在窃窃私语。病房里常有这样情况：有时两个病人的床位紧挨着，但他们往往很多天，甚至几个月都不说一句话；有时却突然为深夜的寂静所激发，他们说起话来，一个人开始推心置腹地向另外一个讲述起自己的往事。

看来，他们已谈了很久了。故事的开头我没有听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全部都听得清楚；不过我渐渐习惯了，开始完全听懂了。既然睡不着觉，我何妨不听一听呢？……一个人半躺在床上，热情地讲述着，他微微抬起头，把脖子伸向自己的同伴。他显然很激动，也很兴奋；他很乐意讲。听他讲故事的人，面色阴郁、毫无兴趣地坐在床铺上，两腿搭拉着，偶尔喃喃地回答一句，以表示对讲故事人的同情；他这样做似乎主要是出于礼貌，并非出于真实的感情。他不时地取出鼻烟往鼻子里吸。他叫切列文，是感化连的士兵，年纪在五十岁左右，他是一个总爱绷着脸的空谈家，喜欢发表长篇冷冰冰的演说，又是一个自负的傻瓜。讲故事的人叫希什科夫，还很年轻，三十来岁，是我们监狱的民事犯，在缝纫车间干活。在此以前，我很少注意过他，就是后来，在我蹲监狱的整个期间，他也从未引起过我的兴趣。他是一个头脑空虚、性情乖张的人。他有时沉默寡言，抑郁不乐，行为粗暴，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有时又突然参与某一件事，从一个狱室跑到另一个狱室，到处传播消息，造谣中伤，拨弄是非，常常因为一点点小事而发火动怒。人们揍他一顿以后，他又沉默起来。他是一个胆小怕事而又软弱无力的年轻人。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很藐视他。他个子矮小，骨瘦如柴，眼神总是显得惶恐不安，有时又面无表情地陷入沉思。当他讲述什么事时，一开头总是兴致勃勃，热情洋溢，甚至手舞足蹈——可是突然又把话题扯开，讲起别的事情来，或者被一些新的细节所吸引，忘记了前面讲的是什么。他常常骂人；当他骂人时，总是责怪别人对不起他，而且十分激动，有时甚至失声痛哭起来……他三弦琴弹得不坏，而且很喜欢弹，节日里甚至也常跳舞，如果叫他跳，他也能跳得很好……人们要是叫他干点什么事情，他都很乐意去干……这倒不是因为他顺从听话，而是因为他喜欢参与大伙的事情，乐意讨好大伙。

我很长时间都未能听清楚他讲的是什么。起初我也觉得他总是离开本题，被一些无关紧要的情节所岔开。他大概也看出切列文对他的故事几乎毫无兴趣，因而他竭力使自己相信，听他讲故事的人正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如果他不这样相信的话，他可能会感到非常伤心的。

“他常到集市上去，”他继续讲道，“大家都向他鞠躬行礼，一句话——他是个财主。”

“你不是说他开铺子吗？”

“嗯，是的，他开着一个铺子。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很穷。真是一贫如洗呀！女人们从河里打水，爬上石岸，往菜园里浇水；人们成天价忙忙碌碌，可是到了秋天，连碗菜汤都喝不上。真穷啊！他却不然，他开了一大片荒地，雇了三个长工替他耕种，另外还有蜂房，出售蜂蜜，还贩卖牲口。象他这样的人，在我们那个地方是很受人尊敬的。他已经年过花甲，一把老骨头也硬了，满头白发，个子也很高大。他常常穿着狐皮袄到集市上去，人们对他很恭敬，觉得他很了不起。‘您好啊，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老爹！’——‘您也好啊！’他对谁都不傲慢无礼。‘祝您长寿，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您日子过得可好哇？’他问道。‘我们的日子嘛，等到油烟变白的时候，就好了。老爹，您过得可好哇？’——‘我们嘛，活着白受罪罢了，也是无所事事呀。’——‘祝您长寿，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他不藐视任何人，他说出来的话，都一字值千金。他读过很多书，一肚子学问，什么经书都看过。他常常让老伴坐在自己跟前，对她说：‘喂，老伴呀，你也听听，心里明白明白。’说完就讲解起来。他的老伴其实并不老，是续弦，因为前妻没有留下孩子。这位后娶的老伴，也就是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年纪都还小，小儿子瓦夏是他六十岁那年生的，女儿阿库莉卡是他最大的孩子，已经十八岁了。”

“她就是你的老婆吗？”

“别着急，一开头菲利卡·莫罗佐夫就从中捣乱。菲利卡对安库季姆说：‘咱们分开吧；你把那四百卢布还给我，难道我是你的长工不成？我不想和你一块做生意了，你的阿库莉卡我也不想娶啦。我现在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括了。我父母已经双亡，我要把所有的钱都喝掉花光，然后就去当雇佣兵，十年后等我当上大元帅再来见你们。’安库季姆真的把钱还给了他，跟他把账完全算清了——因为他父亲曾和老头子合伙做过生意。老头子对他说：‘你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他却说：‘嘿，是我不可救药，还是你不可救药？我跟你这个白胡子老头只能学得一毛不拔。两个臭钱你都看在眼里，遇到什么破烂你都拣——看能不能拿回家去熬粥喝。我可看不上你那些破烂。你就知道攒钱，攒到最后，连你一块儿进坟墓。我可是个有志气的人。我才不娶你的阿库莉卡呢：就是不娶，我也已经和她睡过觉了……’

“安库季姆一听火冒三丈，大声骂道：‘你竟敢污辱一个诚实父亲的贞洁女儿！你这条毒蛇，人面兽心的东西，你说说，你什么时候和她睡过觉？’他一边骂，一边气得浑身发抖。这是菲利卡亲口告诉我的。

“‘反正我和她睡过觉了，别说我不娶她，别人也不会要她了，就是米基塔·格里哥里伊奇如今也不会娶她啦，因为她已经不贞洁啦。从去年秋天她就和我私通。你现在就是请我吃一百只大虾，我也不同意娶她。不信，你给我一百只大虾试试看——我也不同意……’

“于是，这小伙子在我们那个地方吃喝玩乐起来了，闹得天翻地覆，满城风雨。他交了一些酒肉朋友，花钱如流水，花天酒地地过了三个月，把什么都挥霍尽了。他常说：‘等我把钱花光，我就卖房子，卖一切东西，然后就去扛长活，或者流浪！’他从早到晚总是醉醺醺的，套上两匹马，系上铃挡，赶着车到处游逛。大姑娘都爱他爱得发狂。他四弦琴弹得可

棒啦。”

“这么说，他早就和阿库莉卡有勾搭罗？”

“别着急，你听我说。我当时也是刚刚把父亲埋葬掉，我母亲给安库季姆家烤面包，我们全都给他家干活。我们的日子很苦。咳，我们原先也在树林后面开了一片荒地，种了点庄稼，可是父亲一死，什么都全完啦，老兄，我也吃喝玩乐起来了。为了向母亲要几个钱花，我常常跟她怄气打架……”

“打母亲，这可不好。这是造孽啊。”

“老兄，我一天到晚喝得烂醉如泥。我们家的房子不算好，但还勉强能住，虽说快坍塌了，但终归是自己的呀，屋子里空荡荡的，一无所有。我们常常挨饿，有时一个星期也弄不到一碗饭吃，只好喝西北风。母亲常常骂我，责备我，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老兄，我那时和菲利卡·莫罗佐夫形影不离，从早到晚和他鬼混。他对我说：‘你给我弹几声吉他听听吧，再给我跳个舞，我躺着向你丢钱，我可是一个最有钱的人呀。’他什么事没干过啊！只是偷来的东西他不要。他说：‘我不是贼，而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又说：‘走，咱们往阿库莉卡家大门上涂松焦油去；①我不想让阿库莉卡嫁给米基塔·格里哥里伊奇。
****

①谁家大门上要是被人涂上松焦油，就表明这一家有不正派的女人。
****

对我来说，现在这件事比喝果子冻更为重要。’老头子很早就想把女儿嫁给米基塔·格里哥里伊奇。米基塔也是一个老头子，老伴早已死去，戴着老花眼镜做生意。这老头子一听人家背后说阿库莉卡的坏话，就打退堂鼓了，说：‘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呀，我可不愿意在老年再结婚啦。’我们就这样给阿库莉卡家大门上涂上了松焦油。家里人又是打她，又是骂她……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大嚷大叫：‘我非要把她打死不可！’老头子却说：‘若是从前，在正直的长老面前，我在篝火旁就会把她剁成肉酱，可现在世界上却是一团漆黑和腐败透顶啊！’街坊邻居常常听见阿库莉卡嚎啕大哭：家里人一天到晚地打她。菲利卡在集市上扯着嗓门高喊：‘阿库莉卡可是个陪酒的好姑娘呀。长得又俊，穿得又漂亮，又有海量！这一回，我要让他们一辈子都记着。’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我碰见阿库莉卡担着水桶迎面走来，我冲着她喊道：‘您好，阿库琳娜·库季莫夫娜！祝您健康，您穿得这么漂亮，是从哪儿弄来的呀？告诉我，你的情郎是谁？’我刚一说完，她便瞪着两只大眼睛打量起我来，这时她已经消瘦得很厉害了。正当她打量我的时候被她妈妈看见了，以为她在和我吊膀子，老婆子便站在大门口喊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又磨起牙来啦！’当天她又挨了一顿打。往往一打就是一个钟头。她妈妈说：‘我非要把她打死不可！从今以后，她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

“这么说，她是个放荡女人罗！”

“你听我往下说呀，大叔。那时候我经常和菲利卡一块儿喝酒。有一天，我母亲来找我——当时我正躺着。母亲说：‘你这个下流东西，干吗老躺在这里？你纯粹是一个恶棍。’她一个劲儿地骂我。又说：‘你和阿库莉卡结婚吧。她爹妈现在都乐意把她嫁给你，还同意拿出三百卢布作为她的陪嫁。’我对妈说：‘妈，现在人人都知道她不贞洁呀！’妈说：‘你这个傻瓜，要知道，一结婚就什么闲话也没有啦；她若是一辈子都觉得在你面前有罪，这对你就

会更好。我们可以用他们的钱过日子；我已经和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说好啦。她很听我的话。’我说：‘把二十卢布放在桌子上，我才娶她。’嘿，信不信由你，一直到结婚那天我都醉得不省人事。这时，菲利卡·莫罗佐夫又威胁我说：‘我要把你这个阿库莉卡的丈夫的肋骨打断，只要我愿意，我每天都可以跟你老婆睡觉。’我说：‘你吹牛，你这个狗养的！’于是，他满街叫嚷着败坏我的名誉。我跑回家，对妈说：‘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拿出那五十卢布，我就不结婚啦。’”

“他们真的乐意把阿库莉卡嫁给你吗？”

“嫁给我？为什么不乐意呢？要知道我们也不是名声不好的人家呀。我父亲只是因为一场大火才破了产，要不然，也许比他们还富呢。安库季姆说：‘你们是无家可归的穷光蛋。’我回敬他道：‘你们家大门上的松焦油抹得也不算少呀！’他说：‘怎么，你看不起我们？你说说她怎么不贞洁？别人的嘴是封不住的。上有上帝，下有门坎，你可以不娶她。不过，你得把拿去的钱还给我。’当时我立即和菲利卡商量好，派米特里·贝科夫去对他说：我要当众侮辱他。老兄，实话跟你说吧，一直到结婚那天，我都醉得不省人事。只是到举行婚礼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婚礼举行完以后，我们坐车回到家，坐下来，我舅舅米特罗凡·斯切潘内奇说：‘虽说名声不好，但事情办得挺好，事情一办完就什么也别提啦。’安库季姆老头也喝得酩酊大醉，他甚至痛哭起来——眼泪顺着胡子往下流。嘿，老兄，你猜这时我怎么着：还在举行婚礼以前，我就准备好了一条鞭子，事先放在衣袋里，这时我把鞭子拿出来，想马上拿阿库莉卡开开心，让她也尝尝用不正当的欺骗手段结婚是一种什么滋味，同时也让人们知道我结婚时并不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傻瓜……”

“对！让她一辈子都记着……”

“不，大叔，你别作声。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风俗，婚礼举行完以后，得马上把新郎和新娘送入洞房，别的人都留在外面喝酒。我和阿库莉卡入了洞房。她呆呆地坐着，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看来，她很害怕。她的头发也象亚麻一样白。两只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她默默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活象家里坐着一个哑巴。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老兄，你想想看：我已准备好了鞭子，这时我便把鞭子放在床上，可是她，老兄，却一点也不在乎，她好象任何对不起我的事都没有做过似的……”

“看你说的！”

“她满不在乎；俨然象是一个清白人家的清白姑娘。可是，老兄，在这以前她为什么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呢？菲利卡·莫罗佐夫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败坏她的名声呢？”

“是啊。”

“这时我立刻跳下床来，跪在她面前，同时把手放在胸口对她说：‘亲爱的阿库琳娜·库季莫夫娜，请你饶恕我这个傻瓜吧，我真不该把你看成一个坏女人。请你饶恕我这个下流东西吧！’可是她却坐在床上，瞧着我，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笑着，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她又是哭，又是笑……我于是出去，对众人说：‘嘿，我现在要是遇上菲利卡·莫罗佐夫，他就别想活啦！’两位老人也十分激动，不知向谁祷告才好；我母亲几乎跪在她脚下，嚎啕大哭起来。那个老头子说：‘我亲爱的女儿呀，要是早知道这样，我也就不会让你嫁给这样

一个女婿了。’婚后第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块儿去教堂：我戴一顶羊羔皮帽，身穿薄呢子上衣和天鹅绒的裤子；她穿一件兔皮大衣，头上蒙着绸头巾——她配得上我，我也配得上她，我们一块儿走着，真是天生的一对！人们都羡慕我们；我自己嘛，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至于阿库莉努什卡①，我既不能在别人面前夸奖她，也不能在别人面前贬低她，她也是十里挑一的呀……”

****

①阿库莉卡和阿库莉努什卡都是阿库琳娜的爱称。

****

“那好啊。”

“你往下听吧。结婚第二天，我还没有醒酒，就避开客人，跑出去喊道：‘把菲利卡·莫罗佐夫这个坏蛋给我抓来，——把这个下流东西带到我这儿来！’我跑到集市上大喊大叫。我当时还没有醒酒；有三个人在弗拉索夫家门口强行把我拦住，送回家去。这时全镇的人都谈论开了。姑娘们在集市上交头接耳地说：‘亲爱的姑娘们，你们可知道吗？阿库莉卡原来是贞洁的呀！’可是没过几天，菲利卡就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你把老婆卖掉吧——保管你有酒喝。我们那边有个当兵的叫亚什卡，他就是为了这个才娶老婆的：他不和老婆睡觉，可是三年没断过酒。’我冲着他说：‘你是个坏蛋！’他却说：‘你是个傻瓜。要知道结婚那天你并不清醒。你醉醺醺的，怎么懂得这种事情？’我回到家，喊道：‘你们是在我喝醉的时候骗我结婚的！’妈妈这时动手打我。我说：‘好妈妈呀，你的耳朵让人家用金钱给堵住了。你把阿库莉卡交给我！’嘿，我开始揍她，老兄，我一连揍了她两个小时，一直揍到我自己都站不稳了才住手；她一连三个星期都没起床。”

“可也是啊，”切列文冷淡地说，“不打她们，她们就会……你碰见她和情人在一起了吗？”

“没有，碰是没有碰见，”希什科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高嗓门说，“我感到十分难过，人们都嘲笑我，嘲笑得最起劲的就是菲利卡。他说：‘你老婆是一个模特儿，是供人玩赏的。’他把我连同亲戚们都一块儿请去，打开酒瓶说：‘他夫人可是个善良的女人呀，气度高贵，彬彬有礼，又会待人处事，各方面都好——他现在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不过，小伙子，你是否还记得，你曾亲自往她家大门上抹过松焦油呀？’我醉醺醺地坐着，这时他突然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按倒在地，说‘跳舞呀，你这个阿库莉卡的丈夫，我就这样揪着你的头发，你给我跳个舞，也让我开开心。’我喊道：‘你这个坏蛋！’他冲着我说：‘我现在就带着你的亲朋好友们到你们家去，我要当着你的面，用树条抽打你的老婆阿库莉卡，我想抽打她多少下就抽打多少下。’信不信由你，从那以后，我整整一个月都不敢走出家门：我怕他来污辱我。就为了这件事，我又开始打她……”

“干吗老打呢？俗话说，捆得住手脚，却捆不住舌头。光打也不是办法。你教训教训她，给她点厉害看看，然后再去哄哄她。女人们就是这样。”

希什科夫沉默了片刻。

“我感到很难过，”他又开始讲道，“老毛病又犯啦：我打她，有时从早一直打到晚；她一举一动我都看着不顺眼。不打吧，我又觉得无聊。她常常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望着窗外啼哭……她老是哭，有时看着她也真叫人可怜，不过我还是打。我母亲也常常为了她而责骂

我：‘你这个下流东西，天生坐牢的贱骨头！’我叫喊着：‘我要把她打死，你们现在谁也别来劝我；都是因为你们用欺骗手法让我跟她结婚。’起初，老头子安库季姆还出面袒护他女儿，他亲自跑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要到法院去告你！’后来他也就撒手不管了。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也完全屈服啦。有一天她跑来找我，哭哭啼啼地央告我：‘我有一件事求求你，伊凡.谢苗内奇，事情虽然不大，但挺重要。你就行行好，饶恕她吧！这都怪那些恶人诽谤中伤我们的女儿呀；你自己也知道，她是贞洁的……’老婆子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哀求我。这时我故意摆起架子来，说：‘你们的话，我现在连听都不想听！我现在想怎样对待你们就怎样对待你们，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菲利卡·莫罗佐夫是我的相好，是我的好朋友……’”

“这么说，你又和他混在一起啦？”

“哪儿的话！怎么还能接近他呀！他完全喝上瘾了。他把所有的家产喝光以后，被一个小市民雇去，顶替他的大儿子去当兵。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风俗，一个被雇去当兵的人，在被送走当兵以前，全家的人都得迁就他，他就是那一家的主人。钱是一次交清的，在被送去当兵以前，他就住在雇主家里，往往一住就是半年，把雇主家里闹了个天翻地覆，闹得只有菩萨才能忍受得住。他说：‘我替你们的儿子当兵，所以我就是你们的恩人，你们全家都得尊敬我，不然我就不去了。’菲利卡把这个小市民家里搅了个底朝天，他和主人的女儿睡觉，每天午饭后揪着主人的胡子，想怎么揪就怎么揪，只要能使他感到快活就行。他每天洗澡，要人家用酒代替水泼在石块上，使之喷出蒸汽，还让女人亲自把他抬进浴室。游逛够了回家时，他站在大街上喊道：‘我不想走大门，你们把围墙给我拆掉！’人们便把围墙拆掉，让他从大门旁走进去。最后该送他当兵了，这时他才清醒过来。大街上人山人海，家家户户都出来观看送菲利卡·莫罗佐夫去当兵！他向四面鞠躬。这时，阿库莉卡正好从菜园回来；菲利卡在我家大门口碰见了她。‘站住！’他一边喊，一边从车上跳下来，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亲爱的，你是我的灵魂，我爱你已经两年了，如今人们敲锣打鼓送我去当兵。请你这位诚实父亲的贞洁女儿饶恕我吧，因为我是一个卑鄙下流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说着，又深深地给阿库莉卡鞠了一躬。阿库莉卡这时站着不动，起初仿佛有点害怕，然后也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并说：‘也请你原谅我吧，善良的好汉，我一点儿都不怨恨你。’我跟着她走进屋里，我说：‘你这个下贱的女人，你和他说了些什么？’信不信由你，她看了我一眼，说：‘我现在爱他，胜过光明！’”

“咳！真是！……”

“我那天一整天都没跟她说一句话……天黑时我说：‘阿库莉卡！我现在要杀死你！’我一夜都没有睡觉，走到穿堂喝了几杯克瓦斯，这时天也快亮了。我进屋对她说：‘阿库莉卡，快收拾东西，跟我到地里干活去。’在这以前我们就准备去干活，妈妈也知道这事。她说：‘这才是正经事呢；现在是农忙季节，我听说那边种地的人总是不干活，已经有三天没下地了。’我把车套好，一句话也没说。一出我们那个镇，就是一片蔓延十五俄里的松林，过了松林，就是我们家开垦的那块田地。我们在松林里走了大约三俄里，然后我勒住马，说：‘阿库莉卡，你下车吧；你的末日到啦！’她瞧着我，十分害怕，一声不吭地站在我面前。我说：‘我讨厌你啦，你祷告上帝吧！’我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她那两根辫子又粗又长，我把辫子往手上一缠，从她身后用两条腿把她夹住，抽出刀，把她的头往后一扳，照着喉咙就是一刀……她刚一叫喊，血就喷了出来，我扔下刀，伸开胳膊从前面抱住她，放在地上，我拥抱她，大哭大喊地呼唤她；她也喊，我也喊；她全身颤抖，竭力挣脱我，血流在我身上，脸上，

手上；血不停地往外涌呀，涌呀。我抛开她，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连马也扔下不管了，只顾往前跑，从房后跑回家，一头钻进浴室：我们那间浴室早已破烂不堪了。一直蹲到深夜。”

“阿库莉卡呢？”

“她嘛，我跑掉以后，她也站起来往回跑。后来人们在离我杀她那个地方一百步以外发现了她。”

“这么说，你没有把她杀死？”

“是的……”希什科夫沉默了片刻。

“有一根血管，”切利文说，“若是第一刀割不断，人就会挣扎，不管流多少血，都不会死的。”

“她死啦。傍晚发现她的时候，她已死了。人们报告了警察，开始搜捕我，夜间在浴室里找到了我……唉，我被关在这里已经快四年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补充说。

“嗯……当然啦，不打是不行的！”切利文冷淡而又慢条斯理地说，接着又掏出鼻烟壶开始闻鼻烟，不慌不忙地闻了很长时间。“这么说来，小伙子，”他继续说道，“你真是太笨啦。有一次，我也碰上我老婆和她的贼汉子在一起。我把她叫到草棚里，把一条马缰绳折起来，对她说：‘你发誓吧，你对谁真心诚意？你发誓，你对谁真心诚意？’我用马缰绳抽她，一直抽了一个半小时。到最后，她说：‘我给你洗脚，我喝你的洗脚水。’她的名字叫奥芙多季娅。”

第五章　夏天

已是四月初，复活节也快到了。夏天的活儿也渐渐开始。太阳一天比一天温暖和明亮，空气里充满着春天的气息，对人的身体发生着刺激性的影响。美好时日的来临也使那些带脚镣的人们感到激动不安，使他们产生了某种希望、希求和烦恼。看来，人们在明朗的阳光下比在阴沉沉的冬天或秋天更加强烈地渴望自由，这在每个囚犯身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他们似乎也喜欢明朗的天日，但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急躁情绪，甚至有点感情冲动。的确，我也察觉到，一到春天，我们监狱里就更加经常地发生吵架的事。常常可以听到喧哗声、喊叫声、吵闹声，有的人甚至寻衅闹事；.与此同时，在干活的时候，有时你会突然发现有人若有所思地、一个劲儿地凝视着远方的蓝天，凝视着额尔齐斯河的彼岸——在那儿，自由的吉尔吉斯大草原象一块无边无际的地毯铺展开去，蔓延一千五百俄里；你还会发现有人正鼓起胸膛，在做深呼吸，看来人们都非常想呼吸一下那遥远的自由空气，以减轻自己受压抑的心灵中的痛苦。“唉！”——囚犯们发出一声感叹，然后象是要摆脱自己的幻想和沉思似的，他们突然急不可耐地、悒悒不乐地抓起铁锹干活或搬起砖来。一分钟以后，他们已忘却了自己那突然迸发出来的感情，又开始尽情地嘻笑和叫骂；或者突然以一种不寻常的、完全没有必要的热情干起分配给他们的包工活来，——他们开始使出全身的力气干活，仿佛想要以繁重的劳动把困扰着他们心灵的那些东西驱散似的。这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人们，大部分人都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期……在这种时候，脚镣是会使人感到沉重的！我并不想对这一切加以

美化，然而我相信我说的是真实情况。此外，在温暖而明朗的阳光下，当你正以自己的全副身心谛听和感受着周围那充满生机、万物复苏的自然界时，紧紧关闭着的监狱、卫兵的监视和对别人意志的屈从，就会使你觉得更加难以忍受；此外，在这春天的日子里，随着第一只百灵鸟的飞来，人们开始在西伯利亚和俄国各地流浪：上帝的人民越狱潜逃，躲藏在森林之中。在蹲过令人窒息的监狱之后，在受过审判之后，在体验过脚镣和棍棒拷打的痛苦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漂泊到他们所喜欢的地方，漂泊到被他们看中和不受任何约束的地方；他们吃着上帝恩赐的食物，夜间则安歇在森林中和田野上，既无忧无虑，又感受不到狱中的烦闷，就象林中的鸟儿一样，在上帝的眼皮下，只须跟天上的星宿道一声晚安就行了。不用说，在"库库什金将军麾下供职"，往往也需忍饥挨饿，艰辛备尝的。有时一连几天都弄不到一块面包吃，见人就得躲避隐藏，被迫去偷，去抢，有时甚至行凶杀人。"流放犯似婴儿，看见什么要什么。"——在西伯利亚，人们都这样谈论着流放犯。这句俗语是千真万确的，只须稍作补充就可以用来形容流浪汉。流浪汉很少有不做强盗的，他们几乎又总是小偷，当然这多半是出于需要，而并非他们的天职。然而，也有积习很深的流浪汉。有的人刚一服满自己的刑期，就从流放地逃跑了。他在流放地似乎也感到满足，生活上也有保障，但却不行！他总是想逃跑，仿佛有一种东西在召唤着他向别处逃跑似的。森林中的生活尽管贫苦、可怕，但却自由自在得很，充满着冒险的事业，对于那些体验过这种生活的人来说，它有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有的人看起来似乎也很稳重和安分守己，已有希望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良民和精明强干的主人，但他却逃跑了。有的人甚至结了婚，生儿育女，在一个地方已经住了五、六年，可是一天早上他却突然失踪了，使得他的孩子、老婆、左邻右舍感到困惑莫解。在我们监狱里，有人曾把一个这样的逃亡者指给我看。这个人其实并没有犯过任何特别的罪行，至少我没有听人讲过他这方面的事情，可是他总是逃跑，他逃跑了一辈子。他曾越过俄国南部的边界到过多瑙河彼岸，到过吉尔吉斯草原，西伯利亚东部，高加索，——总之，他什么地方都到过。谁知道呢，由于他非常热衷于漫游，如果在另外一种环境下，他也许会成为鲁滨逊第二呢。不过，这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本人在监狱里却很少说话。即使说也只说那么简短几句最必要的话。这是一个身材十分矮小、年纪已过半百的庄稼人，他性情特别温和，脸上总是显得特别平静而又呆板，甚至呆板到愚蠢的程度。夏天，他喜欢坐在外面晒太阳，而且嘴里总是低声哼唱着小曲儿，声音低得五步以外都难以听见。他面部表情有些麻木呆滞；他吃得很少，而且只吃面包；他从未买过一个面包圈儿吃，也没喝过一杯酒；他也许从来也没有积攒过一分钱，甚至也许连钱都不会数。他十分平静地看待着周围的一切。有时他亲手喂东西给监狱里的狗吃，我们监狱的人谁也没有喂过那只狗。一般说来，俄国人是不喜欢养狗的。听说他结过婚，甚至结过两次；人们还说，他把孩子留在什么地方了……至于他是因为什么入狱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期待着他从我们这儿跑掉；然而不知是时机未到呢，还是因为他已经年迈，他却没有跑，仍继续生活在我们中间，对周围这种奇特的环境采取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不过这是靠不住的，尽管有人也许觉得他实无逃跑之必要，逃跑对他并无好处。然而，总的说来，和监狱生活相比，森林里的流浪生活终究要算是天堂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法相比的。尽管艰难坎坷，但终究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啊！因此，任何一个俄国囚犯，不论他在哪儿蹲监，当春天第一道和煦的阳光照射下来时，他就会显得有点春心荡漾。然而也并非每个囚犯都想逃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逃跑很困难，而且要对其后果负责，一百个囚犯当中敢于冒此风险的也不过只有一人而已；其余的九十九人虽然也幻想着如何逃跑和往哪儿逃跑，但也只不过是拿这种愿望，拿想象中的逃跑的可能性来安慰安慰自己的灵魂罢了。有的人只能回味自己过去曾如何逃跑……我现在说说那些已判过刑的人们。这些人当中，经常想逃跑和最想逃跑的当然也只是那些候审犯人。那些判了刑的犯人只是在入狱初期才想逃跑。一个囚犯，当他度过两三年的苦役生活后，便开始珍惜这段度过的时光，于是他渐渐暗自下定决心：宁肯按照法律程序服完自己

的刑期，宁肯出狱后被发配到流放地，也不愿冒此风险，因为一旦失败，他就会遭到毁灭。而失败是完全可能的。十个人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已判过刑的犯人中只有那些刑期很长的犯人才常常想越狱潜逃。十五年，二十年，似乎是最长的刑期了，被判处这种长期徒刑的人总是幻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他们已经服完了十年苦役，也仍是如此。最后，脸上的烙印也是妨碍他们冒险潜逃的部分原因。改变命运——已成了一句术语。在审讯一个逃亡犯时，若问他为什么潜逃，他就回答说：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稍微有点文绉绉的字眼的确很确切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任何一个囚犯其实并非想要完全获得自由，——他晓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想要落到另外一个机关，或者被送到流放地，或者在流浪中因犯下新的罪行而重新受审，——一句话，不论落到什么地方都行，只是不要再回到已经使他厌倦了的那个老地方，不要再回到原来的监狱。这些逃亡者，如果在整个夏天都找不到一个适于过冬的好地方，如果，比方说，碰不到一个出于私心而愿意窝藏逃犯的人，最后，如果他们甚至通过凶杀手段也不能给自己弄到一张可以在各地自由居住的身份证，——那么，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如果不被抓住的话)在入秋以前，就会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来，回到监狱中来，作为无业游民在狱中过冬，当然他们并不放弃这样的希望：明年夏天再度逃跑。

春天对我也发生了影响。我记得，有时我从木桩栅缝隙里贪婪地向外窥视，或者把头靠在木桩栅上，久久地伫立在那儿，贪婪地、一个劲儿地凝视着我们要塞围墙上的青草如何变绿，远方的天空如何变得越来越蓝。我心中的不安和烦恼与日俱增，我对监狱越来越痛恨了。作为一个贵族，我在头几年经常感受到的囚犯们对我的敌视，使我无法忍耐，这种敌视毒害了我的一生。头几年我常常住院，虽然并无任何疾病，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离开监狱，摆脱掉那种根深蒂固的、且又无法和解的普遍的敌视。“就是你们这些铁嘴钢牙，把我们啄吃光了！”——囚犯们都这样说我们。我非常羡慕那些平民出身的囚犯，他们一入狱就立刻变成大伙的同伴。因此，春天、自由的幻影、自然界中那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也就更加使我感到惆怅，使我感到心烦意乱。在大斋期末尾，大约是在第六周，轮到我做斋戒祈祷。从第一周起，全狱的囚犯就被值勤班长根据斋期的周数分为七个班，每班三十人，轮流做斋期祈祷。我很喜欢斋戒周。做斋戒祈祷的人可以不出工。我们到离监狱不远的一个教堂去做祈祷，每天去两、三次。我好久没有去过教堂了。我从遥远的童年时代起就非常熟悉这种大斋期仪式，那庄严的祈祷，那一躬到地的磕头跪拜——这一切都在我心中激起了对那久远的往事的回忆，使我回想起少年时代的一些印象。我记得一大清早，当我们踏着夜间上了冻的地面，由荷枪实弹的卫兵押送着到上帝之家去时，我感到非常高兴。卫兵不进教堂。走进教堂后，我们都站在后面，挤在靠门口的地方，因而只能听得见那声音洪亮的教堂执事的诵读声，偶尔也能从人群背后望见神甫的黑袈裟和他那光秃秃的头顶。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到教掌去，有时看见那些拥挤在门口的平民如何卑躬屈膝地闪在一旁，给一位佩戴着肩章的胖老爷或一位衣饰华丽而又特别虔诚的阔太太让开道，那些老爷太太们总是想挤到前面几排去，常常为了争抢一个好位置而同别人争吵。我记得，那些站在门口的人做祈祷时也不象我们现在这样，他们都很谦恭热诚，一躬到地，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

现在轮到我站在这样的地方了，甚至比这更糟；人们一看见我们这些脚上戴着脚镣、脸上打着烙印的囚犯们，就纷纷躲开，仿佛有点害怕我们；我们每次来教堂都能分到一些施舍品；我记得，不知为什么这种情况竟使我感到快活，在这种奇怪的快感里有一种异样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既然如此，那好吧！”——我心里这样想。囚犯们都很虔诚地做祈祷，他们每次来都要拿出自己那可怜的一个戈比买一支圣烛献上，或者把钱丢进教堂的募捐箱里。“我也是一个人呀，”当他们往箱里丢钱的时候，心里可能这样想，“在上帝面前，人人

都是平等的呀……”做过早弥撒，我们举行圣餐礼。当神甫举起手中的圣餐杯念叨着：“……即使是强盗，也来接受吧，”在一片叮叮当当的脚镣声中，几乎每个人都匍匐在地，仿佛这句话正是对他自己说的一样。

复活节也到了。狱方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鸡蛋和一块鸡蛋奶油面包。城里送来的施舍品又堆满了监狱的院子。神甫手持十字架进来了，长官们也来祝贺，又是油乎乎的菜汤，又是狂欢痛饮和醉后的狂态——一切都和圣诞节时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现在可以在院子里散步和晒太阳。比起冬天来，到处都似乎更加明亮，更加广阔自由，但也更加令人惆怅。漫长的夏日真是令人难熬，特别是在节日期间。平时由于干活，至少可以使人觉得日子比较短些。

夏天的活儿的确比冬天艰苦得多。我们主要是在建筑工地干活。一些人忙于挖土，砌砖，盖房子；另一些人则忙于修理公房，有的当铁匠，有的当木匠，有的当油漆匠。还有一些人则到砖窑上打土坯。打土坯，在我们监狱里被认为是一种最繁重的活。砖窑离要塞有三、四俄里远。整个夏天，每天早晨五、六点钟都有五十多人的一大帮囚犯到砖窑去打坯。被挑选来干这种活的都是一些不会任何手艺的壮劳力，即那些不在作坊干活的囚犯。他们都随身带着干粮，因为往返一次需要走八俄里，走这么远的路程回来吃午饭是不合算的，所以他们只好等天黑回狱后才吃饭。每人每天的包工活定额都很高，需要干一整天才能完成。首先需要挖土和运土，自己担水，自己和泥，最后用那些泥打出二百块甚至二百五十块土坯来。我只去过两次砖窑。在窑上干活的人，晚上回来时都已精疲力尽，整个夏天他们总是责备别人，抱怨他们干的活最重。这样，他们就仿佛得到了一种安慰。尽管如此，有的人还是很乐意到那儿去干活，这首先是因为那儿是在城外，在额尔齐斯河岸上一个开阔而自由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向四周眺望一眼也是一种快乐；那儿不象监狱里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在那儿可以随便抽烟，甚至还可以舒舒服服地躺上半个小时。我仍象以前一样，或者在作坊干活，或者去烧建筑用石膏，或者到建筑工地去背砖。干这后一种活时，每次都得从额尔齐斯河岸上把砖背到七十俄丈①以外的营房建筑工地，中间需要爬过要塞围墙。
****

①一俄丈等于 2.134 公尺。
****
这种活我一直干了两个月，我甚至喜欢上了这种活。尽管背砖的绳子常常磨破我的肩膀，但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干这种活显然使我的体力增强了。一开始，我只能背八块砖，每块重十二磅，后来，我竟能背十二块，甚至十五块了，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在服苦役期间，为了忍受那可恶的监狱生活的种种物质困难，人们对体力的需要并不亚于对精神的需要。

出狱后，我还想活下去……

不过，我之所以喜欢背砖，并不单纯是因为这种活增强了我的体质，还因为这种活是在额尔齐斯河岸上干的。我所以经常提到这个河岸，因为只有从这个河岸上才能看到上帝的世界，看到晴朗而明净的远方，看到那荒无人烟的自由的大草原，草原的荒凉空漠给我留下一种奇特的印象。只有在这个河岸上干活，才能够背向要塞，才能够不看见它。我们干活的其他地点，都是在要塞里或要塞附近。从入狱后的头几天起，我就憎恨这座要塞，特别是它里面的几幢房子。我们少校的住房，在我看来是一个最可恶、最令人讨厌的地方，我每次从它旁边走过时，都怀着仇恨的心理望着它。在河岸上可以忘却自己：有时你眺望着那无边无际、空旷荒凉的原野，就象一个囚徒从监狱窗口望着外面的自由一样。这儿的一切都使我感到珍惜和亲切：明朗而炎热的太阳悬挂在高不可测的湛蓝的天空，从额尔齐斯河的彼岸隐隐约约

传来吉尔吉斯人的歌声。当你凝神眺望一阵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吉尔吉斯人的可怜的、被烟熏黑了的帐篷以及从帐篷旁边升起的缕缕炊烟，你还会看到一个吉尔吉斯女人正围着她那两只绵羊忙碌着什么。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贫穷和粗野，但却是自由的。你还会在那蔚蓝色的清澈的天空中看到一只飞鸟，于是你久久地、一个劲儿地望着它飞翔：它一会儿掠过河面，一会儿又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之中，一会儿又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在天际出现……甚至就连我初春时节在河岸石缝里发现的那棵可怜的、已经干枯了的野花，也仿佛引起了我过分的注意。服苦役第一年中的苦闷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使我感到焦躁不安，感到痛苦。在头一年里，由于苦闷，有许多东西我竟未能察觉到。我闭上双眼，什么也不想看。在我那些恶毒的、充满敌意的狱友中我竟未能看出好人来，这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讨厌的外壳包裹着。在那些恶毒尖刻的话语中，我有时竟未能听出亲切友好的话来，这些话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们是在无意中说出的，是发自肺腑之言，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所蒙受的苦难和忍受的痛苦也许比我更多更深。可是，干吗要说这些呢？每当我下工回来，虽已精疲力尽，却感到非常高兴：这样我就可以睡上一个好觉了！因为在监狱里，夏天睡觉简直是一种痛苦，比冬天更糟。不错，晚上有时倒使人觉得挺美。整个白天照射着监狱大院的太阳，终于落下去了。空气渐渐变得凉爽起来，接着，微带寒意的草原的夜晚降临了。在关门以前，囚犯们往往成群结伙地在院子里散步。当然，多数人则都聚集在厨房里。在那里，人们往往就监狱里某个迫切的问题展开争论，说东道西，有时还议论某些传闻，那些传闻尽管荒诞可笑，但却能引起这些与世隔绝的人们的极大兴趣。譬如说，有消息说，我们的少校将要被撤职查办。囚犯们都象小孩一样容易轻信流言；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是那个著名的爱说闲话的“怪人”克瓦索夫传出来的，而且大家早已不相信他的话了，因为他只要一张口，就是谎话连篇；可是大家仍然抓住这件新闻津津有味地议论个没完，到最后，他们又都生起自己的气来，后悔不该听信克瓦索夫的谎言。

“谁能赶得走他呢？”一个人喊道，“要知道，他膀大腰圆，能顶得住的！”

“可是，他上边还有比他地位更高的人呀！”另一个反驳道，这是一个热情而又聪明的小伙子，他见过世面，但却是一个天下少有的爱抬杠的人。

“乌鸦是不啄乌鸦的眼睛的！”第三个人愁眉苦脸地、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他已经满头白发，正孤单单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汤。

“他的上司难道会来问你：该不该撤他的职吗？”第四个人一边轻轻地拨弄着三弦琴，一边冷淡地说。

“为什么不能问我呢？”第二个人怒气冲冲地反问道，“咱们大伙可以去请愿嘛，只要问起咱们的情况，咱们就都上前说话。你们就知道这样吵吵嚷嚷，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就打退堂鼓！”

“你以为怎么着？”三弦琴手说，“要知道，我们是在坐牢呀！”

“前几天，”那个爱抬杠的人，也不听别人的话，急躁地继续说，“剩下来一些面粉。我们一点一点地把它刮在一起，送出去卖。可是后来让他知道了，是管伙食的人报告的；他就把面粉都给没收了，还说这是节约下来的东西。这公平吗？”

“你想向谁告状？”

“向谁！向钦差大臣本人告状，听说快来啦。”

“哪个钦差大臣？”

‘这是真的，弟兄们，一位钦差快要来了，”一个年轻而又活泼的小伙子说道。这个小伙子认识字，当过司书，而且读过《拉瓦莉尔侯爵夫人》一类的书。他总是显得那么愉快而又滑稽可笑，他很有学识，而且饱经世故，因而颇受大家的尊敬。他也不管大伙一听到钦差大臣要来的消息都是多么兴奋，多么感兴趣，自己却径直走到炊事员那儿去买牛肝吃。我们的炊事员常常做这种生意。比方说，他们用自己的钱买一大块牛肝来，煎好后，切成小块卖给囚犯们。

“买一个铜币的还是买两个铜币的？”炊事员问道。

“给我切两个铜币的，也让别人眼馋眼馋!”那个囚犯答道，“有一位将军，弟兄们，一位从彼得堡来的将军，将要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这是真的，是要塞司令部的人说的。”

这一消息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人们足足询问了一刻钟：将要来的钦差大臣究竟是谁，是哪位将军，什么官衔，他的职位是否比当地的将军高？囚犯们都特别喜欢谈论官衔、长官、谁的职位更高、谁敢在别人面前称王称霸、谁又甘拜下风等等。他们为了争论这些问题，常常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打起架来。这对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然而，人们往往拿对将军和当权人物了解得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知识范围、见识高低以及他入狱前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总之，在监狱里，关于上层当权人物的谈话，往往被认为是最文雅、最重要的谈话。

“这么说来，弟兄们，真是要来撤换少校啦，”克瓦索夫说，他是一个身材矮小、满面红光、性情急躁、头脑却十分糊涂的人。关于撤换少校的新闻就是他首先传出来的。

“他会送礼的!”那个愁眉苦脸、头发斑白的囚犯突然插嘴说，他已经喝完了自己的汤。

“一定会送的!”另一个人说，“他敲诈勒索的钱还少吗？！在来我们这儿以前，他就当过营长。前些日子他还打算娶大祭司的女儿呢。”

“可是他并没有娶成，碰了个钉子回来啦；人家嫌他穷。他算什么未婚夫！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他坐的那把椅子。复活节时玩纸牌输了个精光。这是费季卡说的。”

“是呀，他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呃，老弟，我是个结过婚的人。穷人结婚才不好受呢：一结婚，夜就变短了!”斯库拉托夫这时转过身来插嘴说。

“说得对！我们正在谈你呢，”那个当过司书、说话随便的小伙子说道，“我说你呀，克瓦索夫，你真是一个大傻瓜。难道你以为少校能买动这样的将军，这样的将军会专程从彼得堡来查办少校吗？我照直跟你说吧，小伙子，你真蠢。”

“怎么？你以为他当上了将军，就不收别人的礼了吗？”人群中有一个人用怀疑的口气问道。

“他当然不收啰，要收就得厚厚的一迭子。”

“不错，得厚厚的一迭子；就凭将军这个头衔，少了也不行。”

“将军总是要收礼的，”克瓦索夫一口咬定说。

“怎么，你给他送过礼吗？”突然闯进来的巴克卢申轻蔑地说道，“你恐怕连将军的模样儿也没有看见过吧？”

“我看见过。”

“你撒谎。”

“你才撒谎呢。”

“伙计们，他说他看见过将军，现在就让他当众说说，他看见过哪一位将军？喂，你说吧，反正所有的将军我都知道。”

“我看见过吉别尔特将军，”克瓦索夫有点犹豫不决地说。

“吉别尔特？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将军。我想准是吉别尔特当中校的时候，偶尔回头看过你一眼，你一时心慌，错把他当成将军了。”

“不对，你们听我说，”斯库拉托夫喊道，“因为我是一个结过婚的人。莫斯科确实有过一个名叫吉别尔特的将军，他是俄国籍的德国人。每年圣母节斋戒期间，他都要向一位俄国神甫忏悔，而且，弟兄们，他象一只鸭子一样老是喝水，每天喝四十杯莫斯科河水。据说，他喝水是为了医治什么病；这是他的勤务兵亲自告诉我的。”

“说不定他是用这些水在肚子里养鲫鱼吧？”那个抱着三弦琴的囚犯说。

“喂，你们别说啦！人家正说正经事呢，你们却……弟兄们，这个钦差大臣到底是个什么人呀？”一个老是跑来跑去的囚犯关切地问道，他叫马尔蒂诺夫，是个军事犯，当过骠骑兵。

“这全是撒谎！”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囚犯说，“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全是胡说！”

“不，不是胡说！”直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的库利科夫果断地说，他年近五十，仪表堂堂，脸上总是流露着一种鄙夷不屑的庄重神气。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以此感到自豪。他是一个兽医，身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吉卜赛人的血统，他在城里靠给马治病赚钱，同时还在监狱里贩卖私酒。他是个聪明人，见过很多世面，说起话来慢

慢吞吞的，仿佛他说的每句话都一字值千金似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弟兄们，”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上星期就听人说有一位将军要来，而且是一位很重要的将军，要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至于有人会给他送礼，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可不是我们的那位八只眼：他可不敢往将军跟前站。将军与将军不同，弟兄们，有各式各样的将军。不过，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少校仍将稳稳当当地留在现在的这个职位上。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是一些有话无处说的人，而有权有势的人物是不会互相说坏话的。钦差大臣视察完监狱以后，就会回京销差，向上边报告说这里一切都好……”

“他说得对，弟兄们，少校已经吓破了胆：从早上就喝得烂醉如泥了。”

“可是到晚上他会把别人新送来的酒照样喝光，这是费季卡说的。”

“黑狗洗不成白的。他喝醉酒难道还是第一次吗？”

“算啦，要是将军什么事也办不成，那又有什么办法！得啦，咱们何苦管人家的闲事呢！”囚犯们焦急不安地说。

关于钦差大臣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监狱。人们在院子里闲逛，彼此争相传说着这一消息。另一些人故作镇静，保持沉默，显然是竭力以此显示自己的妄自尊大。还有一些人仍然显得漠不关心。有几个囚犯抱着三弦琴坐在狱室的台阶上，有的继续闲聊，有的拖长声调唱起歌来。总之，这天晚上大家都显得特别兴奋。

九点多钟给我们点了一次名，然后把我们赶进狱室，锁上门过夜。夜很短；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就得起床，可我们却很少在十一点以前睡过觉。在此以前，人们往往不断地走来走去，说东道西，有时甚至也象冬天那样开赌场。夜里闷热得令人难以忍受。虽然凉爽的夜风也能从敞开着的窗口吹进来，可是囚犯们躺在床上仍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就象在做恶梦一样。跳蚤成堆。我们监狱里冬天就有跳蚤，而且相当多，一到春天，它们繁殖的速度就更快了，这种情况我过去虽然也曾听说过，但在未亲身体验之前，我是不大相信的。越是接近夏天，它们就越加猖狂凶恶起来。不错，对于跳蚤是可以习惯的，我自己就有过这方面的体验；不过终究还得要吃一些苦头。有时把人折磨得实在难受，就象害热病似的，怎么也睡不着，你自己也觉得你不是在睡觉，只是迷迷糊糊地躺着。到黎明时，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跳蚤似乎也不咬了，似乎可以在微带寒意的晨风的吹拂下香甜地睡一会儿了，——可是突然，监狱大门口的那面鼓又无情地咚咚敲打起来，天快亮了。于是你把短皮袄蒙在头上，一边咒骂着，一边倾听着那洪亮而清晰的鼓声，仿佛在数着它一共敲打了多少下似的。这时，在似睡非睡之中，你头脑里不由地产生出一个痛苦的念头：明天，后天，仍将如此，一连几年都仍将如此，直到获得自由。可是你转而又想，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自由呢？自由在哪里呢？然而，该起床了；人们又象平时那样走动起来，拥挤……人们正在穿衣服，忙着出工干活。当然，中午还可以再睡上一个小时。

关于钦差大臣的消息是确实的。这一消息一天天越来越被证实是真的了。最后人们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一位很重要的将军已经离开彼得堡前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现已到达托波尔斯克。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到狱中来。从城里也传来消息说：人们都吓得胆战心惊，正张罗

着把好的一面展示给他看。人们还说，高级官员们正在筹备欢迎会、舞会、庆祝会。囚犯们被成群结队地派去修整通向要塞的街道，铲平高低不平的土坡，给栅栏和柱子涂上颜色，该粉刷的粉刷，该油漆的油漆，一句话，大家都希望立刻把那些要向钦差大臣显示的东西整顿好。我们囚犯们都十分清楚这件事，因而他们相互之间谈论得更加热烈，更加慷慨激昂了。他们的幻想竟达到十分天真的地步：他们甚至拟好了请愿书，一旦将军询问他们是否满意时，就呈交给他。与此同时，他们相互之间继续不停地进行争论、谩骂。少校也很焦急。他常常坐车到狱中来，常常大喊大叫，向人们猛扑，常常把囚犯送到禁闭室去进行惩罚，而且越来越注意起囚犯们的衣帽整洁和仪表端正来了。恰在这时，我们监狱里发生了一件小事，不过，这件小事一点也没有象人们预期的那样使少校感到焦急，相反，却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一个囚犯在打架时朝另一个囚犯的胸部扎了一锥子，差一点没扎到心窝上。

用锥子扎人的囚犯叫洛莫夫；受伤的囚犯叫加夫里尔卡，他是一个积习很深的流浪汉，我不记得他是否还有别的绰号，我们大家总是管他叫加夫里尔卡。

洛莫夫是 T 省 K 县的一位富裕农民。洛莫夫全家人都生活在一起：老洛莫夫，三个儿子和他们的一位叔父。他们是很富有的庄稼人。全省的人都说，他们家存有三十万卢布的现款。他们种田，制革，经商，更主要是放高利贷，庇护流浪汉，窝藏赃物或干一些其他的营生。全县有半数农民都欠他们的债，受他们的奴役。这一家人以聪明能干、狡猾奸诈著称，可是后来他们却狂妄骄傲起来了，特别是当本地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拜访过他们家以后；那位大人物在旅行期间路经他们这儿时，亲自拜见了老头子，对老头子的机灵能干和善于经营备加赞赏。从此以后，他们便以为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于是越来越敢于冒险，干起各种非法的勾当来。人们都痛恨他们，希望他们遭到天诛地灭；可是他们却越来越神气十足、目空一切了，连警察局长、陪审员都不放在眼里。最后，他们果然大祸临门，被弄得家破人亡；不过，他们之所以倒霉，并不是由于他们所干的那些坏事和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是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他们在离自己村大约十俄里的地方有一处田庄，也就是西伯利亚人所说的小村庄。有一年秋天，那里住着他们的六个长工，都是吉尔吉斯人，这六个人很久以来就给他们家种地。一天夜里，这六个吉尔吉斯人突然被人暗杀了。开始审理这一案件。案件审理了很久。在审理过程中又发现了他们所干的其他许多坏事。洛莫夫一家被指控为杀害自己长工的凶手。全狱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自己也是这样供认的：人们怀疑他们欠长工的工钱过多，尽管他们家资万贯，但他们既贪梦又吝啬，为了不付给吉尔吉斯人工钱，就把他们杀害了。在侦讯和审判期间，他们的全部财产损失殆尽。老头子死了，儿子们东逃西散。其中一个儿子及其叔父被关进我们监狱，服十二年苦役。有什么办法呢！在吉尔吉斯人被杀这件事上，他们是完全无罪的。后来，狱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加夫里尔卡的人，他是一个著名的骗子手和流浪汉，性情愉快活泼，而且又敢于承担一切责任。不过我并未听人说过他是否承认了这件事，可是全监狱的人都一致确信，吉尔吉斯人皆死于他之手。加夫里尔卡还在过流浪生活时就跟洛莫夫一家人打过交道。他是因当兵开小差和当流浪汉而被捕入狱的，所以刑期较短。吉尔吉斯人是被他和另外三个流浪汉杀死的：他们想要抢劫那个田庄，以便发一笔大财。

我不知监狱里的人为什么都不喜欢洛莫夫叔侄。侄子是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而且很善于与人相处，可是扎了加夫里尔卡一锥子的那个叔叔，却是一个愚蠢而又爱打架的庄稼汉。在此以前，他就和许多人打过架，而且常常挨揍。大家之所以喜欢加夫里尔卡，是因为他那活泼而又平易近人的性格。尽管洛莫夫叔侄也知道他是真正的罪犯，而他们则是他的替罪羊，但他们并不和他争吵，也从不和他交往；加夫里尔卡也不理他们。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和老

洛莫夫因为一个丑得可怕的女人发生了口角。加夫里尔卡吹嘘那个女人对他如何钟情，庄稼汉吃起醋来，于是就扎了他一锥子。

尽管洛莫夫叔侄由于这一案件破了产，但在狱中仍过着富有者的生活。显然他们有钱。他们有自己的茶炊，自己烧茶喝。我们的少校是了解他们的案情的，因而非常痛恨他们。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常常对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找他们的麻烦。洛莫夫叔侄说，这是因为少校想要接受他们的贿赂，但他们从未向他行过贿。

当然，如果洛莫夫把锥子扎得再深一些，就可能扎死加夫里尔卡。但结果只刺破了一点皮。有人把此事报告了少校。我还记得他当时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时的情景，显然他是幸灾乐祸的。他对加夫里尔卡特别亲热，就象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怎么样，我的朋友，你能不能自己去医院？不，最好用车送他去。赶快套马！”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着一个军士喊道。

“大人，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只刺破了一点皮，大人。”

“你不懂，你不懂，我的亲爱的；你瞧……扎的正是要害地方；一切都要看伤在什么地方；正扎在心窝上了，这个强盗！你等着瞧吧！”他冲着洛莫夫咆哮起来，“哼，我现在就来和你算总账！……送禁闭室！”

他的确算了总账。洛莫夫重新受审，尽管伤势很轻，但意图是很明显的。结果，给罪犯延长了刑期，并打了他一千棍。少校这才感到心满意足了……

钦差大臣终于来到了。

他在抵达本城后的第二天，便来视察我们监狱。那天正好是节日。早在几天以前，我们这里的一切就已擦得油光锃亮，修整得平平整整，洗涮得干干净净。囚犯们都剃了头。大家穿着洁白的衣服。按照规定，夏天囚犯们都穿白麻布做的裤褂。每个人的背上缝有一个直径二俄寸①的黑圈儿。
****
①一俄寸等于 4.4 公分。
****
对囚犯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训练：如果大人物跟他们问好时，应该如何回答。少校忙得象是热锅上的蚂蚁。将军来前一个小时，囚犯们都象木偶似的垂手肃立在自己的床位旁边。中午一点钟，将军终于驾到了。这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将军，他重要到这样的程度：由于他的到来，大概整个西伯利亚西部的官员们都会胆战心惊的。他严肃而庄重地走了进来；身后跟随着一大群地方官员，还有几名将军和上校。随将军从彼得堡同来的还有一位文官，这位先生身材高大、漂亮，身穿燕尾服，脚穿一双便鞋，他举止十分优雅而又从容不迫。将军常常转过身去跟他说话，而且态度十分谦恭。这使囚犯们感到极为有趣：一位文官，竟受到如此的尊敬，而且是受到一位将军的尊敬！后来囚犯们获知了他的大名，他是什么人，不过在此以前曾对他进行过许多的猜测。我们的少校穿一身带橙黄色硬领的紧身军服，两眼充满着血丝，紫红色的面孔上满是粉刺，看来，他并未给将军留下特别愉快的印象。出于对高贵客人的特别尊敬，他把眼镜也摘了下来。他离开人群，笔直地站在远处，全身象发热病似地等待着将军阁下一旦有什么吩咐，好飞快地跑去执行他的旨意。但却没有任何吩咐。将军一声不响地

巡视了各个狱室，还看了看厨房，尝了尝菜汤。有人把我指给他看，说我是一个贵族。

“哦！”将军回答道，“现在表现如何？”

“目前还令人满意，阁下，”人们回答他。

将军点点头，两分钟以后就离开了监狱。囚犯们被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至于控告少校的事，当然更谈不上了。少校事先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的。

第六章　监狱里的动物

没过多久，我们监狱里买了一匹枣红马，名叫格涅德科，这件事远比高贵客人的来访更使囚犯们感到有趣和开心。按规定，我们监狱里应该喂养一匹马，以便运水和向外运送垃圾。专门派了一名囚犯去喂马，人和马一起出车，当然要由卫兵押送。我们这匹马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格涅德科很早以来就给我们服务了。这是一匹良马，不过已经衰老。一天早晨，那是在彼得节①前夕，格涅德科拉完晚上一趟水回来，不料跌倒在地，几分钟以后就死了。
****

①宗教节日(公历七月十一日，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

大家都为它感到惋惜，围拢在它身旁，议论争吵个不休。我们过去的一些退伍骑兵、吉卜赛人、兽医等等，都把他们关于马的渊博知识显示了出来，彼此甚至谩骂了一阵，但也未能使马复活。它僵死地躺在那里，肚子膨胀起来，每个人都认为用手指按一按马肚子是自己的责任；人们把这件命中注定的事报告了少校，少校决定立即再买一匹新马来。彼得节那天，做完早弥撒以后，等我们大家都集合好，开始把出售的马牵进来。不用说，马要由囚犯们自己挑选。我们当中有一些真正的识马专家，要想欺骗这二百五十个过去专干这一行的人，是困难的。吉尔吉斯人、马贩子、吉卜赛人、小市民们都来了。囚犯们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匹新马被牵进来。他们都象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尤其使他们感到快慰的是，他们现在仿佛都成了自由人，好象真的是在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马。在对第四匹马进行挑选以前，已经有三匹被牵进来又被牵出去了。进来的马贩子怀着惊异的神色胆怯地环顾着四周，偶尔也回头看看领他们进来的卫兵。一群二百多人的乌合之众，每个人都被剃光了头，脸上打着烙印，脚上戴着铁镣，居住在这谁也不敢跨进门坎的监狱里，就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一切都会使人产生某种敬畏的感觉。我们这些囚犯们在检查每一匹被牵进来的马时，真是煞费了苦心，什么狡猾手段都使出来了，马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几乎都被他们仔细查看过并用手摸过了；而且他们都显得那么内行，那么严肃认真和忙忙碌碌，好象监狱的全部福利都维系在这匹马身上似的。几个契尔克斯人甚至翻身跳在马背上；他们眼睛发红，用别人听不懂的土语流利地交谈着，不断地点着头，从他们那黝黑的长着鹰钩鼻子的脸庞上闪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有一个俄国人神情专注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两眼紧盯着他们，仿佛想要跳在他们身上似的；语言虽然不懂，但他却十分渴望从他们的眼神上猜出他们是怎么想的：这匹马值不值得买？他那种焦急不安的专注神情也许会使一个旁观者感到惊异。人们简直不明白，象他这样一个囚犯，为什么会对这种事情这样感兴趣，这样忙个不停？何况他又是一个温顺谦恭、受压抑而又不敢反抗的人，在别的囚犯面前甚至连吭一声都不敢吭！好象他是在给自己买马，好象买一匹什么样的马对他来说绝不是无关紧要似的。除了契尔克斯人，最惹人注目的要算是那些从前的马贩子和吉卜赛人了，在他们面前，人人都得退避三舍。特别是在两个囚犯之间，几乎发

生了一场决斗，——一个是库利科夫，他过去在吉卜赛人中间当过盗马贼和马贩子，另一个是无师自通的兽医，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西伯利亚庄稼汉，虽然入狱不久，但已经把库利科夫在城里的全部生意给夺过来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监狱里有几位无师自通的兽医，颇受城里人的器重，不仅小市民和商人，就连一些高级官员，当他们的马有病时，也常来请这几个兽医医治，尽管城里还有几位真正的兽医。在尧尔金这个西伯利亚庄稼汉到来以前，库利科夫没有竞争的对手，他的生意十分兴隆，当然他是要收谢礼的。他大耍吉卜赛人的欺诈手段，冒充内行，其实他懂得的事情比他吹嘘的要少得多。按收入说，他在我们中间是贵族。由于他的经验、智慧、勇敢和果断，他早已不知不觉地赢得了全体囚犯的尊敬，大家都信服他的话。他说话虽然不多，但说出来的每句话都很有份量，而且只在最紧要的关头才开口。他显然沾染了一些花花公子的习气，但他身上却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精力。他年纪已经不小，但仍显得十分漂亮和聪明。他对待我们贵族总是十分客气和彬彬有礼，但从不丧失自己的自尊心。我想，如果把他打扮一番，化装成一位伯爵，带到首都某个俱乐部去，他也会在那儿应酬自如的，他会玩起惠斯特牌来，同人们进行亲切的交谈，话语虽然不多，但却很有份量，即使待上整整一个晚上，也不会被人看出他其实并不是一位伯爵，而是一个流浪汉。我要郑重其事地再说一遍：他的头脑是那么聪明，那么敏捷和机智，举止又是那么优雅潇洒，颇有花花公子的风度。想必他见过很多世面，有很深的阅历。然而，他过去的生涯却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他被关在特别部。由于尧尔金的到来，他的兽医声望也显得黯然失色了。尧尔金虽然是个庄稼汉，但却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庄稼汉，年纪在五十岁左右，是一个分裂派教徒。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把库利科夫在本县城的几乎全部生意给夺过来了。他轻而易举地就医好了几匹库利科夫早就认为不可救药的马，他甚至医好了几匹连城里的著名兽医也认为无法医治的马。这个庄稼汉和他的同伙是因伪造货币而入狱的。象他这样年纪的人，何苦还要参与这种事情呢！他有时以自嘲的口吻给我们讲述说，他们只要用三个真正的金币就能造出一个假的来。他的兽医成就使库利科夫蒙受了一些屈辱，甚至使得库利科夫在囚犯当中的声望也开始下降了。库利科夫在城郊养了一个姘头，他总是身穿一件棉绒上衣，手指上戴着银戒指，耳朵上戴着耳环，脚穿一双自制的镶边皮鞋，可是突然间他的收入减少了，于是被迫做起酒保的生意来；因而人们都等着看这两位仇敌现在在买枣红马问题上，说不定会真的打起架来。大家都好奇地等待着。他们俩周围都有自己的一帮人。两帮的头目已经按捺不住，渐渐开始谩骂起来。尧尔金那张狡黠的脸上已经堆出嘲讽的微笑。然而，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库利科夫并不想吵骂，不吵骂他也会巧妙地应付过去的。他开始时稍作让步，而且恭恭敬敬地倾听着对方的批评意见，可是，当他抓住对方的话柄时，便谦虚而又坚定地指出对方错了，在尧尔金尚未醒悟过来和进行申辩以前，他又证明他这也错了，那也错了。总而言之，尧尔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着巧妙地击败了，尽管尧尔金仍然占着上风，但库利科夫那一帮人也感到满意了。

“不行，伙计们，搞倒他可不那么容易，他会保护自己；真有他的！”一些人说。

“尧尔金可比他懂得多呀！”另一些人说，但话音里似乎已有退让的意思。于是，这两帮人说话的口气都突然变得谦虚起来。

“不是他懂得多，而是他走运。要讲起牲口来，库利科夫可真有两下子。”

“小伙子真有两下子！”

“有两下子……”

新的枣红马终于挑选好并买成了。这是一匹良马，牙口很轻，长得又好看又壮实，它的步态神情都显得特别可爱，令人喜欢。当然，它在其他方面也是无可挑剔的。开始讲价钱：卖主要三十卢布，我们的人只给二十五卢布。双方激烈地争论了很长时间，不断地增增减减。最后，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好笑起来。

“争这干什么，难道要你从自己腰包里掏钱不成？”一些人说，“干吗争这么厉害？”

“怎么，心痛公家的钱吗？”另一些人喊道。

“不过，弟兄们，钱终究要从伙食团出呀……”

“伙食团！不，看来咱们这些傻瓜不是人家种出来的，咱们是自己长出来的……”

这笔生意终于以二十八卢布成交了。人们报告了少校，于是马就算买定了。不用说，人们立刻端出面包和盐来，隆重地把新买到的格涅德科牵进监狱。这时，似乎没有一个囚犯不去用手拍拍它的脖子或摸摸它的嘴脸。当天就把格涅德科套上车去拉水，大家都好奇地观看这匹新买来的枣红马如何去拉水。我们的运水夫罗曼端详着这匹新买来的马，显得特别高兴。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庄稼汉，性情沉默而又稳重。是的，俄国所有的马车夫都是这样一种性格：特别稳重，而且沉默寡言；好象真的由于经常和马打交道，便使人形成了这种特别稳重、甚至有点傲慢的性格。罗曼性情平和，同任何人都友好相处，他不爱说话，常常闻着鼻烟，狱里的马很久以来总是由他一个人喂养。新买来的这匹马已经是第三匹了。我们大家都觉得，枣红马对监狱正合适，这种毛色的马最适于家庭饲养。罗曼也是这样认为的。比方说，若是换上一匹花斑马，那无论如何也就不会买了。运水的工作几乎是固定的，不知根据什么权利总是由罗曼一个人来干，我们当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未曾想过要去争夺他的这项权利。原先那匹枣红马死的时候，任何人，甚至就连少校本人也没有责备过罗曼，大家都认为这是天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罗曼则是一个好车夫。格涅德科很快就成了全监狱的宠儿。囚犯们虽说是一些冷酷的人，但却常常走到它跟前亲昵地抚摸它。有时，从河里拉水回来，罗曼去关军士给他打开的大门，格涅德科已经进了院子，于是它停下车来等他，同时拿眼角瞟着他。“自己走吧！”罗曼对它吆喝一声，格涅德科立刻自己拉起水车，一直拉到厨房才停下，等待着炊事员和清洁夫拿水桶来提水。“真聪明，格涅德科！”人们冲着它喊道，“自己拉回来啦！……真听话。”

“别看是一头牲口，可真懂事！”

“好样的，格涅德科！”

格涅德科摇摇头，打着响鼻，仿佛它真的听懂了人们的夸奖并为此感到高兴似的。这时往往有人拿出面包和盐来喂它吃。格涅德科一边吃，一边摇着头，仿佛在说：“我认识你，我认识你！我是一匹可爱的马，你是一个好人！”

我也喜欢拿面包喂格涅德科。瞧着它那好看的嘴脸，感觉着它那软绵绵而又温暖的嘴唇如何灵巧地在手心里舐吃着食物，不知怎的我总是感到特别愉快。

总而言之，我们这些囚犯是能够喜爱动物的，如果允许的话，他们是很乐意在监狱里饲养许多家畜和家禽的。我总这样想：还有什么比这种工作更能使囚犯们那种冷酷而残忍的性格变得温柔与高尚呢？但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不论是我们的那些规章制度，还是监狱里的环境，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然而，在我蹲监狱期间，我们也偶尔养过一些动物。除了格涅德科，我们还喂养过几只狗，一群鹅，一只名叫瓦西卡的山羊，此外，我们还养过一段时间的鹰。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监狱里养着一只名叫沙里克的狗，这是一只聪明而又善良的狗，我和它一直很友好。由于一般老百姓都认为狗是一种不干净和不值得注意的动物，所以沙里克几乎从未引起过我们任何人的关注。它独自生活着，睡在院子里，靠厨房里的一些残羹剩饭过活，人们从未关心过它，但它却认得每一个人，并把狱中所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主人。当囚犯们下工回来，一听到卫兵室里喊："班长！"它便向大门口跑去，亲热地迎接着每一批下工回来的囚犯，同时摇摆着尾巴，亲切地望着每个走进来的人的脸，期待着人们的爱抚。然而多年以来，除了我，它几乎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爱抚。因而，它爱我胜过爱任何人。我不记得另外一只名叫别尔卡的狗是怎样被弄到监狱里来的。第三只狗，库利佳普卡，是我从工地上拣回来的，当时它还是一个小狗崽。别尔卡是一只十分丑陋的狗。它被马车轧过，脊梁骨总是弯曲着，因此当它奔跑时，从远处看，就象是两个长在一起的白色动物在奔跑一样。此外，它浑身都是疥，眼角往外流脓；尾巴上的毛几乎已完全脱落，总是夹着尾巴。由于受到了命运的嘲弄，显然它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它从不敢对任何人大声吠叫，好象怕人似的。它多半靠人们扔在狱室后面的面包渣儿过活；若是看见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还在几步远以外，它就立即四条腿朝天卧在地上打起滚来，以表示顺从，仿佛在说："你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吧，你看，我并不想反抗呀！"每个囚犯，一看见它在地上打滚，就用脚踢它，似乎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瞧这条下贱的癞皮狗！"——他们一边踢，一边骂道。可是别尔卡却连尖叫一声都不敢，即使踢得很重时，它也只是发出几声低沉而又悲惨的嗥叫而已。当它遇到沙里克，或者当它跑出监狱遇到别的狗时，它也总是这样躺在地上打滚。有时，一只耷拉着耳朵的大公狗向它猛扑过来，冲着它狂吠乱叫，它便温顺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须知狗是喜欢自己同类的温顺和屈从的。那条凶猛的公狗立刻平静下来，若有所思地站在四条腿朝天恭恭顺顺躺在地上的别尔卡身旁，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开始慢慢地嗅它身上的每一个部位。被吓得浑身打颤的别尔卡这时可能想些什么呢？"这个强盗，也许会把我撕开吃掉吧？"——它头脑里大概在这样想。然而，当那条公狗仔细地嗅遍它的全身，在它身上并未发现任何特别有趣的东西时，便撇下它跑掉了。于是别尔卡立即爬起来，又一跛一颠地去追逐那一大群护送着一条母狗的公狗。尽管它也知道，它永远也不会跟母狗结成近交，但它仍一跛一颠地远远跟在狗群后面瞎跑——在它那不幸的一生中，对它来说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安慰吧。显然，它也顾不得考虑光彩不光彩了。它对未来已完全失掉了希望，它只是为着一块面包而活着，而且它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有时试着去抚摸它；这对它来说是那样地新奇和突然，它立刻全身伏卧在地，四只爪子乱蹬，感动得全身颤抖，尖声嗥叫起来。我出于怜悯心，常常去抚摸它。因而，它一遇见我总要尖叫几声。有时它从老远看见我就尖叫起来，叫得使我感到心酸，甚至流出眼泪来。后来，它在监狱外面的围墙上被别的狗咬死了。

库利佳普卡完全是另一种性格。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从作坊带进狱中来，当时它还是一个尚未睁开眼的小狗患。喂养和抚育它，使我感到愉快。沙里克立即担负起保护它的责任来，并和它一起睡觉。当库利佳普卡渐渐长大时，沙里克就让它咬自己的耳朵，抓自己身上的毛，并且象成年的狗通常逗弄小狗崽那样跟它一起玩耍。说也奇怪，库利佳普卡只往长

和宽处长，却总不见长高。它的毛蓬松而柔软，呈银灰鼠色；一只耳朵耷拉着，另一只向上竖立着。它的性格也和别的小狗一样，充满热情而又易于兴奋。当它看见主人时，总是高兴得吠叫个不停，接着就扑上来舐脸，简直想要把它全部的感情都流露出来："让人们看看我是多么地爱你吧！管它合乎礼貌不合乎礼貌呢！"不论我走到哪里，只要喊一声："库利佳普卡！"——它就会突然从墙角里，从地缝里钻出来，一边兴奋地尖叫着，一边向我飞奔而来，象一个皮球似的在路上打着滚。我非常喜欢这个小丑八怪。在它的一生中，命运给它安排的似乎只有满意和喜悦。可是有一天，那个专做女皮鞋和制革的囚犯涅乌斯特罗耶夫忽然对它发生了特别的兴趣，有一种东西突然吸引住了他。他把库利佳普卡叫到自己跟前，用手摸着它的毛，亲热地让它躺卧在地上。库利佳普卡毫无戒心，只顾高兴地尖叫。可是第二天它却失踪了。我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如同石沉大海；只是过了两个星期才真相大白：原来涅乌斯特罗耶夫特别看中了库利佳普卡的皮毛。他扒了它的皮，熟制好以后，给一位法官太太定购的丝绒棉皮鞋做了衬里。他把皮鞋做好后，还拿给我看过。毛色好极了。可怜的库利佳普卡啊！

我们监狱里很多人都会加工制革，并常常把毛色好的狗带到狱中来，接着这些狗就转眼不见了。有些狗是偷来的，有些甚至是买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厨房后面看见两个囚犯，他们正在商量什么事，并忙忙碌碌地张罗着。其中一人用绳子牵着一条出色的大狗，显然是良种。不知是哪家的下流仆人把它偷了出来，以三十个戈比卖给了我们的鞋匠。那两个囚犯正准备把它勒死。这很容易办到：把皮一扒，尸体扔进我们狱室后面角落上那个又大又深的脏水坑里；一到炎热的夏季，那里就臭气熏天，这个脏水坑很少有人清理过。那条可怜的狗似乎已经猜到了给它安排的命运。它用锐利而不安的目光轮番打量着我们三个人。只是偶尔才敢摇摆一下它那低垂着的、毛茸茸的尾巴，似乎想以这种充满信任的表示来感化我们。我急忙走开，他们俩当然很顺利地就干完了他们想要干的事情。

我们监狱里的鹅，似乎也是偶然出现的。我不知道这些鹅是谁把它们孵出来的，它们应该归谁所有；不过有一段时间，这些鹅使囚犯们大为开心，甚至闹得全城都知道了。它们是在监狱里孵出来的，饲养在厨房里。小鹅长大以后，常常成群地跟着囚犯们去上工。只要一听见打出工鼓，囚犯们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这些鹅就拍打着翅膀，咯咯叫着跟在我们后面跑，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过大门口的高门坎，一直跑到队列的右侧，在那里排好队，等待着人们出发。它们往往跟在人数最多的一批囚犯后面，囚犯们干活时，它们就在附近的草地里觅食。当囚犯们下工回狱时，它们也排成队跟在后面往回走。要塞里到处都在传说：有一群鹅和囚犯们一起去上工。"看，囚犯们带着鹅回来啦！"迎面走来的人都这样说，"你们是怎么训养的呀？"——"拿去，喂鹅吃吧！"有的人一边说，一边递过来一些施舍品。尽管这些鹅忠心耿耿，可是一到开斋节，仍把它们全部宰掉了。

然而我们的那只山羊瓦西卡，若不是发生了一件特殊的情况，囚犯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把它宰掉的。这只山羊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把它带进狱中的，我也不得而知；可是我们监狱里突然出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白山羊。几天之内，我们大家就都喜欢上它了，它使我们大家忘掉了忧愁，甚至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养这只山羊的理由是：既然我们监狱里有一个马厩，那就应当喂一只山羊和马作伴。不过，我们并没有把它关在马厩里，起初养在厨房里，后来它就在狱中到处乱跑起来了。这是一只非常好看、非常淘气的小山羊。只要一招呼，它就跳在凳子上或桌子上，和人们顶头，它总是欢蹦乱跳地闹着玩，叫人看着高兴。后来它头上长出两个挺长的犄角；一天晚上，一个名叫巴拜的列兹金人正坐在狱室台阶上和其他几个囚犯聊天，他忽然想和山羊顶头玩。他们头碰着头顶撞了好长时间，——逗山羊玩是囚犯们

所喜爱的一种游戏，——瓦西卡突然跳到最高一级台阶上，趁巴拜转身向旁边看的工夫，它蓦地用后腿站立起来，把前蹄贴在身上，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巴拜的后脑勺上猛撞，巴拜翻身滚下台阶，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巴拜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总之，大家都非常喜欢瓦西卡。等它长大以后，经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我们大家一致决定给它做一次人所共知的手术，我们的兽医是很善于做这种手术的。“这样，它就不会有膻味了，”——囚犯们说。手术后，瓦西卡开始长得膘肥体壮，我们总是把它喂得饱饱的，仿佛要送屠宰场似的。最后，它长成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大山羊，两只犄角又粗又长，个子特别高大，满身都是肥肉，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它也经常跟着我们去上工，囚犯们和过路的行人瞧着它都感到高兴。所有的人都认得监狱里的山羊瓦西卡。有时，譬如说，囚犯们在河岸上干活，他们就攀折一些柔嫩的柳枝，摘些树叶，或者在堤坡上采撷几朵鲜花，拿去装饰瓦西卡：用柳枝和鲜花把它的犄角编扎起来，给它全身都挂满花环。下工回来的路上，囚犯们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瓦西卡走在最前面，他们自己则跟在它身后，遇到行人时，他们似乎都为这只山羊感到骄傲。他们对它欣赏个不够，有的人甚至象小孩子一样想出这样一个主意：“能不能给瓦西卡的犄角镀上金？”然而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并没有这样做。不过，我记得我曾问过阿基姆·阿基梅奇(他是我们这里仅次于伊赛·福米奇的镀金工匠)：真的能往羊犄角上镀金吗？他仔细把山羊端详了一番，认真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也许可以，“不过，不会太牢固，况且这样做也完全无益。”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瓦西卡本可以在狱中活很长时间的，它也许会因患气喘病而老死在狱中；可是有一次在下工回来的路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瓦西卡照例走在囚犯们前面，这时却迎头碰上了正坐着四轮马车急驶而来的少校。“站住！”少校怒吼道，“这是谁的山羊？”人们向他作了解释。“怎么！未经我允许，竟敢在狱中养山羊！班长！”班长马上跑过来，少校下令立即把山羊宰掉，把羊皮扒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卖回来的钱留作伙食基金，羊肉则留给厨房给囚犯们炖汤喝。狱中的人都议论纷纷，不胜惋惜，然而谁也不敢违抗命令。人们在脏水坑旁边把瓦西卡宰掉了。有个囚犯付给狱方一个半卢布，把羊肉全部买去。用这笔钱给大家买了一些面包圈儿；买去羊肉的那个囚犯则把肉切成小块，炖熟，零卖给囚犯们。肉的确很香。

有一段时间，我们监狱里还养过一只鹰，这是一只形体不大的草原鹰。人们把它带进狱中来时，它已受了伤，而且已经精疲力尽。全监狱的人都围拢来看它；它已不能飞了：右边的翅膀垂在地上，一只腿已经脱骱。我记得，它当时凶猛地环视着四周，两眼紧盯着看热闹的人群，张着它那弯钩形的嘴，准备在临死前和人们决一死战。当人们饱看了一阵渐渐走开以后，它便展开那只健康的翅膀，用一条腿一瘸一跛地跳到监狱最远的那一头，紧贴着木桩栅，躲在一个角落里。它在我们这儿生活了三个来月，在此期间，它一次也没有走出过自己的角落。起初，人们还常来看它，让狗挑逗它。沙里克凶猛地向它扑去，但显然也怕接近它，这使囚犯们看着十分有趣。他们说：“这东西真凶！谁也接近它不得！”后来，沙里克开始残忍地欺负它；它已经不害怕了，在人们的唆使下，它灵巧地乘机咬住鹰的那只受伤的翅膀。鹰竭尽全力用爪和嘴进行自卫，它象一个负伤的王子一样，紧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并以高傲而凶猛的目光环视着前来看热闹的人群。后来人们对它厌倦了，把它撇在一边忘掉了；然而每天仍可以看到它身旁放着几块鲜肉和一勺水。显然，，还有人在照料它。起初，它不想吃，一连几天都不吃食物；后来，它开始吃食了，但从不吃人手中的食物，也不当着人的面吃。我曾多次从远处对它进行观察。当它看到附近无人时，它就从角落里走出来，一瘸一跛地沿着木桩栅往外走十二、三步，然后再返回去，这样反反复复地来回走，仿佛在作活动似的。它一看见我，便立即使出全身力气急忙跛跳着跑回自己的角落，然后回过头来，张着嘴，背毛竖立，准备立刻投入战斗。不管我如何爱抚它，也不能使它软化：它又是啄我，又是挣扎，也不肯吃我拿着的牛肉，而且当我站在一旁时，它总是以它那凶狠而锐利的目光聚精会神地

盯着我。它对任何人也不信任，也不向任何人屈服妥协，它孤独地、满怀仇恨地期待着死亡。后来，囚犯们仿佛又想起它来了，尽管两个月来谁也没有关心和提到过它，可是忽然间大家又似乎对它产生了同情心。他们说，应该把这只鹰带到外面去。“即使死，也别让它死在监狱里。”他们说。

“是呀，它是一只自由而凶猛的飞禽，它是过不惯我们监狱的生活的。”另一些人附和着说。

“看来，它和我们不一样！”有人补充道。

“瞧你，净说傻话；它是飞禽，我们是人嘛。”

“弟兄们，鹰是森林之王……”斯库拉托夫开口道，不过，这一次人们都不听他的了。一天下午，出工鼓敲过以后，人们把鹰逮住，由于它拼命地啄人，便用手捏住它的嘴，把它带出了监狱。人们来到围墙上。这一队中的十二个人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看看鹰往哪儿跑。说也奇怪，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仿佛他们也分享了一部分自由似的。

“瞧这狗东西：为它做好事，它反而咬人！”擎着鹰的那个囚犯一边说，一边爱抚地瞧着它。

“米基特卡，放开它！”

“看来，.箱子里是装不住这个鬼东西的。把它放走吧，让它去享受那真正的自由吧！”

人们从围墙上把鹰扔到草原上。当时正值深秋季节，天气寒冷而阴沉。秋风在那光秃秃的草原上呼啸着，吹得一束束干枯而发黄的野草沙沙作响。那只鹰抖动着受伤的翅膀，一直向前跑去，它好象急于离开我们，随便跑到哪里去都行。囚犯们好奇地注视着它的头如何在草丛中时隐时现。

“瞧它跑得多快！”一个人若有所思地说。

“连头也不回！”另一个补充道，“弟兄们，它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只顾往前跑！”

“怎么，你还想让它回来向你道谢吗？”第三个人说。

“啊，它自由啦！它已经感觉到自由了。”

“是的，它自由了。”

“已经看不见啦！弟兄们……”

“老站着干什么？快走！”卫兵喊道，于是大家一声不响地缓步向工地走去。

第七章　请愿

在本章的开头，已故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的《手记》的出版者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作如下说明。

《死屋手记》第一章中曾简略提到过一个贵族出身的弑父者，而且是把他作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典型例子来谈的，因为囚犯们往往以冷酷无情的口吻讲述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另外还提到，凶手在法庭上并未承认自己的罪行，然而根据那些熟谙这一案情的人所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出，事实是那样明显，对于他的罪行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那些人还告诉《手记》的作者说，罪犯是一个行为十分放荡的人，他欠了债，由于渴望得到一笔遗产，便把自己的父亲杀死了。此外，弑父者被捕前所供职的那个城市的人，也都是这样来谈论这一案件的。关于这后一种情况，《手记》的出版者掌握有相当确凿的材料。最后，《手记》中还提到，那位弑父者在监狱里总是显得高高兴兴，精神状态非常好；他是一个性情乖张、轻率浮躁、遇事极不审慎的人，但他绝不愚蠢，《手记》的作者在他身上从未发现有什么特别残忍的东西。作者还补充了这样一句话："当然，我是不相信这一罪行的。"

不久前，《死屋手记》的出版者从西伯利亚得到通知说，这个罪犯确实是无辜的，他白白地忍受了十年苦役的痛苦；他的冤案已由法庭正式昭雪。真正的罪犯已落入法网，并已招认，那个不幸的人也已获释出狱。出版者无论如何是不能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的……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关于这一事实的极为深刻的悲剧意义，关于被这一骇人听闻的指控所断送的年轻的生命，也无须多作评述了。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我们还认为，如果这一事实是可能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本身就给《死屋手记》中所描绘的图画增添了一个新的、极其鲜明的特点，并使得它更加完整了。

现在我们继续叙述下去。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终于习惯于我在狱中的处境了。不过，这个"终于"是经过了一个十分困难和痛苦的过程的，是相当缓慢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实际上我几乎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年。正因为如此，这一年才自始至终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似乎觉得，这一年的每一个小时我都能依次记得。我还说过，别的囚犯也是很难习惯于这种生活的。我记得，在这头一年里，我常常暗自思忖："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内心里都很平静吗？"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十分有趣。我已经说过，生活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囚犯都不象住在自己家里，他们好象是寄住在一个客店里，处在征途中，处在征途的某一段路程上。就连那些被发配到这里终身服苦役的人，也总是显得坐立不安，忧心忡忡，他们每个人想必都在暗自幻想着某种几乎不能实现的东西。这种旷日持久的焦虑不安，这种奇怪的急躁情绪和强烈的希望，尽管是以缄口无言表现出来的，但却是明显的；他们的种种希望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的，但往往都象梦幻一样不切合实际，尤其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种强烈的希望往往产生于那些显然是最实际的人们的头脑，——这一切就使得这个地方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外观和特点，而且这些特点也许就构成了它的最富有代表性的特色。我似乎觉得，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是狱外所没有的。这里的人都是一些幻想家，这也可以明显

地看得出来。这种情况之所以令人感到可怕，乃是因为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使大多数囚犯都显得愁眉苦脸，郁郁寡欢，甚至带着一种病态。大多数人都沉默寡言，几乎凶狠到了要进行复仇的地步，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希望表露出来。朴实憨厚，襟怀坦白，往往受到人们的鄙视。希望越是不能实现，幻想家本人越是感到他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他们就愈加顽固地、羞怯地把它深埋在自己的心中，但却不能够甩掉它。谁晓得呢，也许有人还会暗自感到羞愧哩。俄罗斯性格中有那么多严肃而又清晰的见解，同时内心里又充满着那么多的自我嘲讽……也许正因为这些人总是在内心里对自己感到不满，他们在平时的相互关系中才表现出那么多的不耐烦，那么多的敌意和冷嘲热讽。譬如说，如果有那么一个更为天真、更加缺乏耐性的人忽然想出出风头，偶尔大声说出了大家心中的话，大谈特谈其幻想和希望，这个人立刻就会被人打断，遭到众人的围攻和嘲笑；不过我觉得，那些攻讦别人最起劲的人，他们自己的幻想和希望也许比别人更多。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监狱里，天真幼稚和头脑简单的人往往被别人看成是最鄙俗的傻瓜，因而受到人们的蔑视。正因为每个人都十分孤僻和自负，所以他们才蔑视那些善良和不自负的人。除了这些天真幼稚和头脑简单的饶舌家以外，其余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善良的和凶恶的，性格孤僻的和性格开朗的。性格孤僻而又凶恶的人非常多；如果他们当中也有人天生爱说话的话，那就一定是一些永无休止的造谣诽谤者和怀有强烈嫉妒心的人，他们对别人的任何事情都加以干涉，但他们却从不向别人吐露自己的真实感情和内心的秘密。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宜的。心地善良的人(这种人很少)都很文静温和，沉默寡言，他们把自己的期望埋藏在心中，当然，他们比那些性格忧郁的人更倾向于幻想和相信自己的期望。此外，我觉得监狱里还有一些完全绝望的人。比方说，那个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的老人就属于这种人，尽管这种人很少。从表面上看，这位老人很平静(我已经谈过他了)，但根据某些迹象，我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是十分可怕的。不过，他有自救的方法：祈祷和殉教的观念。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个神经失常、读圣经读得入了迷、曾用砖头砸过少校的囚犯，大概也是一个完全绝望和失掉了最后希望的人；但又因为一个人如果完全失掉希望就无法生存下去，于是他便想出一种解救的办法：自觉自愿地、几乎是人为地去殉教。他声称他用砖头砸少校并非出于仇恨，仅仅是为了想要受难。谁晓得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一个人如果没有目的和为达到目的而作的努力，他就不能生存下去。一个人如果失掉了目的和希望，他就会由于苦恼而变成一个恶魔……我们囚犯的目的，就是自由和摆脱苦役。

我现在力图把狱中所有的人都加以分类，然而这能做得到吗？同极其细微的抽象思维活动相比，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是不能对其进行明显和重大的区分的。现实生活的趋势是分化。我们囚犯也有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很糟，但毕竟也是一种生活，它不仅是一种法定的生活，而且包括我们的内心生活。

我已经说过，在我蹲监狱的初期，我不能也不善于深入理解这种生活的内在实质，因此，它的一些表面现象在当时曾使我感到有说不出来的苦恼。我有时简直想要憎恨那些也和我一样的受苦人。我甚至嫉妒他们，诅咒自己的命运。我所以嫉妒他们，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同伴中间，他们彼此平等，彼此了解，虽然实际上他们也和我一样，十分厌恶和痛恨这种在棍棒下结成的同志关系和这种强制性的集体生活，每个人都渴望摆脱这种生活。我再重复一遍，我在恼怒时产生的这种嫉妒心，是有其正当的理由的。有人说，一个贵族，一个有教养的人，在服苦役和蹲监狱期间所感受到的痛苦，是和任何一个庄稼汉完全一样的；这种说法其实完全不正确。我最近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并读了这方面的文章。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是对的，是人道主义的——大家都同样是人，囚犯也是人。但这一概念未免太抽象了，它忽略了很多具体的条件，这些具体条件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够理解。我并不是

说，一个贵族或者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似乎就更加丰富，更加细腻，他们在精神发展方面就更加成熟。一个人的精神及其发展程度是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的。甚至教育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作为衡量的尺度。我愿意首先出来作证，就是在那些最没有受过教育、最受压抑的受苦人当中，我也遇到过一些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的人。在监狱里往往有这种情况，你认识一个人已经多年，总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野兽，因而藐视他。可是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内心世界却突然充分地显示了出来，这时你就会看到他的思想感情是多么丰富，他的心灵是多么善良，他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了解得多么清楚，这一切都会使你大开眼界，一开始你甚至不敢相信你亲自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形：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时却表现得十分野蛮和厚颜无耻，使你感到厌恶，不管你心地多么善良，也不管你过去如何看待他，你在自己心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原谅他或替他辩解的理由。

我也无须去谈习惯、生活方式、饮食等方面的改变了，这些方面的改变对于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人说来，当然要比一个庄稼汉更加痛苦，因为一个庄稼汉即使在自由时也常常挨饿，在监狱里起码是可以吃得饱的。我不想争论这些。可以设想，对于一个稍微有点意志力的人来说，这些困难同别的困难相比都算不了什么，虽然，习惯的改变实际上也绝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还有比这更大的困难，遇到那些困难时，人们就不会去注意居住条件的肮脏和拥挤，饮食的不足和不洁了。一个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一个娇生惯养的人，尽管过去过惯了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生活，如今当他汗流满面地干了一天活之后，他也会狼吞虎咽地嚼吃黑面包，喝带有死蟑螂的菜汤。对于这些是可以习惯的，正如那首讽刺一个身陷囹圄的花花公子的幽默歌曲中所唱的：

顿顿给我白菜加凉水——
我吃起来也是狼吞虎咽。

不；比这一切更加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普通囚犯入狱后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和其他的人完全一样，如同来到自己家里，在这个集体里开始享有和别人同样的权利。大家了解他，他也了解大家，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同伴，看作自己人。然而，一个贵族就不同了。不管他如何正直、善良、聪明，他将一连数年受到人们的敌视和蔑视；他不能为大家所了解，更主要的——大家都不信任他。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同志；虽然经过多年以后，他做到了使别人不再欺负他，但他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他将永远忍受被别人疏远和孤独的痛苦。囚犯们对他的疏远有时也并非完全出于恶意，而是无意识的。他不是自己人，仅此而已。再没有比生活在一个不适宜的环境里更可怕的了。一个从塔干罗格迁居到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港的庄稼汉，立即就会在那里找到一个和他一样的俄罗斯庄稼汉，他们立即就能达成协议，两个小时以后，他们就和睦共处地住在同一间小木房或窝棚里。.可是贵族出身的人却不然。他们同平民之间似乎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当那位贵族突然间完全失掉了他原先的一切特权并变为一个平民时，这一点更能充分地看得出来。哪怕他同一个平民结识了一辈子，四十年间在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场所天天和他打头碰面，甚至作为恩人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父辈同他交往，——也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他。一切都不过是视觉上的错误而已。我知道，每个读了我这些话的人，都会说我在夸张。不过，我坚信这是正确的。我不是从书本上，也不是从抽象的概念，而是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得出这一结论的，我的这一论断将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也许以后人们就会了解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

事有凑巧，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很快就证实了我的观察，并使我受到强烈的影响。第一年夏天，我经常孤单单一个人在狱中各处溜达。我已经说过，我当时正处在这样一种心理状

态之中：我甚至无法鉴别也区分不出囚犯当中哪些人会喜爱我，或者以后会喜爱我，尽管他们从来也没有平等地对待过我。我也结识了几个贵族，：但同他们的友谊从未使我心头感到过轻松。我对什么都看腻了，但又无处躲避。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从一开头就使我最清楚不过地明白了我的孤独处境以及我在狱中的特殊地位。这件事发生在夏天，七月末，那天天气晴朗而炎热，吃过午饭以后，人们象往常一样正睡午觉，以便下午出工干活，可是忽然全监狱的人都起床了，开始在院子里站队集合。在这以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当时我正陷入深思之中，想自己的心事，以致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几乎无所察觉。其实，囚犯们已在暗中骚动三天了。这次骚动也许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正象我后来所猜测的那样，我不由地回想起囚犯们的某些谈话，而且最近以来囚犯们吵架的次数也增多了，人们都显得愁眉不展，心情特别不好。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由于繁重的劳动、漫长而无聊的夏日、对森林和对自由的不由自主的向往、短促的夏夜、睡眠不足等原因造成的；也许，这一切汇聚在一起，便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不过爆发的导火线，却是因为伙食。近几天来，囚犯们在狱室里，特别是在厨房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总是大声发牢骚，十分气愤，他们对炊事员感到不满，甚至试图把其中的一个换掉，可是刚换上去的那个炊事员很快又被撵走，又换上了原来的那个。总之，大家的心情都非常不安。

“干的是牛马活，喝的却是肚肠子汤，”常常有人在厨房里发牢骚说。

“不喜欢喝这种汤，那就叫个奶油冻吧，”另一个人接着说。

“弟兄们，我非常喜欢喝这种汤，”第三个人搭腔道，“因为它味道很香。”

“要是天天给你喝这种汤，你也觉得很香吗？”

“当然啦，现在是吃肉的季节了，”第四个人说道，“我们在窑场干活累得腰酸腿痛，干活干累了，见到什么都想吃。可是肚肠算是什么食物呀!’’

“不喜欢肚肠，那就吃心吧。”

“就算再添上心，老让我们吃肚肠和心，这算什么食物！还讲不讲一点公理？”

“是呀，伙食太糟啦。”

“放心吧，人家的腰包早填满啦。”

“这可不是你管得着的事儿。”

“我管不着，谁管？可肚子是我的呀。以我看，我们大伙若是一齐去请愿，伙食就会办好。”

“请愿？”

“是的。”

“为了那次请愿，把你揍得还轻吗？你这个傻瓜!”

“说得倒也对，”另一个一直没有开口的囚犯发牢骚道，“可是，光着急有什么用呢！请愿时你怎么说？你这个傻瓜，你倒先说说看。”

“我是要说的。如果大家都去，我就跟着大伙一块儿去说。我就说我们的伙食太糟啦。我们中间有的人起小灶，有的人却只能吃大锅饭。”

“瞧你这个小机灵鬼！看人家吃得好，就眼馋啦。”

“看着别人的钱财别眼红，早起晚睡不受穷。”

“不受穷？……这一回我可非要跟你争论到老不可。这就是说，你有钱，你想袖手旁观吗？”

“有钱的是叶罗什卡，他有狗又有猫。”

“说实在的，弟兄们，还坐着等什么？这种伙食咱们也吃够啦。人家扒我们的皮，我们干吗不找他说理去？”

“干吗！你大概是希望人家把食物嚼烂再送到你嘴里去吧，你吃惯现成的啦。要知道我们是在服苦役呀，你懂不懂？”

“你们瞧，果然是这样：老百姓吵一吵，将军吃个饱。我的天哪!”

“说得对。八只眼可吃得又肥又胖。他还买了两匹大青马哩。”

“哼，他还喜欢喝酒。”

“前几天他和兽医玩纸牌时打起来啦。”

“他们玩了一个通宵，我们的那位动了两个小时的拳头。这是费季卡说的。”

“所以才让我们喝肚肠子汤。”

“哎，你们这些傻瓜！这种事我们可干不得。”

“大伙都出面去说，看他还有什么辩白的理由。我们要坚持到底。”

“辩白的理由！他会把你的门牙打掉，准会这样干的。”

“还会把我们送交法庭审判……”

总之，大家都激动起来了。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的伙食的确很不好。而且各种各样的事情

又接踵发生。更主要的是大家都很苦闷，内心里憋着一肚子火。苦役犯都是一些天生爱打架和爱闹事的人；不过，成群结伙聚众闹事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意见总是不一致。他们每个人也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往往大话说得多，实际事干得少。不过，这一次骚动却不同于往常。囚犯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狱室里，院子里，议论纷纷，破口大骂，怒气冲冲地回忆着少校任职期间所干的一切坏事，把他的老底都给抖落出来了。有几个人特别激动。在任何这样的场合，往往会出现一些出谋划策者和领头人。这次请愿的领头人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在各个工地、营地和其他地方都很有名。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到处都有这样的人，而且都很相似。这种人热情洋溢，渴望得到正义，他们都十分天真和真诚地相信，正义一定能够得到，而且立刻就能得到。这种人并不比别人愚笨，其中有些人甚至也很聪明，但他们往往过于急躁，缺乏机智和审慎。在这类事情中，如果有人善于因势利导，能够引导群众赢得事业的胜利，他们就会成为另一类型的人，即人民的带路人和天然领袖，不过这种人在我们当中是非常少的。然而，我现在所说的这次请愿的出谋划策者和领头人，几乎总是把事情引向失败，他们自己则为此而被投进监狱或被发配服苦役。他们由于过激而遭到失败，然而也正因为过激，他们才会对群众发生影响。群众都乐意跟他们走。他们的热情和义愤影响着每一个人，到最后，就连那些最犹豫不决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对成功的盲目信心甚至对那些最顽固不化的怀疑主义者也有诱惑力，尽管他们的信心往往显得那么不稳定，那么幼稚可笑和缺乏根据，以致连旁观者都感到惊奇：为什么群众会跟着他们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总是走在前头，而且无所畏惧。他们象一群公牛似的低着头，挺着犄角横冲直闯，但他们往往缺乏远见，又不谨慎，更不会玩弄那种纵横捭阖的诡谲手段，而有些卑鄙无耻的人却擅于利用这种手段赢得胜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安然无恙地从漩涡里跳出身来。这种人是必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人肝火很旺，爱发牢骚，暴躁易怒，而且缺乏耐性。他们眼光非常短浅，不过这也或多或少构成了他们的力量。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往往不是奔向直接的目标，而是走到斜路上去，他们不注意大事，却往往抓住一些小事不放。这正是他们遭到毁灭的原因。但他们却能为群众所了解，这也正是他们力量之所在……不过，我还必须讲一讲请愿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监狱里有几个这样的人，也参加了请愿。他们都显得格外激动。特别是其中有个叫马尔蒂诺夫的囚犯，他过去当过骠骑兵，性情暴躁，不守本分，且又多疑，不过他很正直和诚实。另外一个叫瓦西里·安东诺夫，是一个沉着冷静而又易怒的人，他举止十分傲慢，脸上总是流露着嘲讽的微笑，但很有修养，而且也很正直和诚实。我不能对所有的人都一一加以描述了，因为这样的人很多。至于彼得罗夫，更是不停地跑前跑后，倾听人们的谈话，自己却很少发言，显然他很激动，他是第一个从狱室里跑出来站队的。

正在狱中值勤的班长立刻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那些已经站好队的囚犯们彬彬有礼地请他转告少校：全体苦役犯想要和他谈话，要当面请教他几件事。所有的残废老兵也跟着班长跑了出来，并在囚犯的对面站好队。交给班长的这项任务是非同寻常的，使他感到惊恐万状。但他又不敢不立刻去向少校报告，因为第一，如果囚犯们骚动起来，就可能会闹出什么乱子。我们的狱方人员都非常害怕囚犯闹事，第二，即使什么事也不发生，比方说，囚犯们改变了主意，又立刻散开，他这个当班长的也应该把所发生的一切立刻报告给长宫。他吓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急忙跑去向少校报告，他甚至顾不上亲自问明情况并规劝一下囚犯们。他看得出来，囚犯们现在是不会跟他谈话的。

我一点也不清楚所发生的事情，也跟着大伙出来站队。事情的详细经过我是后来才打听

到的。当时我以为是要站队点名，但又不见值日官来，这使我感到奇怪，我于是四下里张望。人们的面孔都很激动、气愤。有的人甚至面色苍白。总的说来，大家都很焦急，沉默不语，等待着少校的到来。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带着特别惊奇的神色瞧着我，然后又一声不吭地掉过脸去。看来，他们看到我和他们站在一起，都感到惊奇。他们显然不相信我也会参加请愿。那些站在我周围的人很快又向我转过身来，大家都用疑惑的目光瞧着我。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站得离我很远的瓦西里·安东诺夫粗暴而又大声地问我；在这以前，他跟我说话时总是用“您”称呼我，对我相当有礼貌。

我困惑不解地看着他，仍竭力想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我已猜到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是呀，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回狱室去吧，”说话的是军犯部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这以前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善良而又温和的小伙子。“这儿的事与你无关。”

“我看见大家都出来站队，我以为是点名呢。”我答道。

“瞧，他也爬出来啦，”一个人喊道。

“铁钩鼻子，”另一个说。

“苍蝇拍子！”第三个人带着难以描述的轻蔑神情说道。这个新的绰号立即引起了一阵哄笑。

“他在伙房里起伙，是抬举我们，”有人补充说。

“到处都是他们的天堂。这儿是监狱呀，可他们却吃白面包，还买奶猪。你是自己起伙，往这儿钻干什么？”

“这里不是你站的地方，”库利科夫走过来，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他挽起我的胳膊，领着我走出队列。

他本人面色苍白，两只黑眼睛炯炯有神，紧紧地咬着下嘴唇。他若无其事地等待着少校的到来。我顺便插几句：每逢这种场合，即需要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观看库利科夫的表情。他非常喜欢炫耀自己，但也实干。我觉得，即使上断头台，他也会穿得漂漂亮亮，昂首阔步走上前去的。如今，当大家都对我不礼貌并咒骂我时，他显然故意加倍地显得对我彬彬有礼，而且他的话特别坚定有力，甚至有点傲慢，不容任何人反驳。

“我们在这儿办自己的事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这儿没有您的事。您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待一会儿吧……你们的人都在厨房里，您到那儿去吧。”

“让他滚回无脚后跟的安季普卡居住的第九根柱子那儿去吧！”有人应声说道。

从稍稍打开一点的厨房窗口，我确实看到了我们的那几个波兰难友；不过，我觉得，除

了他们，那儿似乎还有不少别的人。我困惑不解地向厨房走去。身后发出一片笑骂声和嘘嘘声(在监狱里，人们用嘘嘘声代替吹口哨)。

“不高兴啦！……嘘-嘘-嘘！滚蛋吧！……”

直到现在，我在监狱里还从未受到过这么大的侮辱，这一次使我感到非常痛心。可是，我正赶到节骨眼儿上了。在厨房穿堂里我遇上贵族托—夫斯基①，他是一个坚毅果敢、气度豁达的青年人，他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却非常喜爱 B。苦役犯们往往把他同别的贵族区别开来，甚至有点儿喜爱他。他英勇果敢，强壮有力，这从他的每一个动作上都能看得出来。
****

①指西蒙·托卡尔热夫斯基(1823--1900)，他是反对农奴制、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波兰农民协会的会员，著有《七年苦役》一书。
****

“您怎么啦，戈梁奇科夫，”他冲着我喊道，“到这儿来吧！”

“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他们在请愿，难道您不知道吗？他们当然不会成功的，因为谁会相信苦役犯的话呢？狱方会调查主谋人，如果我们待在那边，他们当然就会把暴乱的责任首先推到我们身上。要记着我们是因为什么进监狱的呀！他们不过挨一顿鞭笞罢了，我们可得去受审。少校恨透了我们这些人，把我们都毁灭掉他才高兴呢。他会利用我们把他自己洗清的。”

“而且这些苦役犯会出卖我们，”当我们走进厨房的时候，米—茨基补充说。

“放心吧，狱方不会发慈悲的！”托—夫斯基接着说。

厨房里除了几个贵族以外，还有很多人，总共有三十来个。他们所以留在这里，都是因为不愿意参加请愿，——一些人是出于怯懦，另一些则由于坚信任何请愿都无济于事。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在这里，他是任何类似事件的顽固不化的天然反对者，他认为请愿会破坏狱中的正常秩序，也不符合道德规范。他一言不发，十分平静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束；他对这次请愿会有什么结果一点也不关心，相反，他深信狱方的秩序和意志必然会胜利。伊赛·福米奇也在这里，他困惑不解、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贪婪而胆怯地倾听着我们的谈话。他感到十分不安。所有出身于平民阶层的波兰苦役犯，也都和他们的贵族同胞待在一起。这里还有几个胆小怕事的俄国人，尽管他们总是受压抑，但却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们不敢和其他囚犯一起参加请愿，只是满腹忧愁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束。最后，这里还有几个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囚犯，他们并不是胆小怕事的人。他们所以不参加请愿，乃是因为他们固执而又傲慢地坚信，这一切都是胡闹，除了把事情搞坏，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不过我觉得，他们此时仍感到有点尴尬，显得并不那么完全自信。尽管他们也晓得他们关于请愿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事后也得到了证实，但他们仍觉得好象是背弃了自己的难友，把难友出卖给少校了。那个因伪造货币而入狱并夺去了库利科夫兽医生意的、十分精明能干的西伯利亚庄稼汉尧尔金也在这里。从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来的那个老人也在这里。炊事员们也都留在厨房里没有出去，他们想必认为他们也属于狱方人员，因而参加请愿，反对狱方是不适宜的。

“不过，”我开始犹豫不决地对米—茨基说，“除了这些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去站队了。”

“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B 悻悻地说。

“我们若是出去，就会比他们多担一百倍的风险；这有什么必要？Je hais ces brigands。难道您以为他们请愿会有什么结果吗？我们为什么要参与这种蠢事？”
****
①法语：我恨这些强盗。
****

“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一个苦役犯接着说，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凶狠的老头子。阿尔马佐夫也在这里，他赶忙附和着说：

“除了每人挨五十大棍，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

“少校来啦!”有人喊道，于是我们都拥到窗口去观看。

少校凶相毕露、怒气冲冲地飞跑进来，满脸通红，戴着墨镜。他一言不发，但却果敢地走到队前。在这种场合他确实是很果敢的，而且勇气十足。不过，他几乎总是处于半醉状态。就连他那顶沾满油污、着黄边的军帽和肮脏的银白色肩章，这时都孕育着一种不祥之兆。紧跟在少校后面跑来的是司书佳洛夫，他在我们监狱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实际上掌管着狱中的一切，甚至能左右少校；此人狡猾、聪明，但却不是一个坏人。囚犯们对他都感到满意。跟在他们后面跑来的是我们的那位军士，他显然已经受到一顿十分严厉的申斥，还有十倍的不幸在等着他呢。接着跑来的是卫兵，人数不多，只有三、四个人。自从打发人找少校以后，囚犯们似乎都脱帽站着，这时他们马上挺直腰板，整好衣帽，每个人都倒换一下脚站好，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长官的第一句话，或者更准确地说，等待着他的第一声喊叫。

少校立刻发作起来；他没说上两句话就扯着喉咙大喊起来，甚至发出一种刺耳的尖叫，他几乎要发疯了。我们从窗口看见他顺着队列跑着，冲着囚犯们追问。不过，由于离得太远，我们未能听得见他的问话以及囚犯们的回答。我们只听见他尖着嗓子狂喊：

“造反啦！……出列……主谋人！你是主谋人！你是主谋人!”他一边喊，一边向人们扑去。

听不见回答。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有一个囚犯被拉出来，送进了卫兵室。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被送进卫兵室，接着是第三个。

“我把你们全都送交法庭审判！让你们再造反！谁在厨房？”他从敞开的窗口看见了我们，便尖着嗓子喊了一声。“都到这儿来！把他们都赶到这儿来!”

司书佳洛夫向厨房走来。等他来到厨房后，有人告诉他，这里的人没有参加请愿。他立即跑回去报告少校。

“哦，没有参加！”他的话声顿时降低了两个音阶，显出高兴的样子。“不管参加还是没有参加，都到这儿来！”

我们走出来。我似乎觉得，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往外走。我们低着头走了出来。

“哦，普罗科菲耶夫！还有尧尔金，是你呀，阿尔马佐夫……站好，站好，你们都站在一起，”少校一边温和地打量着我们，一边用急促而柔和的声调对我们说，“米—茨基，你也在这儿……把名字都记下来。佳洛夫！立刻造一张表，哪些人满意，哪些人不满意，全都写上，然后把表交给我。我要把你们全都……送去审判！我要教训教训你们这些骗子手！”

这份表起了作用。

“我们满意！”从那些不满意的人群中忽然有人闷闷不乐地喊道，不过声音似乎不怎么坚决。

“哦，你们满意！还有谁满意？满意的都站出来！”

“我们满意，我们满意！”又有几个声音喊道。

“你们满意！这么说，是有人在煽动你们罗？可见，有主谋人，有谋反者！他们会更倒霉的！……”

“天哪，这是要干什么？”人群中有人喊道。

“这是谁，谁在喊？”少校一边咆哮着，一边朝发出声音的那边跑去。“是你呀，拉斯托尔古耶夫，是你喊的吗？送卫兵室！”

拉斯托尔古耶夫是个全身浮肿、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走出队列，慢吞吞地向卫兵室走去。其实那一声并不是他喊的，不过由于少校认定是他，他也就不敢申辩了。

“真是吃饱了就惹是非！”少校在他身后嗥叫着，“瞧你吃得肥头大耳，三天不挨揍，你就……我要把你们全都查出来！满意的，站出来！”

“我们满意，大人！”传来几十个闷闷不乐的声音，其余的人都倔强地一声不吭。这正是少校所期望的。显然，以某种和解的方式尽快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对他本人也有好处。

“哦，现在大家都满意了！”他赶忙说，“这我看得出来……我知道。这里有人在煽动！他们当中显然有主谋人！”他冲着佳洛夫继续说，“这件事必须详细调查。不过现在……现在该出工啦。敲出工鼓！”

派工时，他亲自坐阵监督。囚犯们都一声不响、郁郁不乐地向各个工地走去，不管怎么说，他们显然都巴不得赶快离开他的视线。派完工，少校立即到卫兵室看了看，吩咐如何惩罚那些“主谋人”。不过这次惩罚并不很重。他甚至匆匆地就结束了这件事。后来听说，有个囚犯曾请求他宽恕，他立即就宽恕了他。显然，少校的心情也有点不佳，他甚至也许有点

害怕。在任何情况下，请愿都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其实，诉几句苦也算不上是什么请愿，况且这次也不是向最高长官请愿，而是向他少校本人提出的，不过，这终究是一件使人感到难堪和有伤体面的事情。尤其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所有的囚犯都闹起来了。因此，无论如何也得赶快把事情平息下去。“主谋人”很快就被释放了。第二天，伙食的确有所改善，尽管没有维持多久。头几天，少校常来狱中巡视，并常常发现一些违章现象。我们那位军士似乎仍然惊魂未定，总是显得忧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至于囚犯们，在这次事件以后，也久久未能平静下来，但他们都不象以前那样激动了，而是默默地感到惶悚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有些人甚至垂头丧气起来，另一些人则照常发牢骚，不过谁都不愿再提请愿的事。很多人仍显得有点气愤，他们大声地互相挖苦讽刺，好象是以此来惩罚自己参加请愿似的。

“结果怎么样，老弟，吃不了兜着走吧！”一个人说。

“只图一时痛快，现在可尝到苦头了。”另一个人补充道。

“哪有耗子给猫系铃的呢？”第三个人说。

“不挨几棍子是不能使我们弟兄们相信的。嘿，这一回没把我们每个人都揍一顿，就算不错了。”

“你以后也该多动动脑子，少说闲话才是。”有人恶狠狠地说。

“你教训谁？想当教师爷吗？”

“教你多懂点事。”

“谁要你来教训，你算老几？”

“我嘛，暂且还是一个人，可你算什么东西？”

“你是狗嘴里吐出来的一块骨头。”

“那说的是你自己。”

“好啦，好啦，住嘴吧！你们叫嚷什么！”两个吵架的人受到众人的呵斥……

就在请愿那天的傍晚，下工回来，我在狱室后面碰见了彼得罗夫。他正在找我。他走到我跟前嘟哝了几句，似乎是两、三句含糊不清的慨叹，但很快又心不在焉地沉默起来，呆呆地和我并排走着。那件事仍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以为彼得罗夫会向我作一些解释的。

“请告诉我，彼得罗夫，”我问他，“你们的人是不是生我们的气啦？”

“谁生谁的气？”他若有所思地反问道。

“囚犯们生我们……贵族的气？”

“为什么要生你们的气呢？”

“哎，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请愿。”

“你们干吗要参加请愿呢？”他问道，仿佛想竭力搞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你们不是自己起伙吗？”

“我的天哪！要知道你们当中也有人自己起伙呀，可他们都参加了。哎，我们本应该参加的……因为咱们是朋友嘛。”

“可是……你们算是我们的什么朋友呀？”他困惑莫解地问道。

我赶忙瞧了他一眼：他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可是在这一瞬间我却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了。那个很久以来就使我感到困惑和苦恼的问题，现在第一次被我彻底搞清楚了，我突然明白了许多在此以前我一直琢磨不透的事情。我明白了：即使我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囚犯，即使我将永远被囚禁在监狱里，即使我是一个特别部的犯人，他们也永远不会把我看作是自己的朋友的。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彼得罗夫当时的神态。在他那句“你们算是我们的什么朋友呀？”的问话里，包含着多少真诚、天真无邪和毫不做作的困惑莫解啊。我曾这样想：这句话里是否含有讥讽、恶意和嘲笑的意味呢？一点也没有；我不是他们的朋友，仅此而已。他说这句话时心里也许在想：“你走你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你干你的事情，我们干我们的事情；咱们不是一家人呀！”

的确，我曾这样想过：请愿结束后，他们会把我们吃掉，不让我们活下去的。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听到过，也没有觉察到对我们有任何特别的怨恨。他们只不过仍象以前那样有时偶尔抱怨我们几句，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而且，他们对于所有那些留在厨房里没有参加请愿的人以及最先喊出“我们满意”这句话的人，也一点儿没有生气发怒过。谁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于这后一点我是不能够理解的。

第八章　狱友

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自己人，即那些“贵族们”，特别是在初期。不过，在被关押在我们监狱里的那三个从前的俄国贵族(阿基姆·阿基梅奇、暗探 A 和那个被认为是弑父者的人)当中，我与之交往和交谈的只有阿基姆·阿基梅奇一人而已。而且说实在的，也只有当我感到绝望，感到十分烦闷，除了他再也找不到交谈者的时候，我才去找阿基姆·阿基梅奇。在上一章里，我曾试图把我们所有的囚犯加以分类，现在既然谈到了阿基姆·阿基梅奇，我认为不妨再增加一类。诚然，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只有他一个人。这是一类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苦役犯。当然，完全漠不关心的人，即那种认为过自由生活和过监狱生活并没有什么两样的人，在我们监狱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不过，阿基姆·阿基梅奇似乎是个例外。他在狱中安排得那样舒适，仿佛打算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他使用的一切东西，从被褥、枕头到其他物品，质地都很结实，安放得井然有序，看不出有任何临时寄宿的痕迹。他还得在狱中蹲很多年，不过，他大概也从未考虑过出狱的问题。他之所以安于现状，当然并非出于真心，而多半是出于对上级的屈从，不过对他来说，这反正都是一样。他是一个好人，起初甚至帮

我出过一些主意，帮我操办过一些杂务；不过我得老实承认，有时，特别是在初期，他曾使我感到十分懊丧，使得我本来就很忧郁的心情更加苦闷不堪了。我正是由于苦闷才找他谈话的。我渴望他能讲几句充满生气的话.哪怕是几句气愤和激昂的话也行，我们好一同发泄心中的怨气，诅咒我们的命运；可是他却一声不吭地糊着他的那些小灯笼，或者讲述他某年某月曾参加过什么阅兵式，他们的师长是谁，叫什么名字，对阅兵式是否满意，给炮手发出的信号如何不断变换，等等。而且他的声调是那么平淡而又彬彬有礼，犹如滴哒滴哒往下滴水一样。即使当他讲到他在高加索因参加某次战役有功，长官们把“圣安娜”勋章给他佩挂在战刀上时，他几乎也一点没有振奋起精神来。只是这时他的声音似乎变得异常庄重严肃；当他说出“圣安娜”勋章这几个字时，他把声音稍微压低，显出一种神秘的样子，说完以后沉默了两三分钟，显得格外庄重……在头一年里，我也有过糊涂的时候，有时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憎恨起阿基姆•阿基梅奇来，我暗自诅咒自己的命运不好，不该让我头挨着头地和他睡在一个通铺上。一个小时以后，我又为此而责怪自己。不过，这都是在头一年中发生的事；后来我就在内心里跟阿基姆•阿基梅奇完全和解了，并为自己原先的糊涂想法感到羞愧。我记得，我和他表面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

除了这三个俄国贵族以外，在我蹲监狱期间，我们这里还关押过八个贵族。我曾同其中几个过从甚密，我甚至也很乐意接近他们，不过并非同所有的人。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物也都显得有点病态，性格孤僻，而且十分偏执。其中有两个我后来干脆就不跟他们来往了。他们当中受过教育的只有三个人：鲍—斯基①、米—茨基和年事已高的若—斯基②，

****

①指波兰革命家约瑟夫.鲍古斯拉夫斯基。

②指波兰革命家约瑟夫.若霍夫斯基(1800--1851)。他因一八四八年在华沙发表革命演说而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年徒刑。

****

后者原是某地的一位数学教授，他为人善良忠厚，但性格却十分古怪，他虽然受过教育，但眼光极其短浅。米—茨基、鲍—斯基和他完全不同。我一开始就和米—茨基相处得很好，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很尊敬他，但我从来也不能喜爱他和依恋于他。他是一个疑心很重而又凶狠的人，具有惊人的自制力，很善于抑制自己。然而，也正因为他善于抑制自己，我才不喜欢他：我似乎觉得，他从未向任何人打开过自己的心扉。不过，也许是我看错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而又特别高尚的人。他与人交往时那种特别老练而又多少有点狡猾的巧妙手腕和慎重态度，正好暴露出他内心深藏着的怀疑主义。不过，他的缺点也正在于这种双重性格：既疑心重重，又坚定不移地深信自己那种独特的信念和希望。尽管他很善于处事，但他和鲍—斯基及其挚友托—斯基却是死对头。鲍—斯基是一个体弱多病并带有结核病症状的人，他性情暴躁，爱动肝火，实际上却非常善良，而且气度豁达。他有时简直暴躁到使人完全无法忍受和乖张任性的地步。我由于忍受不住他的这种性格，后来便和鲍—斯基决裂了，然而我任何时候都不能不爱他；我同米—茨基虽然没有争吵过，但我从未爱过他。我同鲍—斯基决裂后，接着也就立刻同托—斯基断绝了来往，在上一章讲述那次请愿事件的时候，我曾提到过这位年轻人。这使我感到十分难过。托—斯基虽然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他善良、勇敢，总之，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人。问题在于，他非常热爱和尊敬鲍—斯基，甚至对他崇拜到这样的地步：谁若是跟鲍—斯基有一点不和，他就立刻把那个人看做是自己的敌人。他后来所以和米—茨基闹翻，似乎也是因为鲍—斯基的缘故，虽然他们的友谊已保持了多年。其实，他们都是一些精神失常、肝火很旺、暴躁易怒而又疑心重重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处境很困难，比我们困难得多。他们都远离祖国，其中有些人的刑期很长，十年，二十年，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总是怀着很深的偏见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人，只看到苦役犯残酷无

情的一面，不能甚至也不愿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好的品质，任何的人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环境和命运迫使他们抱有这种不幸的观点。显然，他们在狱中都感到非常痛苦。他们对待契尔克斯人、鞑靼人以及伊赛·福米奇都很友好、和蔼可亲，但对其他苦役犯却抱着厌恶的态度，竭力回避他们。只有那个从斯塔罗杜布来的旧教徒才深受他们的尊敬，值得提出的是，在我蹲监狱期间，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没有因他们的国籍、信仰和思想方式而指责过他们，就象我们一般老百姓有时对待外国人特别是对待德国人那样。其实，对德国人也只不过取笑一下而已，因为在俄国老百姓看来，德国人是极其滑稽可笑的。其实，苦役犯们对我们这几位外籍难友是相当尊重的，远比对我们这些俄国贵族更为尊重，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然而这几位外籍难友似乎从来也不想注意和考虑这一点。我再来谈谈托—斯基。当他们从第一个流放地转解到我们要塞来的时候，他一路上几乎是背着鲍—斯基走来的，因为后者体质很弱，还没有走一半路，就已疲惫不堪。他们最初被流放到 Y 城。据他们说，他们在那儿生活得很好，那儿要比我们要塞好得多。后来他们跟流放到另一个县城的人通过一次信(其实那次通信是完全无罪的)，就为了这件事，便决定将他们三人转解到我们要塞里来，以使他们处在我们最高长官的直接监督之下。他们的另外一位难友叫若—斯基。在他们到来之前，米—茨基是我们监狱里唯一的一个波兰人。可想而知，他在服苦役的第一年是多么苦闷啊！

这位若—斯基，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总是祷告上帝的人。我们这些政治犯都是一些年轻人，其中有几个甚至还非常年轻；只有若—斯基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人。他为人正直，但脾气有点古怪。他的难友鲍一斯基和托—斯基都非常不喜欢他，甚至很少和他说话，认为他太固执和太乖僻。我不知道他们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监狱里，人们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生活在一起，因而这里的人比起狱外的人都更容易发生争吵，甚至相互憎恨。这种情况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不过，若—斯基的确是一个相当愚蠢的人，也许还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的其他难友也都跟他合不来。尽管我从未和他发生过争吵，但和他相处得也不怎么融洽。我记得，他总是竭力用他那蹩脚的俄语向我讲解他自己臆想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天文学体系。据说，他过去还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不过学术界对他只是嗤之以鼻。我似乎觉得，他这个人的理智多少受了点损害。他整天跪在那儿祷告上帝，从而博得了全体苦役犯的尊敬，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我亲眼看见他在患过一场重病之后，死在医院里了。其实，人们对他的尊敬，早在他刚刚跨进监狱的门坎，和少校发生过那次冲突以后就开始了。在从 Y 城来我们要塞的途中，他们没有剃过头，因而他们脸上都长满了胡茬子；他们被直接带去见少校，少校认为这是对章法的公然违犯，因而大发雷霆；其实，这件事一点也怪不得他们。

“看他们这邋遢样子！”他嗥叫起来，“简直象是流浪汉，强盗！”

若—斯基当时还听不懂俄语，他以为少校问他们是什么人？是流浪汉还是强盗？于是他回答说：

“我们不是流浪汉，而是政治犯。”

“什么？你竟敢对我这样无礼？真是太放肆了！”少校咆哮起来，“送禁闭室！打一百棍，立即，立即执行！”

老人毫不争辩地躺下受刑，他用牙齿紧咬着胳膊，没有喊叫一声，没有呻吟一声，一动不动地忍受了这次刑罚。鲍—斯基和托—斯基当时已走进监狱，米—茨基在大门口等着他们，他跑过去和他们拥抱，虽然在此以前他并未见过他们。他们激动不安地把少校刑罚若—斯基

的事对他讲了一遍。我记得，米—茨基后来曾向我讲述过这件事："我当时非常气愤，"他说，"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我气得象发热病似的浑身直打哆嗦。我在大门口等着若—斯基。他在禁闭室受完刑罚后，应该直接从这里进监狱。旁门忽然打开了，若—斯基走进来，他谁也不看，面无血色，苍白的嘴唇颤抖着，从聚集在院子里的囚犯们(他们已经获知一个贵族正在受刑)中间穿过，走进狱室，直奔自己的铺位，一句话也没说，跪下来便开始祷告上帝。囚犯们都很惊讶，甚至深受感动。"他接着说："我一看见这位白发苍苍、把妻子儿女都抛在家乡的老人，我一看见这位忍辱受刑后又立即跪下来祷告上帝的老人——我便急忙跑到狱室后面，足足有两个小时还未能清醒过来；我气得发狂……"囚犯们从这时起就开始非常尊敬若—斯基，他们对待他总是很有礼貌。特别使他们敬佩的是，他在受鞭笞时竟未喊叫一声。

然而，有必要把全部真实情况都讲出来：绝不能根据这个例子来判断西伯利亚最高当局对待被流放的贵族的态度，不管这些被流放的贵族是俄国人，还是波兰人。这个例子只能说明，有时可能碰上恶人，如果这个恶人是某地的一位独揽大权的最高长官，如果这位凶恶的长官又特别不喜欢某个流放犯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流放犯的性命当然也就难保了。然而也不能不承认，西伯利亚最高当局，也就是那几位能影响其他长官的作风和行为的最高长官们，在对待流放的贵族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当慎重的，有时甚至也很想对他们宽纵一些，不象对待平民出身的流放犯那样。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第一，这些最高长官本身都是贵族；第二，以前曾发生过某些贵族由于不愿躺下受刑，而向掌刑人猛扑过去的事例，从而产生了可怕的结果；第三，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三十五年前突然有一大批贵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来，三十年来这些流放犯都已定居下来，并在整个西伯利亚博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在我蹲监狱期间，这些高级长官们遵照古老的传统习惯，对贵族出身的政治犯都往往另眼看待，不象对待其他流放犯那样。下级军官们也都仿效最高长官的榜样，对政治犯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当然，他们的看法和作风是从上边因袭下来的，他们不得不服从上边的旨意。不过，下级军官中也有很多愚蠢的人，他们对于上级的指令牢骚满腹，倘若允许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地各自为政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然而，并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完全没有。我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下面我还要讲到这一点。在军事监管下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第二类苦役犯(我也属于这一类)，其处境比起第一类苦役犯(在矿山服役)和第三类苦役犯(在工厂服役)来要艰苦得多。不仅对于贵族来说，而且对于所有的囚犯来说，都十分艰苦；这是因为对这一类苦役犯实行的看管制度完全是军事性质的，很象俄国内地的军犯连。军事看管更加严厉，规章制度也更加严格，总是戴着脚镣，总是处在卫兵的监视之下，狱门总是上着锁；对待其他两类苦役犯却没有这样严格。至少囚犯们都是这样说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很了解那边的情况。如果把他们调到法律上被认为是最严厉的第一类那里去，他们是会感到高兴的，实际上他们早就抱有这种幻想了。至于说到俄国内地的军犯连，凡到那里去过的人一讲起来都不禁毛骨惊然，他们都断言，整个俄国再也没有比军犯连更艰苦的地方了，和那里相比，西伯利亚简直要算是天堂了。因而，如果说我们监狱处在极其严格的军事看管制度下，处在总督本人的亲自监督之下，有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半官方人士出于个人恩怨和嫉妒心，秘密告发某些不可靠的军官放纵宽容某些政治犯——如果说在这种地方，贵族出身的政治犯还能享受到一些优惠待遇，对他们的态度和对其他苦役犯有所不同，那么，我敢于说，若是在第一类和第三类苦役犯那里，他们享受到的优惠待遇就会更多。因而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可以根据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情况来判断整个西伯利亚。从第一类和第三类苦役犯那里传来的各种消息，都证实我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监狱的长官对待我们贵族还是比较关心和谨慎的。在劳动和关押方面，对我们没有任何宽容：我们干的也是那种活，同样戴脚镣，同样受监禁，总之，和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在这些方面对我们是不可能宽容的。我知道，不久以前，这个县城里曾有过很多告密者，搞过很多阴谋活动：人们互相设陷阱，互相倾轧，

因此，长官们都很害怕告密。在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比被人告发宽容政治犯更可怕的呢！因此，人们都很胆小怕事，对待我们和对待别的囚犯完全一样，只是在体刑方面略有不同。当然，如果我们真的犯了什么过错，应该受刑罚的话，要鞭笞我们也很容易。这是他们的职责，也完全符合“在刑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尽管如此，他们始终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随便鞭笞我们；一般囚犯却常常无缘无故地遭受严刑拷打，特别是当他们落到某些下级军官或喜欢发号施令的人的手中时，这种事更是经常发生。据说，要塞司令获悉若—斯基老人的事情以后，十分气愤，并提醒少校以后要手脚规矩点。人们都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还听说，就连那位最信任少校并有点偏袒他的总督大人，虽然也认为少校忠于职守并有一定的才干，可是当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也把少校训斥了一顿。我们的少校对这些也不得不加以考虑。比方说，由于 A 的告密，少校非常痛恨米—茨基，尽管他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想对他进行迫害，但却始终未敢轻举妄动。若—斯基受刑的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公众舆论都一致反对少校，很多人都指责他，有些话甚至说得非常尖刻刺耳。

我现在又回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少校时的情景。我和另外一位和我同时入狱的贵族流放犯，还在托波尔斯克的时候就听人讲述过此人的令人讨厌的性格，当时那里住着一些已被流放了二十五年的老贵族，一见面他们就对我们深表同情，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羁押站的院子里，他们提醒我们要警惕我们这位未来的长官，并答应要尽一切力量或通过熟人来帮助我们，以使我们不受到他的迫害。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当时，总督的三个女儿正好从内地来探亲，她们收到了他们的书信，看来她们也确实在其父亲面前为我们说过情。可是这位总督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告诉少校，要他更加谨慎一些。下午两点多钟，我和我的难友来到该城，押解我们的卫兵带我们直接去见我们的统治者。我们在门房里等他。与此同时，已有人去找在狱中值勤的军士。军士刚一到，少校也来了。他那张紫红色的长满粉刺的凶恶面孔给我们留下一种特别不愉快的印象：仿佛是一只凶恶的蜘蛛跑出来捕捉误触到蛛网上的可怜的苍蝇似的。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的难友。他说话急促、生硬、令人猝不及防，显然是想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某某。”

“你呢？”他从眼镜底下打量着我，继续问道。

“某某。”

“班长！马上送他们进监狱，先到卫兵室按照民事犯的规格立即给他们剃光半边头；明天再给他们戴铁镣。这是什么外套？哪里发的？”他打量着我们穿的背上缝着一个黄圆圈的灰色棉袄，突然问道；这种棉袄是在托波尔斯克发给我们的，现在被他一眼发现了。“这是新式的！大概是一种新式样……是彼得堡……设计的……”他一边说，一边让我们转过身去，轮番打量着。“他们随身还带着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他突然向押送我们的宪兵问道。

“还有他们自带的衣服，大人，”宪兵立即挺直腰板答道，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谁都知道这位少校，谁都听说过他，谁都怕他。

“全部没收。每人只准留一件衬衣，而且必须是白色的，其他颜色的全部没收。别的东

西送去拍卖，卖来的钱入库。犯人不能有私人财产，”他一边严厉地瞪着我们，一边继续说，“你们要当心，要规规矩矩！如果让我知道，就得……受体刑！只要有一点行为不轨——我就鞭笞你们！……”

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接待，那天晚上我差一点没有病倒。我后来在狱中耳闻目睹的一切，又加深了我的印象；不过，关于我入狱时的情形我已经叙述过了。

我已经说过，狱方没有也不敢对我们有任何宽容，在干活时，当着别的囚犯的面他们不敢让我们干轻活。不过有一次，他们也曾试图这样做过：我和鲍—斯基在工程处当了整整三个月的文书。不过，这件事对外是严加保密的，是工程处处长亲自决定让我们去的。一些有关人员也许知道这件事，但他们都佯装不知。这件事发生在格—科夫当工程处处长的时候。格—科夫中校到我们这儿来真乃是从天而降，他在我们这儿待的时间很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不到半年的时间，甚至也许还要短些，——后来就被调到俄国内地去了，但他却给囚犯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囚犯们不只是喜爱他，甚至有点儿崇拜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不过，从一开始他就赢得了囚犯们的心。“他简直象是一位慈父！有他，就无须父母操心了！”——在他主持工程处工作期向，囚犯们常常这样说。我似乎觉得他是一位十分放荡而又豪爽的人。他对囚犯们非常亲热，几乎达到了温情脉脉的地步，他的确象慈父一样喜爱他们。至于他为什么如此喜爱囚犯们——那我就不知其中的原因了，不过只要一看见囚犯，他总是要对他们讲几句亲切友好的话，或者跟他们开几句玩笑，插科打浑一番，更主要的——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气，他的态度中丝毫也没有屈尊俯就或纯属官长恩赐的成分。他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自己的人。尽管他具有这种天生的民主作风，但囚犯们对他从来没有不尊重和放肆过。恰恰相反，只要一看见自己的长官走来，他们脸上便显得容光焕发，都脱下帽来，笑容满面地迎上前去，和他攀谈。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囚犯们都爱听。确实有这种深受群众欢迎的人。他平时总是那样朝气蓬勃，精神抖擞，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英姿飒爽。“他是我们的山鹰！”囚犯们谈起他时，总是这么说。他当然无法减轻我们的繁重劳动；他只掌管着工程处的工作，在任何一位军官的指挥下，这里的工作都是要按部就班地照常进行的。他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当他看到囚犯们已干完分配的活时，就不让他们再干下去，尽管还没有敲收工鼓，也让他们收工回狱。特别使囚犯们感到满意的是他对囚犯们的信任态度，不吹毛求疵，不发火动怒，不象别的长官那样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如果他丢失一千卢布，这些钱又恰巧被我们当中的一个惯偷拾到，我想那个惯偷也会把钱送还给他的。是的，我相信会这样的。当大家听到我们的“山鹰”同那位人人憎恨的少校发生了一次争吵以后，大家都对这件事十分关心。这件事发生在他来我们这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过去曾和我们的那位少校共过事，两位旧友久别重逢，自然要开怀畅饮一番。可是他们的关系却突然破裂了。自从发生那次争吵以后，格—科夫便成了我们少校的死对头。人们都说，他们争吵时甚至动手打了起来，对于少校来说这种事是完全可能的：他经常和人打架。囚犯们听到这件事以后，都非常高兴。“八只眼怎能同这种人友好相处呢！他是山鹰，而那一位却是……”下面通常是一些不便于形诸笔墨的骂人话。大家都很想知道他们两个当中究竟谁揍了谁。假若关于打架的传闻是不真实的(很可能是这样)，我想囚犯们一定会感到十分懊丧。“不，一定是中校占了上风，”他们说，“他个头虽小，但很勇敢，听说那一位吓得直往床下钻。”然而不久，格—科夫就被调走了，囚犯们又灰心丧气起来。诚然，工程处的长官都是一些好人，在我服苦役期间，处长曾更换过三、四个；“不过，再也遇不到象他那样的人了，”囚犯们说，“他是山鹰，他是我们的英雄和保护人。”这位格—科夫特别喜爱我们这些贵族们，就是他安排我和鲍—斯基到工程处去工作的。他调走后，这个惯例也没有改变。工程技术人员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对我们十分同情。

我们常到工程处去抄写文件，甚至把书法也练得娴熟了；可是最高长官突然下来一道命令，要我们立即回去干原来的活：有人告密了！不过，这倒也是件好事：办公室里抄抄写写的工作已使我们两个人厌倦了。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和鲍—斯基几乎总是形影不离地去干同一种活，我们最经常干活的地方是在作坊。我们俩一块聊天，一块谈论我们的希望和信念。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不过他的信念往往显得十分古怪和奇特。常常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也很聪明，但他们往往抱有一种稀奇古怪的信念。为了这种信念，他们一辈子饱经忧患，备尝艰辛，甚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要放弃这种信念，又会使他们感到十分痛苦，几乎是不可能的。鲍—斯基每次听到我的反驳后都很伤心，并用辛辣的言词回敬我。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许比我正确，不过我不知道；然而，我们终于分道扬镳了，这使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曾互相分担过忧愁。

与此同时，米—茨基不知为什么一年年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和愁眉不展了。他感到十分苦闷。从前，在我刚入狱的时候，他还比较能与人促膝谈心，还能常常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我入狱时，他蹲监已经三年。起初，他对很多事情还感兴趣，很想了解这些年来世界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由于他身陷囹圄，他对外界的一切都一无所知；他听我讲述时，也显得很激动。可是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似乎把一切都凝聚在内心之中了，犹如一盆燃烧着的木炭蒙上了一层灰。他心中的怨尤越来越大。“Je hais ces brigands，”（“我恨这些强盗，”）——当他看见苦役犯时，常常向我重复这句话；这时，我对苦役犯已有更多的了解，不管我怎样为苦役犯进行辩护，对他都不起任何作用。他不理解我的话，有时只是随声附和地表示同意；可是第二夫，他照旧重复说：“Je hais ces brigands。”顺便说一下，我和米—茨基常常讲法语，因而，那位在工地上当监工的士兵德拉尼什尼科夫，不知根据什么理由常常管我们叫“医生”。米—茨基只有在回忆起他母亲的时候，才显得精神振奋：“她年迈多病，”他对我说，“她爱我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健在？她倘若知道我在这里受鞭笞，她会感到非常痛苦的……”米—茨基不是贵族，他在流放前曾受过体刑。每当他回想起这件事时，总是咬紧牙关，竭力把视线转向一旁。最近一个时期，他常常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一天上午十一点多钟，他被召去见要塞司令。要塞司令高高兴兴、笑容可掬地出来接见他。

“喂，米—茨基，你昨天夜里梦见什么啦？”他问道。

“我一听，立刻打了一个寒颤，”米—茨基从要塞司令部回来后讲述道，“我的心仿佛被刀刺了一下一样。”

“我梦见接到了母亲的来信，”他回答说。

“比这还好，比这还好！”要塞司令说，“你自由啦！你母亲替你求情……她的请求被批准了。这是你母亲的信，这是释放你的命令。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出狱。”•

他回来时，面色苍白，这个消息使他大为震惊，他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用他那双颤抖而又冰冷的手紧紧握住我们的手。很多囚犯都来祝贺他，为他有幸出狱感到高兴。

他出狱后作为移民在该县城定居下来。很快就给他安排了工作。起初，他常来我们监狱，尽量把各种新闻告诉给我们。他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新闻。

除了米—茨基、托—斯基、鲍—斯基和若—斯基以外，其他四个贵族当中有两个还很年

轻，刑期也很短，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过为人都很正直、憨厚和坦率。第三个，阿—丘科夫斯基，头脑十分简单，没有任何特点；第四个，勃—姆，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给我们大家留下的印象很坏。不知为什么把他也当成了政治犯，连他自己也否认这一点。他是一个庸俗的小市侩，沾染了一身靠骗取小钱而发财致富的小商人习气。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除了自己的本行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粉刷匠，而且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粉刷匠。长官们很快就得知了他的这套本领，全城的人都来请勃—姆去给他们粉刷墙壁和天花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把所有的官邸都粉刷油漆一新。房主自己掏腰包付给他工钱，因此他日子过得相当富裕。不仅如此，还派他的一些伙伴跟他一块去干活。经常跟他干活的有三个人，其中两个学会了他的手艺，特别是那个叫特—热夫斯基的，粉刷画彩的本领一点也不比他逊色。我们的少校住的也是官邸，他也让勃—姆给他粉刷墙壁和天花板。勃—姆在他那儿干活特别卖力气，就连总督的官邸也没有这样认真粉刷过。少校住的是一幢木房，从外表看已经破旧不堪，可是里面却粉刷得象宫殿一样漂亮，少校感到十分满意……他常常一边搓着手一边高兴地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住在这样漂亮的房子里怎能不结婚呢？”他一本正经地补充说。他对勃—姆越来越感到满意，而且对其他几个和勃—姆一起干活的人也喜欢起来了。这项活干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少校完全改变了对我们政治犯的看法，并开始充当起我们的保护人来了。结果有一次，若—斯基被召到他的宅子里。

“若—斯基，”他说，“我使你受了委屈。我平白无故地鞭笞了你一顿，我知道这是冤枉了你。我现在懊悔了。你明自这一点吗？我，我，我对不起你！”

若—斯基回答说，他明白这一点。

“你明白吗，我，我，你的长官，把你叫来就是为了请你饶恕，你感觉到这一点了吗？你在我面前算得了什么？一条蛆罢了！甚至连蛆还不如：你是一个囚犯！而我——是奉上帝的旨意①当少校的。少校！你明白这一点吗？”

****

①在我蹲监狱期间，这句话不仅我们那位少校确曾这样说过，而旦许多低级军官，特别是那些从下面擢升上来的军官都这样说过。——作者注。

****

若—斯基回答说，他明白这一点。

“好啦，现在我和你言归于好，你感觉到，你完全感觉到这一点了吗？你能够明白并感觉到这一点吗？你想想看：我，我是少校……”

若—斯基亲自给我讲述了他们会见时的情景。看来，这个总是喝得烂醉如泥、爱和人打架、头脑紊乱的人也还有一点人的感情。如果考虑到他的理智不健全和缺乏教养，他的这一举动几乎可以认为是宽宏大量的举动。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醉意促成的。

不过，他的幻想并没有实现：他没有结婚，虽然他的住宅被粉刷完以后，他曾下定决心要结婚。他非但没有结成婚，反而受到了审讯，他被迫辞职了。他过去所干的一切坏事也都被揭发了出来。过去，他仿佛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对他的这次打击太出乎意外了。这一消息使全监狱的人都感到无比高兴，人们都象过节一般兴高采烈！据说，少校曾象一位老太婆一样嚎啕大哭，泪流满面。然而毫无办法。他被迫退职了，先是卖掉了两匹花斑马，然后又

卖掉了全部财产，陷入贫困的境地。我们后来看见他身穿一件破旧的便服，头戴一顶钉着帽徽的便帽。他恶狠狠地瞧着囚犯们。不过，身上的军服一旦脱去，他也就失掉了昔日的全部威风。穿着军服时，他俨然象是一尊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换上便服，他突然又变成了一个不足挂齿的无名小辈，活象是一个仆人。令人诧异的是，一件军服对于这些人来说竟是如此重要。

第九章　潜逃

我们的那位少校被撤职后不久，我们监狱里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苦役犯部被取消了，成立了一个刑事军犯连，直接归军事部门管辖，它是仿照俄罗斯刑事军犯连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说，第二类苦役流放犯不再被送到我们监狱里来了。从这时起，我们监狱就开始只接纳军事犯，即接纳那些未被剥夺公民权的士兵，这些士兵也和别的士兵一样，只是他们都判了刑，被送来服短期徒刑(最长不超过六年)，刑满出狱后再回到原来的营队去当普通士兵。不过，如果他们因第二次犯罪而再度被关进监狱的话，他们的刑期仍象过去一样，就将是二十年了。在这次体制改变以前，我们监狱里就有一个军犯部，那些军事犯之所以和我们待在一起，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关押他们。现在，整个监狱都变成军犯部了。当然，原来的苦役犯，即那些被褫夺了公民权、脸上打着烙印、头发被剃去一半的真正民事苦役犯，仍留在狱中，直到他们服完自己的刑期；新的苦役犯不再送来，留下的服完刑期后也将陆续离去，因而十年后，我们监狱里就不会再有一个苦役犯了。特别部的犯人也留在狱中，而且不断有新的犯有重大罪行的军事犯被陆续送来，直到西伯利亚开设最繁重的苦役营为止。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仍象过去一样：仍是原来那样的环境，干的仍是那些活，规章制度也几乎和原来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官长更换了，而且越来越多。任命了校官，连长，此外还任命了四名轮流在狱中值勤的尉官。残废老兵也取消了，代替他们的是十二名士官和一名军需官。实行十人编班，班长由囚犯们自己推选。不用说，阿基姆·阿基梅奇立即就成了挂名的班长。所有这些新成立的机构，整个监狱及其各级管理人员和囚犯们，均受要塞司令管辖，他是最高官长。这就是所发生的全部变化。不用说，囚犯们起初都很兴奋，他们猜测，议论，想摸清新长官们的脾气，然而，当他们看出一切仍和过去一模一样时，他们也就立刻平静下来，我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大家都摆脱了原来的那位少校，人人都仿佛松了一口气，精神上也随之振奋起来。惶恐不安的神色消失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必要时可以向长官作解释，无辜者不再代替有罪的人受惩罚了，除非在发生误会的情况下。就连酒也照旧继续在狱中出售，尽管原来的残废老兵已由士官所代替。这些士官多半都是一些正派而又机灵的人，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一开始，他们中间有些人企图在囚犯面前摆架子，这当然是由于缺乏经验，以为可以象对待士兵那样来对待囚犯们。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他们是在同谁打交道了。另外一些头脑过于迟钝的士官，也都在囚犯们面前碰了钉子。囚犯们有时甚至采取这样生硬的做法：例如，他们引诱士官上钩，用酒将他灌醉，然后严肃地提醒他：他曾和他们一起喝过酒，因而……这样一来，不管他们如何用牛肠子往狱中带酒或倒卖，士官们也就看着不管不问了，或者尽量不去注意这些事情。不仅如此，他们也象原先的残废老兵那样，常常到市场上去替囚犯们买面包圈儿、牛肉和其他物品，什么东西都买，只要携带着不伤大雅就行。至于为何要进行这样的变动，为何要建立军犯连，那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一切都是在我服苦役的最后几年中发生的。我还得在这种新制度下再熬上两年的时光……

是否要把我全部的监狱生活以及我在狱中所度过的全部岁月都记述下来呢？我不想这样做。如果把这几年中所发生的事以及我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依次一一描述出来，势必就会

使现有的篇幅再增加三倍、四倍。而这种描写到头来必然会显得过于千篇一律，描写出来的事件也会显得过于单调乏味，特别是当读者已经可以根据所写出的篇章对第二类苦役犯的生活有一个大致了解的时候。我很想把我们的整个监狱以及我在这几年中的感受在一幅图画上鲜明而完整地描绘出来。我不知我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其实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作出评判的。不过，我确信我应该就此结束我的故事了。况且，对往事的回忆有时也使我自己感到厌倦。有些事情我也未必都能回忆得起来。最后几年仿佛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我确信，有许多事情已被我完全忘却了。我只记得，那些年月都十分相似，过得既缓慢，又无生气。我记得，那些漫长而无聊的日子都十分单调乏味，就象雨后屋檐下的滴水声一样。我记得，只是对子复活，对于重新做人，对于新生活的强烈欲望，才给了我等待和期望的力量。于是，我终于克制住自己：我等待着，屈指计算着每一天，尽管后头还有一千天，但我仍怀着愉快的心情把每一天送走，埋葬，高高兴兴地迎接着第二天的到来，因为剩下来的终究不是一千天，而是九百九十九天了。我记得，在那些年月里，尽管周围有数百个狱友，但我却处在可怕的孤独之中，可是后来我竟喜欢起这种孤独来了。精神上的孤独，使我能够重温我过去的生活，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回首往事，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有时我甚至感谢命运给我带来了这种孤独，否则，我就不会进行这种自我批判，就不会这样严格地检查过去的生活了。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我下定决心，我暗自发誓：在我未来的生活中再也不能重犯过去的那种错误和过失了。我给自己的未来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决心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心：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期待着自由，我呼唤着它早日来到我的身旁；我希望在新的斗争中重新考验自己。有时我感到十分焦急……如今一回想起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就感到难过。当然，这一切都仅仅与我一个人有关……我之所以要写这一切，因为我认为任何人都会理解这一点的，任何人也都会有这种遭遇的，如果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被投入监狱服苦役的话。

不过，干吗要讲这些呢！我最好还是再讲点别的什么吧，以免故事结束得过于唐突。

我有时曾这样想，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谁也不能逃出监狱吗？难道这么多年就无人越狱潜逃过吗？我已经说过，一个囚犯在狱中度过两、三年以后，他就开始珍惜这几年的时光，不会不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最好还是不慌不忙地、不冒风险地把剩下的刑期服完，最后以合法身份在移民区定居下来。不过，这种想法只存在于那些刑期不长的囚犯的头脑之中，而刑期很长的囚犯也许是甘愿冒此风险的……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监狱里并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是因为人们都十分胆小呢，还是因为军事监管制度特别严格，或是因为我们县城的地形十分不利于逃跑(开阔的草原地带)？——这就很难说了。不过我想，这几种原因也许都有作用吧。的确，从我们这儿逃跑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在我蹲监狱期间，也曾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有两个囚犯，而且是两个最重要的囚犯，决心冒险去试一试……

少校被撤职后，_A(就是那个给少校当密探的人)就变得孤零零无人保护了。他虽然还很年轻，但性格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坚强起来，而且定了型。一般说来，他是一个胆大妄为、做事果断而又非常机灵的人。如果给他以自由，他也许会继续充当密探并靠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来谋生的，不过若是那样，他也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愚蠢和轻率了，也就不会又象从前那样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被流放了。他在监狱里学会了制造假身份证。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不能肯定，我只是听我们囚犯们这样说。人们说，他在少校的厨房里常常干这种事，不用说，干这种事曾使他捞到不少好处。总之，我想，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我曾有机会了解过此人的内心世界：他简直厚颜无耻到了令人气愤、令人嗤之以鼻的地步，使我感到极端厌恶。如果他决心搞到一瓶酒喝，而要想把

酒搞到手就非得杀掉一个人不可，我想他一定会把那个人杀掉的，只要这事能够悄悄地去干，不被人发现就行。他在狱中学会了谨慎从事。于是，这个人被特别部的囚犯库利科夫注意上了。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库利科夫。他虽已上了年纪，但却充满热情，精力旺盛，强壮有力，他具有各种特殊的本领。他浑身都是力量，对生活充满着渴望；象他这样的人，就是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也还是想要活下去的。如果说囚犯当中无人逃跑使我感到惊奇的话，那么首先使我感到惊奇的便是库利科夫。

不过，库利科夫已经下定决心逃跑了。他们两个人当中究竟谁对谁的影响更大：是 A 对库利科夫的影响大呢，还是库利科夫对 A 的影响大？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两个人很般配，他们俩都很适于干这种事情。他们交上了朋友。我猜想，库利科夫是指望 A 能把假身份证准备好。A 是贵族出身，而且交游很广，——这就预示着一旦到达俄国内地，他们就将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冒险事业来。别人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商量的，他们怀抱着什么样的希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不希望过那种平淡无奇的西伯利亚流浪生活。库利科夫是一位天才的演员，他能够扮演生活中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角色；他期望得到很多东西，起码他期望着事物的变化无常。这样的人本应受到狱方的严密监视。然而他们已商定好逃跑了。

要想逃跑，没有卫兵的协助是不行的。应该说服一个卫兵跟他们一起逃跑。驻守要塞的一个营队里有个精力旺盛的波兰籍士兵，他本应有一个很好的命运，虽说上了年纪，但仍显得矫健、稳重。他刚来西伯利亚当兵时还很年轻，由于强烈怀念故乡而开过小差。被抓回后，受了刑罚，并在军犯营关了两年。当他重新被送回去当兵时，他回心转意了，开始尽心竭力、勤勤恳恳地服务。后来由于成绩显著，被提升为班长。他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非常自信，而且自命不凡。他言谈话语中，都显得自命不凡。那几年我曾看见过他几次：干活时他和别的卫兵一起监押过我们。别的波兰人也曾跟我谈起过他。我似乎觉得，他昔日的乡愁已变成一种永恒的无声的仇恨，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头。这个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库利科夫选择他做同伴算是选对了。他姓科列尔。他们商妥一起逃跑，并订好了日期。当时正是六月，天气炎热。本地的气候相当稳定；夏天天气总是那么炎热，是适于过流浪生活的季节。当然，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能离开要塞直接上路：因为我们这座县城位于一块高地上，四面八方都很开阔。往四周走很远都见不着森林。他们需要先到城郊某个地方去一趟，换上一般老百姓的衣服，库利科夫早就在那儿找到了一个隐身之处。我不知道他们那些居住在城郊的朋友们是否参与了这次秘密行动。应该说他们是参与了，不过后来在侦讯这一案件时，并未得到充分的证实。那一年在城郊一个偏僻的地方，住着一位绰号叫万尼卡-塔尼卡的年轻而又十分漂亮的少女，她刚刚开始自己的社交活动，很有前途，而且后来她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还有一个浑名：火。看来，她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一行动，库利科夫已经在她身上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光。我们的好汉们一大清早就出工干活去了。这次派工安排得十分巧妙：让他们俩跟随一个过去当过砌炉工和抹灰工的囚犯希尔金一起去粉刷一座空营房，那里的士兵早已搬到野营地去了。A 和库利科夫是作为搬运工派去的。科列尔被派去监视他们。由于三个囚犯需要由两名卫兵跟随，而班长科列尔又是一位服役多年的老兵，所以便派了一个年轻的新兵给他当助手。我们的逃亡者想必对科列尔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他也很信任他们，因此，经过多年顺利的服务以后，这个聪明、稳重而又谨慎的人，便决计跟他们一起逃跑。

他们是在早晨六点来钟来到营房的。除了他们，那里没有任何别的人。干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活以后，库利科夫和 A 对希尔金说，他们要到作坊去看望一个熟人，并顺便带几件所需要的工具来。跟希尔金打交道可得十分留心，也就是说要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他原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市民，职业是砌炉工，他狡猾聪明，诡计多端，但却沉默寡言。他外表又瘦又弱。如果不是受到命运的嘲弄，他会按照莫斯科人的习惯穿一辈子坎肩和睡衣的，可是经过长期的漂泊后，他却进了我们监狱，而且是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军事犯终身被关在特别部里。他究竟是怎样落到这种地步的，我不知道；不过，他从未流露过任何的不满情绪；他举止温和而又稳重，只是有时象皮鞋匠那样爱喝几口酒，不过，即使喝醉了酒他也很安分守己。他当然不会参与秘密行动，不过他眼光却很敏锐。不用说，库利科夫曾向他挤眉弄眼，说到作坊后要把昨天藏在那儿的酒带回来。这句话打动了希尔金的心，他没有任何怀疑就跟他们分手了，他自己则和那个新兵留了下来；就这样，库利科夫、A 和科列尔到城郊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回来，这立刻引起了希尔金的怀疑。他是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开始回忆：库利科夫的情绪有点不对头，A 似乎曾和他嘀咕过两次，库利科夫至少也向他挤过两次眼，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了，现在都回想起来了。科列尔的情绪也有点不正常：他走前曾对新兵进行了一番训话：当他不在时应该怎么做；他的表情很不自然，至少希尔金觉得是这样。一句话，希尔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仍不见他们回来，他感到十分不安。他非常清楚，这件事会使他担当多大的风险：狱方可能会怀疑到他身上，认为是他故意放走了他们，他们之间可能达成了什么谅解。如果再迟迟不把库利科夫和 A 失踪的事向狱方报告，狱方对他的怀疑就会更大。时间不能再耽搁了。这时他又回想起来，最近一个时期库利科夫和 A 的关系特别密切，他们常常交头接耳，常常避开众人到狱室后面去溜达。他回想起他那时就对他们俩产生了某种想法……他用探寻的目光扫了卫兵一眼；那个卫兵正抱着枪打呵欠，傻头傻脑地用手指头抠鼻孔，因此希尔金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只简单地对他说，让他跟随自己到作坊去一趟。应该到作坊去问问他们是否到过那儿？结果，那儿的人谁也没有看见他们。希尔金的怀疑被证实了。“他们也不可能是到城郊喝酒闲逛去了，尽管库利科夫常常到那儿去，”希尔金心里琢磨着，“他们若是到那儿去，是会告诉我一声的，因为这种事无须瞒着我。”希尔金于是把活撂下，也不回营房，径直向监狱走去。

当他来到班长面前，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给班长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班长听后吓了一跳，起初甚至不敢相信。当然，希尔金向他声明：这一切都仅仅是猜测和怀疑。班长立即跑去报告少校。少校立即报告要塞司令。一刻钟以后，一切应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并报告了总督本人。潜逃的两个囚犯都是要犯，彼得堡可能会严加申斥的。不管正确与否，A 被认为是政治犯；库利科夫则是特别部的头号罪犯，而且是军事犯。在此以前，还没有发生过特别部囚犯越狱潜逃的先例。人们还回想起来，按照规定，特别部的每个囚犯外出干活时应该派两个卫兵跟随，至少也应该一对一。这一规定未能被遵守，因此才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立即往附近各村镇派去了信差，通知说有囚犯潜逃，并留下了他们的面貌特征。派了哥萨克去追捕他们；还给邻县邻省下了公文……总之，狱方感到十分害怕。

与此同时，囚犯们却处在另外一种焦急不安之中。他们一下工就立刻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大家听到这一消息后，都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这一消息震动了每个人的心弦……这一事件不仅打破了监狱里的单调而平静的生活，把监狱搅得象个蚂蚁窝一样乱成一团，而且在每个囚犯身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拨动了他们那早已被忘却了的心弦；一种类似希望和勇敢无畏的东西，一种对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渴望，又在每个人的心中翻腾起来了。“既然有人能

逃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他们一想到这里就振奋起精神来，带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别人。他们突然都变得高傲自大起来，开始用傲慢的目光打量值班的军士。不用说：狱方人员立即都飞奔到狱中来了，要塞司令也亲自来了。囚犯们振作起精神，大胆而又轻蔑地瞧着他们，一个个都沉默不语，显得既严肃又庄重，他们心中似乎在说：“我们会应付这种事情的。”狱方人员倾巢出动早已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他们还料到一定会进行搜查，因此事先都把东西藏了起来。他们知道，狱方遇到这种事往往都是事后聪明。果然不出所料，狱方人员忙乱起来，什么地方都翻寻到了，——但却一无所获。下午上工时，对囚犯们加强了警卫。晚上，哨兵一刻不停地查巡监狱；比平时多增加了一次点名，但点错的次数也比平时增加了两倍，这又引起了一片手忙脚乱：把囚犯们赶到院子里，重新进行清点。然后又按狱室点了一次名……总之，乱成了一锅粥。

然而，囚犯们对此却一点也不在乎。象以往遇到这种情况一样，他们都显得这事与自己毫无关系，整个晚上都显得格外彬彬有礼。“他们什么碴儿也找不到的。”狱方自然认为狱中可能还有逃犯的同谋者，因而下令对囚犯们进行监视和窃听。但囚犯们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干这种事情，难道还会把同谋者留下来吗？”“这种事情只能悄悄地去干，不会让别人知道的。”“象库利科夫和 A 这样的人，干这种事还能留下痕迹吗？他们办事老练圆滑，不会露出一点破绽的。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人，见多识广；上了锁的门他们也能进得去！”总之，库利科夫和 A 的声望在增长；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似乎觉得，这两个人的丰功伟绩将会流传到苦役犯的子孙后代，比监狱的寿命还会更长久。

“他们真老练！”一些人说。

“瞧，都以为从我们这儿跑不出去。现在不是有人逃跑了吗！……”另一些人补充道。

“不错，是跑啦！”第三个人一边说，一边带着权威的神气回头看看周围的人，“可是跑的是谁呀？象你这样的人敢跑吗！”

若是在别的时候，对一个囚犯讲这种话，那个囚犯会立刻回敬几句，以维护自己的面子的。可是现在却谦恭地默不作声。“的确，我们可不是库利科夫和 A 那样的人；光说不行，先得做出个样子给别人看看……”

“弟兄们，说真格的，我们干吗老待在这儿呢？”第四个人打破了沉默，他手托着腮，，谦恭地坐在厨房的窗台上，他的话声虽然很低，而且拖着长音，但内心里却显得十分得意。“我们干吗老待在这里？活着不象一个人，死了不象一个鬼。唉-唉！’’

“这种事可不象从脚上往下脱鞋那么容易。老唉声叹气有什么用！”

“瞧人家库利科夫……”一个火暴性子的年轻小伙子插嘴道。

“库利科夫！”另一个人立即接过去说，同时轻蔑地瞥了那个年轻小伙子一眼。“库利科夫！……”

那意思是说：有几个人能象库利科夫那样呢？

“还有 A，弟兄们，这小伙子也真够机灵，嘿，他可真是个机灵鬼！”

“那还用说！就连库利科夫也得听他的摆布。他可滑头啦！”

“喂，弟兄们，你们说说，他们现在已走远了吧……”

于是，人们立即又议论起他们是否已经逃走很远？他们朝哪个方向走了？最好往哪儿跑？附近有什么村镇？熟悉本地地形的人开口说话了。人们都兴趣盎然地听他们讲。他们讲起附近农民的习性，说这一带的农民都不可靠。离城市近的农民都老奸巨滑，他们不会同情囚犯的，如果被他们捉住，就会被他们出卖掉。

“弟兄们，这地方的庄稼汉可不好惹。哦-哦-哦，这些庄稼汉可厉害啦！”

“不可靠的庄稼汉！”

“西伯利亚人都是穷光蛋。要是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把人杀掉的。”

“哼，我们这几位也不是傻瓜……”

“当然啦，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谁能斗过谁。我们这几个人也不是好对付的。”

“那就等着瞧吧。”

“你怎么看？他们会被抓住吗？”

“依我看，一辈子也抓不住他们！”另一个火暴性子的人应声说道，一边用拳头捶着桌子。

“嗯，这就要看他们谁斗得过谁了。”

“我是这样想的，弟兄们，”斯库拉托夫接过话岔儿说道，“我要是一个流浪汉，他们一辈子也别想抓住我！”

“你？”

有的人笑了，另一些人则显出不愿听的样子。可是斯库拉托夫却再也憋不住了。

“一辈子也抓不住！”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弟兄们，我常常这样想：就是有一个小缝儿，我也能钻过去，他们休想抓住我。”

“说不定你肚子一饿，就会去找乡下佬要面包吃。”

一阵哄笑。

“要面包吃？胡说！”

“你还犟什么嘴？谁不晓得你和瓦夏大叔就是因为害死了一头牛①才被送到这儿蹲监狱的？”

****

①就是说他们杀死了一个乡下农民或一个乡下女人，因为他们怀疑他或她施展魔术，借用风力，使很多牲畜倒毙。我们监狱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杀人犯。——作者注。

****

笑声更大了。那些严肃的人更加气愤地瞧着他。

“全是胡说！”斯库拉托夫喊道，“这都是米基特卡造的谣，其实他也不是说我，而是说瓦西卡，不知怎么把我也给捎带上了。我是莫斯科人，我从小就过流浪生活。当教堂执事教我认字的时候，他揪着我的耳朵让我跟他背诵：‘上帝啊，大发慈悲吧，可别让我进地狱……’我却背成：‘大发慈悲吧，让我进警察局，’等等……你们瞧，我从小就开始过流浪生活了。”

又是一阵大笑。这正是斯库拉托夫所期望的。他不能不扮演这种小丑的角色。大家很快就不再理他了，又开始认真地谈论起来。主要是一些老年人和通晓这种事情的行家在议论，年轻人和性情温和的人则伸着脖子高高兴兴地听他们讲；厨房里挤满了人；军士们当然没有在场，因而大家都无拘无束。我发现有个鞑靼人听得特别带劲，他叫马麦特卡，身材矮小，颧骨很高，样子显得特别滑稽。他几乎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说，别人的话也几乎听不懂，可是他却从人堆里探出头来，津津有味地听着。

“怎么，马麦特卡，雅可西②？”没人答理的斯库拉托夫由于无事可做，便挨着他坐下来说。

****

②鞑靼语：好。

****

“雅可西！哈，雅可西！”马麦特卡一边兴高采烈地嘟囔着，一边向斯库拉托夫点着他那滑稽可笑的头，“雅可西！”

“他们不会被抓住吧？约克①？”

****

①鞑靼语：是。

****

“约克，约克！”马麦特卡一边挥着手，一边说。

“看来，你没听懂我的话，是吗？”

“是的，是的，雅可西！”

“去你的雅可西吧！”

斯库拉托夫用手指在他帽子上掸了一下，顺手把帽子往下一拉，蒙住眼睛，便高高兴兴地走出厨房，弄得马麦特卡困惑不解。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监狱都处于严格的戒备状态，对附近地区进行了紧张的搜捕。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囚犯们立即就得知了有关狱方在外面所采取的措施的准确消息。头几天的消息对逃亡犯是有利的：无影无踪，如同石沉大海。囚犯们都非常高兴。对逃亡者命运的一切担忧和不安都消失了。“他们什么也找不到的，一个人也抓不住！”——囚犯们都得意洋洋地说。

“不会有什么事；已经是出了膛的子弹，追不上啦！”

“再见吧，别怕，我一会儿就回来！”

“大家都说，附近地区的农民都被动员了起来进行搜查，凡是可疑的地方、森林、峡谷，都派人守卫着。”

“那也没有用，”囚犯们嘲笑着说，“他们准是遇到了什么人，把他们藏起来了。”

“那还用说！”另一些人说道，“我们的人可不是糊涂虫；他们事先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人们还进一步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逃亡者也许一直还在城郊某个地方待着，藏在某个人家的地窖里，等“警报”解除和头发长长，过个一年半载再从那里动身……

总之，大家都处在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状态中。可是，逃跑后的第八天，忽然传说已发现了线索。不用说，这些谣传立刻遭到囚犯们的蔑视和驳斥。可是这些传闻当天晚上就被证实了。囚犯们焦虑不安起来。第二天全城的人都在说，逃犯已被捉住，正在往回押送。到了下午，人们说得更加详细了：他们是在七十俄里远的一个乡村里被捉住的。最后，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值勤班长从少校那儿回来，明确地宣布：天黑以前就将把潜逃犯押回监狱，直接关进禁闭室。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这一消息对囚犯们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描述的。他们一开始似乎都很气愤，接着又灰心丧气起来。后来，有人企图加以冷嘲热讽。人们开始嘲笑，不过他们嘲笑的不是捕人者，而是被捕者，一开始说风凉话的只是少数人，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起来了。只有那些严肃、坚定、有独立见解、且又未被这种冷嘲热讽弄糊涂的人，才没有参与嘲笑。他们鄙夷地瞧着那些轻浮的人，自己却一言不发。

总之，库利科夫和 A 如今受到人们的贬抑，就象他们以前受到人们的赞扬一样。大家都乐意贬低他们，好象他们使大家蒙受了屈辱似的。人们带着鄙夷的神情讲述他们如何忍受不住饥饿，跑到乡下人家里去乞讨面包。这是把流浪汉贬得一无是处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是：逃亡者受到了追踪；他们躲藏在森林里；追兵从四面八方把森林包围起来。当他们看到实在走投无路时，便投降了。他们当时除了投降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傍晚时分，当逃亡者被捆绑着手脚、由宪兵监押着送回监狱时，全监狱的囚犯都拥到木桩栅前观看，瞧瞧怎样处置他们。当然，除了停在禁闭室旁的少校和要塞司令的马车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逃亡犯被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以便第二天

送审。囚犯们的嘲笑和鄙视立刻又烟消云散了。当他们更详细地了解到当时的情况以后，也觉得除了投降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大家便怀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审讯的结果。

“准得挨一千棍，”一些人说。

“岂止一千！”另一些人说，“会把他们打死的。A 也许会挨一千棍，库利科夫会被打死的，我的老弟，要知道他是特别部的囚犯呀。”

然而，他们都没有猜对。A 只挨了五百棍；这可能是因为考虑到他前一个时期品行良好，而且又是初犯。库利科夫似乎挨了一千五百棍。这次惩罚是相当宽宏大量的。他们俩都是有头脑的人，在审讯时没有牵连任何别的人，他们明确地说，他们是直接从要塞逃跑的，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我最替科列尔感到惋惜：他失掉了一切，失掉了最后的希望，他受的刑罚最重，大概挨了两千棍，后来把他作为一个囚犯发配到别的地方去了。A 受的刑罚较轻，这应感谢医生的帮助。他被送进医院后又神气起来，大声嚷叫着说如今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已作好准备去干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库利科夫受完刑罚后回到监狱，仍象过去那样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好象他从未离开过监狱似的。不过囚犯们对他的看法却变了。尽管库利科夫时时处处都表现得文质彬彬，但囚犯们从内心里不再尊敬他了，他们对待他似乎更加简慢无礼起来。总之，在这次潜逃之后，库利科夫的声望大大降低了。成功，对于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

第十章　出狱

我现在所讲述的一切都是在我服苦役的最后一年中所发生的。这最后的一年，特别是服苦役的最后几个月，也几乎象第一年一样使我终生难忘。然而细说这一切有什么用处呢！我只记得，在这一年中，尽管我十分焦急地等待着刑期快快结束，但日子过得却比头几年轻松些。这首先是因为我在囚犯当中已结识了很多朋友和知己，他们最终都认定我是一个好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我都很热诚，并真心地爱我。在送别我和另一位难友出狱时，那个开路先锋几乎失声痛哭起来；出狱后，我们在本城一家公寓里又住了整整一个月，他差不多每天都来看望我们，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事，只是想来看看我们。不过，也有一些直到最后对我都很冷酷和不友好的人，看来，他们连一句话也不愿意跟我说——天晓得因为什么。我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鸿沟。

一般说来，我在最后一个时期享受到的优惠待遇比整个服役期间所享受到的还要多。在本城供职的那些军官中有我的一些老相识，甚至还有我小时的一些同学。我和他们恢复了来往。通过他们的帮助，我能够得到更多的钱，能够往家里写信，甚至能够弄到书看。几年来，我一本书也没有读过，我在狱中所读到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的那种奇特而又使我激动不安的印象，是难以描述的。我记得那天晚上，狱室上锁以后，我就开始阅读那本书，读了一个通宵，直到天亮。那是一本杂志。它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给我带来了信息；昔日的生活又极其鲜明而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竭力根据所读过的内容猜测我是否已经落后于生活很远？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是否发生了很多事件？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正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我一字一句地进行推敲，竭力从字里行间发现蕴藏的涵义和对过去的暗示，寻觅那些当时曾使我们感到激动不安的事件的痕迹；如今，当我充分意识到我已经远远落后于新的生活，已经同一切失掉了联系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悲伤。必须习惯于新的事物，

必须熟悉新的一代。我特别留心阅读着那些署着我从前的朋友和熟人名字的文章……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名字，出现了一些新的活动家，我十分渴望赶快熟悉他们；然而使我感到苦恼的是，我手头的书是如此之少，要想搞到书又是如此困难。从前，在我们那位少校的管辖之下，往狱中带书是很危险的。如果被搜查出来，就一定要追问："书是从哪里来的？从什么地方搞到的？原来你同外界还有联系呀！……"对于这些质问我能回答什么呢？由于过着无书的生活，我不得不暗自思考，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力求解答那些问题，它们有时使我感到很伤脑筋……这一切是讲述不完的。

我是在冬天入狱的，因此我也应该在冬天，在和入狱时间相同的那个月份出狱并获得自由。我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冬天的到来，夏末时，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眼巴巴望着树叶在凋零，草原上的野草在枯萎。夏天过去了，秋风开始呼啸，开始下第一场雪……盼望已久的冬天终于到来了！由于预感到了自由，我的心顿时猛烈地跳动起来。然而，说也奇怪：时光过得越快，刑期越是接近于结束，.我反倒变得越发有耐性了。最后几天我甚至感到惊奇，并暗自责备自己：我怎么变得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和熟视无睹了呢？工余时间，很多囚犯在院子里碰见我，都首先开口跟我说话，向我表示祝贺：

"亲爱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很快就要出狱了，快啦，快啦。您就要把我们这些孤苦伶仃的人丢下不管了。"

"怎么，马尔蒂诺夫，您不是也快了吗？"我答道。

"我？唉，别提啦！我还得在这儿再熬上七年……"

他暗自叹息着停住脚步，心不在焉地望着远处，仿佛在眺望未来似的……是的，很多人都真诚地、高高兴兴地向我表示祝贺。我觉得，大家似乎都对我更加亲热起来了。显然，我已不再是他们的人了；他们在向我告别。贵族出身的波兰人克—钦斯基，是个文静温顺的青年人，他也象我一样，闲暇时喜欢长时间地在院中散步，他希望借助于新鲜空气与活动来保持身体健康，以弥补夜间狱室里的污浊空气所带来的危害。"我急切地盼望着您出狱，"有一次散步时他碰见我，面带微笑地对我说，"等您一出狱，我就会知道，离我出狱的那一天还有整整一年。"

我要在这里顺便指出，由于耽于幻想和长期脱离现实，我们囚犯心目中所想象的自由，似乎比真正的自由即现实生活中的那种自由还要更加自由。囚犯们往往夸大真正的自由这一概念，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正是每个囚犯的特点。在囚犯们看来，任何一个衣服褴褛的勤务兵几乎都是一位王子，和囚犯们相比，他们几乎都是自由人的化身，就因为他们没有被剃光半边头，他们不带脚镣，不受监押。

出狱那天的前夕，在暮色苍茫中，我绕着监狱的木桩栅作最后一次散步。在那些年月里，我围绕着这些木桩散步何止有千百次啊！在我入狱后的第一个年头，我常常独自一人，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在这里流连徘徊。我记得，我当时曾屈指计算过我还将在这里度过多少时日。天哪，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那只鹰被俘后的生活也是在这里，在这个角落里度过的，彼得罗夫也经常在这里和我相遇。就是现在，他也没有离开我。他跑过来，象是想要猜测我的心事似的，默默不语地在我身旁走着，又仿佛暗自对什么感到惊奇。我默默地向我们狱室周围那些已经变黑了的圆木桩告别。当时，在我刚入狱的时候，这些圆木桩在我看来都是多

么冷漠无情呵！和那时相比，它们现在想必也已衰老，不过，我并未觉察出有什么不同。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应该把一切实话都说出来：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

这究竟是谁之罪？

第二天天刚亮，在出工干活以前，我到各狱室向全体囚犯告别。许多长满老茧的有力的大手亲热地向我伸过来。有的人满怀狱友的情谊握住我的手，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另外一些人已十分清楚，我马上就要成为和他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了。他们知道我在本城有一些熟人，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到那些老爷家去，又要和那些老爷平起平坐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而在和我告别时虽然态度也很和蔼可亲，但却远远不象是跟一位难友告别，反倒象是和一位老爷告别。有些人转过身去不看我，显得十分冷淡，对于我的告别话也不作回答。有几个人甚至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看着我。

上工鼓敲响了，大家都出工干活，我留下来。这天早晨苏希洛夫起得比谁都早，他急急忙忙地赶快把茶给我准备好。可怜的苏希洛夫啊！当我把几件旧狱服、衬衫、脚镣带和一些钱送给他的时候，他竟失声痛哭起来。“我需要的不是这些，不是这些呀！”他一边用力咬住他那颤抖的嘴唇，一边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知道您走后我会失掉什么吗？没有您，我在这儿还能依靠谁呀！”我和阿基姆・阿基梅奇作最后一次告别。

“您也快啦！”我对他说。

“我还早着呢，我还得在这里蹲很长的时间，”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喃喃地说。这时，我搂着他的脖子，我们互相亲吻了一阵。

囚犯们上工十分钟以后，我和另外一位跟我同时入狱的难友也走出监狱，我们永远不再回来了。为了把脚镣卸掉，必须直接到锻工车间去。这时已没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押送我们，只有一名军士跟随我们一同去。在锻工车间给我们摘除脚镣的也是我们的囚犯。在给我那位难友摘脚镣时，我站在一旁等着；然后我走到铁砧跟前。铁匠们让我转过身去，背向着他们，他们从后面抬起我的脚，放在铁砧上……他们忙乱了一阵，都想把这件活干得更灵巧、更出色些。

“铆钉，铆钉，先转动铆钉！……”一位年纪较大的锻工喊道：“把它放下，就这样，好啦……现在用榔头砸吧……”

铁镣掉在地上。我把它拣起来，擎在手里，最后看了它一眼。想起来多么奇怪啊：它刚才还戴在我脚上呢。

“好啦，愿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囚犯们用断断续续、粗声粗气、但似乎又有点高兴的声音说。

是啊，愿上帝保佑！自由，新生活，死里逃生……多么美好的时刻啊！

================================

译后记

《死屋手记》是一部描写沙俄时代监狱生活的小说，它的引言和第一章最初于一八六 0 年九月一日发表在《俄罗斯世界》上，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又陆续在《时报》上全部刊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要求废除农奴制、实行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团体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尼古拉一世及其鹰犬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黑暗统治，对国内进步势力加以疯狂打击与迫害，把很多知识界人士关进监狱或发配边疆，妄图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因为参加进步青年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被捕入狱的。

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于一八四九年春被捕，审讯持续了八个月，其中有二十一人以“参与阴谋活动”的罪名被判死刑，重要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在集会上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在十二月一个严寒的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成员被绑赴刑场。刽子手给他们披上白色尸衣，准备行刑，这时突然宣布：最高当局决定将死刑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

一八五 0 年一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之一、诗人杜罗夫一起，被押解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军事监狱，开始了四年漫长的苦役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投进了“漆黑的地狱之中”。苦役虽然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的世界观，却未能蒙住作家聪慧锐敏的眼睛。这个期间，他广泛地接触狱友，细心观察和研究囚犯们的生活，搜集材料，构思未来的作品。严酷生活的篇章，丰富而强大的人民精神，展现在作家面前。在昏暗窒闷的囚犯病房里，他俯身在小桌上，将自己的印象、感受以及许许多多的民间谚语和俗语，记在他那本《西伯利亚笔记》里。这本笔记被保存了下来，里面记载的许多材料后来都被作家写进《死屋手记》和其他作品中了。一八五四年二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出狱后，在给其长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他在苦役期间搜集的材料“足足能写成几本书，……我从监狱里带出来多少人民的典型人物和性格啊！我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因此我十分了解他们……”

《死屋手记》发表后，立即为革命民主主义阵营所接受，被看做是“对卑鄙龌龊的俄国现实生活的愤怒揭露”。除了一小撮反动的当权者以外，绝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都热烈欢迎这部作品。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末，屠格涅夫从巴黎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十分感谢您惠寄《时报》两期，拜读后，甚感满意。我特别喜欢您的《死屋手记》，关于澡堂情景的描写，在文风上很象但丁；您对于笔下的各种人物(例如彼得罗夫)，都有很多细腻而真实的心理描写。”

赫尔岑为向俄国国外读者介绍《死屋手记》，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有过精辟的论述：“此外，且不可忘记，这个时代①还给我们留下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象但丁题在地狱入口处的著名诗句一样惹人注目，就连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预料到他讲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惊；作者用他那戴

着镣铐的手描绘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鲜明图画。”

****

①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农奴制改革前社会思潮高涨时期。

****

《死屋手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蜚声于世界文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对西伯利亚苦役生活作过如此深刻动人的描写。苦役监狱里关押着各种各样的囚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因反抗沙皇政府的统治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囚犯们每天被迫参加繁重的劳动，稍有一点越轨行为，就要遭受狱吏的严刑拷打，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打开《死屋手记》，一幅幅关于苦役生活的生动鲜明的画面，一段段对囚犯心理的描写，一件件离奇怪诞的犯罪事实，立刻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每章既是整体的一部分，又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每一章都和整部小说的主题紧密相关，都是为描写监狱生活服务的，对个别人物的刻划也都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

然而，仅仅从描写监狱生活的角度来评价《死屋手记》，显然是不够的，作品的题材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囚犯的经历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行时，往往进一步探究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囚犯并非都是天生的“恶人”或“痞子”。“到处都有好人和坏人”，监狱里的囚犯“也许一点儿也不比那些还留在狱外的人更坏”。囚犯也是按照同样的生活规律生活着，他们同样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厌恶的外壳包裹着”。囚犯也是人，因而应该受到人的待遇，——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作者对于那些草菅人命的各级官吏和刽子手则充满强烈的愤怒。《死屋手记》中这种人道主义立场曾受到民主主义评论家皮萨列夫的高度赞扬。皮萨列夫在一篇专门评述这部作品的论文《已经死亡和正在死亡的》中写道：“大概未必用得着向那些有头脑的读者证明，一个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罪犯，仍然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读者都是有头脑的，因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谈论囚犯的人类尊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危险的。”这里顺便提一下，就因为这篇文章，皮萨列夫几乎受到沙皇政府的审讯。《死屋手记》最初在杂志上发表时，也曾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种种刁难和阻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平民对贵族和官僚的态度、金钱的作用、劳动的作用等等。一般囚犯对贵族出身的难友的敌视态度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吃惊，这在《死屋手记》中有大量的描写，并从社会学的角度作了解释。在这方面，《请愿》一章写得特别深刻。尽管贵族出身的讲故事者戈梁奇科夫完全理解囚犯们对贵族的仇视心理，并竭力为这些囚犯辩护，但他们并没有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普通劳动人民和贵族地主阶级之间“似乎永远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卓越的艺术才能塑造了一些普通人民的光辉形象。作者往往用很短的篇幅，淡淡几笔就把他们勾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例如他笔下的彼得罗夫、巴克卢申、库利科夫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渴望生活，向往自由，和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的悲观、仿徨、怨天尤人的精神状态迥然不同。他们大都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受尽了欺压和凌辱。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他们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

无罪的，他们从未受到过良心的谴责，也从未感到过懊悔，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神圣权利充满坚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如果处在另外一种环境下，这些囚徒的天性和优良品质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发展。作家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曾感慨系之地写道："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这究竟是谁之罪？"

然而，必须指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并不是这些叛逆者，而是文静温顺的少年阿列伊、心地善良的寡妇娜斯塔霞 •伊万诺夫娜以及那个从斯塔洛杜布旧教徒村来的殉教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初步提出了一种道德规范，并错误地把它当作俄国人民的最高理想。天性的纯洁与高尚，对宗教的笃信，真诚的人类之爱——这就是他赋予他所喜爱的人物的主要持点。作家在后期作品中塑造的梅什金(《白痴》)，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形象，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特点。列夫 • 托尔斯泰特别重视《死屋手记》的这一方面，并从中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本人的信念十分接近。托尔斯泰在一八八 0年九月二十六日致友人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近日身体不适，一直在读《死屋》。反复读了多遍，不忍释手，我认为在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书了。书中的观点(我不是指它的基调)令人惊叹：真挚而朴实，符合基督教精神。这是一本富有教益的书。我昨天反复欣赏了一整天，我很久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艺术享受了。如若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转告他：我喜爱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信仰的空洞说教，他所宣扬的逆来顺受、超阶级的人类之爱等不健康思想，早已被革命人民所摒弃，但他那些以强大的艺术力量描写现实生活、反映群众的深重苦难和对统治者的愤怒抗议的伟大作品，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无怪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进步青年，一方面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宣扬的消极思想，另一方面却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朗诵《死屋手记》，并对它的作者报以热烈欢呼。

王健夫